

书文化大观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广宇
编 著



书

· 朱湘 ·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避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它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地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昏是婚的古字：在太阳下了山，对面不见人的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擎着红光闪闪的火把，悄悄向一个人家走近。等着到了竹篱柴门之旁的时候，在狗吠声中，趁着门还未闭，一声喊齐拥而入，让新郎从打麦场上挟起惊呼的新娘打马而回。同来的人则抵挡着新娘的父兄，作个不打不成交的亲家。

印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矫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楷体是最常见的了。这里面又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一种是通行的正方体；还有一种是窄长的楷体，棱角最显；一种是扁短的楷体，浑厚颇有古风。还有写的书：或全体楷体，或半楷体，它们不单看来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并且有时有古代的写本，很足以考证今本的印误，以及文字的假借。

如果你面前的是一本旧书，则开章第一篇你便将看见许多朱色的印章，有的是雅号，有的是姓名。在这些姓名别号之中，你说不定可以发见古代的收藏家或是名倾一世的文人，那时候你便可以让幻想驰骋于这朱红的方场之中，构成许多缥缈的空中楼阁来。还有那些朱圈，有的圈很豪放，有的圈很森严，你可以就它们的姿态，以及它们的位置，悬想出读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少年，还是老人；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你也能借此揣摩出这主人翁的命运：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了人间？是子孙不肖，将他舍弃了？是遭兵逃反，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还是运气不好，家道中衰，自己将它售卖了，来填偿债务，或是支持家庭？书的旧主人是这样。我呢？我这书的今主人呢？他当时对着雕花的端砚，拿起新发的朱笔，在清淡的炉香气息中，圈点这本他心爱的书，那时候，他是决想不到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他自己的未来命运，是个怎样结局的；正如这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我，不能知道我未来的命运将要如何一般。

更进一层，让我们来想象那作书人的命运：他的悲哀，他的失望，无一不自然地流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

时候，时而跟着他啼，时而为他扼腕太息。要是，不幸上再加上不幸，遇到秦始皇或是董卓，将他一生心血呕成的文章，一把火烧为乌有；或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一般命运，被浅见者标作禁书，那更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呵！天下事真是不如意的多。不讲别的，只说书这件东西，它是再与世无争也没有的了，也都要受这种厄运的摧残。至于那琉璃一般脆

弱的美人，白鹤一般兀傲的文士，他们的遭忌更是不言而喻了。试想含意未伸的文人，他们在不得意时，有的樵采，有的放牛，不仅无异于庸人，并且备受家人或主子的轻蔑与凌辱；然而他们天生得性格倔强，世俗越对他白眼，他却越有精神。他们有的把柴挑在背后，拿书在手里读；有的骑在牛背上，将书挂在牛角上读；有的在蚊声如雷的夏夜，囊了萤照着书读；有的在寒风冻指的冬夜，拿了书映着雪读。然而时光是不等人的，等到他们学问已成的时候，眼光是早已花了，头发是早已白了，只是在他们的头额上新添加了一些深而长的皱纹。

咳！不如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读“人生”这本书罢！

选自《朱湘》

书 房

· 梁实秋 ·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待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赏玩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股怪味，不是桂馥兰薰，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其实除了赤贫的人囊馕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来亨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的女公子用一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度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借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滞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榻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榻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 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 ooze calf, etc），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

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在青岛的时候，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度藏中文图书的办法，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用白粉写上宋体字的书名，直立在书架上。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但是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惟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于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护，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笈，笈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笈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笈药里封尘网”的书笈是否即系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笈早已封尘网了！

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牛将安觅？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的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齐的靠着整垛山墙的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以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来参观，叹曰：“造这样大的木架有什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鱼之扰，真不如尽量把图书塞入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如果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选自《梁实秋散文》

我所爱读的书

· 苏雪林 ·

每逢刊物征稿，主编先生出“我最爱的”这一类题目，很富于诱惑性，能使最懒惰的作家也激发出一点提笔的勇气。但我碰着这样好题目，反应还是漠然，因为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又是一个好恶易于变迁的人，当我的兴趣集中于某一事物时，觉得天地间唯此最为可爱，若兴趣转移于别一事物，则爱好的标准也随之而迁，所以凡我认为适意者无可可爱，但若问我什么是最爱，我想除了我的宗教信仰的对象以外，其他都说不上。现在既蒙编辑先生以此题征稿，只有随意写一篇吧。

我所爱读的文字都是偏于想象恢宏，辞采瑰丽的那一类，若带有荒唐悠邈的神话成分，则更与我口味相合。在先秦文籍中，我爱读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招魂。这些文章内容非常深奥，二千年来注家辈出，总不能发现它的庐山真面，所以它的神秘美更加深厚，好似一片绿波，沧漭闪烁，天光云影，上下荡摩，虚幻与真实，交织成一张绮丽的梦的网，把你的灵魂轻轻摇摆到美妙的仙境里去。假如将来有个独具炯眼的注家，将屈赋的意义，还它个水落石出，则屈赋的神秘美即将消失了吗？不然，我相信这样反能使屈赋的内容更见丰富，文艺的价值更高，这种美的保持将更坚实。要知真正神秘美有它独立性的，那些建筑在“朦胧”和“晦涩”基础上的，都是些假货呀！屈赋之次，我欢喜六朝民间恋歌，像子夜歌、读曲歌、华山畿和一部分杂曲。这是中华儿女真的心声，给予读者心弦的共鸣，也万古常新，不受时代影响。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篇幅很多，其中许多作品我认为无味，但为了它包含这些恋歌，也就成了我架上常备书之一。盛唐诗人中我最爱杜少陵，他那种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作风，投合我的个性。我的心灵也许是因为弹性太强吧，轻飘飘的东西，总觉得镇压它不住，只有长江大河的浩瀚，泰岱华岳的庄严，才能将它熨贴得平稳。杜诗正有这种气魄，这种分量，所以特为我心灵所欢迎。李长吉、李义山、温飞卿的诗集，我常放在杜诗一起，理由就是我爱唯美文学。宋诗我爱陆放翁，一部剑南诗钞，几乎圈点遍了。清代诗家，我顶欢喜袁子才，这位负佻达文人之名随园老人，生前挨过许多骂，身后也负谤无穷，但我对于他的小仓山房全集，自幼至今，爱诵不衰。他的诗固有不少油腔，但长篇五七古，融才学识于一炉，爽快磊落，极见才气。他偶一发言均带幽默意味，更见其天分之高。再在他笔下，任何话都可说明，任何意均可曲达，所谓“使笔如舌”实非虚誉。照我看来，普通人的舌头还不及他的笔尖来得那么圆转自然呢。我同意洪吉亮所加于他的“通天神狐，醉则露尾”的考语，但我们若不问神狐变化的神通，专去注意他那条偶然拖下的尾巴，态度也是有失公平的。也许我初学作旧诗时，系由随园入手，第一次得来的印象自难泯灭，故尔有此偏见吧。道光时诗人龚定庵的作品，缥缈幽深，雄奇哀艳，于汉魏唐宋诸家之外，自成一种风格。他的势力，笼罩同光以后的诗坛，决非无故而然。我虽然不能模仿他的作风，但我承认自己是受他魅力所支配之一人。宋词我爱苏东坡、辛弃疾、吴梦窗、张叔夏的，清词我爱纳兰成德的。元曲我认为无价值，只有经过金圣叹等人笔削改造过的西厢记例外。小说红楼、水浒外，也爱读忽来道人的荡寇志。蒲留仙文言的聊斋志异，白话的醒世姻缘传，已翻过多次了。若在闷居无聊时，这两部

书落在我手里，我相信还有兴趣阅读它一个通篇。聊斋的俗曲也极好，作者的思想是庸俗的，文笔却极高妙，无论如何，你不得不承认蒲留仙确是个天才作家。

西洋文学我涉猎颇少，诗歌爱读的是荷马的两部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可说百读不厌。其次是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戏剧则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威尔斯的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梅特灵的青鸟，王尔德的莎乐美。小说则爱读的极多，林琴南所译的几种名著如块肉余生述、贼史、十字军英雄记、萨克逊劫后英雄录、红礁画桨录、迦茵小传都是我国文启蒙老师，到今回忆，尚有余味。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及他长篇一生，在我脑中也有深刻印象。哈代的人生小讽刺专写人生黑暗面，那一种辛辣味，很能刺激我们麻痹的灵魂。但哈代的辛辣与我国鲁迅不同，哈代发自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鲁迅则不过他个人惨澹少恩病态心理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哈代作品耐读。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发扬原始基督教的精神，当然极富于崇高之美，但我又欢喜描写灵肉斗争的作品，因此，霍甫特曼的异端，法朗士的黛丝，并不以宗教家禁阅而放逐之于我书斋以外。更有一部哀感顽艳的哀绿绮情书不能使我忘怀。童话则爱安徒生的全集，加洛里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及其他世界童话名著。我是一个至老尚具“童心”的人，好的童话往往能使我像一个孩子似地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手。战后检点我自己的书所存已是无几，然而我偏偏保存十几种北新书局出版，赵景深先生赠送我的童话书，这能教谁相信呢？近年我研究一点子神话，曾读巴比伦、亚述、埃及、印度古代神话若干种，最美的还推希腊。卡来尔的英国文艺中的古神话，给了我许多希腊神话知识，也给了我若干文艺创作灵感。

宗教方面，一部新旧约和吴经熊所译的圣咏集是我日常精神的食粮。还有马相伯译的一部灵心小史，亦我随身的珍籍。这本圣女德兰自传，确系宇宙有数奇书，它教给我们什么是“虔敬”的德行。我国人的聪明才智何尝在西洋民族之下，可惜数千年来深中道家余毒，不知“虔敬”为何事，所以无论什么事都干不好，我现在愿意向国人介绍这本灵心小史，希望我们能从这里面学习一点儿东西。

选自《归鸿集》

城隍庙的书市

· 阿英 ·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城隍庙，每天到那里去的人是很多很多，有的带了子女，买了香烛，到菩萨面前求财乞福。有的却因为那里是一个百货杂陈，价钱特别公道的地方，去买便宜货。还有的，可说是闲得无聊，跑去散散心，喝喝茶。至于帝国主义者，当然也要去，特别是初到中国来的；他们要在这里考察中国老百姓的落后风俗习惯，以便在《印象记》一类书里进行嘲笑、侮辱。我也常常地到城隍庙，可是我却另有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目的，说典雅一点，就是到旧书铺里和旧书摊上去“访书”。

我说到城隍庙里去“访书”，这多少会引起一部分人奇怪的，城隍庙那里有什么书可访呢？这疑问，是极其有理。你从“小世界”间壁街道上走将进去，就是打九曲桥兜个圈子再进庙，然后从庙的正殿一直走出大门，除开一片卖善书的翼化善书局，你实在一个书角也寻不到。可是，事实没有这样简单，要是你把城隍庙的拐拐角角都找到，玩得幽深一点，你就会相信城隍庙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很大的古董铺、书画碑帖店、书局、书摊、说书场、画像店、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不仅有，而且很多。对于这一方面，我是相当熟悉的，就让我来引你们畅游一番吧。

我们从小世界说起。当你走进间壁的道路，你就得留意，那儿是第一个“横路”，第一个“弯”。遇到“弯”了，不要向前，你首先向左边转去，这就到了一条“鸟市”；“鸟市”，是以卖鸟为主，卖金鱼、卖狗，以至于卖乌龟为副业的街。你闲闲地走去，听听美丽的鸟的歌声，鹦哥的学舌，北方口音和上海口音的论价还钱，同时留意两旁，那么，你稳会发现一家东倒西歪的，叫做饱墨斋的旧书铺。走进店，左壁堆的是一直抵到楼板的经史子集；右壁是东西洋的典籍，以至于广告簿；靠后面，是些中国旧杂书；二十年来的杂志书报，和许多重要又不重要的文献，是全放在店堂中的长台子上，这台子一直伸到门口；在门口，有一个大木箱，也放了不少的书，上面插着纸签——“每册五分”。你要搜集一点材料吗？那么，你可以耐下性子，先在这里面翻；经过相当的时间，也许可以翻到你中意的，定价很高的，甚至访求了许多年而不得着的，自然，有时你也会化了若干时间，弄得一手脏，而毫无结果。可是，你不会吃亏。在这“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曾见到、听到过的许多图书杂志，会像过眼云烟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断片。翻书本已是一种乐趣，而况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中意的书已经拿起了，你别忙付钱，再去找台上的。那里多的是整套头的书，《创造月刊》合订本啦，第一卷的《东方杂志》全年啦，《俄国戏曲集》啦，只要你机会好，有价值的总可以碰到，或者把你残缺的杂志配全。以后你再向各地方，书架上，角落里，桌肚里，一切你认为有注意必要的所在，去翻检一回，掌柜的决不会有什么误会和不高兴。最后耗费在这里的时间，就是讲价钱了，城隍庙的定价是靠不住的，他“漫天开价”，你一定要“就地还钱”，慢慢的和他们“推敲”。要是你没有中意的，虽然在这里翻了很久，一点不碍的，你尽可扑扑身上的灰，很自然的走开，掌柜有时还会笑嘻嘻地送你到大门口。

在旧书店里，徒徒的在翻书上用工夫，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书不一定

放在外面，你要问：“老板，你们某一种书有吗？”掌柜的是记得清自己的书的，如果有，他会去寻出来给你看。要是没有，你也可以委托他寻访，留个通信处给他。不过，我说的是指的新书，要是好的版本，甚至于少见的旧木版书，那就要劝你大可不必。因为藏在他们架上的木版书虽也不少，好的却百不得一。收进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好书，这些好书，一进门就会被三、四马路和他们有关系的旧书店老板挑选了去，标上极大的价钱卖出，很少有你的份。但偶尔也有例外。说一件往事吧。有一回，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六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而原定价只有三元，当然我不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多了。他笑嘻嘻的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最后讲价，是两毛钱一本，这两毛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是毕竟不多的。

带住闲话吧。从饱墨斋出来，你可以回到那个“弯”的所在，向右边转。这似乎是条“死路”，一面是墙，只有一面有几家小店，巷子也不过两尺来宽。你别看不起，这其间竟有两家是书铺，叫做葆光的一家，还是城隍庙书店的老祖宗，有十几年悠长的历史呢。第一家是菊舫书店，主要的是卖旧西书，和旧的新文化书，木板书偶而也有几部。这书店很小，只有一个兼充店伙的掌柜，书是散乱不整。但是，你得尊重这个掌柜的，在我的经历中，在城隍庙书市内，只有他是最典型，最有学术修养的。这也是说，你在他手里，不容易买到贱价书，他识货。这个人很喜欢发议论，只要引起他的话头，他会滔滔不绝的发表他的意见。譬如有一回，我拿起一部合订本的《新潮》一卷：“老板，卖几多钱？”他翻翻书：“一只洋。”我说：“旧杂志也要卖这大价钱吗？”于是他发议论了：“旧杂志，都是绝版的了，应该比新书的价钱卖得更高呢。这些书，老实说，要买的人，我就要三块钱，他也得挺着胸脯来买；不要的，我就要两只角子，他也不会要，一块钱，还能说贵么？你别当我不懂，只有那些墨者黑也的人，才会把有价值的书当报纸卖。”争执了很久，还是一块钱买了。在包书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的开口来：“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那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近来他的论调却转换了，他似乎有些伤感。这个中年人，你去买一回书，他至少会重复向你讲两回：“唉！隔壁的葆光关了，这真是可惜！有这样长历史的书店，掌柜的又勤勤恳恳，还是支持不下去。这个年头，真是百业凋零，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不景气，可惜，可惜！”言下总是不胜感伤之至，一脸的忧郁，声调也很凄楚。当我听到“不景气”的时候，我真有点吃惊，但马上就明白了，因为在他的账桌上，翻开了的，是一本社会科学书，他不仅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掌柜，而且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呢！于是，我感到这位掌柜，真仿佛是现代《儒林外史》里的异人了。

听了菊舫书店掌柜的话，你多少有些怅惘吧？至少，经过间壁葆光的时候，你会稍稍的停留，对着上了板门而招牌仍在的这惨败者，发出一些静默的同情。由此向前，就到了九曲桥边。这里，有大批的劣货在叫卖，有业“西洋景”的山东老乡，把裸体女人放出一半，摇着手里的板铃，高声的叫“看活的”，来招诱观众。你可以一路看，一路听，走过那有名的九曲桥，折向左，跑过六个铜子一看的怪人的把戏场，一直向前，碰壁转弯——如果你不

碰壁就转弯，你会走到庙里去的。转过弯，你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了。先呈现到你眼帘里的，会是几家镜框店，最末一家，是发卖字画古董书籍的“梦月斋”。你想碰碰古书，不妨走进去一看，不然，是不必停留的。沿路向右转，再通过一家规模宏大的旧书店，一样的没有什么好版本的书的店，跑到护龙桥再停下来。护龙桥，提起这个名字，会使你想到苏州的护龙街。在护龙街，我们可以看到一街的旧书店，存古斋啦，艺芸阁啦，欣赏斋啦，来青阁啦，适存斋啦，文学山房啦，以及其他的书店，刻字店。护龙桥，也是一样，无论是桥上桥下，桥左桥右，桥前桥后，也都是些书店、古玩店、刻字店。所不同于护龙街者，就是在护龙街，多的是“店”，而护龙桥多的是“摊”；护龙街多的是“古籍”，护龙桥多的是“新书”；护龙街来往的，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在护龙桥搜书的，不免是“平民小子”；护龙街是贵族的，护龙桥却是平民的。

现在，就以护龙桥为中心，从桥上的书摊说下去吧。这座桥的建筑形式，和一般的石桥一样，是弓形的，桥下面流着污浊的水。桥上卖书的大“地摊”，因此，也就成了弓形。一个个盛洋烛火油的箱子，一个靠一个，贴着桥的石栏放着，里面满满地塞着新的书籍和杂志，放不下的就散乱地堆铺在地下。每到吃午饭的时候，这类的摊子就摆出了，三个铜子一本，两毛小洋一扎，贵重成套的有时也会卖到一元、二元。在这里，你一样的要耐着性子，如果你穿着长袍，可以将它兜到腰际，蹲下来，一本一本地翻。这种摊子，有时也颇多新书，同一种可以有十册以上。以前，有一个时期，充满着真美善的出版物，最近去的一次，却看到大批的《地泉》和《最后一天》了，这些书都是崭新的，你可以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下来。比“地摊”高一级的，是“板摊”，用两块门板，上面放书，底下衬两张小矮凳，买书的人只要弯下腰就能检书。这样的“板摊”，你打护龙桥走过去，可以看到三四处；这些“摊”，一样的以卖新杂志为主，也还有些日文书。一部日本的一元书，两毛钱可以买到；一部《未名》的合订本，也只要两毛钱。《小说月报》，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这里面，也有很好的社会科学书，历史的资料。我曾经用十个铜子在这里买了两部绝版的书籍：《五四》和《天津事变》，文学书是更多的。这里不像“地摊”，没有多少价钱好还。和这样的摊对摆的，是测字摊，紧接着测字摊就有五家“小书铺”，所谓“小书铺”，是并没有正式门面，只是用木板就河栏钉隔起来的五六尺见方，高约一丈的“隔间”。这几家，有的有招牌，有的根本没有，里面有书架，有贵重的书，主要的是卖西书。不过这种人家，无论西书抑是中籍，开价总是很高，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店的出版物，照定价打上四折，是顶道地，你想再公道，是办不到的；杂志都移到“板摊”上卖，这里很难见到。我每次也要跑进去看看，但除非是绝对不可少的书籍，在这里买的时候是很少的。这样书铺的对面，是两三家碑帖铺，我与碑帖无缘，可说是很少来往。在护龙桥以至于城隍庙的书区里，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二本书回去，做一回“顾客”；不知道只晓得上海繁华的文人学士，也曾想到在这里有适应于穷小子的知识欲的书市否？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伙轻蔑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

由此向前，沿着石栏向左兜转过去，门对着另一面石栏的，有一家叫做

学海书店的比“板摊”较高级的书铺，里面有木版旧书，有科学，有史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书；门外的石栏上，更放着大批的“鸳鸯蝴蝶派”的书。你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里面浏览浏览，找找你要买的书。不过，他们的书，是不会像摊上那么贱卖的。一部绝版的《新文学史料》，你得花五毛钱才能买到，一部《海滨故人》或是《天鹅》，也只能给你打个四折。在这些地方，你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有一本书名字对你很生疏，著作人的名字很熟悉，你不要放过它。这一类的书，大概是别有道理的。外面标着郭沫若著的《文学评论》（是印成的），里面会是一本另一个人作的《新兴文学概论》。外面是黄炎植的《文学杰作选》，里面会是一部张若英的《现代文学读本》。外面是蒋光慈的什么女性的日记，里面会是一册绝不是蒋光慈著的恋爱小说。外面是一个很腐朽的名字，里面会是一部要你“雪夜闭门”读的书。至于那些脱落了封面的，你一样的要一本一本本地翻，也许那里面就有你求之不得的典籍。离开这家书铺，沿店铺向右转进去，在这凹子里，又有一家叫做粹宝斋的店。这书店设立的不久，书也不多，木版旧籍也很少，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文献却极多，而且很多罕见的。如果你是研究近代文史的，这粹宝斋你就必得到，但要想买到新文学的文献，或者社会科学书，是很难以如愿的。看过这家书店，你可以重行过桥了，过桥向右折，是一个长阔的走廊，里面有一个卖杂书的“书摊”，出了“廊”，仍旧回到了梦月斋的所在。到这里，护龙桥的书市，算你逛完了，但是，此行你究竟买到几册书呢？

跟着潮水一般的游客，你去逛逛城隍庙吧。各种各样的店铺，形形色色的人群，你不妨顺便地去考察一番。随着他们走进城隍庙的边门，先看看最后一进的城隍娘娘的卧室，两廊用布画像代塑佛的二殿，香烟迷漫佛像高大的正殿，虔诚进香的信男信女，看中国妇女如何敬神的外国绅士，充满了“海味”的和尚，在这里认识认识封建势力，是如何仍旧地在支配着中国的民众，想一想我们还得走过怎样艰苦的历程，才能走向我们的理想。然后，你可以走将出去，转到殿外的右手，翻一翻城隍庙唯一的把杂志书籍当报纸卖的“书摊”。这“书摊”，历史也是很长的了，是一个曲尺的形式的板架，上面堆着很多的中外杂志和书。我再劝你耐下性子，不要走马看花似的，在这里好好地翻一翻，而且在你翻的时候，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把看过的堆作一堆，要买的放在一起，马马虎虎的把检剩的堆子摊匀一下。卖书的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无论你怎么翻，怎么检，他都没有话说，只是在旁边的茶桌上和几个朋友谈天说地，直到你喊“卖书的”，他才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在还价上，你也是绝对的自由，他要十个铜子，你还他一个，也没有愠意，只是说太少。讲定了价，等到你付钱，发现缺少几个，他也没有什么，还会很客气地向你说，“你带去看好了，钱不够有什么关系，下次给我吧。”他是如此的慷慨。这里的书价是很贱，一本刚出版的三四毛钱的杂志，十个铜子就可以买了来，有时还有些手抄本，东西典籍之类。最使我不能忘的，是我曾经在这里买到一部黄爱庞人铨的遗集。

城隍庙的书市并不这样就完。再通过迎着正殿戏台上的图书馆的下面，从右手的门走出去，你还会看到两个“门板书摊”。这类书摊上所卖的书，和普通门板摊上的一样，石印的小说，《无锡景》、《时新小调》、《十二月花名》之类。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出版物，你很可以在这里买几本新出的小书，看看这一类大众读物的新的倾向，从这些读物内去学习创作大

众读物的经验，去决定怎样开拓这一方面的文艺新路。本来，在城隍庙正门外，靠小东门一头，还有一家旧书铺，这里面有更丰富的新旧典籍，“一·二八”以后，生意萧条，支持不下，现在是改迁到老西门，另外经营教科书的生意了。如果时间还早，你有兴致，当然可以再到西门去看看那一带的旧书铺，但是我怕你办不到，经过二十几处的翻检，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了。

一九三四年

选自《阿英散文选》

忆读书

· 冰心 ·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

山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

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 80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采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己！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989 年 9 月 8 日清晨

选自《书香集》

读 书

· 老舍 ·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长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来。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选自《老舍文集》十四卷

三家书店

· 朱自清 ·

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 Cross 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烘烘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

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囚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窖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店二十八年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哪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准，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隼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一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五一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十九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十八世纪罗兰

生 (Rowlandson) 所画守卫室内部, 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 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 画的是一七二九的一个守卫, 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 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 石板铺的地, 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实锁着, 只留下一个小方窗, 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 真是铜墙铁壁, 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 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 三楼买儿童书、外国书, 四楼五楼卖廉价书; 二楼卖绝版书, 难得的本子, 精装的新书, 还有《圣经》, 祈祷书, 书影等等, 似乎是青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 搜罗甚博, 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 (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 装订, 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 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 还有“点儿”, 错综着配置, 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 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 数这儿讲究, 别家书店里少见, 书影是仿中世纪的钞本的一叶, 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钞本用黑色花体字, 文首第一字母和叶边空处, 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样花饰, 典丽缜密, 穷极工巧, 而又经久不变; 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 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一九三一年里, 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 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 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 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 各有印刷所, 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 现在再展览剑桥的, 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 (The Pitt Press) 奠基百年纪念, 展览会便力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 (General Smuts) 开幕, 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 (James Jeans), 亚特·爱丁顿 (Arthur Eddington), 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 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 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 墨色匀称, 行款合式, 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 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 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 极仔细的校对; 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 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 都卖得少, 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 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 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 认真地考究地印, 也只能够本罢了。——一五八八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

英国印第一本书, 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 (William Caxton) 之手, 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 约翰·席勃齐 (John Siberch) 来到剑桥, 一年内印了八本书; 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 大学方面因为肩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 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 便呈请政府, 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 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 一五三四年颁给他们敕书, 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 或书铺, “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一五八三年, 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 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 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一六二一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 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 这一来更愤愤不平; 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 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 附了一个比较

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请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写实，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John Tenniel）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灰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哪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The Poetry 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不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斐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 Monro）左一九一二年创办了这片诗籍铺。用意是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一九一一给诗社办《诗刊》（Poetry 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Georgian Poetry），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

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一九二二，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 Chapbook)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Alida Klementaski)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间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象，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外，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接着行，也下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Sheets)，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跨角儿上一张小账桌，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账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账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选自《朱自清》

序

姜德明

求知和读书是无法分开的，读书总要买点书吧，而买书亦如求知，其过程有点像滚雪球。作学生时，我是从课堂上知道鲁迅、冰心、巴金的名字的，课本上的文选已经不能满足，我就到处去寻找他们的单行本。找到一本《呐喊》，还想找《彷徨》，进而想找到鲁迅的全部著作，甚至连看不懂的《野草》也买来了。对于别的作家也是如此。书是越来越多了，雪球越滚越大。

解放以前，天津天祥商场二楼几乎全是卖旧书的，线装书、外文书、新文学版本应有尽有，至少有十几家铺面和书摊连在一起，而且各有特色，要想在那儿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是很容易的。我最初的新文学绝版书便得自这个地方。那时我先后读到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藏书家写的书话，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我非常羡慕他们的收获，却因不能见到原书而遗憾，但只读书话也有不少的乐趣。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古人向来有读书目和题跋的习尚。老实说，我早就把唐弢的书话当作我访书的一份“白皮书”来看待，凡是提到的书，遇有机会我都不放过。所以我说过，他写的书话实际也是一部普及新文学史的读物或入门书。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先后结识了阿英、唐弢同志。我从他们那儿学会了珍惜书，爱护书，访书和藏书，甚至学会了怎样辨别翻版书和盗印本，懂得初版本的价值，绝版书的可贵。我觉得他们是最懂得书文化魅力的爱书人，他们对书的痴迷程度，反映了一种高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情趣。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去年在上海见到巴金先生，讲起目前的出版工作，他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有的书印得那么差，居然还拿出来卖。真奇怪。”巴金也是一位爱书懂书的人，他对书的那种严肃的感情令人起敬，而他的感慨实际也是对那些不重视书文化的出版家进行了批评。

青年朋友李君，捧来《书文化大观》的书稿，光看篇目就很吸引人，至少在我们的书店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有知识，也很有趣味的书。作者在“文革”时正是求知之年，却饱受了文化饥饿之苦，所以他很珍惜现在正在大学攻读研究生的生活，课余设计了这部书稿，费尽余年心血，终于把它献给一切渴望知识、热望读书的人们。我想，凡是带有初创性质的作品，开头总是未必尽善尽美的，我在看了全部细目之后，便不揣冒昧地提出个别补充之处，作者虚心接受了。我跟作者说：“当年我在流连旧书摊时，完全是自己在探路，若能得到你这本《书文化大观》该多好。”

李君在编写本书时，自然已吸收了前人的某些成果，我愿作者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务使它日臻完美，盼它能在促使人们更加爱书，并提高对书文化的认识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1992年3月于北京

序

黄裳

想起自己开手买书时的往事。

旧书浩如烟海，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袋里的钱有限，应该买这本不买那本，是要有个算计的。找指导老师不容易，大学里还没有文献学、版本学这类课程，前辈藏书家也一个都不认识，只得设法自修，而参考书更是难得。偶然碰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不禁大喜。如饥似渴地读了，又按照他的指引，搜罗起书目、题跋来。从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到黄丕烈的《菴圃藏书题识》，一直到鲁迅日记每月后面的书帐，每见必收，迄今也有了百十来种。翻翻书目，发现这也有个发展过程。最早的艺文志之类，往往只孤零零地留下一个书名，有时连作者和卷数都不记，实在使人遗憾。到了明清之际，藏书家的书目里在作者卷数之外，才偶尔注明“宋板”“旧抄”字样，觉得有些意思了。再往后，书目中出现了记行款和黑白口的附注，参考意义又多了一层。人们还不满足，以为如此还不足窥见古书面目，从杨守敬开始，又集印了《留真谱》，此后公私藏家也纷纷影印书影，一时蔚成风气。一直到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出现，可以说是一部系统完整地留下了古书面目的大丛书，读者从中不但接触了古书的体貌，也看到了中国雕版文化的发展轨迹。真的为买书人提供了极好的教材。前些年北京图书馆编印了《中国雕版图录》，从纵横两种视角反映了我国雕版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书是用珂版精印的，质量超过了过去的许多书影。

门径稍稍摸到以后，接下来就是实践。这中间也有个漫长的有意思的过程。买书是要交学费的，往往上了不知多少当以后才能多少懂得版刻前后，书卷完缺……。这当儿，读题跋就更觉得有意思，更能体会到得到或失去一本好书的高兴和颓丧，也就是说进一步领会了书趣。于书本内容之外，对纸墨、刻工……也逐渐有了欣赏的眼力。买书而讲究这些，似乎太奢侈了些。然而不然，古刻本自有其工艺美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是一本李杜诗，把铅印本与旧刻本放在一起，自然会显出差异来，读时的心境感受会是完全两样的。有时得到一本禁书，不免要想到它历劫仅存的不平常命运，从而平添几分珍惜之情。这样，每一本书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藏书者看来，其间都有一段书缘。把这书缘记下来的就是书跋或书话，而这正是我所爱读的文字。

《书林清话》迄今还不失为有趣的著作，不过也确是有点陈旧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本视野更开阔、更富有历史感的新作，给爱书和跟书打交道的人作伴，为他们带来知识和乐趣。听说《书文化大观》就要付印，读了它的目录，知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著作，只可惜今天市上已不再见线装书的影子，即使增长了见识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

一九九二·三·三十 黄裳记

书史简说

图书的定义

图书是指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一定物质材料上记录知识、表达思想的著作物。图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有意识地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书籍所下的定义是：“一种除去封面至少要有 49 页的非期刊的印刷出版物。”采用各种不同方式生产的图书已有 4000—5000 年的历史。中国书的历史，至少已有 3500 年了。现代出版书籍的三个基本条件：纸、制版、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国书史的分期

根据我国图书发展的过程，学者一般将中国书史分为以下四个大的时期：1. 从远古到东汉初年纸发明之前的时期；2. 从东汉初期到唐代中叶印刷术发明前的写本卷轴时期；3. 从唐代末叶到清代鸦片战争印刷术发明后手工业印刷术时期；4.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现在机械化印刷术时期。也有根据书籍制度划分的，一般分为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

甲骨的书

现存最早的书籍是商朝后期的甲骨文书。甲为龟甲，骨即兽骨。因为这种图书是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作甲骨文。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1899 年才被发现。最初，种地的农民在黄土层下掘出许多龟甲兽骨，误作龙骨卖给药店。内阁学士王懿荣患疟疾，所吃中药里便有一味龙骨。他发现上面刻有文字，字形与现在的文字不同，很难认辨，认为这种骨头一定很古，就派人到药铺选了一些文字较为清楚的，全部买下。1904 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做考释。1928 年后又做了多次发掘，先后出土达十余万片。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甲骨文的“册”字作“𠄎”，像几片长短不同的龟片连在一起。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提到发现刻有“册六”二字的龟版，且有穿孔，很可能在商朝就已经把许多龟片串连成册。甲骨文虽然不是正规的书，但具备了图书的特征，并可以从了解殷商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我们把它称为图书的萌芽。

青铜的书

除了甲骨的书以外，商代后期还出现了在青铜器上铭刻文字的书。青铜器是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具，铸刻在器具上的文字称为铭文。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在当时是非常神圣的东西。贵族们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的，就把文件或事件铸在青铜器上。青铜器从商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前汉。从器物的情况来看，殷器上刻文字的很少，间或有几个字。到了周朝，器物上的刻辞就长起来了，其中毛公鼎是传世古代器物上刻辞最长的一件，有 492 字之多。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后来渐渐演变为各种形体，通称为“钟鼎文字”。青铜器历代都有出土，至今已发现几万件，其中有铭文的就有一万多件。由于青铜器本身有其固有的作用，铭文只是附加的，所以虽有书籍的作用，仍不能算正规的书。

石头的书

除甲骨青铜之外，古人还在石头上刻字。形式有三：在天然山石上刻文字叫“摩崖”，在石头加工成长方形再刻上字叫“碑”，加工成上圆下方的形状叫“碣”。《墨子》中有“镂于金石”的话，可见在战国时代，在石上刻字已相当流行。现存最早的石头书，要算秦国的石鼓。因为刻石的形状像鼓，故有是名。秦石鼓共十个，唐初发现于陕西天兴县（今陕西凤翔）。石鼓上面刻着歌颂田猎宫囿美好的四言诗歌：“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宝”。字体是篆书，后人称之为“石鼓文”。十个石鼓上的文字原有六百多个，但传世既久，字多漫灭，第八鼓更是只字不存。汉代著名的石书是东汉灵帝时高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的《汉石经》，世称《熹平石经》，由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亲手书写，工人陈兴等镌刻。共刻六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碑高一丈、宽四尺，凡46块。刻成后立于洛阳大学门前，以为经书提供标准文本。原碑今已不存，只能从残石或集拓窥见其遗痕。汉以后较著名的石头书有《魏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石经》、《北宋国子监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甚至在雕板印书已经非常普遍的清高宗乾隆时，还在石头上刻了一部《十三经》，世称《清乾隆石经》，现完整无缺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首都图书馆与首都博物馆之间的夹道内。石头书与甲骨书、青铜书不同的是，石头本身并无特殊用途，已经接近于正式的书籍了。

竹木的书

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做的。竹木的书在周代末期就已出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板写的书叫“版牍”。一根竹片叫作“简”，把许多简编连在一起叫作“策”。编简成策的绳子或皮条叫作“编”。一块木板叫作“版”，写了字的叫“牍”，一尺见方的牍叫“方”。《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说明短文写在版牍上，长文就要用简策了。简的长度不一样，字数也不一定，通常是二十二字到二十五字，最少的仅二字。每简通常是一行，但汉简中也有写两行到五六行的。木牍则行数较多，一般是四五行。简牍按顺序编连成策，起首的第一片简叫“赘简”。赘简正面不写字，背面写书名和篇名；第二片简正面也不写字，背面写有该书的篇目。它们相当于后世书籍的封面和目录。编连的简可以从左向右卷成一束，卷起以后，赘简背面的字就露在外面。竹木简的使用，自商周以迄东汉，最盛行的时期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简策制度对后世书籍产生的影响很深，就是今天的铅印书籍，也还有因袭它的地方。

缣帛的书

在竹木的书盛行的同时，出现了缣帛的书。缣帛是丝织品，犹如今天书画使用的素绢。《墨子》一书中有“书于竹帛”的话，可见战国初年缣帛作为图书材料已和竹木并用了。竹木的书与青铜的书、石头的书相比，当然已经方便许多，但携带起来仍然很不方便。譬如战国时惠施号称“其书五车”，实际上并没有几部书，因为竹筒体积很大。而且无论韦编、丝编，翻阅日久都容易磨断。所以孔子晚年读《易》，就曾“韦编三绝”。这样就容易造成脱简错简、次序凌乱。缣帛的书比较起来则收藏容易、携带方便，更不必担

心散乱。而且缣帛柔软光润，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章的篇幅随意剪裁，也可以卷成一束，随意舒卷。缣帛的书一般把一篇文章截成一段，卷成一束就叫作“一卷”。古今图书称“卷”即来源于此。缣帛的书非常考究，但由于缣帛产量少、成本高，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与竹木并行。譬如《汉书·艺文志》在计算书籍数目时，有的称“篇”，有的称“卷”，而篇数多于卷数，可见简策还是主流，缣帛并未能普遍使用。

纸的发明

用帛代简是有很大便利的。但是缣帛贵而难得，不能普遍行用。在当时文化发达、书籍需要增长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价廉易得，既可以保持缣帛和简牍的优点，又没有其各自缺点的材料，这样，纸便被发明了。”纸的发明者，一般都说是东汉的蔡伦。也有人指出蔡伦以前我国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发明的时间被提前到汉代初年。纸不是蔡伦一个人的创造发明，他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推广了新的造纸方法，使造纸技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纸的发明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手抄或印刷图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由于早期的纸比较粗糙，尚少用来写书，到晋代才被普遍采用。东晋末年，则全面进入了纸书时代。

纸写本书

纸发明以后，著书写字更为方便。抄书藏书逐渐成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东汉桓帝始设秘书监作为国家藏书机构。与此同时，私人藏书、抄书的也多了起来。纸写本书的极盛时期是整个隋、唐两代，尤其在六七世纪之间达到最高峰。隋文帝时官家向民间搜求异书，共抄了三万多卷。隋炀帝时又将秘书阁藏书各抄五十副本，藏于洛阳的观文殿。隋文帝爱佛，在抄书的同时，还写了四十六部佛经，共十三万多卷。百姓在帝王的影响下，也纷纷抄写佛经，据称“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唐太宗时，文风大盛，更扩大了写书、抄书的工作。唐玄宗时设立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唐代私人抄、藏的书逐渐增多。以抄书为业的人也应运而生，叫作“经生”。初期写本书的形式完全是模仿帛书的，后世称为“卷子本”。

卷轴装

隋唐时期纸写本书的主要形式是卷轴。卷轴，是指把字写在一张张纸上，而后把纸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细木棒粘在纸的左边，以此为轴向右卷起，成为一束。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008.bmp}

轴比卷子长一点，两头露在卷外，以便卷舒。卷子的左头卷入轴内，右头则露在外面，为避免损坏，往往接上一张较坚韧的纸，或罗、绢、锦等丝织品，这叫作“褭”。褭头再系上一根带子，作捆缚卷子之用，叫作“带”。卷子卷好后，成为一轴，放在书架上，轴头向外，便于抽出和插入，所以有“插架”之名。轴头上往往系上一根签子，在上面写简单的书名和卷次，以便于寻找。卷轴形式的纸书现在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敦煌千佛洞的藏书。这些书的纸卷长短不一，长的有二三丈，短的仅二三尺。每张纸上用墨或铅划上直行，唐朝人称为“边准”，宋朝人称为“解行”。上下有栏，称作“边栏”。每张纸一般为二十行至三十行。每行的字数也有一定的规律。书写的格式是：

每卷起首空两行，预备写全书总名，然后开始写本篇的名称（小题）和卷次。此下空数字，再写全书名称（大题），也有起首不留空行，径写小题的。然后写正文。正文写完，隔一行，再写本篇篇名和卷次，这空着的一行是为了填写抄书年月和抄书人姓名的，但不写的也很多。如果一书有正文也有注解，那就往往用朱笔写正文，墨笔写注解；或者正文单行、注解双行，都用墨笔写。卷轴形式的纸书到唐朝末年起了很大变化，逐渐过渡到册页形式。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009.bmp}

经折装和旋风装

九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一种新式书籍，称为“经折装”。这种书是把长卷一正一反地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在这叠纸的前后面各加上一张硬纸，以资保护。经折装由卷轴装发展演变而来，它克服了卷子展开、卷起都非常费时、费事的缺点，查索起来无需把全卷都展开，需查阅哪一页，可以直接翻出哪一页，非常方便。经折装的缺点是容易散开，于是就又有人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页和最后页粘起而将书的右边包裹起来。这种形式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由于折起来的纸像一片树叶，所以唐朝人把这两种形式称为“叶子”。

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印刷术主要有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种，都是中国人发明并传播到全世界去的。自公元九世纪起，印本书籍在我国已经出现，木板雕印是古代图书印刷的主要形式，雕版印刷先于活字印刷而发明。雕版印书究竟始自何时，尚难绝对肯定。学术界曾有人主张汉代说、六朝说、隋朝说、五代说等，有的已为事实所推翻，有的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比较可靠的是唐代发明说，有唐宋以来诸家文献以及敦煌发现的各种实物证明。具体时间大致发生在七八世纪之间，而在九世纪后半就已经相当发达。

初期的雕版印刷书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生产量比过去手写本时代大大增加。唐代后期雕版印书已经流行，刊刻书籍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日历、佛经、文集、字书、小学以及阴阳占卜等。咸通九年刊印的《金刚经》，不仅是最早的雕版印本文字，也是最早的雕版印刷版画，刊印颇为精美，可惜被英人斯坦因盗往国外。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发现的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到了五代，统治阶级和僧侣阶层都大力提倡刻印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宰相冯道校刻《九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刷印的经典书册，也是政府刊刻书籍事业的肇始，对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官本一出，士大夫阶层也有了出资刻书的人，民间及佛教徒的刻书事业也继续发展。但五代刻本和唐代刻本一样，流传到现在的非常少，而已都是残本。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活字印刷术是现代印刷的主要方法。欧美学者一般都把活字印刷术认为是15世纪中叶（1440—50年）日耳曼人谷腾堡的发明。但是确实的证据说

明，活字印刷术是公元 11 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中国人毕升所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中有详尽记载。当时的方法虽嫌笨拙，但铸字、排版、印刷这三段基本过程都已具备。毕升所发明的活字，后世称为泥活字。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的前导。但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并未得到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术一直是那时印刷事业的主要方法。

宋版书

两宋时代是雕版印刷术极为昌盛的时代。“宋版书”在书籍制度上遗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宋代由于社会渐趋富裕，商业经济逐渐发达，文化事业因而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学术活动的繁荣要求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改进又刺激了著作物的增加和便利了著作物的出版。所以宋代刻书范围几乎遍及当时所有的知识部门，除儒家经籍外，还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文选等。并出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部著名的大书。不仅各级政府机构刻书，私家刻书、坊间刻书也有了很大发展。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刻本为最著名，此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也都曾刻书。地方机关刻本书也有种种不同的名目。依其官署名称，则有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等。此外，各州、军学、郡学、县学以及书院等也都有刻本。宋代私家刻书较著名的有陆子遯、廖莹中世彩堂、吉安周必大等。宋代书坊最著名的要算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南宋时临安陈氏经籍铺刻书也较著名。宋代刻书地域很广，主要的中心地区有五处，即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除中心地区外，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出现了技术水平很高的刻本书。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书，极受历代藏书家的珍视，原因有二：一是许多著作，在今天来说，只有宋本最接近于原本；二是宋版书的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臻于完美，神气肃穆而不板滞，刻板刷印不失书写原貌，书品宽大、纸精墨莹，而各地方刻本又各具独特的风格。

册叶制度

印刷书籍最初出现时所采用的经折装等形式都是模仿卷轴制度的。但是经折装的折缝易于断裂成散叶，于是在五代和北宋之间出现了以散叶装订成册的册叶制度。主要形式有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蝴蝶装

蝴蝶装是册叶制度的最初形式，出现于五代和北宋之间。即以书页反折（有字的纸面相对折成）而将中缝粘在一张裹背纸上，翻阅时好像蝴蝶两翼飞翔飘舞，故名。蝴蝶装的外封面一般都用硬纸，因此，可以在书架上直立。宋代的书，尤其是北宋，在排架时，都以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直立排列，与现代排架形式相仿佛。蝴蝶装虽比经折装和旋风装便于阅读，但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譬如每翻一页必然遇到两个无字的背面，而且版心折缝处容易脱落破损，所以在南宋时为包背装所取代。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013.bmp}

包背袋

包背装由蝴蝶装发展而来。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明。它不像蝴蝶装将纸叶反折，而是正折，即有字的纸面向外。这种形式，阅读方便，但排架时容易磨损书口，使书页断裂，因此改为平放，硬封面也改作软封面。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013.bmp}

线袋

线装是古籍中最普通的装订形式。由包背装发展而来。起于明代，风行清朝，一直沿用到现在。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014.bmp}

线装的装订方法基本上与包背装相同，所不同的是线装不用整张纸包背，而是用两张散页作书皮，加在正文前后，然后打孔穿线成册。

元代的图书

元代初年，皇帝很重视刻书，使得雕版印书事业在金宋战乱之后又重新振兴起来。元代官刻图书遍及各地，中央机关刻书的有兴文署和艺文监。地方官府刻书的也很多。当时全国各路、府、州、郡县都设有儒学，各路儒学刻了不少书。官府倡导于先，私人也就风行于后。私家刻书的很多，较著称于世的，可以举出岳氏荆溪家塾本、平水进德斋曹氏、东平丁思敬、吉安王常等。坊刻则比之宋代有过之无不及。著名的如叶日增广勤堂、刘君佐翠岩精舍、余氏勤有堂、刘氏月新堂等。以福建地区为最多。元版书的装订以包背装为主，蝴蝶装比较少，线装还没有发现。佛书大部分是经折装。现今流传的元版书，其版式多半是黑口双栏，用赵孟頫字体。纸多为较为粗糙的福建纸，色黄，有的呈黑褐色。元初接近宋本，字大行疏，中期以后，行格渐密，字形比宋本略小。元代在印刷术方面有极可注意的两件事，一是活字印刷术的改进，二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

明代的图书

明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以嘉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或者再细分为明初、明中叶、晚明三个阶段。前期理学书籍居极大比重，后期内容趋于活泼和广泛，包含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明代刊本也可依宋元习惯，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类型。官刻本中，有国子监、太医院所刻的本专业的图书和“内府”刻本图书。地方官刻书籍，则由各省布政司、按察司负责。官刻本中刻印最好而且校勘精当的是藩府刻本。官刻本着重刻经史典籍。明代私家刻书风气甚盛，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他们除了刊印古籍之外，还往往翻刻宋元版。私人刻书最著名的是常熟毛晋汲古阁。私家刻本以名家诗文为多。明代书坊刻书分布地区广、刻书数量多。福建建宁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建阳县书坊独盛。金陵、杭州、北京等地也有许多书坊。坊间刻本，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还大量刻印了一些小说、戏曲、酬世便览、百科全书之类的民间读物。明代刊本的形式，前期完全沿袭元代的风气，装订全是包背，版式全是黑口，多半是大黑口，字体多为软体。嘉靖以后风气改变，以宋刊尤其是北宋刊为模范，白口盛行，版心上方往往有字数，下方有刻工姓名，有时有写样人姓名。字体又转向欧、颜一派。到万历年间终于发展成横轻直重的所谓“宋字”。装订也由包背而改为线装。纸张方面初期多用黄纸，嘉靖时多用白棉纸，以后，又多用黄纸。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

新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其次是套印书的应用。明版书的缺点，一是校订不十分精审，错漏很多；二是书帕本的滥刻；三是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四是伪造古书；五是无用的序跋过多。

清代前期的图书

清代的图书事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清初至鸦片战争为前期，鸦片战争至清末为后期。清代前期的刻书事业沿袭了明代格式，官刻、家刻、坊刻仍是三个各具特点而又相互补充的组成部分。清代历朝官刻都由武英殿承刻，此外则有曹寅所主持的扬州诗局所刻印的书。武英殿和扬州诗局所刻各书，缮写刊刻之工致，纸张遴选和印刷、装订之端庄大雅，无不尽善尽美，有的还采用细薄洁白的开花纸精印，为清代刻书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清代私家刻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大都是手写上版，所谓“写刻”。选纸用墨均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雕版书籍以私家刻本为最有价值，各式各样丛书的出现成为清代出版事业的特色之一。坊刻主要印行村塾学生读物和民间通俗作品，在当时不被藏家重视。清代书坊经营最久的要算“扫叶山房”。

鸦片战争后的图书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日益加速的急速转变时代。社会变化引起的政治改革要求、外国教会的活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和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传入等诸种因素的相互刺激、相互影响，使得中国的图书和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图书种类日益增多、出版数量日益高涨、出版物新类型（杂志、报纸、教科书等）的诞生、新印刷技术（铅印、石印等）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企业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图书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西方印刷术的传入

西方印刷术在 19 世纪初年传到中国，并且逐渐发展而代替雕版印刷术，成为图书出版的主要方法。西方印刷术，依其印版的构造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凸版、平版和凹版。凸版印刷术，特别是其中的铅活字印刷术，是印刷书籍的主要方法。凸版（铅活字印刷术）首先传入我国，随后是平版（石版印刷术），其后是凹版（雕刻铜版印刷术）。各种新的印刷技术也在 20 世纪开始后陆续传入中国。

初期的铅印图书

首先将铅字印刷术传入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最初期的铅字印刷所都掌握在外国人手。当时的铅印书几乎完全是宣传宗教的刊物。当时的铅印书籍和杂志在形式上完全是模仿雕版书籍的。版面构造完全和雕版书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印刷，线装。从外形看，和雕版书没有任何区别。

书海一勺

世界藏书知多少

世界藏书浩如烟海。如将全世界所有图书馆的藏书书名用打字机打成一行字，其长度可排二千多亿公里，约绕地球五千二百万圈。

我国古籍有多少

据《世界图书》1981年第9期统计，我国书籍的出版自西汉以前到清代，共出书18万多部，236万7千卷。

影响世界的十六部书

1.尼古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517年出版；2.托马斯·潘恩的《常识》，1766年出版；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4.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89年出版；5.梭罗的《不服从论》，1849年出版；6.哈里耶特·比彻·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出版；7.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出版；8.阿尔拜雷德·萨耶·马汉的《海军强国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出版；9.麦金德的《世界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出版；10.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25—1927年出版；11.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1543年出版；12.哈维的《血液循环》，1628年出版；13.伊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29年出版；14.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15.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1900年出版；16.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1916年出版。

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根源篇 11种：《尚书》、《周易》、《诗经》、《孙子兵法》、《老子》（附《庄子》）、《春秋》（附《左传》）、《论语》（附《孟子》、《孝经》）、《韩非子》、《礼记》、《黄帝内经》；创变篇 9种：《史记》、《论衡》、《太平经》、《坛经》、《唐诗三百首》、《资治通鉴》、《四书集注》、《明夷待访录》、《红楼梦》；维新篇 10种：《海国图志》、《新伪学经考》、《盛世危言》、《天演论》、《建国方略》、《尝试集》、《阿Q正传》、《独秀文存》、《社会学大纲》、《新民主主义论》。

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十种书

文学 10种：《诗经》、《楚辞》代表先秦古诗；《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代表汉后古诗；《白香山诗集》、《韩昌黎文集》代表古散文；《宋元戏曲史》代表古代戏曲；《水游》、《红楼梦》代表古代小说；《鲁迅杂感选集》代表近代文学思想。史学 6种：《左传》、《史记》代表古代史学中的通史方面；《史通》代表古代史学的批评方面；《徐霞客游记》代表地理游记；《廿二史札记》代表正史研究；《帝王春秋》代表历代帝王之史事。哲学思想 20种：《论语》代表孔子思想；《墨子》代表墨家思想；《孙子》代表古代兵法；《老子》、《庄子》代表道家思想；《孟子》、《荀子》代表儒家思想；《韩非子》代表法家思想；《论衡》代表古代唯物论；《金刚经》或《六祖坛经》代表佛学；《化书》、《李氏焚书》、《续焚书》、《明夷待访录》代表古代民主思想；《读四书大全说》、《四存编》或《习

斋先生言行录》、《太平天国文选》代表农民革命思想；《天演论》代表西学；《清代学术概论》代表清末学术；《孙中山选集》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五四运动文选》代表新文化运动。科学4种：《梦溪笔谈》、《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何谓五经

五经是五部经书的总称。这五部经书是《诗》、《书》、《礼》、《易》、《春秋》。西汉时始有此称。

何谓六经

六经是六部经书的合称。即在《诗》、《书》、《礼》、《易》、《春秋》之外，加《乐经》。六经之称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六经也叫六艺。

何谓七经

七部儒家经典的台称。七经名目，历代不同。东汉《一字石经》作《易》、《诗》、《书》、《仪礼》、《春秋》、《公羊》、《论语》。《后汉书·张纯传》唐李贤注作《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北宋时以《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为七经，见于北宋刘敞撰《七经小传》。清康熙《御纂七经》为《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

何谓九经

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汉书·艺文志》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及小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录》作《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宋刻巾箱本九经为《易》、《诗》、《书》、《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明代郝敬《九经解》，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为九经。清代纳兰成德《通志堂经解》以《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为九经。

何谓十经

十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宋书·百官志上》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南史·周续之传》，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加上五纬：《诗纬》、《书纬》、《礼纬》、《易纬》、《春秋纬》为十经。清惠栋《九经古义》，以《易》、《诗》、《书》、《左传》、《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穀梁传》、《论语》为十经。其中“左传补注”后别本单行，故名《九经古义》。

何谓十二经

十二经是十二部儒家经典的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加《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易纬》、《春秋纬》为十二经(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说十二经指《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何谓十三经

十二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指《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即为上述十三经。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何为三传

三传是春秋三传的简称，是解释《春秋经》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合称。

何谓三礼

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

何谓三史

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后来《后汉书》广为流传，唐开元后，就以范晔的《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

何谓四史

三史加《三国志》称四史。

何谓十史

十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十部史书的合称。它们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

何谓十三史

十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

何谓十七史

宋以后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为十七史。

何谓二十一史

明以后，在十七史之上，加上元、明官修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四史，合称二十一史。

何谓二十二史

清乾隆初年，《明史》修成，连同二十一史，合称二十二史。

何谓二十三史

清乾隆时，下诏《旧唐书》列为正史，连同二十二史，合称二十三史。

何谓二十四史

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二史合为一史，加上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总共有四千万字左右，分为 3249 卷。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1644）共四千余年的历史，保存了历代王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是研究和了解古代历史的宝贵遗产。二十四史一般通行两种本子，一是武英殿本，即清代官刻本；一为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集合各史较早刻本影印。二十四史具体书名如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何谓二十五史

二十四史加上柯劭忞著《新元史》，称二十五史。1921 年徐世昌以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名义，把《新元史》列为正史，遂有二十五史之称。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亦称二十五史。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十五史缩印本，其中无《新元史》，而在二十四史上加《清史稿》。

何谓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加《新元史》和《清史稿》，合称二十六史。

何谓三通

唐杜佑撰《通典》、宋郑樵撰《通志》、元马瑞临撰《文献通考》三书的合称。

何谓九通

三通加清代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

何谓十通

九通加上清光绪刘景藻撰《续清通考》是谓十通。十通是政书的渊海。

何谓百子全书

百子全书又名子书百家。系子书汇编。清光绪元年崇文书局辑印。收先

秦至明代子书一百家，儒二十三家，兵十家，法六家，农一家，术数二家，杂二十八家，小说十六家，道十四家。搜罗广泛，但不精湛。

二十二子指哪些书

二十二子是二十二种子书的汇集。清光绪中浙江书局编选辑印。选辑周、秦、汉子书二十二种：《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文子缵义》、《扬子法言》、《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

六十种曲包括哪些剧本

六十种曲也叫《汲古阁六十种曲》，是传奇剧本汇编。明毛晋编。选收六十个剧本，除《西厢记》为元杂剧外，其余皆为明传奇剧本。这些剧本是：琵琶记、荆钗记、香囊记、浣纱记、寻亲记、千金记、精忠记、鸣凤记、八义记、三元记、南西厢、幽闺记、明珠记、玉簪记、红拂记、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北西厢、春芜记、琴心记、玉镜记、怀香记、彩毫记、运甓记、鸾镜记、玉合记、金莲记、四喜记、绣襦记、青衫记、红梨记、焚香记、霞笺记、西楼记、投梭记、玉环记、金雀记、赠书记、锦笺记、焦帕记、紫箫记、水浒记、玉玦记、灌园记、种玉记、双烈记、狮吼记、义侠记、白兔记、杀狗记、昙花记、龙膏记、飞丸记、东郭记、节侠记、双珠记、四贤记、牡丹亭。

何谓四梦

四梦指明汤显祖撰的四种戏曲，即《南柯记》、《紫钗记》、《还魂记》（一名《牡丹亭》）和《邯郸记》。四种剧本都写梦中的故事，故称四梦。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故又称临川四梦；所居名玉茗堂，故亦称玉茗堂四梦。刻书家常把这四个剧本合刻在一起，用同一版式。

三言二拍指哪些书

三言二拍是《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五种话本的合称。三言为明冯梦龙辑，共收话本120篇。二拍为明凌蒙初撰，共80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后由抱瓮老人从诸书中选录40篇，题名为《今古奇观》。

何谓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指四部有名的章回小说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西游记》。四大奇书之称起于清李渔（号笠翁）芥子园所刻印的上述四种书。此外，《金瓶梅》被称作第一奇书，并在书名前冠以“第一奇书”字样。

何谓六才子书

六才子书这一名称是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提出来的。他把《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传》与《西厢记》这六

部书合称为六才子书。

何谓十才子书

十才子书指的是这样十种说部书：《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十才子之名，不知起于何时何人。除《三国演义》写作水平较高外，其他九种多写才子佳人故事，在中国文坛上有的影响极其微小。所以，十才子书的选择和排列并无多少道理。只是书坊商人为了吸引读者，便利推销，才将这些书以第几才子书为题依次刻印发行。另有人称十才子书包括《花笺记》和《三合剑》，而无《白圭志》和《驻春园》。

何谓四大千

四大千是四部一千卷的大书的合称，即《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全唐诗》。

何谓宋三大书

宋三大书指宋代官修的三部一千卷的大型类书，即《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

何谓一大万

一大万指《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一万卷，故有此称。

书的结构

封面

封面一般指书籍的前后封皮，前封面印有书名、作者姓名、出版机构名称。后封面印有定价、统一书号或其它标志，有保护书页和装饰的作用。

内封和扉页

内封和扉页指书籍前和封面后的空白页或印有书名、作者、出版机构名称的单页，又名里封面、副封面，有保护书页和装饰的作用。

书脊

书页装订后，在前封面和底封面交接处所形成的脊背叫书脊。书脊上一般印书名、册次、作者姓名和出版机构名称。

版面

图书报刊一页的幅面叫版面。包括文字、图画和四周白边。

版心

版心指图书报刊上排印文字、图画的部分，不包括四周的白边。

开本

现代生产的印书用纸面积大小有一定的规格标准，印书用的全张纸裁切为多少个书页，就是多少开。现在通常书本有 16 开、大 32 开、小 32 开等。

印张

印张是计算出版物篇幅的单位。我国现行标准印张的幅面，等于 787 × 1092 毫米全张的一半。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是对书籍内容的简要介绍和评论以及读者对象的说明，也叫内容摘要。

目次

把书籍内容的章节题名按次序排列，注明页码，叫目次，通常印在书籍正文之前，也称目录。

序言

序言也称前言、绪论，系由作者本人或请他人写作，附印在书籍正文前面的文章。用来说明本书写作的意图和出版经过、资料来源，或对书的内容加以评介和说明。亦称序、绪论、前言、作者的话、编辑说明等。

后记

后记是由作者本人或别人写作，附印在图书正文后面的文章。其内容和序言类似，有时是读后感、编后感之类的文章。

附录

附印在书籍正文后面的有关文章、文件、图表、索引，以及作者或书籍内容人物的年谱等资料统称附录。

索引

用笔划、字韵或四角号码排列方法，把本书有关的词句、人物、时代附在正文之后，便于读者查考，此谓之索引。

插图

书籍的插图有图画、图表和照相等形式，有的印在文字中间，有的用插页方式，也有把插图集中在书籍正文之前的。插图的作用是帮助读者对作品中事物的理解，增强文字的表达能力和书籍的艺术性。

版权页

版权页是附印于书籍正文前或后的版本记载，记录书名、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版次、印次、印张、印数、出版年月、定价等项目。

版次

版次用以标明图书版本的重要变更。凡第一次出版的叫第一版或初版。书名不变内容经过重要变更，重排印出版的叫第二版，以下类推。如果书籍内容没有变更，只改换开本、版式、封面，则不作为版次的变更。

印次

用以统计书籍每一版印刷的次数。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算起，每重印一次即累计标明。如内容经过变更重行排印改为第二版时，印次则从第二版另行算起，以下类推。

印数

印数是表明一本书印了多少册的累计数字。例如《×××》一书第三次印刷时，印数为 27000—47000，表明前两次已印过 27000 册，这一次又印了 20000 册，总共 47000 册。一种书如有不同的开本或不同的装帧，如精装、平装、普及本等，印次和印数都分别累计。

统一书号

统一书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字代表图书分类，第二、三、四个字代表出版社，圆点后的数字代表出版社品种的顺序号。如中华书局出版的《说文解字》一书的书号是 9018·65，9 代表文化教育类，018 代表中华书局，圆点后的 65 代表该局出版品种顺序号，其他各书以此类推。统一书号一般印在版权页或封底右（左）下角定价上边。

版权符号

在国外出版的西文图书或杂志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 C 样的符号，那便是版权符号。它来自英语 Copyright 一词，表示法律承认原作者有控制其

作品的传播或获得利益的权利。

书衣

书衣就是俗称的书皮，是为保护书用的，因为它如书的衣服，所以称为书衣。古今藏书家，对于图书的装订，在采用书衣质料和颜色上，都特别注意。如钱曾述古堂的书衣，用自造的五色笺纸；毛晋汲古阁的书衣，用宋笺藏经纸或宣德纸，染上各种颜色。历代官书的书衣，多用黄红蓝紫等色的绢绫做。清代修《四库全书》，对于书衣更异常讲究，其色分青红蓝灰四色，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用以标志《经》、《史》、《子》、《集》四库。这种办法，实开晚近封面绘画的先声。

副叶

在书衣的里面，另衬一叶空白纸，叫作副叶。其功用有二：一、可以保护书叶，使之不受损伤，因此又名护叶。二、副叶有用万年红纸做的，能避免潮湿。南方诸地如广东等省多用此式。红白相衬，颇为鲜艳。

书根

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线装书常利用书根书写或加印书名、卷次和册数。标写书根，由来已久，盖在宋时就有写书根的例证，这和精装书在书背上印字的用意相同，全是为了便于检查。古籍的装订，原甚精良，再标上书根，尤为必要。

版口

书叶折叠的地方，称为版口，亦称版心。版口中有专为折叠时作标记用的象鼻和鱼尾，刻在上下两端，其中间叫作中缝。

象鼻

版口上下两端的界格，称为象鼻。这是就其形状而起的名称。象鼻中空的，称为白口。象鼻中有墨线的，称为黑口或称为细黑口、小黑口。象鼻中有宽黑线或全是黑的时，称为大黑口或宽黑口、粗黑口。象鼻中间刻有文字的，称为花口。宋版多是白口或小黑口，元版多是大黑口或花口。此亦一时风气之所趋。至明代，则以黑口为贵。

边栏

书版的四边界格，称为边栏。其四边界格上画一道粗墨线的，称为单边。其在粗墨线之内，又附一道细墨线的，称为双边。其天地两边没有细线，仅在左右两边有细线的，称为左右双边。其天地左右全有细线的，称为四周双边。元代版本，多四周双边。这种四周双边，俗又称文武边栏。

衬纸

衬纸多是用在旧书重新装订时。旧书遭受虫蚀，或纸质薄脆不堪翻阅时，必须重新装订，对其破损之处，则用染纸逐一填补。对其薄脆之处，则在其上下两端和书口等处的里面，用白棉纸裱衬，裱完之后，再在每叶之内，各衬白纸一张。这样一来，翻阅时不但容易映出书叶，亦且明鲜美观。

书签

书签是书衣上所贴的纸签，亦有用丝织品的，用以题写书名，也是书的很重要的一项装饰。

帙

帙是卷轴式书之外衣，也是保护书用的。因为一部书往往有许多轴，插在架上如果没有好方法去管理它，种类多了，势必互相混杂。为了防止混杂，便用布帛之类的东西把一部书的许多卷轴汇集一起，包裹起来成为一包。其卷轴多的，也可包成几个包。这种布包就称帙。

书套

书套是册叶书之外的附属品。用硬纸为里，外敷以布，围绕全书的四面，而露其上下两端，俗称为书套。因其围绕四面，折叠四边，所以名为四合套。其制作再精致一步的，则四周和上下两端不露出，六面全都包严，称为六合套。藏书家和图书馆，为了保护善本书，多用六合套。再精致一点的，则外敷续锦，开函的地方，挖作方形或环式，密函之，既坚牢而又美观。

木匣

用木板做匣，亦名为函。其制法，一端可以开闭，把书放在匣内，不易损伤。清代《四库全书》插架，就是用楠木做成这样的函式木匣保护，所以至今将近两百年，尚完好如新。

纸匣

纸匣亦是函的变形，其形式和木匣不同，只五面用纸墙，一面张口的叫作单匣。在单匣的外边，再在张口的一面，套上一个较大的单匣，使图书紧闭在内的叫作双匣。纸匣的外背，可以标写图书的名称、类号等等文字，又可以直立插架。因此，这种纸匣，为近来图书馆解决古书直立插架困难的一个新的发明。

夹板

木匣的变形，是为夹板。其制法，取和书形大小相等的木板两片，板的两端各穿二孔，用带通过。书的上下各放一片，把书夹入板中，然后结带。用此法保护图书，亦颇坚牢。

书文化之最

最早的竹木简古写本

我国最早的竹木简古写本是《仪礼》。1959年考古学家在武威汉墓中发现了504根竹、木简。其中有469根，据初步考订，是西汉末年所抄写的《仪礼》。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写本书。

最早的帛写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帛写书是《缙书》。《缙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1942年9月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的战国楚墓中出土。这是一件用毛笔墨书、彩绘在丝织品上的帛书，高约30厘米、长约39厘米。帛的中间写有长篇文字，分左右两部分。左方十三行，右方倒写11行，共计六百多字。所用字体为战国时代的古文，有的文字漫漶不清，多不可识。文字四周有植物、怪兽、三头戴角人像等十二奠。图像间注有说明文字。《缙书》于1946年被美国人柯克思诬骗掠夺到华，盛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最早的纸写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写书是晋人手抄的《三国志》。手抄本《三国志》是陈寿撰成后不久抄写的。现有甲乙两种抄本。甲本于1924年在新疆都鄯县出土，是《吴书·虞翻传》《臧张温传》的部分内容，共计80行、1090余字，中有残缺。原本流入日本，国内有新印本流传；乙本于1965年1月在新疆吐鲁番县的英沙古城附近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是《吴书·吴主权传》和《魏书·臧洪传》的残卷，共40行，计有570余字，中有残缺。甲、乙两种抄本均隶书体、行款恭正，但非一人抄写。乙本抄书年代早于甲本，但相距时间不会太长。

最早的木刻印本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印本书是《陀罗尼经咒》。这是一张唐刻梵文经咒，1944年4月出土于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印本长34厘米、宽31厘米，用唐代名茧纸印制，质地薄而透明，韧性强。印本中间小方栏内刻一菩萨像。栏外四周有数行梵文经咒。梵文外，又雕双栏，其中四角及每边刻有菩萨像，像之间为佛教供品的周像。根据印本右边的题汉文可知，这张经咒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文。据考证，《陀罗尼经咒》为唐代末期作品，不早于757年，印刷于公元850年以后的可能性大。此书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最早的雕版印刷书

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书是唐朝的《女则》。根据明朝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编了一本书，名叫《女则》。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去，宫中有人把此书送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到这本书讲的都是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对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有好处，就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了出来。

现有最早的有日期的雕版印刷的书

我国和世界现存最早的有日期的雕版印刷的书是《金刚经》。《金刚经》印成于唐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它是一部长约 1 丈 6 尺、高约 1 尺的卷子，由六张面积相等的印有经文的纸粘缀而成。卷首另有一幅扇画，画着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的说法图。其余为《金刚经》全文，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这卷举世闻名的《金刚经》，原藏甘肃敦煌千佛洞，1899 年发现，1907 年被英人斯坦因盗去，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书

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书是《大德施德县志》。一般认为，元代科学家王桢在 13 世纪末发明木活字印书，并于元大德二年（1298 年）试印他自己纂修的《大德施德县志》。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书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由汉文译成的西夏文本。这是一个残卷，其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计有 26 卷和 36 卷的残页，76 卷的全文；其二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张质生收藏，计有第 11 卷至第 15 卷全文。这两种《华严经》是否同一本子，待考。但都是元代的木活字本则是无疑的。印于 14 世纪。

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是《泥版试印初编》。泥活字及其印刷方法由毕升于北宋庆历年间发明。但泥活字印品宋、元、明三代均未见传世。《泥版试印初编》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籍，由清代翟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印制。内容系其生平所著各体诗文及联语。现藏北京图书馆。

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书是《宋诸臣奏议》。铜活字出现在明孝宗弘治初年（1488 年）。弘治三年无锡会通馆华燧用铜活字首先印了此书。相传铜活字就是华燧所创制。《宋诸臣奏议》150 卷，共印 50 册。因为是初次试印，印刷技术不甚高明。

最早的短版印刷书

我国最早的短版印刷书，是明代吴发祥印造的《梦轩变古笺谱》。在《梦轩变古笺谱》中，吴发祥还创造了一种叫“拱花”的方法。当时，我国短版印刷最突出的代表作品，除了《梦轩变古笺谱》，就要数胡正言印造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了。

最早的雕版印刷的大丛书

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的大丛书是《大藏经》。《大藏经》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雕刻了十余年，方才完成。此书有 5048 卷，刻的板子有 13 万块。

最早的丛书

我国最早的丛书是《儒学警悟》。本丛书由南宋俞鼎孙、俞经合辑。全书共7集、40卷。收宋人著作《古林燕语辨》、《演繁露》、《懒真子录》、《考古编》、《扞虱新语》、《萤雪丛说》等六种，记载了宋代制度掌故、人物琐事等。每种都收足本，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向只有抄本流传，直至1922年武进陶湘始为刊行。

最大的丛书

我国最大的丛书是《四库全书》。此丛书的编纂开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历时15年始成。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大约9亿9千7百万字，装订成36,304册。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保存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分抄七部，分别贮放在宫内的文渊阁、奉天行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文汇、文宗均毁于战火；文源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文澜所藏也多散失，经后人补抄配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抽选了其中的珍本231种，影印出版，定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最早的类书

我国最早的类书是《皇览》。它由三国时魏朝刘邵等编撰。刘邵于魏文帝皇初元年（220年）始，“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数年后编成供皇帝阅览、使用的《皇览》一书。全书凡680卷，四十余部类，每部数十篇，共计八百余万字。《皇览》早已散失，今所辑已不及原书的百分之一。

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是《古今图书集成》。本书原名《古今图书汇编》，系清康熙年间陈梦雷原编，后由蒋廷锡等编校。全书正文1万卷，目录40卷，合计1亿6千万字，分订5020册。全书按所收内容分类编排，分历象、方輿、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个汇编、32典，每典中又分部，共6,109部。每部先汇考，次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项。内容繁复，区分详细，集我国古籍之大成，是一部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现存最早的类书

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是《北堂书钞》。《北堂书钞》由隋唐间虞世南编纂。是虞世南任隋朝秘书郎时，摘抄秘书省藏书，汇编而成。全书共160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食、地等19部。每部再分为类，共852类。每类摘引唐以前古籍中一些有关的词句，但不尽注明出处。

最大的书

世界最大的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出版的《四库全书》，共3万6千册。

最小的书

世界最小的书是奥地利维也纳市一家餐馆里陈放的一本长23毫米、宽

21 毫米，共 136 页的介绍烹调知识的书。

问世最快的书

问世最快的书是约翰·里斯纳的《恐怖之层》。英国考吉图公司收到此书初稿后，不到 24 小时便出版了长达 223 页的平装本。

问世最慢的书

问世最慢的书是《德语词典》。格里姆兄弟从 1854 年就开始编纂，直到 1971 年方才出版。

最滞销的书

世界上最滞销的书是戴维德·威尔金斯由古埃及人后裔的科普特语译成拉丁文的《新约》译书，1716 年由牛津出版社出版 500 本，平均每 139 天才卖出一本。

最早的畅销书书单

1895 年，美国《读书人》登载了十九个城市书店中最畅销的六本书的书名，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张畅销书书单。自 1903 年开始，《读书人》月刊每期公布本月内最好销的六本书，称为“畅销书六册”。可以说，“畅销书”一词在这时首次正式出现。

最大的书籍订购数

世界最大的书籍订购数是《第 52 版汽车协会成员手册》（1982—1983），共 4,800,000 册。其总印数自 1908 年以来已达 82,000,000 册。

退稿最多的书

有记载的出版商对一份手稿的最高退稿次数为 223 次。这是英格兰巴斯市吉尔伯特·杨于 1966 年所写的 13 万字的《世界上政府的征战》一书出版前的遭遇，出版后却大受欢迎。

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

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国的《永乐大典》。本书初名《文献大成》，由明代解缙负责编纂。后更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 22,877 卷，凡例和目录 60 卷。全书 3 亿 7 千万字，定名《永乐大典》。始于永乐元年（1403 年），成书于永乐六年。全书装订成 11095 册。编制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经书、史籍、工技、农艺、医学、宗教等。因本书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只书写了一个正本。明嘉靖年间另摹副本一份。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年间已渐散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副本大遭焚毁，未毁的几乎全被劫走，1960 年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1984 年版又增加 67 卷。

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专著

我国有关活字印刷术最早最详细的著作是《活字印书法》。本书附录于《农书》之后。作者是元代的王祯。

最早考辨伪书的专著

我国最早的考辨伪书的专著是《诸子辨》。本书又名《龙门子》，1卷。明宋濂撰。是考辨秦至宋代诸子书的杂著。考辨凡44条，既考辨真伪，又有批判文字。

最早全面论述藏书理论的著作

我国最早全面论述藏书理论的著作是明著名藏书家祁承 写的《澹生堂藏书训约》。此书分《聚书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篇，分别对图书采访、图书分编典藏和如何阅读等作了深刻论述。

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图书馆活动的专书

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图书馆（藏书楼）活动的专书，是清代孙庆增撰的《藏书纪要》。本书较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封建社会藏书楼的全部活动内容。凡一卷，分购书、鉴别、抄录、校雕、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则。

最长的更正

印出的书里出现了错误总得想法弥补。最初，书往往被修改，画得很乱。后来人们发明了书后附上更正的办法，这样的更正常常有几页或十几页。1587年出版的一部神学著作创了108页的最高纪录。

最古老的装订书

世界最古老的装订书是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136公里处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一本《诗集》。据专家测定，它是一千六百多年以前装订而成。此书是作为殉葬品放入墓中一个12岁女孩下部下面随葬的。该书包括490页羊皮纸，封面是木板，用皮条装订。是用科普特文精心手抄而成。

最早的图书馆学辞典

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辞典是《图书学大辞典》。本辞典由卢震京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分词典和附录两部分。词典部分收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印刷、装订等方面的名词术语以及著名藏书家、图书馆等。附录部分列二十四种附表：中文重要图书馆学书目、中文图书馆期刊目录、中文重要参考书目、中外作家异名表、宋辽金元明清年号名讳索引表、历代藏书家室名索引、世界大图书馆简表等。

最早的总书目

我国最早的总书目是《生活全国总书目》。本书分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收录1935年以前全国各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会以及私人刻印的书籍，约两万余种。分成人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两部分。每部分再按所附分类表分别排列，每种书著录书名、作者、定价及出版单位等。

最大的新书目

我国最大的新书目是《全国新书目》。本书目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

图书馆编。1950年起陆续出版。主要收录全国出版社与出版家送交出版总署的初版、再版及修订本、增订本的新书和初次重印的旧书目等。每种书著录书名、编著者、译者、出版者、出版年月、定价、备注等项。分为社会科学、哲学、史地、译文、文艺、自然科学、应用技术、通俗读物、少年儿童读物、教科书及总类共十大类。每大类下，再分为若干小类，必要时又分子目。

最大的总书目

我国最大的总书目是《全国总书目》。1950—1955年由新华书店编印，1956—1974年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分别编写。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要收录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每种书著录书名、作者或译者、定价、出版者、出版年月、累计印数等项。分两部分编排：一、分类总目录；二、专门目录。

最大的图书分类法

我国最大的图书分类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国法》。1973年编制，以后几经修订。《中国法》将知识门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部类，并进而细分为五大序列22类。第一序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A。第二序列：哲学。包括B。第三序列，社会科学。包括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第四序列：自然科学。包括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林业，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宇宙飞行，X、环境科学。第五序列：综合性图书。

奇书拾趣

金书

斯里兰卡古都阿努拉达普拉的一座古庙中，曾发掘出一部记载古印度史诗的全书。全书共 7 页，都用纯金薄箔制成。它是大约一千四百多年前由印度传入锡兰的。

铜书

春秋战国时，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物，如鼎、钟、爵、盘之类。春秋末年，郑国子产铸刑鼎，就把法律条文刻在上面。公元前 451 年，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也是刻在黄铜上面的。

铁书

保加利亚西部的加布罗夫斯克市保存着由弗拉茨·安格尔·科斯托夫铸成的一本铁书。这本书重四公斤，全书共 22 页，幅面尺寸为 18×22 厘米。书的内容是该市的著名格言和谚语。

钢书

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广场上，陈列着一部钢书。这部共有 1000 页的奇书，均用不锈钢薄板铸刻并装订，书中记录着圣保罗市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铅书

17 世纪末，有人曾在罗马买到一本书，外皮与正文 6 页，都是铅板做的。

玉书

关于玉书，记载周代史事的《大戴·保傅》曾说：“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素问》也说：“著之玉版，每日读之，名曰玉机。”可见玉书在周代已有。北宋时曾发现战国时一篇记秦王诅咒楚王熊相之“多罪”的诅咒文，也是写在玉上的，实物现已不存。

石书

在缅甸古城曼德勒珍藏有一部世界最大、最重的石书，共 730 页，每页由一整块两吨多重的大理石板制成，占地面积超过 5 公顷。书的内容是宣扬佛教哲学的，是全国 100 名最好的石匠用了 9 年才刻成的。中国很早也便有了石书。成书最早的，要推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掘到的十个石鼓。每个高约 3 尺，鼓面直径 1 尺多，鼓身呈圆鼎形，平底，每个石鼓上各刻一首有韵的诗。据考证，书成于秦襄公 8 年。此外，汉代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石经、北宋汴京国子监石经、南宋杭州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以及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经等，也都是刻在石头上的。

泥书

叙利亚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辞书，是由一万五千多张粘土薄片组成的。古代阿西利亚也曾出产一种粘土书。其书每页 32 厘米见方，厚 2.5 厘米，一本书少则十几页，多则几百页，重量和体积都相当可观。

竹书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竹简就是竹书，它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魏。印度至今仍存有竹书。工匠在用火烤过的扁平竹皮上刻上文字，做成竹书，作为手工艺品出售。

木书

与竹书差不多同时，木书也在中国出现了，它叫作“牋”，木书与竹书台称“简牋”。在朝鲜的一座古塔基座内，也曾发现一本印在木块上的经书，据考证大概是公元 700 年前后的印刷品，公元 1 世纪左右还出现了一种制作奇特的木书，它的做法是：在当书页用的薄木板上浇上溶蜡，趁蜡未干时将其括平，待蜡凝固后，用尖棒在蜡上写字，然后用绳子将数块写上字的木板串接在一起，就成了书。

草书

埃及尼罗河上游生长一种灯心草，茎高约 6 尺，有人称它为“埃及芦草”，也就是所谓“纸草”。古代当地人将纸草加工成几公尺或三四十公尺的长卷，在上面写字。称作“纸草书”。据说公元前 25 世纪就有了这种书。目前巴黎一家博物馆还保存有 4500 年前写的一卷纸草书样本。

树皮书

古代拉丁人喜欢用树皮写字，德国卡塞尔市博物馆就保存着用树皮写的书，每本书的脊背上还钉有金色小牌，上用德文、拉丁文两种文字注明书名。

树叶书

世界上以树叶做书的不乏其例。据说印度人最早将椰子树叶切成长 45 ~ 60 厘米、宽 70 厘米的“纸片”，晾干后两面均可书写文字，装订成册后再加上用木板做的封面，就成为一本书。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当年的佛经就是用这种材料做的。除了椰子树叶外，缅甸还有用棕榈叶做书的。这种书一般以 16 ~ 36 英寸长、1.5 ~ 3 英寸宽的棕榈叶为书页，用特别的“墨水”把经文写在叶上，再用线从叶子中间穿过串联起来，并可以折叠成扇形。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里，有一种高达十五六米的棕榈树，傣语叫“戈兰”，学名叫“贝叶棕”，它的叶子过去常被用来刻写经文，称“贝叶经”。西双版纳原有的五百多座佛寺里保存这样的贝叶经五万册。

羊皮书

羊皮曾经是重要的书籍材料。公元前 2 世纪，柏加马斯国王曾用羊皮写字。小亚细亚佩尔加梅城的人们也把小羊皮或羊皮在石灰水中洗净、晾干，绷在框架上，用原石将它打磨平整，再涂上蜜，制成羊皮纸，用来写书。用亚美尼亚语写的《木爷修道院教义》就是羊皮书。据说至少重 32 公斤。古犹太人也用羊皮写法律，波斯人用以记国史。我国古代西藏人也用染制过的羊皮写佛经。

人皮书

人皮书在世界上至少有一百册。譬如在法国德勒斯登的图书馆里，有一

本墨西哥历书，就是写在人皮上的。维也纳也有一本用同样材料制作并画有彩色图画墨西哥抄本。英国的一家博物馆中，存放着一本 19 世纪的人皮书。它是用一个谋杀犯的人皮包成的。内容是介绍 1827 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一个叫韦廉·葛达的富裕农民杀死了他的情妇而被处死。他的一部分皮做了此书的封面。法国著名天文学家、诗人卡米尔·弗拉马利翁博士的诗集《空中的土地》，用一位非常喜欢他的诗的伯爵夫人的肩上的皮装订。此书封面上烫有几个法文金字：“遵照一位女士的心愿，用她的皮装订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一个俘虏收容所所长的老婆，对人皮、特别是对有纹身图案的人皮感兴趣，她借助丈夫的职位和权势，残酷地杀害了一些身上有纹身图案的俘虏，用他们的皮做成书的封面。其中有希特勒影集、《我的奋斗》等。

八吨重的书

法国图卢兹市普利瓦出版社为纪念建社十五周年曾出版过一本号称世界最大的书，这本书长 4 米、宽 3 米、重 8 吨，共 30 页，每页重 200 公斤。书呈立姿放置，以便读者翻阅。书中记载着法国本地区各行各业最有名的活动家的事迹，其中包括画家、艺术家、作家、大企业家、政治家、记者等。

重两吨半的图书目录

英国伦敦曾出版过一部大型图书目录——《世界文学著作目录》。它有 754 卷，527,800 页，重达两吨半。全书包括世界各国从 1556—1956 年四百年间所出版的 1134 万部文学著作的目录。《世界文学著作目录》从出版第一卷到最后一卷，总共花了 15 年时间。

昂贵的书

1967—1971 年由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800—1900 年的大不列颠国会文件》的书皮用掉 334,000 张印第安山羊皮，书的金边用掉价值 39,000 美元的黄金，这套书重达 3.64 吨，价值 5,6000 美元。另一本纽约出版的《美国的鸟类》，全书四册，重 188 公斤，定价 5,1000 美元。再有一本《世界末日》，封面用铜、金子和宝石装饰，重达 200 余公斤，书中有 551 个金字。1964 年，一个日本人出价 400 万法郎想购买此书，被书主拒绝。

微型书

日本小型艺术家新野是世界上最小书籍的设计者，书长 1.4 毫米，全书只有 20 页。书的封面用皮革制成，书名烫金压印。书的内容是诗人若山的儿歌《蚂蚁》和《火车头》。放大镜是此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日本东京凸版印刷公司也出版有一种小如绿豆的微型书。它的封面长 1.5 毫米，全书 50 页，厚 1 厘米。也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书中的文字。1971 年东德印制了一本《绘画入门》。此书长 3 毫米，宽 2.5 毫米，只及婴儿的小指指甲大小，版面只有 2×2 毫米。手工雕刻、手工装订，技术之精湛绝妙惊人。日本还出版了一本可以从针尖里穿过的小书。里面的文字也很特殊，是一种彩色符号。读者要通读它，除了必须借助于高倍放大镜，还须学习认识符号。

塑书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已经出现了用高强塑料印制的“塑书”。这种书印刷精美，图片清晰，不易撕坏，可以清洗，适宜作幼儿读物和广告图册。

闻香书

法国巴黎一个品酒师发明并出版了一种专供闻的书。书共 30 页，带有 54 个很小的瓶子，装有各种芳香物质，有桃、山楂、桂皮、麝香、干草、软木等香味和法国上等葡萄酒味，当你需要品尝某一种香味时，只要打开相应的一页，扑鼻的香味便缕缕散出。英国也出版过一种闻香书。当读者用手摸书上的西瓜、苹果、松子时，便可闻到它们的香味。这是因为书上的图案，是用带有不同香味的纸剪贴上去的。

取暖书

在伊拉克古城尼尼威遗址，发掘出一大批两千年前的砖形书，它们全用泥土烧成，记载着古代亚述帝国的故事。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这种砖形书经火烧后可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热量，不亚于现在的保温瓶。

发光书

美国曾出版一种用含磷油墨印制的书，这种书在夜间没有灯光时也可阅读，因为用这种油墨印出来的字可以发光。

立体书

英国儿童读物出版社曾出版一种表现历史名胜的立体书。书中的建筑物是用硬纸依照实物按比例绘制成的。一打开书本，就会出现立体建筑物。

空无一字的书

纽约一家出版社曾别出心裁地出版过一种空无一字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也没有的书》，用破书本装帧，书中篇幅虽多达 200 页，却真的空无一字。这本怪书很快便以每本 3 美元的价格售出 11500 册，这使得出版者大为振奋，又拟定出版该书的“姊妹篇”。

会说话的书

英国曾出版一种名叫《企鹅》的画册，此书的封底放有薄膜小唱片和一枚小唱针，只要用手指轻轻转动小唱片，就能听到书中老太太、小女孩和小矮人的说话声。南斯拉夫曾出版一种专供学习外语用的图书，书中每行文字下面都嵌入一道粗线条，阅读时，只需用一个大小与钢笔差不多的特制装置沿这条粗线滑动，读者就会听到悦耳的声音。

织出来的书

1894 年东京曾出版一本拉封丹寓言集，此书不是印刷的，而是织出来的。此书现保存于莫斯科国家历史图书馆。

蛛丝装订的书

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展出一本小巧玲珑的书。该书用蛛丝装订而成。

蛛丝的平均粗细为 0.002 毫米。

带锁的书

苏联里加市一个旧书店曾收购到一本题为《宇宙志》的巨型古书。此书用羊皮装帧，封面加了一把锁。这是瑞士地理学家缪斯特的杰作。书中记述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地理概况，并有大量地图、插图和版画。

穿着丛书

美国流行过一种可以穿的系列丛书。这种书把图文印在一种特殊的布料上，读者看书时将书页全部打开，便成了书中主人公穿的特别服装。譬如书是一本警察抓歹徒的小说，那么书打开后就是一件标准的警服，还配有腰带、徽章、手铐和警棍。这种书折起来可以放在书架上，打开则可挂在衣橱里。读者把头套进领洞，就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了。

作帽子的书

秘鲁歌德伯泽人有一种书，看上去是一顶顶帽子，帽子用十多层布围成帽围，每层布上都粘着书页。当地人认为，书是文明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制成帽子就表示崇敬。

印在床单上的书

美国作家桑德拉·霍克曼曾出版过一本印在床单和衣服上的诗集。她说：“读者可以在上床后和穿衣服时读我的诗，学到知识。读完后又可以可将我的诗送到自助洗衣房去洗。这比一本正经地在幽暗、脏乱的图书馆里啃书，效果好得多。”

不怕水的书

英国博物学家皮特·斯科特曾出版过一种用特别的聚乙烯纸印成的书，名叫《鱼类学家指南》。因它不怕水，所以可供从事航海和捕鱼的人阅读。意大利蒙达多里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一种用聚氯乙烯基薄膜印刷的书，供人在海滨浴场阅读。读者不仅不必担心书被水弄湿，不耐烦时还可拿书作枕头躺下休息，因为这种书的封面可以充气。

电子书

联邦德国曾出版一本电子辞书，重量仅 70 克，却包括了 4000 条辞目。使用时只要把想查阅的单词的开头两个字母输入书盒内，按几个电钮，电子书马上会显示出所要查找的内容。

历代出版机构

春秋以前

春秋以前，图书掌握在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手中，为极少数统治阶级贵族所私有。书籍的生产主要由官方书写。

秦代出版机构

秦代，由于秦始皇的禁书法令，私人不能藏书，更不准生产。因此，图书出版机构仍然主要是官修。生产书籍是用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

两汉魏普南北朝出版机构

西汉惠帝刘盈时，取消禁书令，这时私下允许藏书，后来才可以写书。当时的出版机构除官修书籍外，还有私修。西汉时出现了书店，这是我国发行机构之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私家修史之风较盛。

隋唐出版机构

隋唐以前，历朝都由官家修书，书籍的生产靠手抄。隋唐初期官刻初兴，成为出版机构的全面建立时期。抄写书籍、生产图书之规模也逐渐扩大。《唐书·职官志》记载：政府设专门的抄书机构秘书省，有正字4人，楷书手80人。弘文馆有楷书手30人，榻书手3人，熟纸装潢匠9人。集贤院有书直、写御官100人，榻书手6人，画直8人，装书直14人。史馆有楷书手25人，装潢直1人，熟纸匠6人。坊刻已在唐代兴起，主要分布在四川、淮南等地，尤以四川成都地区为全国的刻书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四川眉山出现了不少书坊，刻印了一大批历史书和诗文集。成都府的樊赏家、过家，成都县的龙池坊卞家和上都（长安）东市的大刀家、李家等坊刻都十分著名。

宋代出版机构

宋代，图书出版机构处于发展阶段，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私家的刻书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而且，三大刻书系统之间互相促进、影响，使出版事业大大推进。全国已初步形成几个出版业的中心，官刻即政府各机关刻印，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刻书机构。中央刻书机构以国子监最为著名。此外，还有崇文院、秘书监等机构。南宋初期，由于金兵南下，原在汴京国子监所存的书籍，全部被毁，出版事业遭受惨重损失。随着出版机构的恢复，官私刻书大兴，中央及各级地方政权、教育系统、民间、私人、书商、坊贾，无不刻印。中央政府的出版机构是国子监，地方官刻机构则几乎遍布全国，以四川、福建、安徽等地为最多。各路转运司、安抚使司，提刑使司、公使库、州县各学和公私书院也都大量刻书。两宋时，全国各大城市的书坊都有很大发展，尤以杭州和建阳出版业为最繁荣。临安（杭州）当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坊刻业中心，城内外书坊林立，有名可考的即近二十家。其中荣六郎刻书铺历史最悠久。当时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主”之美称。福建建州的书坊集中在麻沙、崇仁两地，而尤以余氏为最。宋代建本流传甚广。朱熹谓“建阳板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元代出版机构

元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初具规模。当时，中央政府官刻机构以兴文署为主，中央其他官署也刻书。元代曾设经籍所于平阳，一时成为印刷出版中心之一，以后虽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但整个元代平阳刻印图书事业仍占相当重要地位。地方官刻有安徽太平、宁国和浙江杭州等九路分刻《九史》。元代的坊刻书比官刻、家刻都多。福建建宁府仍然是书坊聚居的地方。其中建安崇化镇余氏勤有堂和麻沙镇刘氏南涧书堂以及刘锦文日新堂、虞平斋务本堂等，历史都很悠久。其他如杭州、抚州、婺州、平水等地坊刻业也都很发达。

明代出版机构

明代中央政府一级的出版机构开始分门别类，各司其责，大量出书。在官刻图书中，重要的是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内府刻本指宫廷刻书。主持其事的是宦官衙门司礼监，其下设有经厂，专司刻书。所刻书大多是政令典制和经史读物。监本分南监本和北监本，因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南监刻书尤多。明代的出版机构，虽由司礼监经营，但中央政府各部院，如礼部、工部、兵部和都察院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印本专业的书籍。形成图书“版出多门，各司其责”的局面。明代地方出版机构林立，各省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也间或刊印书籍。在地方出版机构中，明代的特点是各地藩府刻名较多，称作“藩府刻本”。明代私人刻书风气甚盛，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他们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宋元版，所以刻本十分精致。私人出版家中尤以常熟毛晋汲古阁最为著名。他善于刻书，精于校勘，奋斗四十年，刻书六百余种。所刻书籍运销全国各地，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前广泛，数量也更多。福建建宁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的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书坊。

清代出版机构

清代的中央政府出版机构，逐渐趋于集中统一，它改变了明代由司礼监经管、各部院分头刻印的做法，设置了直属内府的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专门从事修书、刻书。清初刻书主要是中央官刻机构一手包办，地方官刻书籍很长时间没有开展印刷。后来武英殿刻书允许各省翻刻，自此以后，各省的官刻机构才逐渐增多。有的地区刻书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地方官府刻书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清初，由于社会动乱，私家刻书人数少，刻书数量也不多。乾隆中叶以后，私人刻书急速发展。清代坊刻业非常兴盛，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出版和经销图书的坊肆。北京还兴起了新的坊刻中心——琉璃厂书肆。在书坊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工。

近代出版机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图书出版由封建的旧式书籍印行，转变到近代的新式书刊印行。在以往封建政府官刻及小私有者的坊刻、家刻和书籍铺的一统天下中，开始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新式印书馆和印书局。从1840年到1860年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出版、进行文化侵略阶段。外国人在华的书刊出版机构主要有：美华书馆、英华书馆、墨海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益智会和广学会等。从1860年到1895年为“洋务派”办出版阶段，主要

出版机构有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其中存在时间最长、出书最多的是江南织造局翻译馆。从 1895 年到 1898 年为维新派进行出版活动阶段，主要出版机构是大同书局。从 1898 年到 1911 年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兴办出版阶段，主要出版机构是民报社。近代出版发行机构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创办于 1897 年的商务印书馆和创办于民国元年元旦的中华书局。其他规模较小的出版发行机构还有：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开明书店和神州国光社等。近代新式印书馆和书局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已初具规模，并进入到崭新的近代化时期。

历代藏书

藏书的起源

书籍，通常指装订成卷册的著作物或文献。我国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原始的图象文字，并有了所谓的“甲骨的书”和“青铜的书”，但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有目的的藏书因而也就谈不上。我国古代藏书，大体可以溯源到周王朝。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有史官，称作“史”或“太史”，其职责是记载各国当代政事，并负责保藏政府文献。由于当时图书和文献档案统称图书或图籍，所以史官便成为政府保藏图书的人了。《史记》上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这个“藏室”，便是周王室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

私人藏书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学术文化的变化和进步，贵族和史官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从孔子开始，图书开始从官方传入民间，私人藏书随之出现。相传苏秦有书数十筐，惠施“其书五车”，尽管当时的书是笨重的简册，五车也并没有多少种，但惠施毕竟成为见于史籍的第一个私人藏书家。

“藏书”一词的使用

“藏书”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喻老》：“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智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

秦代藏书

秦始皇兼并六国，收缴了各国的图籍。秦都咸阳宫中收藏的图书，大大超过了周王室的藏书，文字的统一和简化，更便利了图书的抄写和传播。但秦始皇的焚书对于藏书造成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时有不少人抵制焚书令，想尽办法把书籍隐藏起来。例如曾任秦博士的济南人伏生，到汉文帝时年已九十，他手头的一部《尚书》就是藏在屋壁中保存下来的。正是由于民间有了藏书，并且私人藏书的数量较大，才没有被秦始皇完全烧光。

西汉的官家藏书

汉初在未央宫正殿北面建三座藏书阁：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专用的皇家藏书楼从此诞生，朝廷还向民间求书，广开献书之路。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武帝又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御史大夫的助手御史中丞既掌管监察，又是管理图书的主要负责人，御史官署所在的兰台也是朝廷的重要藏书处。经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统计，当时藏书共 33,090 卷，这是我国图书史上第一次有关皇家藏书数的明确记载。

东汉的官家藏书

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开始的几代皇帝都崇儒尚文，重视图书。东汉建都洛阳，光武帝时曾从长安运来书籍二千余车；后来洛阳的宫廷藏书逐步增加到这个数字的三倍。同时，政府的藏书机构和职官也逐渐建立起来，并不断地扩充和完善。据记载，政府先后设置七所藏书处，最初藏在石室和兰台，新征集到的书贮藏在东观和仁寿阁。此外，宣明殿和辟雍以及鸿都学等处也藏

有大批图书。桓帝时特设专管艺文图籍的秘书监一职，它既是机构名称，又是该机构最高长官的名称，以后各代王朝大都相沿不改。

两汉的私人藏书

西汉废除挟书禁令后，私人藏书合法化了。但由于书写工具的不便，拥有大量图书的藏书家并不多见。私人藏书家见于记载的有卮公、刘德、刘安、孔安国、刘向、班斿、杜邺、富参、卜圭、杜林、班固、刘梁、王和平、蔡邕、华佗等人，其中蔡邕家藏书几近万卷，数量最多。不过，“书肆”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无疑对图书的流通与利用有所促进。

魏晋南北朝的皇家藏书

魏晋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分裂动荡，王朝兴替频仍。在一个王朝初建或暂时稳定时期，统治者往往征集图书，而一经战乱，宫廷图书就大受损失。因此，这一时期的皇家藏书呈现了旋聚旋失的情况。西晋皇家藏书达 29,945 卷，到东晋就只剩下 3,014 卷。梁初在宫内文德殿列藏四部书 23,106 卷，另收藏大批佛教经籍，但侯景乱后东宫几百橱图书却被焚一空。梁元帝时曾聚书 14 万卷，但在他投降前夕，却命人付之一炬。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比南方更甚，图籍损失尤为严重。北周宫廷藏书才过万卷，北齐只 5000 卷而已。曹魏建立了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设置了主管机构，其长官始为秘书令，后改为秘书监。两晋掌管图书的机构，基本上沿袭汉魏旧制，以兰台为外台，以秘阁为内阁。藏书处有秘阁、兰台、崇文院。南朝四朝都设有秘阁典藏图书，管理图书的机构，基本上沿袭东晋，由秘书省主管。设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等职。北朝的藏书处，北魏有秘阁、东观，北齐有仁寿殿、文林殿、麟趾殿，北周有虎门殿、麟趾殿等。其机构设置与南朝相仿。

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见于记载的，比两汉时要多，主要原因是纸写书流行，书籍便于抄录、携带和保存。曹魏藏书最多的是王弼，藏书万卷。西晋张华“载书三十乘”，范蔚也有 7000 卷藏书。南朝私人藏书的人数或藏书数量都较前有很大增长，出现了不少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最多的达到 3 万卷。如陆澄、崔慰祖、王僧孺、任昉、张缙、沈约、张缙、萧劲、马枢等。而且藏书多“异本”，譬如任昉的藏书就有很多为国家藏书所无。

隋代的皇家藏书

隋初皇家藏书仅有北齐和北周宫中留下的 1 万 5 千多卷。隋文帝即位后，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并派人到各地搜访异本，献书者颇不少。隋军灭陈后，又获得一批图书，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政府的图书大增。隋炀帝时，又派了许多人抄书，聚书多达 37 万卷，远远超过以往王朝的藏书。隋政府主持图书事业的领导机构是承袭自汉末始创、经魏晋南北朝完备起来的秘书省。隋代私家藏书不发达。

唐代的皇家藏书

唐初接收隋宫廷藏书近 9 万卷。唐太宗时朝廷曾派人到各地购求图书。

玄宗时还下诏向公卿士庶之家借抄秘府所无的“异书”。以后历经乾元殿的整理内库书和丽正殿的校书、集贤院的校书，不断有新书征集入藏。开元年间，藏书最盛，长安和洛阳的两份四库书合计 125,960 卷，另有唐代人著作 28,469 卷。此外还有佛、道经籍 2500 余部、9500 卷。唐朝的皇家书籍主要藏在后来被称为“三馆”的弘文馆、史馆和集贤书院。主持政府图书事业的政府机构仍然是秘书省。

唐代的私人藏书

唐代是卷轴装的写本书极盛时期，民间有以抄书为生的，书肆也多了起来，私家藏书大有发展。有能力收藏图书的，一是学者，如大校讎家颜师古、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二是贵室高官，如贞观名臣魏征、宗室李元嘉、宰相李泌。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藏书超过万卷的有十五六人。如李元嘉、杜暹、吴兢、韦述、李泌、苏弁、田弘正、韦处厚、柳仲郢等。

宋代的皇家藏书

雕版印刷的推广，促进了宋代官私藏书事业的发展，北宋取代后周之初，皇家藏书仅有 13,000 卷，以后平定后蜀、南唐等国，除南汉图书焚毁外，五代十国图籍之精华尽归北宋所有。太祖、太宗、仁宗、徽宗时均曾奖勉募献征求亡书，并规定官修和新撰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经太祖到钦宗各朝的不断征集，除重复者外，累计入藏 6705 部、73,877 卷。北宋覆灭，宫廷藏书大部毁失。南宋建都临安后，颁布献书赏格，在南方各地广求图书，在秘书省特设“补写所”从事抄书。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 年）秘书省图书完成编目，计 44,486 卷；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 年），又新增 14,943 卷。北宋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主要机构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南宋虽有所谓秘阁三馆，但只是沿北宋旧名，北宋的集贤院、昭文馆等建置，都被取消。自孝宗淳熙二年，秘书省一直主持国家的图书事业。

北宋的私人藏书

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藏书家更易于得书，故北宋私人藏书极盛。著名的藏书家有李昉、王溥、宋绶、宋敏求、王洙、王钦臣、李公择、欧阳修、李淑、田伟、晁补之等。且具有分布地区广、藏书世代相传、注重交流等特点。

南宋的私人藏书

靖康之乱，官私藏书多毁于兵燹，素富藏书的江浙地区，“藏书之家，百不存一，纵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但南宋刻书和藏书事业仍较发达。最著名的藏书家有晁公武，聚书 24,500 多卷，并编有《郡斋读书志》。陈振孙，藏书达 51,180 余卷，编有《直斋书录解题》。叶石林藏书甚至达十余万卷。

金元之际的官私藏书

金灭北宋，曾把汴京的一部分图书携至北方。金章宗时更大力购求图书。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接收了金和南宋的皇家藏书，又两次下诏大规

模求书，但成效不大。辽藏书家中最著名的，当推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图欲。金人藏书，见于史传者不多。元代私人藏书家多为汉人，间或有蒙古人。较著名的有赵孟頫、庄肃、张雯、耶律楚材等。

明代的皇家藏书

明代学术文化繁荣，印刷业更发达，宫廷和私家藏书远胜前代。正式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就曾“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1368年明军攻下元大都后，朱元璋下令将元宫中图籍运往南京，从而把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全部承袭下来，奠定了自己的藏书基础。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南京文渊阁藏书中各取一部，共计100柜，装了十几船北运，贮于北京宫中的文渊阁。明朝北京宫中藏书，宣宗宣德年间达2万余部，近百万卷。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人通过清理文渊阁所贮书籍，编过《文渊阁书目》，收书43,200余册。明代专门掌握国家图书的独立机构开始是秘书监，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十三年七月，又罢秘书监，所藏古今图籍改归翰林院典籍掌之。因翰林院典籍只有二员，官卑品下，致使明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状况日趋败坏。

明代的私家藏书

明代文人学者藏书风气比宋代更盛，私家藏书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从分布地区看，多在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以江浙一带为最盛。最著名的藏书家有江苏地区的叶盛、杨循吉、王世贞，福建的陈第、徐，常熟的赵琦美、钱谦益、毛晋，浙江的范钦、宋濂、项元汴、胡应麟、祁承等。

清代的皇家藏书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使政府藏书受到极大损失。因此，清政府入关后不久便开始征求遗书。乾隆时期更借编修《四库全书》的旗号，下诏征集图书，进书数量在一万种以上，清朝绝大部分书籍藏于宫廷之内，称为内府藏书。为贮放《四库全书》而建立的“南北七阁”，对书籍的保存和流传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清代的私家藏书

清代前期的私人藏书空前兴盛。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共收录历代藏书家1175人，清代就占了497人。清代前期著名藏书家多数分布在东南地区，北方也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有黄宗羲、钱谦益、季振宜、全祖望、朱彝尊、徐乾学、黄丕烈、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址、朱筠、翁方纲、富察昌龄、吴騫、周永年等。清中叶以后由于连年战事，官私藏书频遭焚掠，私家藏书已非乾嘉时期可比。值得一提的藏书家有海源阁主杨以增、铁琴铜剑楼主瞿绍基、皕宋楼主陆心源、八千卷楼主丁申、丁丙等。

版本目录学名著举隅《兵录》

《兵录》由汉武帝时军政杨仆编制，是我国最早的群书目录。《兵录》久佚，已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从《汉书·艺文志》“裙摭遗逸”、“犹未能备”的评语来看，它还是一部不完备的专科目录，但它终究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部群书目录。它的出现，标志着记录图书已由为一书作序，发展为揭示群书的内容，书目的雏型已初步具备，对《别录》、《七略》的编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别录》与《七略》

《别录》与《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的分类图书目录，是奠定我国目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它把古代的分类思想应用于图书整理，提出了图书的正式分类法，对两千年来我国的图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别录》由汉代刘向编纂。成帝时，刘向受诏为国家藏书校书编目。刘向每校完一书，均写有叙录，包括叙述校讎原委，作者生平、学术源流、辨书真伪、内容提要、图书评价等。除抄送一份进奏皇帝外，又另外留抄一份，积累存放，题为《别录》。全书20卷，著录图书603家，13,219卷，分为六部28种。

《七略》则是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根据已汇集成书的《别录》，撮其旨要，采用“七略图书分类法”，于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撰成。全书共7卷，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对其它六略的总结概括，包括总序和各略的序，说明各类图书内容和学术流派。其余六略即六大类，大类之下再分为38种，种下分634家，共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宋初学者已经没能见到《别录》和《七略》，可能在唐代即已亡佚，但它们确立的图书著录方法，直至今日仍为我们所用。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图书事业的主要成就之一。它不仅开创了我国史志目录的先河，而且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汉书·艺文志》由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班固编制。班固自永平中奉诏修史，历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汉书》。由于他十分赞赏“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因此，他“爱著目录，略序洪烈”，删取《七略》之碎而作《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虽是依据《七略》撰成的，但并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它删除了《七略》的辑略，保留了其中内容。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七略》中各书简明叙录，必要时，节取改为班固的自注，对原来文字也作了一些修补。在分类著录方面，虽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各类著录的书籍也基本上保留原貌，但增加了《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均在自注中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此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留下一朝藏书或一朝人著作的记录。

《晋中经簿》

《晋中经簿》亦称《中经新簿》，是西晋文学家、音乐家、目录学家荀勖根据郑默的《魏中经簿》编辑而成。《晋中经簿》正文 14 卷，另附佛经 2 卷。分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著录图书 1885 部、20,935 卷。《晋中经簿》是对西晋图书的一次大总结，它虽依郑默的《中经》而作，但又有创新，较好地反映了自《七略》成书以来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是最早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目录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晋元帝四部书目》

《晋元帝四部书目》，西晋李充编。西晋末年，社会动乱，先遭“八王之乱”，继之以“永嘉之乱”，秘阁藏书，毁损殆尽。晋元帝偏安江左，重新搜集。晋穆帝时著作郎李充负责整理图书，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晋元帝四部书目》虽亦如《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但却改变了荀勖乙为子、丙为史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序，李充修订的四部次序，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

《七志》

《七志》，南朝齐王俭编撰。王俭在主持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的同时，由于对官修目录不满，又依《七略》私撰《七志》，开私人编目之端。《七志》的体制是：一、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文翰志，纪诗赋。四、军书志，纪兵书。五、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术艺志，纪方技。七、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突破了《七略》收书不收图的旧例。最后附佛经录和道经录，实际为九类。《七志》还“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开创了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其不足之处是在史书已很丰富的南齐时代，还墨守《七略》的成规，分史书入《经典志》，不免有泥古之讥。

《七录》

《七录》，南朝梁阮孝绪编。凡 12 卷，分内外篇。内篇五录是：经典录纪六艺，纪传录纪史传，子兵承纪子书兵书，文集录纪诗赋，术技录纪数术。外篇二录是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 6,288 种，44,526 卷。《七录》今已佚，《广弘明集》卷 3 还保存了七录的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可窥其大要，《七录》较之《七志》合理的地方在于将《七志》经典志的史记杂传别出为纪传录；而将军书志改为兵录，与诸子志合并，归入子兵录；并增加佛法录、仙道录，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的较多的佛经、道经，由此全面反映当时社会学术思想的面貌。《七录》在大部类下又分细类，这种分类法，细致得体，对分类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七录》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

《综理众经目录》与《出三藏记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增多，相应地也出现了不少佛经目录。东晋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便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是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书。它是把各种佛经按时代排列，并说明翻译情况。全书将佛经分为六类：一经论本录，二失译经录，三异经录，四古异经录，

五疑经路，六注经杂经录。虽是比较简略的佛经目录，但由于它对当时流传的佛经能分门别类，并注明年代和译者，辨别真伪，便于后人继续整理。《综理众经目录》早已失传，其概貌可从《出三藏记集》中窥见一斑。《出三藏记集》15卷，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佛经目录。是梁释僧佑在道安经录基础上增辑的。它的编制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其特点是总经序，由此可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了解译经地点及年月。这是僧佑的独创。无论从书目编制体例，亦或从史料价值，均为后世采用与推崇。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唐代魏征等撰。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它远览《汉志》，近承《七录》，又参考了前代目录。《隋志》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使四部分类法固定下来而后世相沿不改。荀勖、李充等已导四部分类之先，但顺序不同，部之下亦不分类。《隋志》则将顺序调整为经、史、子、集，部下详分若干类，构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计经10类，史13类，子14类，集3类。四部之后附道佛书。共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隋志》在各部、类之末都写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著录体例是首列书名，下列卷数，然后加注。指明著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隋书·经籍志》的总序、大序、小序、注释，至今仍不失为考见唐代以前古籍概况的重要资料。而且就总序内容来说，也是今天研究古代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的重要文献。

《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

《群书四部录》200卷，唐代元行冲等编。有大、小序，解题，共收图书2,655部，48,169卷，是中国有名的官修目录之一。此目录完成后不久，编者之一毋斐指责它有五大缺点，并于唐天宝年间自著《古今书录》40卷。《古今书录》是《群书四部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的新本。分经、史、子、集四录45家。每部有小序，每书有撰人名氏，并有解题和论述。共著录图书3,060部，51,852卷。《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均已散佚。

《新唐书·艺文志》

《新唐书·艺文志》4卷，宋代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多取法《隋书·艺文志》，而内容则多采《古今书录》，收书除据《古今书录》照录外，增加了《旧唐书·经籍志》所不录的唐人著述27,127卷。并用“著录”和“不著录”相区别。这样，《新唐书·艺文志》便比《旧唐书·经籍志》更完备，并实际上开创了补旧史艺文志的工作。《新唐书·艺文志》在分类和编次体例方面亦有所变动。

《崇文总目》

《崇文总目》，系著录北宋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由宋代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成。由于原书已佚，故卷数已不详。据《宋史·艺文志》则为66卷。《崇文总目》总括崇文院三馆秘阁图书，共著录图书30,669卷。分四部45类，计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尤其史部设立“目

录”类，反映了目录事业在当时的程度。《崇文总目》是在雕版印刷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和在唐代目录工作的丰富经验下建成的，虽继承了《群书四部录》的做法，但又有所改进，故在参考使用上很快就代替了《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南宋晁公武编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开解题目录之先河，树私家目录著作之典范。《郡斋读书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共45类。每部之前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之下有小序，这些小序并未标明，而是写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解题之中。每书有提要，多所考订。《郡斋读书志》共著录图书245,000卷，其中有不少图书是《宋史·艺文志》所不见著录者。

《直斋书录解题》

《直斋书录解题》，南宋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编撰。共著录图书3,096种，51,180卷。以经史子集四部类分图书，共分53类。在编制方面，大部类没有序，也无总序，仅七个类目有序，都是新增创或有变动的类目，对于传统的类目则无任何说明。每类之下，著录书名、卷帙、撰人、版本，以及对著作得失的品评。《直斋书录解题》原书56卷，早已亡佚。现流传本是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22卷本。《直斋书录解题》创设解题一体，其内容包括评论人物、品评图书、揭示图书内容、记述选材范围、志藏书时间、记版本异同，起到了“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虽然先此已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但正式以解题为名，以至后人称此类目录为解题目录，则起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便成了解题目录的典型，对后世目录学影响极大。

《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南宋著名藏书家尤袤编撰。《遂初堂书目》的分类体系虽未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然就其所著录的3,150余部图书之部次看，实系四分法。在44个类目中，经部9类、史部18类、子集12类。尤袤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根据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创设类目。如杂艺、谱录都是他所创设。书目还首创著录版本，成为版本目录的最早著作。

《通志·校雠略》

《通志·校雠略》，南宋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1104—1162）撰。郑樵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开创目录学理论的专门研究，他著名的传世之作《通志》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和《金石略》就是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校雠略》更集中而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他提出图书分类要以学术分类为基础，形成了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全新的十二类百家432种的分类体系。并总结出一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图书分类及目录学的原则。《通志·校雠略》标志着目录学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献通考·经籍考》

《文献通考·经籍考》，元初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凡 348 卷，是中国中世纪仅见的历史巨著。《经籍考》76 卷，主要依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并博采公私目录及有关著述分书辑存。前有总序，下列四部 57 类，各类有小序，各书有解題。《文献通考·经籍考》发展了僧佑“总经序”的方法，形成一种新的提要编辑体例——辑录体，为后世所推崇。

《百川书志》

《百川书志》，明代著名私家藏书目录，高儒撰。成书于 1540 年。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 92 类。其详明程度非以前的任何一部依四部分类的书目所能比拟。该书著录了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并将之列入史部，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百川书志》仿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例，绝大部分书写有简明提要，介绍作者概况、掌故以及其他有关内容。

《澹生堂书目》

《澹生堂书目》，明代祁承 撰。祁承 在《澹生堂书目》中，提出鉴别图书的标准是市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他重视对图书的分类，提出了系统的因、益、通、互四点图书分类主张。其中的通与互，实发前人所未发，为章学诚所说别裁和互著的先驱。在《澹生堂书目》中，改制了一个四部 46 类 243 子目的图书分类体系。类目详明，增删恰当。并首创约史、丛书、余集等类，其中犹以丛书类在分类学上贡献巨大。

《红雨楼书目》

《红雨楼书目》，明代徐 编撰。书目按四部法分类，除经部外，史、子、集三部变动较大。书目收明代集部书较多，其中“明诗选”部分对作者简历著录颇详，所收版本又多善本，是关于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其中“传奇类”收元明杂剧和传奇 140 种。

《古今书刻》

《古今书刻》，明代周弘祖撰。是关于出版和石刻的专科学目。书目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各直省所刻古籍，下编则记载各直省所存石刻。对考求版刻源流及图书存佚颇有价值。

《绛云楼书目》

《绛云楼书目》，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私家藏书目录。书目按四部体系分设 73 类，其中有些类目，如地志类、天主教类等，为以往私家藏书目录所没有，乃钱谦益首创。目录虽无小序和解題，但对于版本情况多有记载。

《千顷堂书目》

《千顷堂书目》是明末清初黄虞稷在其父黄居中千顷堂藏书的基础上编成的目录学著作，凡 32 卷，是收录明代艺文最齐全的书目。它收录了上至明代 16 朝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不少图书连《永乐大典》里也找不着。《千顷堂书目》在分类编目方面的成就亦颇值得称道。

《明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初稿出于清初学者黄虞稷之手。康熙年间，黄虞稷应邀进入明史馆修《艺文志》。他在对明代几种主要官修目录如《文渊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及清初傅维麟《明书·经籍志》等进行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改变了《汉志》以来的历代史志通录古今的做法，而改为记一朝之著述。又将南宋咸淳以下及辽、金、元三朝的各种著述按类附于明人著述之后。书稿交明史馆后以《千顷堂书目》为名行世。今本《明史·艺文志》则是王鸿绪任明史馆总纂时，根据黄著志稿，删去前朝著作改编而成。从此开创艺文志记一代著述之例，《清史稿·艺文志》亦依此例。

《读书敏求记》

《读书敏求记》，明末清初钱曾撰。收书 634 种，皆宋、元精刻。书以四部为序，其中经部分 6 类，史部分 10 类，子部分 20 类，集部分 3 类，共 39 类。《读书敏求记》不仅是清代前期开始出现的善本书目的首创之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钱曾在每种书的解题部分详叙书之版本源流及缮刻异同，并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等一整套方法，为版本鉴定工作找到了一定的规律，对后世影响很大。钱曾另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等行世。

《经义考》

《经义考》是清初著名藏书家朱彝尊写作的一部专科性版本目录学著作。他把自孔子以来人们所诵习的 14 部“经”，以及历代儒者所撰的阐释诠释经书的著作，编成了一部几乎可以说是包罗无遗的关于经的专科目录。《经义考》凡 300 卷，在问世之初便得到极高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巨大的图书目录。该书是编修《四库全书》的相连产物，由《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等根据弘历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撰写的采入和未采入的古籍提要汇编而成。《总目》全书凡 200 卷，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再分小类，小类再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按语，扼要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分这一类目的理由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 3,461 种，79,309 卷；存目 6,793 种，93,551 卷，共 10,254 种，172,860 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篇幅巨大、体例完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名著，在整理古籍方法、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予后来的学术界以颇大影响。然而，也存在着收书不遍、评价不公等严重问题。

《士礼居藏书题跋》

《士礼居藏书题跋》，清代黄丕烈撰。黄丕烈是清嘉道间著名的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之学。每得一善本，辄为题跋，叙其“版本之先后，篇策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划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以及“行幅之疏

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敞好”，以致“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黄丕烈的题跋之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然而在其有生之年却未及辑成专书。光绪以后，辑录他的题跋的书颇多，其中以缪荃孙编辑的《荃圃藏书题识》收录最全、最为流行。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翟绍基的藏书目录。翟氏藏书早在翟绍基时就已开始编目，到其子瞿镛时编了一部《恬裕斋藏书目录》草稿。以后历经校阅、雠勘、增补、修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才由瞿镛的孙子瞿启甲刻印问世，并更名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书目仅著录宋、金、元旧槧及稀见抄本，普通图书没有著录，共收录经部书 82 种，史部书 265 种，子部书 370 种，集部书 525 种，共 1,242 种。其中宋板书 161 种，金本 3 种，元本 105 种。对查考古籍版本颇有参考价值。

《楹书隅录》

《楹书隅录》，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杨以增海源阁藏书目录。杨以增之子杨绍和著。凡 10 卷，共著录宋元珍本近 300 种。考核诸书异同，检校得失，详载行款、题跋、收藏印记。为近代一部著要的目录学著作。

《皕宋楼藏书志》

《皕宋楼藏书志》，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藏书目录。它仿照张金吾《爰日精庐藏书志》体例，著录罕见的宋元刻本及旧抄之书，但所录比张氏稍宽，张氏断自元，而陆氏断自明初。凡《四库提要》和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所没著录的，各撰解题一篇，以叙其流别，解题仿马氏《经籍考》之例，详录各书序跋及名家题跋，因而篇帙多达 120 卷，40 删 4 函。除《皕宋楼藏书志》外，陆氏另有《仪顾堂题跋》、《仪顾堂续跋》两书行世。这三部书目和题跋之作在近代目录学史上影响很大，学术价值极高。《善本书室藏书志》

《善本书室藏书志》，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丁氏所藏善本书目。凡 40 卷，著录小八千卷楼所藏宋元槧本、精刻本、名校名钞本及稿本等。每目均有解题，多有考证之语，学术价值较高。丁氏藏书目录另有《八千卷楼书目》20 卷，依《四库总目》体例分类，是丁氏藏书总目。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清代藏书家莫友芝撰。凡 16 卷，是莫友芝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作的笺注。莫友芝把每遇到的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当条之下，有的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此书被奉为考证版本之学者的金科玉律，评价颇高。可惜莫氏生前未及出版，以后经传抄增补，已失本来面目。莫氏另著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影山草堂书目》等。

《校雠通义》

《校雠通义》，清代章学诚著。章学诚继刘向、郑樵之后，在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

地位、作用，目录学的编制体例和方法诸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古典目录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校讎通义》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精华，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提出互著、别裁之法；认为分类应根据学术的变迁及书籍情况而更改；还极力主张编制专科目录和索引。章学诚曾仿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体例，编纂了史学专科性书国《史籍考》。虽然书已亡佚，但从保存于《章氏遗书》中的《编修史籍考要略》和《史籍考总目》等文章中，可见其概貌。

《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清代张之洞撰。是一部列举了 2200 种左右书籍，以揭示治学行径的书目。本书目非常重视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直至当世的学术著作，并注意收录中外科技书籍。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部之中又分为若干类。每一类中的书籍，以时代先后为序，每一部书名下，注明作者姓名；但当世著作，不书作者，只书“今人”。记载版本以当时习见的为主，不追求宋元版、嗜古好僻。重要书后略加按语，三言两语指出阅读时注意之点。书后附载《别录》与《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近人范希曾撰《书目答问补正》5 卷，对《答问》之错误和漏记多所纠正和补收。《书目答问》及《补正》历来被人们认作是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

《古越藏书楼书目》

《古越藏书楼书目》，徐树兰编，是 20 世纪初设在浙江绍兴的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公共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馆藏书目目录。为体现“古今中外书籍，务求平等对待”的办馆思想，它打破了经、史、子、集四部分体系，把中西书籍融为一体，分为学部和政部两个大类。学部、政部之下，再区分为 48 类。每类再分若干子目，共 332 个子目。48 类绝大多数因袭旧有类名；但在 332 个子目里，显示出中外学术统一立目的倾向。尽管子目不尽恰当，但的确代表着当时的新事物、新学术和新出版的图书。《古越藏书楼书目》是我国图书馆界接受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过渡，为引进、编制与推行十进图书分类法开辟了道路。

《书林清话》

《书林清话》10 卷、《书林余话》2 卷，近人叶德辉著。是版本学方面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叶德辉有感于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仅仅缀述历来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乃遍检史书，阅遍诸家藏书目录和题跋之作，在本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他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价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版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叶德辉另有题跋之作《郎园读书志》行世，或论一书之得失，或辨版本之异同，影响亦很大。

版本术语浅说版本学

版本学是研究各种图籍的刊者、校者、售者、藏者，年代、版次，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行款版式、封面牌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真伪优劣以及传抄情况等问题的学问。版本学与目录学、校雠学有着血缘关系。最初是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各种不同的抄本。印刷术发明以后，由于大量新的研究内容的出现，版本学开始从目录学中独立出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版本

版本一词由版与本组合而成。版的名称源于简牍，本的名称源于缣帛卷轴。雕版印刷发达后，把印本书称为版，而称未雕的写本书为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版本之名称》说：“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将版本二字连缀成一个固定名词则始于宋代，成为雕版书和手抄本的合称。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更为广泛，不仅包含雕版印刷的书籍，非雕版的影印、石印、拓印、铅印、晒印、钤印、油印等本也都包含在内。今天所说的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

抄本

凡手写的书，除原稿和清稿以外，统称抄本。古代刻版印书，远不如今日之便当易成，成本也高，因而读书学习常借善本抄写。抄本中之字体工整者，又别名之为写本。互相传借抄写的书，谓之传抄本。不详年代的抄本，则称为旧抄本或旧写本。古书业对抄本早晚给予习惯上的界线：约清嘉庆以前的通称旧抄本，晚清抄本称近抄，民国以后的抄本书称新抄。确定系明朝或清朝的抄本书而无从断代的，就笼统称明抄或清抄。此外，用乌丝栏纸所抄的书，称为乌丝栏抄本，用朱丝栏纸所抄的书，称为朱丝栏抄本。

毛抄

晚明藏书家毛晋手抄的书，通称毛抄。毛抄本字画挺秀，认真不苟，影写宋本形神酷似，几可乱真。后来的公私藏书家都异常珍视毛氏写本，给予很高评价。

内府抄本

清代宫廷内部设有专人抄书，所抄各书称内府抄本。

影写本

摹写旧版书籍，字画行款、虫蛀缺笔悉依原样者，称为影写本。影写本由于保持了原来刻本的真实面貌，故向为公私藏家所重视。

影宋抄本

藏书家遇宋版书籍，为世人所稀见而不易购得者，往往选有名的写手，用优良纸墨，照式影抄，务使和原本不差分毫。这样的抄本，称为影宋抄本。

稿本

凡已经写定尚未付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为著书人亲手自书的稿本，称为手稿本。凡稿本经他人代为缮写后，又经著书人亲手校定一番，称为清稿本。

底本

曾经删改校正还未眷清的书，或据以刻印的清稿，谓之底本。

卷子本

装订成卷子形状的书籍，世称卷子本。这种装订形式是最早的纸书装订形式。唐以前抄写的图书和佛经，多是用卷轴装订起来的。唐代写本多为卷子本。

刻本

雕版印刷的书称作刻本，或印本。雕版印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官刻、私刻、坊刻三种不同的刻书系统和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影刻本等不同的刻书版式。

官刻本

历代官家所设各类机构所刻印的书，统称为官刻本。又分中央机关刻本和地方机关刻本。中央机关刻本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内府本等。地方机关刻本有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各路儒学本、郡庠本、藩府刻本、扬州诗局本、各地书院本、官书局本等等。

监本

各朝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称为监本，也叫国子监本。这个名称，开始于932年五代时冯道奏请雕刻《九经》，由国子监刻印。是为官刻的开始。明朝在南京和北京设有两个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叫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叫北监本。

经厂本

明代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分十几个监，其中有一个名叫司礼监。司礼监所属的机关中另有一个经厂，专做内廷印书刻书工作。因此，由经厂所刻印的书，就称为经厂本。经厂本的特点是：版框宽大，字大如钱，刻有句读。纸墨均用上等，雕印精良，成为一代佳品。但由于主其事的多为宦官，学识不足、校勘不精，常有脱误错讹，故后世藏书家多不甚重视。

内府本

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的书籍，通称内府本。凡内府本书，印刷校勘，都比较精良，书品宽大、纸张亦佳。

殿本

清朝中央刻书机构设在武英殿，其所刻书籍，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武英殿刻书始自康熙。殿本多用开化纸，书品宽大。其写刻之工致、印刷墨色之光泽、校勘之精详，莫不尽善尽美。因此，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

明，且可比美两宋。

局本

清同治、光绪间，在江宁创立金陵书局，同时江西、浙江、福建、两广、两湖等省，亦相继设立。这些地方官方书局所刻印的书籍，通称局本。在著录局本图书时，一般在局本之前冠以地名，如金陵书局本、湖北书局本等等。书局刻印的书，以浙江书局较好，湖北崇文书局最劣。

王府本

明清两代各王府所刻印的书籍称王府本。如明嘉靖间怀易堂朱载轩刻《陶渊明集》，万历年朱载堉刻《乐律全书》，清乾隆间明善堂怡亲王府刻印的《杜工部诗》等。

藩刻本

明代各地藩王所刻印的书籍称藩刻本。各藩府之前，皆冠以封地和封号，如秦藩、辽藩、楚藩、周藩等。藩刻本是官刻本中刻印最好，校勘精当的本子。

聚珍本

清乾隆刻印《四库全书》，高宗以为“活字印刷”的名称不雅，改称聚珍。武英殿共刻了大小木活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大概共印了一百四十八种书，世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因需要量较多，福州、广州、扬州、江西等地官书局也仿聚珍活字刻版印书，这些刻本通称外聚珍，而把武英殿的活字本称为内聚珍。

私刻本

不以卖书为营业的私人刻书叫作私刻本，也叫家刻本或家塾本。私刻起于唐代咸通年间，早于官刻六十多年朝以来，私家刻书历代都有，比较著名的家塾本书，如宋嘉定十三年陆子适刻《渭南文集》，廖莹中世采堂刻《五经》、《韩柳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建安魏仲立刻《新唐书》。元朝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代私人刻书更多，如吴郡袁褫嘉趣堂刻《世说新语》，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毛晋汲古阁更以刻书著称于世。清代私家刻书最为精湛，其著者如纳兰性德通志堂，顾嗣立秀野草堂，鲍以文知不足斋，许梈古韵阁，黄丕烈士礼居，都刻了不少书。到了民国，刻版印书已趋没落，但董康诵芬室、陶湘涉园所刻各书，刻工、纸张、印刷之精，较之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私刻本往往以室名、姓名、姓来称呼。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元丁思敬本、明闵刻本（闵齐伋）、凌刻本（凌濛初）等。

坊刻本

各朝代、各地区凡以刻书为商的，其所刻书籍，通称坊刻本。因由书坊编刻，故名坊刻本，亦简称坊本。历代设立书铺较多的地方，如浙江杭州，自南宋中期直至元明刻书业都极繁盛，书铺林立，开设最早的如杭州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铺（诗人陈起开设）；福建建安的余志安勤有堂传了好几代。

建阳的麻沙镇也是当时书坊集中的地方。迨至明清，书铺刻书的就更多了，尤其是南京（金陵）和北京，书坊林立，历史最悠久的，要算扫叶山房，经营时间长，刻印的书也较多。

书棚本

南宋时期，临安府（今杭州）棚北大街书坊很多，犹如近代之北京琉璃厂。因临安之书坊亦称书棚，故其所刻各书世称书棚本。

唐刻本

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称唐刻本。唐刻本在文字雕镌上保持了唐人写经的风格，朴素自然。但唐代雕印本图书流传下来的很少。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等唐刻本均被斯坦因盗往国外。

五代刻本

五代雕版印刷的书籍，称五代刻本。五代刻本在文字雕镌上明显地保持着唐人写经韵味。

宋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称宋刻本。两宋刻书极盛。刻书地区以汴京、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为中心。宋刻本神气肃穆而不板滞，镌刻印刷不失书写原貌，纸墨精莹。宋刻本流传有限，且去古不远，甚为世人所珍重。

元刻本

元代刻印之书称元刻本。元代刻书，承金、宋传统。各地官刻，不计费用，选择良工，纸墨均用上等。私刻校勘十分认真，坊刻皆请名家校订。因此，元刻本不少精刻佳品，且具一代风格。字体多摹赵松雪手笔，多简体字。版式，元初接近宋本，字大行疏，写刻认真，疏朗醒目。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趋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纸头较为粗糙。元代刻书，以建阳最为发达，刻印量最大，流行也最普遍。元刻的最大成就是实行了朱墨两色套印。

明刻本

明刻本指明代刻印之书。其中以内府刻本和藩刻本最为著名。明刻开创了铜活字印刷，以无锡华氏和安氏为著，种类多，数量大。明刻字体仿宋而横平竖直，起落笔有棱角，字形方正，笔画挺硬。万历以后，字体由方而长，笔画横轻竖重，因此，后来称作“仿宋体”的印刷字体形成。明刻还创造了短版、拱花的印刷艺术。

三朝本

三朝本指书版经过三个朝代的刊刻修补而重印的书籍。

清刻本

清代刻印之书称清刻本。清刻本数量极大，精本佳刻比比皆是。其中以私家刻本为最精。私家刻书大体有二：一是名人自刻自己著作或前人诗文。

多是手写上版，即所谓“写刻”，字体优美，纸墨考究，是清刻本中的精品。二是考据和辑佚。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辑刻丛书、逸书、影写摹刻旧版书之风极盛，并详加校勘、考订，精品颇多。

民国本

民国时期刻印之书称民国本。祖本

一种书有时有几种不同刻本，其中最早刻印的版本，作为后刻诸本的依据的，叫祖本。

原刻本

初次刻印本称原刻本。原刻本接近原稿，错误少而内容真实，比较珍贵。所以较受藏书家和读者的重视。也叫原本。

初印本

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刷印的书籍称初印本。初印本字画清晰，藏家读者均以之为贵。

重刻本

木版印刷，印过一定次数之后，书版即漫漶不清，需要依旧本再次刻印，此本即为重刻本。重刻本有两种情况：一是照原刻本的版式、行款、字体，原样重刻；一是文字内容依照原本，而字体格式与原本不同，若有出入之处则在序文凡例中说明。

翻刻本

原刻书版字画漫漶不清，或断裂破损不能再行刷印，又据原版重刻刷印的书，叫翻刻本，或复刻本。

影刻本

影照前人刻本重新刻印，无论刻版形式、行款、字体都依照旧样摹写上版刻印的叫影刻本。刻印精工的往往可以乱真。

仿宋本

宋元刻书，写刻字画认真，遒劲秀丽可爱。迨至明清，刻书家往往摹仿宋版字体刻书，这种刻本，也称仿宋本。

后印本

历次再版刷印之书，叫后印本。后印本字迹漫漶，边框不正，墨色暗淡，藏家读者多不喜爱

精刻本

用手写字体上版印刷的版本叫精刻本。精刻本字体劲秀，书写字画不苟，刻印俱佳。精刻本的上版底本多请名家书写，故又称写刻本。多为名人自刻己著。

单刻本

单刻本系针对丛书本而言。同一种书，丛书中已刻入，而另外还有刻本，谓之单刻本。单刻本与丛书本版式刻工不同，有时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丛书本

丛书之称，始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后来刻书家将各家著作选集汇集，名曰某某丛书。凡丛书中已包括之各种书，叫丛书本。

节本

凡因原书分量太多，或文字冗长，在重印时仅节取其中某一部分而付印的称为节本。

抽印本

从某书中抽出一部分，或者抽出若干卷中的某几卷单印成册的书，叫抽印本。

增订本

书经过前后几次刊印，其后印的书，在内容上较以前所印的书有所增加者，称为增订本。

附刻本

凡一书附刻在它书的卷后，而其著作人又和所附之书的著作人非一人，则称之为附刻本。

道藏本

根据道藏刊印之书，叫道藏本。

梵夹本

根据释藏刊印之书，叫梵夹本。

唐卷子本

据唐写卷子刻印之书，叫唐卷子本。

百衲本

衲是指僧人所穿的许多方块布头补缀成的衣服。百衲是形容补缀很多的意思。百衲本则指用许多不同书版凑印成一部完整的书。

残本

凡缺文、缺卷的书，称残本。

足本

书的内容完整无缺，称足本。

配本

一部书残缺不全，用其他版本的同一种书配合而成为一部完整的书，此种书通称配本。

活字本

用胶泥、铜、铅和木块等制成的活字排版印刷的书叫活字本。递修本有的古籍书版残缺，每次印刷书版均须修补，称递修本。

邈邈本

邈邈，形容不整饬。邈邈本，则是指印本极不整饰，字体、书页漫漶不清的书。

大花脸本

宋版经元、明各朝修版、补版，印的书质量不好，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整，字迹模糊不清，这种书称大花脸本。

满汉合璧本

凡一书同刻满汉两种文字者，谓之满汉合璧本。

巾箱本

本头很小的书，称巾箱本。巾箱是古代装头巾的小箱子。把本头很小的书装在巾箱中，随身携带，从而产生今箱本之名，巾箱本今称袖珍本。

书帕本

明代有一种风气，新官上升或奉差出使回京，按例刻印一书，以一书一帕馈赠长官，当时称这种书为书帕本。书帕本因系馈赠之物，刻者既不经意，收者亦不重视，故鲜有佳者。

书院本

历代书院刻印之书称书院本。

补版

书版刻成，经过数次刷印后，字画模糊，或因保管不善，有了残缺断裂，再次剜补修正书版后刷印的书称补版。

进呈本

曾经进呈皇帝阅览之书称进呈本。

纂图互注本

集各家注疏于同一条文之下，并附插图之书，叫纂图互注本。

大字本

宋时刻书，多用大字。其版框纸幅，亦均宽大，每行至多不过十七八字。藏书家称这样的刻本为大字本。

小字本

此种刻本比普通刻本字小，目录上往往特予注明，以示其珍贵。

两节版

有的书在上栏下方约一寸多的地方又横加一道栏线，称两节版或两层楼。也有又在中间横加一道栏线的，称三节版。

上图下文

用上图下文刻印的书，所见较早的有宋代刻的《刘向古列女传》，其次是明弘治间金台岳氏所刻的《西厢记》。明末所刻的小说，常在上栏下约半寸处横加一道栏线，上节刻图，下节刻文，类似今天的连环画，如明末刻本《皇明英烈传》、《初颖日记故事》等。

单色印本

单一种墨色的印本书，与套色印本相对而言。元代以前印本，均为单色印本。

墨本

也称墨印本。与蓝印本、红印本、套印本等不同颜色的印本相对而言。指用黑墨刷印的书本。墨本是刻版印书的主体，其他颜色的印本都是后起的，且不常见。墨版一色显得单调，不够美观。

蓝印本

亦称靛印本。用蓝色刷印的书本。明代刻书，书版刊刻竣工之后，按例须用蓝色或红色先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无误，再用墨印。清代刻书，仍沿此习惯。用蓝色印的叫蓝印本，用红色印的叫红印本或赤印本。蓝印、红印都是初印，字画清晰，为藏书家和读者所珍视。

套印本

在一张纸上印出几种不同颜色的书本，叫套印本。套印一般都是两色的，其中用红黑两色套印的书籍称朱墨本。三色、四色、五色的比较少见。套印本颜色美观，又有圈点评语，极便诵读，此其优点。但工本大、价钱高，且有些套印本往往都是白文，注文省略，则是其缺点。

浙本

也叫浙刻本。浙江地区所有刻本均称浙本。浙江地区自五代以来，经济就已发达，盛产纸张，成为刻书业的中心。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后，更成为政治文化中心，雕版事业更加发展，逐渐出现了具有地区特点的浙本。宋刻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书品宽大，为宋刻本之最佳者。浙本中又分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台州本、衢州本、明州本、严州本等。

蜀本

蜀是四川省的简称，四川地区刻印的书称蜀本。四川是宋代刻书中心之一。主要集中在成都和眉山。蜀本特点：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

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可惜流传不多。宋代四川眉山刻书多是大字，字体多为颜体，也称蜀大字本，又称眉山本。

闽本

也称建本，福建省所刻的书。福建简称闽或建，故名。福建自宋至明一直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主要集中在建阳、建安和建宁三地。福建刻本，行销各地，影响颇大。其特点：字体似柳，有的似徽宗瘦金书体；结构方正，字画严谨；纸多用黄麻纸，质地较薄，颜色发暗，白纸较少。南宋时福建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镇，是书坊的集中地，刻书极多，流传甚广，后或称麻沙镇所刻书籍为麻沙本。麻沙盛产榕树，木质松软，宜于雕刻，刊版容易。但讹误较多，不为世人重视。

江西本

江西省刻印的书称江西本。江西是唐、五代、两宋刻书中心之一。南宋时刻书不少，尤以吉安和抚州为著，官私刻书成为风气。江西刻本多是四周双栏；字体有的似颜，有的似柳，与闽本颇为相似。

平阳本

平阳又叫平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平阳本即平阳地区刻印的书本，也称平水本。平阳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地区。该地当时产纸，书坊也很多。金代刻本所存不多。

高丽本

朝鲜所刻印的中文古籍，俗称高丽本或朝鲜本。我国印刷术传至朝鲜甚早，朝鲜刻印的书流入我国的也很多，无论木刻本或活字刻本刻印均甚精湛。高丽本书品宽大，皮纸，大字，清晰醒目。展卷阅读，颇有舒适之感。

东洋本

我国印刷术外传的地区，首先是朝鲜，其次是日本。凡日本刻印的古籍称为东洋本或日本本。东洋本印工精巧，用纸近似朝鲜本。但字体和本子的装订形式远不如朝鲜刻本。有的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辨识版本比较容易。

越南本

越南刻印的书籍称越南本。越南刻印书籍的技术，也是由我国传去的，故与我国刻印装订形式无甚差异。越南流入我国的传本，多是相当于我国清代道、咸年间的刻本，再早者则未见。

善本

凡是内容较好，流传较少，刻印较精，无错讹脱漏，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科学研究参考价值的古籍，无论旧槧近刻、新旧稿本、抄本、批校本等，均可称为善本。

孤本

古籍中仅有一本或某刻本中仅有一本或未刻的手稿、碑帖仅有一份在国内流传的，通称孤本或海内孤本。

珍本

古籍中刻印较早、流传较少，或文物价值较高的珍贵印本称珍本。

通行本

流通普遍的印本叫通行本。

旧版

明朝以前印本，无论宋、金、元刻，在未能详细审定时代之前，笼统称为旧版。

焦尾本

不幸遭火，略受损伤的焚余之书，叫焦尾本。

不到尾

书未少量缺页的书，叫不到尾。

影印本

近代印刷技术进步，凡遇古版佳刻，欲广泛流通，而不令失其本真者，一般用影印之法。其法以原书逐页摄影，或胶印，或大石印，或铜版印，世称影印本。

石印本

用石材制版所印的书，称为石印本。其法用富于胶着性的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的药纸上。待稍干后，将药纸复铺于石面。揭去药纸，用水拂拭，趁水未干，滚上油墨。石面着水的部分不着油墨；其有字画之处并未沾上水，则着油墨。铺纸压之，即印成书。

排印本

凡是活字印本都是排印，为了区别版本，将泥活字、铜活字、铁活字、木活字等排印的书称为活字本，把近代用铅字排印的书称排印本，又叫铅印本。

珂 版印本

珂 版的制法，先用硅酸钠溶液涂于毛玻璃上，用水洗之，干后再涂以珂 丁和重铬酸钾混合液，使与照像的干片密接，于日光下晒之，则像留在玻璃版上。印刷时，先用水浸玻璃版，拂去湿气，再用胶棒滚上颜色，每版可印数百张，与原像不差分毫。世人称之为珂 版印本，亦称为玻璃版印本。

拓本

凡从金石器皿、碑、碣、印章拓下文字图案订册成书的，叫拓本。拓得

最早的称初拓本。用红色拓的称朱拓。用墨拓的称墨拓。初拓字迹清朗，墨色匀净，保持原来的神采风韵，比较珍贵。

校本

校勘学者，常觅善本，将某些差异字句录于常本之上，无论雠校或他校，皆称校本。凡有名家批语的书，谓之批本。或者还有些议论，谓之评本。批注有的在行间，有的在天头，在天头的还称眉批或眉评。有名家批语同时又有校正的字句者则称批校本。行间或天头有批注文字，同时又加圈点的本子称批点本或评点本。将名家批校的文字，依样抄录到另一常本，则叫过录本。

定本

自己编撰或整理别人的著作，已经编撰或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的书本，叫定本。

副本

同一书籍抄出的复本叫副本。有时也称别本。

异本

同一书籍不同来源的本子，叫异本。也叫别本。

目录分类名词简释

目录

目和录的合称。是系统地著录群书的书名、作者、出版、校勘、内容和收藏等情况，并按次序编排起来，以揭示和报道一定历史时期的文献情况的工具。它可以揭示科学文化的发展概貌，指导并推荐阅读和检索图书，反映馆藏情况，指导做好藏书工作。

题解

把书籍的内容、作者、编纂过程、流传情况等略作说明叫题解。

叙录

叙录是指对一部书作简要介绍的文字。其内容一般包括：著录书名与篇名；叙述校雠之原委；介绍著者生平与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原委及其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事的是非；叙述学术源流；判定书的价值。

提要

摘录书籍内容要点并评价其得失的文字，叫提要。

一书目录

一书目录是指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排、汇集后的成品而言。最早的一书目录是《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

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是指诸书书名和叙录的总纂而言。最早的群书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奉命整理兵书而编制的《兵录》。

国家图书目录

一称官修目录，是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所编制的一种目录。汉武帝时刘向父子编纂的《别录》和《七略》就是官修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则是这类目录书中最出色的代表作。

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和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一类目录书，以及某些专史和政书中的目录书而言。它大多依靠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而撰成。在史志目录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最负盛名。

私家目录

私家目录指由私人编纂、主要著录私人藏书的目录。它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私家目录的范围比较广泛，若从著录的图书来分，大体上可划分为综合目录和专门目录两类。综合目录又可分为藏书目录、地方目录、丛书目录和初学目录等；专门目录则可分为专科目录和

专书目录等。

综合目录

收录文献涉及到各个知识门类的目录叫综合目录。

藏书目录

藏书目录是藏书家对所藏书的著录。藏书目录是随着私藏的兴起而产生的。唐代始有藏书家，并且撰藏书目。宋代私人藏书和私家目录日盛，明清两代较之宋代又有发展。藏书目录多采两种形式：一是编制目录，二是撰写题跋。私家目录以宋晁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最为后世所推重。

地方目录

揭示与报道关于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山川、气候、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文献的目录叫地方目录。地方目录中较重要的是方志目录。

丛书目录

丛书目录是在丛书大量出现，为便于使用丛书而编的一种目录。虽出现较晚却利用较广，第一部丛书目录是明顾修编《汇刻书目初编》。

初学目录

初学目录是为初学者编的目录学的蒙学读本。张之洞主编的《书目答问》即属此种。

专门目录

专门目录是专为与某一种专门学科、某一种专书有关的图书所编的目录。主要有专科目录和专书目录两类。

专科目录

把与某一专门学科有关的图书编制起来的一种专门目录叫专科目录。专科目录是随着学术发展和目录学日趋分歧而发展增多起来的。如释道典籍、经籍、史籍、文艺书籍、科技书籍等等，都分别编有专科目录。

登记书目

登记书目是全面登记和反映一个时期、一定范围或某一类型文献的出版或收藏情况而编制的书目。它是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范围内文献的记录，集中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文化发展的状况，是编制其他类型书目的基础。

科学通报书目

科学通报书目是及时准确地向读者和图书情报机构提供新出版和新入藏的文献情报而编制的一种书目。它要求迅速、准确地提供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文献的情报，为科学工作者及时掌握国内外本门学科发展动向提供条件。

推荐书目

推荐书目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围绕某一专门问题，对文献进行选择性的推荐，供读者学习某门知识，了解某一事件而编制的书目。

书目之书目

书目之书目是将各种书目、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汇辑起来而编成的书目。它是读者和图书情报工作者了解和掌握书目索引的钥匙。又叫书目指南或三次文献。

个人著述书目

个人著述书目渊源于中国古代的个人著述考。它是揭示与报道关于某个作者全部著作、翻译、编辑、校阅等方面的著述活动，以及有关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研究资料而编制的书目。个人著述书目最早的形式是在作者传记之后所附的著作书目。国外则称之为传记书目。

馆藏目录与联合目录

为报道一个图书馆所藏文献状况而编制的书目叫馆藏目录。揭示和报道全国或某一地区若干图书馆所藏的有关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部分文献而编制的统一的目录则称为联合目录。

四部

四部是我国传统的古籍分类名称。四部分类起自晋荀勖《中经新簿》，分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收经部书，乙部收子部书，丙部收史部书，丁部收诗赋类书籍。后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改换了乙、丙部所收录的图书，成为甲部收经书，乙部收史书，丙部收子书，丁部收集部书。李充修订的次序，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到《隋书·经籍志》，将甲、乙、丙、丁的四部改定为经、史、子、集的名称，概括了各部所收书籍的内容性质，一直沿用至今。

经部

经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类目名称，主要收录儒家经典。经部图书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 10 类。

史部

四部分类的类目名称，主要收列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史部图书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 类。

子部

四部分类的类目名称，著录诸子百家和释道宗教著作。下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 14 类。

集部

四部分类的类目名称。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将这部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5 类。

丛书

也叫丛刊、丛刻、汇刻书、套刻书。凡将各类书籍或一人的各种著作汇刻在一起，而成一编并另标书名的图书叫丛书。最早以丛书为书名的是唐代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它并不是两种以上专书编印在一起的真正的丛书。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丛书是宋代嘉泰二年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语》，计收宋人著作 6 种 41 卷。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明清两代，刻印丛书极盛，不下两三千种。《中国丛书综录》登录的丛书为 2,797 种。

类书

类书，是采辑各种古籍中相关的资料，加以分门别类，系于若干标题之下编辑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类书所收内容，举凡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以杂见称”是其突出特点。我国最早的类书当首推魏文帝曹丕时的《皇览》。规模最大的类书则是明永乐六年编成的多达 22,877 卷的《永乐大典》。最早使用类书名称的是《新唐书·艺文志》。

汇编

综合各家著述或文件资料等，按一定系统编排起来，集为一书，或另题书名或直书汇编字样，均叫汇编。一般所说总集、别集、选集、类书、丛书等均具有汇编性质。

总集

总集为图书类目名称，指汇集各家作品的著作。内容包括汇集各时代各种体裁的各家作品集，如《昭明文选》；各时代一种体裁的各家作品集，如《历代诗选》；一个时代各种体裁的各家作品集，如《唐文粹》；一个时代一种体裁的各家作品集，如《元风雅》。还有专门汇集某一地区各家作品的总集，如《成都文类》，专门汇集某一族姓文章的总集，如《文氏家集》。最早的总集公推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流传下来的则以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为最古。

正史

史书的类目名称。凡反映封建王朝正统的纪传体史书算正史。首先列正史之名的是《隋书·经籍志》。它把《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此后历代相沿。

霸史

也叫伪史。史书的类目名称。指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割据政权的历史著作。伪史之名，首见于梁阮孝绪《七录》，霸史之名，首立于《隋书·经

籍志》。此后的书目书或称霸史或称伪史。

杂史

史书的类目名称。收私人撰修，内容庞杂，体制不经，且颇涉琐事遗闻的史书。《隋书·经籍志》首列杂史一类，后代目录书沿用。

别史

史书的类目名称。凡不能列入正史的私修史书入别史。别史正史的别支，是对正史的补充，其区别只在官修还是私撰。别史与杂史的区别是，别史“乃一代之全篇”，而非一事之始末或一时之见闻。

野史

也称稗史。史书的类目名称。凡私人撰修的史书均称野史。野史包罗甚广，别史、杂史等均为野史之属。

专史

专史乃史书的一类，指某一领域的专门史。按社会结构基本领域划分，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外交等专门史；按学科划分，有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文物史、地方史、科技史等；按图书记载人、事的方式划分，有战争史、民族史、宗教史、人物史等。

通史

通史是贯通古今、阐明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著作。乃近代兴起的新的历史体裁。其不同于以往所谓通史的根本点，在于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说明社会性质。编写新的通史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起，第一部《中国通史》于光绪三十年出版，作者夏曾佑。

断代史

阐述一朝或数朝兴亡发展过程的历史著作叫断代史。正史《汉书》以下，均为断代史。

书界熟语溯源

一目十行

一目十行常用来形容读书敏捷。譬如《红楼梦》第23回：“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语出《北齐书·河南王孝瑜传》：“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语义相近的还有“十行俱下”、“七行俱下”等。

下帷攻读

下帷攻读谓放下帷幕，与外间隔绝，专心致志地读书。如《聊斋志异·红玉》：“女曰：‘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歉，或当不殍饿死。’”语出《汉书·董仲舒传》：“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开卷有益

此言读书的好处。语出宋王闢之《澠水燕谈录》卷六：“太宗(宋太宗)……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另“开卷有得”义近此，语出《宋书·陶潜传》：“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书通二酉

比喻读书很多。语出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四卷：“果然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唐时两山山洞藏书千卷。

牛角挂书

比喻勤读。语出《新唐书·李密传》：“闻包恺在缙山，往从之。以蒲鞮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蹊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另“负薪挂角”一词的“挂角”，亦典出于此。“负薪”则指汉代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书”，语出《汉书·朱买臣传》。宋王应麟《三字经》有“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之句。“据鞍读书”义亦近于此。语出《渊鉴类函·驴三》：“江邻几调蓝山尉，骑驴赴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之，乃觉。”

左图右史

形容拥有图书极多。语见清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叙》：“乃设精舍，颜曰诂经，背山面湖，左图右史。”又作“左图右书”，语见明郑棠《长江天堑赋》：“桂揖兰舟，左图右书。”

寻章摘句

谓搜寻摘取文章的片断词句。语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咨曰：‘吴王……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有贬义。

汗牛充栋

形容书籍之多。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

宇，出则汗牛马。”充栋宇，是说书籍堆满房子，高及栋梁；汗牛马，是说牛马运书时累得出汗。

杀青

杀青一词产生于用竹简写书的时代。新砍下来的竹简上面有竹青，写字写不上，一定要将它剖开刮削干净，或是放在火上烘去青汁，这就叫“杀青”，或“汗青”。汉代刘向说过：“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杀青在今天表示一本著作已写完或印好。自己谦逊地说自己文章不好，不值得成书，便说“徒累汗青”。

坐拥百城

比喻藏书很多。语出《魏书·李谧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学富五车

形容读书多、学问大。如《古今小说》：“请个先生教他读书，到一十六岁，果然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再生缘》第一卷第二回：“学富五车真不假，才高八斗果非轻。”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六回：“大贤世居大邦，见多识广，而且荣列胶庠，自然才贯二酉，学富五车了。”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他如五车、五车书、五车读等均典出于此。

青灯黄卷

青灯，油灯。黄卷，书本。指在油灯下对着书本苦读。语出元汉武臣《玉壶春》：“赴琼林饮宴，不在了青灯黄卷二十年。”又作黄卷青灯。如王实甫《西厢记·崔莺莺夜听琴》：“越显得文风盛，受用足，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

斧正

斧正一词，源于简册时代。在本简上写字，写错了可以刮去重写。已用过的竹简和木简，若是削去一层，将上面的字迹完全削去，这样就可以当作新的来使用了。此之谓斧正，或斧削。今天的“斧正”或“斧削”，常用于请别人指教改正自己的文章时。

映雪读书

指利用雪的反光读书，形容贫而好学。如权德舆《旅馆雪晴因成杂言》：“丈夫富贵自有期，映雪读书徒白首。”语出《初学记》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淡，交游不杂。”亦见《尚友录》卷四：“孙康，晋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又作“映雪”，如关汉卿《拜月亭》第三折：“休想我为翠屏红烛流苏帐，撇了你这黄卷青灯映雪窗。”“窗雪”。如贯休《寄匡山大愿和尚》：“一听玄音下竹亭，却思窗雪与囊萤。”“照雪”。如《颜氏家训·勉学》：“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雪窗”。如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投至得云路鹏程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雪案”。如刘克庄《赠陈起》：“雨檐兀坐忘春去，雪案清谈至夜分。”

都喻勤学苦读，典均出于此。

钻故纸

用以讽喻一味钻在古书堆里的人。语见《五灯会元》卷四：“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景德传灯录·古灵神赞禅师》：“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

积案盈箱

书籍堆满几案，装满箱子。形容书籍和文稿之多。语见《隋史·李谔传》：“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

掉书袋

掉书袋指喜欢征引古书，以示渊博。语出《南唐书·彭利用传》：“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著作等身

形容著书之多，迭起来与作者身高相等。语出《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玘，贾黄中父也。

悬梁刺股

悬梁刺股为孙敬悬梁和苏秦刺股两个勤学苦读故事，形容刻苦自学。如《西厢记》第二本：“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悬梁，拴头发于屋梁上读书，以防入睡。语出《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刺股，语出《国策·秦策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成。”亦作“悬头”。如李商隐《咏怀寄秘阁旧僚》：“悬头曾苦学，折臂反成医。”“悬刺”。如顾云《上池州庾员外启》：“披经阅史，无怠于光阴；雪牖萤窗，每加于悬刺。”典亦出于此。

断简残编

简是古代的竹制书写材料，指一片而言。简书或简册是指编联众简以为册的竹制书籍。编联的材料有革、丝两种。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韦是熟牛皮，柔软耐用，《易》是用熟牛皮穿连的，所以称“韦编”。韦断会使简脱落凌乱，因此后世对残缺不全的书称为“断简残编”。

博览群书

指广泛阅读各种书籍。语出《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鲁鱼帝虎

指书中出现的文字的错架。来源于俗语：书经三写，以帝为虎，以乌成鸟；书经三刻，以鲁为鱼，以亥为豕。

凿壁偷光

指勤学苦读。如鲁迅《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语出晋葛洪《西京杂记》：“匡衡字稚圭，勤学而無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亦作“凿壁借辉”。如赵翼《穆庵侍读见余近作枉赠佳章依韵奉答》：“旅邸喜仍邻近在，可容凿壁借光辉。”“凿壁”。如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出：“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偷光”。如独孤铉《凿壁偷光赋》：“达暗之心难固，偷光之意何新。”骆宾王《萤光赋》：“匪偷光于邻壁，宁假辉于阳燧。”“穿壁”。如滕王道《庾信集序》：“穿壁未勤，映萤愈甚。”典均出于此。

囊萤照读

以囊盛萤读书，指勤苦读书。如李中《寄刘钧明府》：“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萤曾寄此烟岑。”语出《晋书·车胤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又作“藏萤”。如顾云《代新及第人谢盐铁使启》：“某学惭辨豹，业愧藏萤。”“聚萤”。如《北史·崔廓传》：“聚萤映雪，悬头刺股。”“照萤”。如苏轼《赠治易僧智周》：“寒窗孤坐冻生瓶，尚把遗编照露萤。”“集萤”。如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萤照”。如戴昺《纳凉即事》：“蚁行缘食几，萤照落书床。”“读书萤”。如元好问《过三乡望女儿村近怀辛敬》：“云际虚瞻处士星，案头多负读书萤。”杜甫《题郑十八著作文》：“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典均出于此。“积雪囊萤”、“萤雪”、“萤窗雪案”、“雪牖萤窗”等则是合“映雪”、“囊萤”二典为一典。如刘兼《倦学》：“百氏典故空自苦，一堆萤雪竟谁知。”《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顾云《上池州庾员外启》：“披经阅史，无怠于光阴；雪牖萤窗，每加于悬刺。”

古书谈屑

古书的别称

与简册制度有关的别称：简策（册）。古书以竹、木作材料。竹制的叫简策，木制的叫版牍。单根的竹片叫简，编连起来的简叫策。简策常用来指书籍。韦编。用熟牛皮条把竹简编联起来，叫韦编。亦用于一般古籍的代称。如袁中道《李温 传》：“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尘缘，不亲韦编。”方册。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联简为册。亦用于泛指典籍。如韩愈《与孟尚书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也作方策，如《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还作编简、青简、书策等，其类一也。

与帛书制度有关的别称：帛。古代用帛作书的材料，故帛常用来泛指书籍。如《文心雕龙·练字》：“简蠹帛裂。”与此相类的有裂帛、素卷、缣素、缣缃等。

与卷轴制度有关的别称：书卷。古代书本多作卷轴形，故称书卷。如杜甫《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诗：“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它如卷轴、卷帙等，此。

与雕版书有关的别称：书籍。如房玄龄注《管子·宙合》：“修业亦不息其书籍。”剞劂。指雕版，亦为书的别称。如韩愈《送文畅师北游》诗：“先生闾穷巷，未得窥剞劂。”

与书的装饰有关的别称：如缃帙、缃素、缥帙、缥缃等均为浅黄色的帛或细绢，常用以作书衣或书囊，以后常引申为书卷。如关汉卿《窦娥冤·楔子》：“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

与文体有关的别称：诗书。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书史。如江淹《杂体诗·颜延之》：“揆日纂书史，相都丽闻见。”典坟。三坟五典的省称。亦作坟典、坟籍，泛指各种古书。如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典籍。原指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和国家重要文献，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如《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

与藏书手段有关的别称：黄卷。古人用辛味、苦味之物染纸以防蠹，纸色黄，故称“黄卷”。如《抱朴子·疾谬》：“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芸编。古人藏书多用芸香驱蠹虫，故称书籍为芸编。如陆游《夏日杂题》：“天随手不去朱黄，辟蠹芸编细细香。”亦作芸帙。如梁寅《蒙山赋》：“坐紫苔兮绿绮奏，荫苍松兮芸帙舒。”芸签。如李商隐《为贺拔员外上李相公启》：“登诸兰署，辖彼芸签。”

古书的署名

远古的书籍一般不署作者的姓名。譬如《诗经》三百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绝大部分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周易》的经文出于何人之手，也一直是亘古之谜。战国时有秦王见《孤愤》、《五蠹》而不知是韩非所作的记载，汉代亦有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子虚赋》而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的描述。即到汉魏，有名的《古诗十九首》，亦没有作者姓名。而且先秦诸子之书，虽题为某子，并不一定是他自己手作，不少是出于他的后人、弟子、宾客之手。纂集成书，时代当更晚。例如《商君书》中的《徠

民篇》谈到秦灭周，秦、魏华阳之战和秦、赵长平之战，都属商鞅死后几十年的事，自然不会出自商鞅的手笔。

书之署作者姓名，自汉代以后渐多。署名方式并不完全一致。较简单的是只署作者的姓名，复杂的则连字号、籍贯、官职、封号、爵名和著作方式都标出来。籍贯、姓名、字号连写的，如清人袁枚的文集《小仓山房文集》卷端下题“钱塘袁枚子才”。钱塘是籍贯，子才是字。籍贯、别号、姓名和字连写的，如南宋张炎的词集《山中白云词》，题为“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张炎原籍天水，古为西秦，字叔夏，号玉田。时代、官职、姓名、字和著作方式连写的，如《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伯喈撰”。汉表示时代，左中郎将是官名，伯喈是蔡邕的字，撰是著作方式。时代、封爵、谥号和姓名连写的，如《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魏表示时代，陈是封地，曹植曾经封陈王，思是谥号。有的则将时代、官职、勋阶、差遣、爵位、封号、食邑、服色、籍贯、姓名与著作方式统统标出，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敬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有些著作有主修、纂修、协理等：主修一般是某地的地方官，挂名组织批准编写审定书本；纂修是具体负责编写工作的。如清代编的《岳忠武王文集》卷端题“护理河南巡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理河南何焯署河南布政使河南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杨景素鉴定彰德府知府黄邦宁修纂汤阴知县李林校阅”。虽然题名众多，但作者是岳飞，编者黄邦宁，余者多属挂名，无实际意义。如作者系僧人或外国人，姓名前往往往加“释”或“西洋”等字样。“释”是东晋以后对僧尼的通称，“西洋”则表示该书是翻译的或外国人的在华著作。如“唐释玄奘”、“宋释文莹”、“明西洋利马窦”、“清西洋蒋友仁”等。在古代，小说、话本、杂剧等文艺作品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故此类书常常不署名，或另起别号。如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署名兰陵笑笑生，《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辑著，话本选《今古奇观》题姑苏抱瓮老人辑，《英烈传》、《说唐》以及公案小说《包公案》等则不题作者姓名。

古书的版式

宋版版式，大抵以白口单边或细黑口为多（亦间有阔黑口），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大题（书名）在首行下方，小题在上；序文、目录和书中正文不分开，篇末大题仅间一行或三四行；卷末有记大小字总数的（亦有不记的），卷末记校勘人衔名。元刻黑口，一见便知，但元刻亦有白口单边或双边者。所谓宋版白口，元刻黑口亦风气大略之云尔。明初多黑口，正德嘉靖以后一般都为白口。宋元版书，书名在鱼尾下，明刻书书名在鱼尾上，反是者殆不经见。又明及宋、元时装订书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装订，故书口不齐。

古书的纸墨

宋刻墨色香淡，用墨稀薄，个别有墨如点漆；元版书，有人斥其用墨秽浊，但亦有墨如点漆的。宋白纸白而硬，即所谓洁白厚纸、纸质莹洁，笺古色而极薄，纸质罗纹不同，纸色苍润。盖宋本传世的以建本为多，建本多用竹纸印。宋代竹纸，帘纹一般两指宽；明代竹纸，帘纹只一指宽。又宋时皮

纸厚实，两面光洁，常有用已经用过的旧公文纸的背面印书的。元本多竹纸，比宋纸稍黑，皮纸极薄而粗黄；但也有洁白坚韧的，也有用纸背印的。明书以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纸又次之，福建者最下。嘉靖以前多绵纸，万历以后，以竹纸常见。又万历以后多用煤和面粉，以代墨汁；惟徽版墨色有极精者。

古书的字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泉。元朝人承袭南宋风气，字体圆活，后来多半参照赵孟頫字体，更加秀媚柔软。普通称为“元体字”。明朝初年沿袭元朝的作风，明初刻本有时很难和元刊区别。嘉靖年间展开复古运动以后，刻书的人便模仿北宋人所用字体，但是采用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方面，到万历年间发展成为方笔，字形肤廓，笔画板滞，渐成机械式图案。明末清初，更渐渐变为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而称之为“宋体字”，其实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了。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沿用着。19世纪活字铅印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就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了。现在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模范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元体字到了明朝，就逐渐发展成为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的。这都是些精刻本。在现在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正楷活字，是取清朝精刻的软体字为模范的。

古书的目录

远古著述多系单篇，没有目录可言。后来编写成都的著作，作者的自序详细地叙述了写作原因，就具有目录的性质，没有必要再列目录。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都兼有目录性质。后来有人编书，为了便于翻检，就在书的后面列一个目录。倘没有自序之类的文字，编写目录就更为必要。古书目录一般都放在书的后面，将目录提到书的前面，大概起源于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

古书的序跋

古书和现代书籍一样，往往有一段提纲挈领的序，或叙，以说明写书的经过和旨趣。其中有自己作的，称作自序。如《淮南子》的《要略》、《史记》的《自序》、《说文解字》的《叙》等均是。也有别人作的。如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写的《诗序》、孔安国写的《尚书序》等。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群书，每校完一种书都写一篇叙录，考论作者生平、时代及学术成就。被认为是为古书作序的典范。序的位置一般放在书的最后，两汉以后，才移到著作的前面。除总序之外，有的古书每篇还有篇序说明每篇要旨。如《诗经》每篇都有篇序，《尚书》也有篇序。这些篇序一般都放在一起，不跟本篇相连，故可以单独成书。

古书的题跋

题跋这种文体，为北宋欧阳修所创。所谓题跋，就是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题，古文是头；跋，是足后的一个部位。《说文解字段注》有“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之说。历代藏书名家收到自己喜爱的书

籍以后，往往要考证版本的异同正讹，并在卷首或卷尾和前后扉页，用朱笔和墨笔作题跋识语，叙述此书的价值、收藏源流、刻印精工与否，以及是哪一朝代的刻本。有的还借题发挥自己的学术思想。古书题跋可分为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其一是讲究书的内容、版本、校勘等，科学性较强，但内容不免枯燥。可作资料用，但不能成为一般读物。这类题跋的例子有陈仲鱼的《经籍跋文》。另一类虽然也谈版本、校勘，但更多的则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成为一种令人喜爱的散文。黄丕烈的题跋，近人郑西谛、黄裳的藏书记等都可算入此类。将古书题跋纂述成书的做法始于明代。流传至今的有都穆的《南濠题跋》、徐 的《红雨楼题跋》、毛晋的《隐湖题跋》等数种。而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顾千里与黄丕烈，他们两人的题跋识语颇为后世珍宝。

古书的分卷

古书绝大多数是用一、二、三……等依次标明卷目的，同时尚有以下分卷方法：

- 一、仅分两卷者用“上下”、“内外”、“前后”等标目；
- 二、分作三卷者用“上中下”标目；
- 三、分作四卷者用“甲乙丙丁”、“春夏秋冬”、“元亨利贞”等标目；
- 四、分作五卷者用“甲乙丙丁戊”、“宫商角徵羽”等标目；
- 五、分作六卷者用“礼乐射御书数”等标目；
- 六、分作七卷者用“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标目。清刻本又用“九重春色醉仙桃”标目；
- 七、分作八卷者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黄绢幼妇外孙 臼”、“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等标目；
- 八、分作十卷者用天干等标目。如宋代《群公四六续集》十卷便是。此外也有用“东壁图书府，西园翰林院”等标目的；
- 九、分作十二卷者用地支等标目。明代郑太和编《麟溪集》二十二卷，则前十卷用天干标目，后十二卷用地支标目。明代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十二卷，鲍氏刊本用“莺嘴啄花红榴，燕尾点波绿皱”十二字标目；
- 十、大部头的书，还有用东方苍龙：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等二十八宿标明卷目的。佛藏等用《千字文》来代替卷目；
- 十一、宋代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原本一百卷，“每卷以百首为率”。邵宝撰《学史》十三卷，“为卷十二，以象月。又余其一，以象闰。每卷或三十条，或二十九条，以象月之有大小。尽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佩文韵府》正集一 六卷、拾遗一 六卷，以韵分卷，一韵一卷。

古书的文体

概括说来，古书的文体可分为两大类，即韵文与散文。前者泛指用韵的文体，与散文相对而言，如歌谣、辞赋、诗、词、曲以及有韵的颂、赞、箴、铭、哀、诔等。骈文也多属于韵文。凡属韵文之外，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为散文。先秦是古书文体开始萌芽、产生的时期。刘勰和颜之推均主张各种文体原于《易》、《书》、《诗》、《礼》、

《春秋》五经。秦汉以下，文愈盛、类愈增、体愈众。除经、史、子书外，尚有单篇作品如赋、碑文、诏奏、书牋等。东汉时期始有收入各体文章，而各具章法的“别集”。此后，文体与日俱增，而各具特色。晋初陆机在《文赋》中论述极详：“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南北朝以后，古书文体已经齐备。梁萧统编《文选》，文体分为三十二类。伍昉编《文章缘起》，文体种类已达八十四类。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古代文体论亦在魏晋六朝正式诞生。唐代形成了近体律诗，词自中晚唐、五代而鼎盛于宋。元朝以后，戏剧和小说两种文体兴起，诗歌和散文不再独霸文坛。分述之，则古书文体大致包括：1. 文学散体，包括诗、词、歌、赋、曲、骈文、传奇、小说以及散文等。还有既可用散文写，又可用简练的韵文写成的箴、铭、颂、赞等。2. 诏浩官书。是封建统治者皇帝专用的文体，有诏、诰、敕、册、制、玺书、御札、批答、赦文、谥文等。3. 政论学说。包括奏疏、评议、疏证、学案等。4. 公牋文书。凡是诏诰、奏议、官书、文告、诉状、契约等均属于公牋文书，多以檄、誓、盟、令、教、露布等文体流行于世。5. 书牋序跋。6. 史志。7. 碑志行状。8. 其它杂著，包括符命、祭文、吊文、诔文、祝文、约戒以及杂著。历代文体专著则有晋代挚虞撰《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论》，南朝梁伍昉撰《文章缘起》，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明徐师曾撰《文体明辨》，清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清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等。

古书的用典

古书常常用典。所谓用典，指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譬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吹竽已滥，汲绠不修。”就用了两个典故。“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在古书里，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较少，偏于应酬的求藻丽的文体用典则多一些。譬如集部用典多于子史，骈文用典多于散文。古书之所以用典较多，有不少是出于炫学。譬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便是。持这种心理的文人很多，如黄山谷就颇为推崇“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种境界。有的人更爱用些罕为人知的僻典，让人感到不知所云。于是便惹来“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的咒骂。不过，倘若典故用得恰到好处、贴切自然，真能起到使文章更简练、更生动、更深刻、更委婉的作用，譬如前举“吹竽已滥，汲绠不修”之例，如用白话道来，必定是索然无味，罗里罗嗦的一大堆。典故还可以用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譬如陶渊明的诗《述酒》，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因当时正是刘裕天下，为避杀身之祸，不得不在诗里大量用典。所以诗读起来怪里怪气。典有明用暗用之分。明用的，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文心雕龙·情采》）等，一望即知用典；暗用的，如白居易《与元微之书》：“人生几何？离阔如此！”苏轼《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等类，则为暗用。前者“人生几何”见于曹操《短歌行》，后

者“逝者如斯”是引用《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典还有“古典”与“今典”之别。如辛弃疾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古典”是刘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北伐”事；“今典”明指韩侂胄的草草出兵。“古典”和“今典”常常结合使用。

古书的避讳

古代，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和写出，必须用其他方法避开，此之谓避讳。避讳起于东周之初，但在春秋以前，只是一种社会习俗，尚无固定的制度。

古书中常用的避讳方法，有改字、减笔、增笔、拆字、合字、空字，或以“某”、“讳”等字替代。

避讳还有公讳与私讳之分。公讳亦称国讳，指全国臣民都要敬避的尊长之名；私讳，亦称家讳，指家族内避宗亲长者之名。公讳主要包括避在位君主名和避庙讳。如秦始皇嬴政，又名正，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汉石经于《论语》、《尚书》中“邦”字多改为“国”字。它如盈改为满、恒改为常、启改为开、彻改为通、弗改为不、询改为谋、爽改为盛、鷺改为俊、欣改为喜，则为避汉朝皇帝刘盈、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询、刘爽、刘鷺、刘欣等人讳也。东晋避后妃讳很多。如郑太妃名阿春，故以“阳”代“春”，廷臣议事引《春秋》必改称《阳秋》，孙盛著书名《晋阳秋》，檀道鸾著书也题名《续晋阳秋》。唐代避讳法令本宽，避讳风气却很盛。唐人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四民月令》为《四人月令》。《管子·霸言》有“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之句，唐人为避李世民讳，改“世”为“代”，后人传写又误“代”为“伐”，故“而世不谓贪者”成了“而伐不谓贪者”，颇令人费解。甚至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虎，而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宋、金避讳极严。譬如避高宗“构”的嫌名竟达五十五字之多。宋代雕版刻印的古书，凡属皇帝名胤、灵、恒、祯、曙、頊、煦、佶、桓、构、慎、惇、扩、昀、祺、等字，都缺笔避讳。金诸帝也广避嫌名，如金世宗初名褭，规定避同音字二十八个。元代帝王之名是汉字译音，无所谓讳。明初也不避帝王名讳，明末才有规定。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今上御名”亦须回避。如明光宗名朱常洛，则明季刻书，太常寺作太尝，常熟作尝熟。熹宗名朱由校，则汲古阁刻《十三经》，于“由”字皆作“击”。清自东北入关以后，帝王之名始用汉字，第一个以汉字为名的顺治帝名“福临”二字不讳。避讳自康熙以后开始。如清代刻印的书，玄字作“”，胤字作允，弘以宏代，盖避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讳也。此外，公讳还包括避太子名，避后妃名，避皇后祖、父名，避权贵名，避权臣祖、父名，避孔子名等。如吕太后名雉，雉便改称野鸡，如《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雉。”私讳多是子女避祖、父名。如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为避家讳，就把赵谈改为赵同，亦名同子，所以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就出现了“同子参乘”的字样。苏轼祖父名序，他代人作序时便改为“叙”，其父苏洵则改序为“引”。

避讳的种类则有：改姓名。如孔子名丘，姓“丘”的就改姓“邱”；汉文帝名“恒”，“田恒”就成了“田常”。改地名。如金世宗之父名宗尧，

改“宗州”为“瑞州”；北周文帝宇文泰，小字黑，改“黑水”为“乌水”；清康熙帝名玄烨，“玄武门”改称“神武门”。改官名。如唐高宗李治即位，避太宗庙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避高宗名，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各州“治中”改为“司马”。改书名。如唐代改《神渊》为《神泉》，改《世本》为《系本》，避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名也。改物名。如十国吴王杨行密据扬州，州人皆把“蜜”叫“蜂糖”；唐避代宗李豫嫌名，改“薯蕷”为“薯药”；至宋避英宗名曙嫌名，再改叫“山药”。改干支名。如唐高祖之父名昉，兼避“丙”字，故唐修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八史，所用干支记年、日，皆把天干的“丙”写作“景”。改经史文字。如《梁书》撰者姚思廉避其父讳察，在《刘孝绰传》中将《论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之句改作“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改通常用语。如唐高祖祖父讳虎，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狗”便改作“画龙不成反类狗”。此外还有因避讳而改前朝年号、改前人封号、改谥号、改数字等类。甚至出现了明武宗时，为避己姓而禁民畜猪的事件，真是贻笑千古。

历代为避讳而擅改前朝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谥号等，甚至追改古书，造成了古籍内容的混乱。但是，如果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疑滞，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尤于版本学上作用显著。譬如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载《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敬、竟、殷、匡、恒字皆缺笔，避宋代皇帝讳也。因宋版书避帝王讳，而元刻仿宋不避宋讳，由此可以判定此本乃宋槧，又因宋仁宗名祯字不缺，故又可进一步断定刊刻于宋仁宗之前。

古书的标点符号

古代使用表示句读的符号，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出土的盟书已有了表示句读的符号。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表示句读的符号明显增多。汉代表示句读的符号趋于定型，被许慎作为文字收入《说文》之中。宋代刻书大盛，刻书始有断句之圈点。宋、元、明、清之刊本书有各种形式之标点符号，大概可分为三种性质：一、官定之章句重要符号，如《四书》中“子曰”、“孟子曰”等字上冠“圆圈”，注解亦加圆圈，表彰大儒言语重要。始于宋官刊本《四书》、《五经》。二、圈点符号，于文章精采处、字句重要处旁加各种形式之色彩圈点，如归有光、方苞五色圈点《史记》等。三、各种书名、人名、地名符号及问号、惊叹号等，以便阅读、解释及表达文章读法、声调。刊本古书以明代标点符号最繁，各书不同。如嘉靖刊本金履祥《尚书表注》，有地名、人名等符号，又有抽象之地名符号，如蓬莱、溺水等，与实际地名符号不同。

古书的抬头字样

古书凡涉及天、地之辞义，如圜丘、方泽等字样，与宗庙、皇帝著作如御纂、御批等都要抬头。有单抬（高一字）、双抬（高二字）、三抬（高三字）三级。如宣统时所刊之书，涉及光绪朝，要用双抬，同治朝用三抬，所应抬头之字样，系照《科场条例》等书规定。殿版书以三抬头止，科场闱墨更严，均系按照“贴例”。元代刊本书，凡遇蒙古之国名、地名、部族名都要抬头。

古书的牌记

古代刻书者为了说明自己所刻书籍和别人所刻书在质量上有所区别；或表示刻书时间、地点、刊刻者，以资识别；或表示版权，于是就有牌记产生。古书的牌记，相当于后世的商标和现代书籍的版权页，但所记载的内容，不如版权页那么完整而系统。版记的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是碑形和方形，也有钟形、鼎形、亚字形、香炉形等。牌记的位置，有的在卷首，有的在卷末，有的在序言后面，有的在目录后面，这些部位一般都还是好找的，有的牌记刻在书中某一卷的后面，就不容易找。

牌记的类型有：

一、只有刻书时间的牌记，如明重刻宋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在卷末有“弘治甲子年重新刊行”牌记一行。

二、有刻书地点及刊刻者的牌记，如宋刻本《王建诗集》在目录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港口陈解元宅刊印”牌记一行。

三、有刻书时间和刻书斋室名的牌记，如明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书中有“正统戊辰善敬堂刊”牌记一行。

四、有刻书时间、斋室名、刻者姓名及字体的牌记，如明活字本《春秋繁露》在卷末有“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校正刊行”三行。

五、有刊刻者籍贯、刊刻者及斋室名的牌记，如宋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在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二行；明刻《史记》，在《集解序》后有“震泽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牌记二行。

六、有说明刊刻质量及斋室名的牌记，如宋刻《挥尘录》，在目录后有“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谨咨”牌记五行。

七、广告性质的牌记，如元刻《新刊王氏脉经》，序后有“天地以生物为心，故古之圣贤，著书立论，教人以智而济人之生也，得其书而自秘者，岂天地圣贤之心乎？夫治病莫重于明脉，脉法无出于王氏脉经之为精密。本堂所藏不欲自秘，先以针灸资生经梓行矣，今复刻脉经与众共之，庶以传当世济人之道，且无负古人著书之意云。时天历庚午仲夏建安叶日增志于广勤书堂”牌记七行。

古书的价格

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书籍交易活动。古书的价格，见于记载的，则始于唐代。如唐开成三年（838年），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在扬州书市买了一部刻本《关中疏》，凡四卷，价450文。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书籍仍以手抄为主，因手抄本费工费时，故其价格比较昂贵。如一部小楷抄写的《唐韵》五卷，当时要卖5000文钱，约为《关中疏》价格的十倍。

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刻印书开始占据主要角色，书籍也多明码标价，渐趋正规。如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印的《小畜集》一部八册，书前刻印着“每部价钱伍贯文省”；宋淳熙三年（1176年）刻印的《大易粹言》一部二十册，书前刻印着“每部价钱捌贯文足”；宋淳熙十年（1183年）刻印的《汉集》，书前刻印着“每部二册，现卖钱六百文足”。从现有资料看，北宋时期书价便宜些，约每册书100文钱，如嘉佑四年（1059年）刻印的《杜工部集》一部十册，售价1000文钱。南宋时期由于物价飞涨，

书价也随之提高，平均每册书要价在 300 文以上。当时大米每斤约 10 文钱，一册书值 30 多斤大米。

元代书价约每册 1 两钞，折合大米 5 斤。如天历元年（1328 年）政府出售的日历，每本售价一两钞，表面上看比宋代便宜了许多，实则不然，系元代特别是元末米价腾贵、货币贬值造成的结果。

明万历年间书价约与南宋时期相近，平均每册 0.28 两银左右（约合大米 36 斤）。如《封神演义》一部 2 两银，《月露音》一部 0.8 两银，《精骑集》一部 1 两银，等等。当时北京的猪肉和鲜鱼价格均为每 0.02 两银，相比之下，书价是极贵的，一部《封神演义》的书价可买 220 斤大米或 100 斤鱼肉。而当时一个刻书工人的月工资仅 1.5 两银（约可买 165 斤大米），养家糊口尚觉艰难，根本无法奢望买书读书。明代一个七品知县的月俸是 1125 斤米，一个中央政府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的月俸是 750 斤米，买书只能是这一阶层的人。

清代的书价也大致与明代持平，平均每册均在 0.3 两银左右。如嘉庆十年刻印的《唐才子传》一部二册，“每部计银六两”，嘉庆十八年（1813 年）刻印的《三经音义论孟孝经》一部十册，售价“叁钱贰分”。当时米价约每两银 80 斤米，每册书的价值约在 24 斤米价左右。而清代一个七品知县的薪俸是每月 8 两银，约可购书 27 册。若要购买当时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每部 12.46 两银），则需支付一个半月的工资。当时一个普通的政府文书人员月薪 1.8 两银，除了应付日常的吃穿用外，买书是十分困难的。

古书续谈古书的注释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变迁，许多古书后人已难以理解。这就需要注释。所谓注释，就是对文章中语汇、内容及引文出处所作之说明。我国的古书注释远在战国时代就已开始，历代注释家创造了多种类型的注释。如故、训、传、说、记、注、解、笺、章句、集解、义疏、正文等，各具特点。故，通诂，晋郭璞释为“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即用当代语言解释古代之语言，或用共同语言解释方言。汉人注书，多名为“故”，也称“故训”、“训诂”。《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家诗，其中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皆为三家诗之本注。训，即用通俗之词语解释难懂之词语。汉人注书称训。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每篇目皆加“训”字，如《繆称训》、《齐俗训》、《道应训》等。传，即解经之文。《释文》谓“传述”，引申为解释古今之言语者。《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诗》有《毛诗故训传》、《韩诗内外传》，皆为解释经或以注释方式阐明经之微言大义者。说，即解释之文。为与经相辅而行之文。《汉书·艺文志》著录以“说”注释者有：《诗·韩说》、《鲁说》、《礼·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齐说》、《鲁夏侯说》等。记，疏记的意思。《礼记正义》说：“记者，共撰所闻，编而录之。”《礼记》就是儒家解说《礼》经的文字，它记经义之不备，兼录经外的话以说明经义，其功用于传、说很相近。注，注的本义是灌注。古书之义难懂，需要解释，好像水道阻塞，必须灌注才能够流通。“注”也写作“註”，晋已用之。注释称注，由来已古，《史记·衡山王传》索隐引刘向《别录》：“《易》家有求文氏之注。”以“注”为注释名称者最为普遍，如高诱之《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郑玄《礼记注》、《周礼注》，韦昭《国语注》等。解，解是分析的意思。管子书有解，如《形势解》、《立政解》、《版法解》、《明法解》。它与《形势》、《立政》、《版法》等相为表里。韩非也有《解老》，是解释《老子》的。汉人沿用这一名称。或称“解谊”，如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或称“解诂”，如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笺，笺本为小竹片，读书时随记心得，系在竹筒上以备参考。后为注释之一种。注书称“笺”，始于汉之郑玄。古人治学，讲究师承，凡引申前人之说，则称为“笺”。郑玄解释《诗经》以毛公《诗传》为据，或是补充，或是发挥，不与《毛传》相杂，故其注称为《诗笺》。章句，古人解经，于训释词义外，再串讲经文大意，汉人称之“章句”。《汉书·艺文志·尚书类》有《大小夏侯章句》、《欧阳章句》、《公羊章句》、《谷梁章句》，东汉王逸有《楚辞章句》，宋朱熹有《大学章句》等。集解，也称集注、集说、集释等。采集各家解说为一书，或兼解经与注。前者如何晏之《论语集解》、后者如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义疏，这是盛行于南北朝的一种注释体裁，和集解相近。义疏是从讲论来的，所以又叫讲疏。它的特点是逐字逐句讲解古书，根据一家之注，从不违反，所谓“疏不破注”。皇侃《论语义疏》便是这一注释体裁的代表。正文，为正前人之义疏。始于唐。唐太宗诏孔颖达等整理前代经说，编定统一之经书注释。因其整理、编定之书出于官修，故名“正义”。孔颖达等所撰五经疏义，称为《五经正文》。古书的注释和正文往往分别单行，所以正文篇卷与注并不一致。如春秋古经十二卷，而《左传》却为三十卷。后来为了方便阅读，才把正文和注合在一起。最早这样做的是后汉马融。对古书的注释，有偏于解释词句的，有只在

阐明作品内容的，有的不仅阐释原著的哲理，还加上了自己的观点。另有一类是以考核史实为主，还有的则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出典的证明上。使用古书注释，愈近愈好，古注质朴，去作者不远，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后人读古注，有时感到难懂，于是有人另作新注。古书新注的类型有集注、补注、新注、选注、综合普及等。

古书的辑佚

书籍一天天增加，也一天天在散亡，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于是就有些好学博览之士，想尽方法，希望通过其他书籍中引用的材料，把这些散佚的文献重新搜辑、整理出来，力图恢复作者原书的面貌，使之成为足本。这便是辑佚。中国古籍散失惊人，今存五代以前的集部书籍大多是辑佚本子。辑佚工作始于宋。现传的最早辑本当为王应麟之《三家诗考》、《周易郑康成注》。明代孙瑒辑了一部《古微书》，是专辑“纬书”的。张溥的《汉魏百三家名家集》则开始辑录诗文。到清代，随着朴学家们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的展开，辑佚方法的精密和修《四库全书》的推动，使辑佚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中心工作之一，成绩高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专门的辑佚之学。清代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录入《四库全书》和登记在《四库全书》存目中的，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辑佚的资料来源甚广，举其大者言之：（1）类书；（2）史书；（3）总集；（4）地志；（5）古书注解；（6）杂纂，杂抄；（7）金石；（8）报刊。比较大型的辑佚书有：《武英聚珍版书》，洪颐煊辑《经典集林》，王谟辑《汉魏遗书抄》，张澍辑《二西堂丛书》，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逸书》，黄奭辑《黄氏逸书考》，叶昌炽辑《淡庐丛稿》，陶栋辑《辑佚丛刊》。古代辑书存在着漏、滥、误、陋四大弊病，一些人也专以辑佚相矜尚，以致不辨真伪、漠视现存书籍。

古书的辨伪

古书辨伪的历史，随伪书的产生而产生。远在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已经察觉出周王朝对商王朝的历史作了歪曲的宣传。过了百余年，孟子也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的叹息。此可谓辨伪学之初创。秦焚书后，古书散佚，伪书纷出，辨伪学亦随之而发展。司马迁是汉代第一个辨伪学家，刘向、马融、郑玄、王充等人的辨伪工作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魏晋南北朝至隋，作伪甚于辨伪，只是佛经辨伪在此时发展到高峰。唐初辨伪之学很少建树，至中唐始别开生面。可彰者一为重开辨伪之风的刘知几，二是写有很多辨伪专篇论著的柳宗元。至宋则辨伪之学继往开来，颇多发展。功绩显著者有欧阳修、王安石、郑樵、江应辰、司马光、洪迈、叶适、黄震、王应麟诸家。成就最为卓著者当推朱熹，所辨书涉经史子集达五十余种，并提出诸多辨伪方法，对后学颇有启迪。明初有宋濂《诸子辨》，是为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著。明末则有胡应麟《四部正伪》，内容从诸子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对伪书种类、来历及辨伪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从兹使辨伪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清代乃辨伪学之鼎盛时期，著名的辨伪学者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胡渭著《易图明辨》、万斯同著《群经疑辨》、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崔述著《考信录》、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魏源著《书古微》、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

著《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章炳麟、王国维著述尤多，他们在辨伪书与辨伪说、群书辨伪与单书辨伪诸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有的还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关于辨伪的方法，明人胡应麟曾有系统总结，他在《四部正讹》里提出辨伪之法有八：“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撰者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贗籍无隐情矣。”近人谈辨伪方法者，如胡适、梁启超等，虽各有补充和发展，但其说莫不脱胎于此。

古书的校勘

古书流传至今，少则百年，多则两千多年，几经传抄转刻，难免出现文字、记事的错讹。校勘，正是用来考订古书谬误的一种古籍整理方法。它可以正事实、通文字、惠后学。其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勘同异，定是非。具体工作程序包括：1. 搜集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以备比勘。2. 比较各本及有关资料，选出底本，找出异同。3. 审校舛讹，定其是非。4. 撰写校记，以备读者查阅。校勘古书不仅要求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还要有相当水平的古籍知识，能够识文字、明版本、通目录、晓体例。校勘方法则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工作相传始于春秋时代孔子删诗书，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具规模，但其校勘成果多已亡佚，汉代校勘成果最大者是东汉郑玄的群经笺注。南北朝至隋为校勘史上的衰落时期，值得称道的唯有西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和北齐人颜之推的《书证》。唐代则有颜师古《匡谬正俗》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宋代始有纯粹的校勘成果著述，不复与注文、释文、训诂等结合在一起。其中以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和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佳。元明校勘因删改之风流行，故后人讥为“谬种流传”，例外者则有胡应麟《经籍会通》。清代是校勘史上的鼎盛时期，校勘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地位在此时得到底定。同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校勘家。如慧栋、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卢文弨、毕沅、汪中、孙星衍、阮元、王引之、俞樾、孙诒让、鲍廷博、黄丕烈、顾广圻、赵一清、纪昀等，校勘成果累累，但成书的却不多。主要的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群书拾补》。民国以来校勘总体成绩不甚显著，较有成绩的著作是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和陈垣的《校勘释例》。

书名面面观

原始书籍没有书名

最原始的书籍指刻在甲骨上的书和铸在青铜器上的书。甲骨的书还不是正式书籍，它虽具有书的作用，但还只是一些记事材料，当然也就没有书名。直到1903年甲骨文学者刘鹗才编印出我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青铜器的书最初也没有书名，它也不是正式书籍，只是在青铜器上记述的“铭文”。

古书多不题书名

远古之书，其书名不皆出于作者之手，多为后人所追题。例如《诗》、《书》、《易》、《礼》、《春秋》等名称都是后人收集整理时加上去的。韩非子的著作，当时并无总名，《汉书·艺文志》中称《韩子》，宋人的著作才称《韩非子》。司马迁的《史记》，著成以后，亦无书名。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里只是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道，成一家之言。”后来东方朔看到此书，称为《太史公》，《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此外，《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等，也都是指这部著作。直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

先写作后命题

远古典籍，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往往先写作而后命题。据《史记·郿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故为之起名为《新语》。可见，此书在著述之前并无书名。

书名始于简策

简牍按顺序编连成策，前面有两根空白的简。第一简叫作“赘简”，写篇名。如果简策是部巨著，篇名的后面空几个字，再写上全书的总名。篇名称“小题”，书名称“大题”。还可以在篇名下加上这篇书在整个书中的次第，如《劝学第一·荀子》。春秋以前的简策书，主要是篇名，还没有书名。自孔子编辑整理我国最早的简策书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开始，最早的书名也就产生了。

刘向命定书名颇多

有人说书名始于西汉刘向。称汉武帝时，刘向受命校书，广罗异本，分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自此书才有正式名称。此说虽有争议，但是刘向命定书名颇多，却是事实。如中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原为屈原、宋玉、景差等人分散的一篇篇作品，后经刘向校订、编辑成书，以《楚辞》作总书名。《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史事和策士议论、权谋的汇集，原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经刘向整理编次、删去繁复以后，才定名为《战国策》。

官书命名

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书，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尔雅》书名的由来类此。所谓“尔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异同，多识写兽草木之名，博贤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诗》、《书》、《礼》、《周官》等书的命名方式，更为显而易见。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名

古人著书作文，多因事物之需要，而发乎不得不然，很少有先命题，而强其情与意造作成文的。所以《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摘首句二字名篇。如汉代史游著的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有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桃夭》等都是以前一句中选二字作为篇名。例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均属此例。

同书异名

一书别名，古已有之。但自宋明以后，坊估射利，文士矜奇，往往将古书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明冯梦楨刊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宋叶梦得《岩下放言》，会稽书商刊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说。此外，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李焘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刘珂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宋代张孝祥的《于湖词》，也称《张孝祥词》、《于湖居士乐府》、《于湖先生长短句》、《于湖先生雅词》等。明唐文献撰《唐宋伯文集》，又名《占星堂集》、《唐文恪公文集》。明张楠撰《命理正宗》，又名《神峰通考》、《神峰辟谬》，等等，不胜枚举。《红楼梦》的别名更多，如《金玉缘》、《风月宝鉴》、《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

古籍书名的种类

一、直接用著者姓名作书名的。如《孟浩然集》、《王昌龄集》、《诸葛亮集》。

二、以著者的字作书名。如《李太白文集》，太白是李白的字。《左太冲集》，太冲是左思的字。《王子安集》，子安是王勃的字。

三、以著者的号作书名。如《李卓吾评水浒传》，卓吾是明代李贽的号。《射阳先生存稿》，射阳是吴承恩的号。《玉川子集》，王川子是著名诗人卢仝的号。

四、以著者的斋室名作书名。如《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是清代袁枚的斋名。明代汤显祖家有玉茗堂，他的作品名《玉茗堂全集》。梁启超的书室名“饮冰室”，他的作品名《饮冰室合集》。

五、以著者官职作书名。如唐代诗人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他的书取名《杜工部集》。晋代文学家阮籍曾作过步兵校尉，他的文集就叫《阮步

兵集》。唐代韦应物曾作江州及苏州刺史，他的作品就名《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

六、以著者籍贯作书名。如宋代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他的文集就叫《临川集》。唐代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他的作品名《柳河东集》。

七、以著者的谥号作书名。如《欧阳文忠集》，文忠是宋代欧阳修的谥号。

八、以帝王年号作书名。如苏洵的书叫《嘉祐集》，嘉祐是宋仁宗赵祯的年号。白居易的诗文集叫《白氏长庆集》，长庆是穆宗的年号。

九、以朝代作书名。如《唐史》、《宋史》。

十、以书的体裁作书名。如《徐霞客游记》。

十一、以涉及的地区作书名。如《苏州府志》。

十二、以反映的学科内容作书名。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十三、以藏版、刻印情况来取书名的。如《山带阁注楚辞》、《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即属此类。

叠床架屋的长书名

明代邓仕明编了一本书，四卷一册，为万历年间闽建书林陈德宗刻印。书名是《新锲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长达 22 字之多。实际上只要“便览”二字即足，可是加上什么“新锲”，又经权威板本“校正”，权威人士“查对”等等，成了一个叠床架屋的长书名。此书曾为郑振铎以五十金购得。

晦涩的书名

古代不少书名，需经解释才能弄清其含义，这种情况以集部书居多。如王禹偁的《小畜集》，是用《周易》小畜卦作为集名，不加说明，便无法理解。也有些书名用词过简，令人费解。如清代大兴王源撰雍正刊本《六宗》，讲的其实是文章练要。宋代王贵学撰百川学海本《兰说》，不如用另名《王氏兰谱》简单明了。清代无为汪有典撰光绪刊本《史外》，亦颇晦涩，不如另名《前明忠义别传》易懂。

类书的书名

《皇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是刘劭、王象等人奉魏文帝曹丕命编纂的。这部书是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所谓“宜皇王之省览”，故名《皇览》。从《皇览》至清末，中国出现了几百种类书，有趣的是都不以“类书”作为书名，有的称《御览》，有的称《大典》，有的称《类鉴》，还有一些书名颇奇特，如梁朝的《鸿宝》、隋朝的《编珠》、唐朝的《兔园策》、《锦带书》、《金钥》、宋朝的《锦绣万花谷》、元朝的《集翠裘》、明朝的《金海》、《玉麒麟》、《万物绀珠》、清朝的《三才汇编》等。古代外国的百科全书与我国类书相似，其书名也各式各样，如《乐园》、《锦簇书》、《宝籍》、《万花集》、《哲学珠玑》等，最奇怪的一个书名叫《语言学与商神的婚礼》，是一部用神话和寓言写成的百科全书。

书名用典

古书的书名常常用典，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

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宋代左圭编的收有宋人笔记一百种的书，名《百川学海》，用汉代扬子云“百川学海而至于海”；晚近书名亦有用典的，如《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

伪书纵横

伪书

伪书，伪造之书也。书籍有假，各国所同，然而中国的伪书之多，出现之早，恐怕远非他国所能比拟。中国正式的书籍，大约成于先秦。几乎与此同时，伪书也便出现了。如龚自珍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到秦汉时候，伪书大量产生。如明代胡应麟说：“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历代造作伪书的数量之多，曾令清末张之洞发出“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的感叹。

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产生的原因可大别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二类。有意作伪大致可分八种：托古自重、邀赏、政治斗争需要、求同伐异、炫名、挟嫌谤人、掠人之美、嫁名于人。非有意作伪则主要缘于后人的失考误断。

托古自重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就连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亦未能免俗。古代道术之士，为使自己的作品取信于世，就利用这种心理，或托古人之名，或掇古人之事，或挟古人之文，或蹈古书之名，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托古之风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如《易卦》必托名伏羲、《本草》必托名神农、医经必托名黄帝、《周礼》必托名于周公。一时间，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此种风气至晋代尚历久不衰，甚至到唐宋以下，犹有余波微澜，如《杜解》之借名于苏轼，《龙城录》之嫁名于柳宗元，便是其例。

邀赏

古代书籍屡遭厄运，散佚严重。每经战乱之后，或遇朝代更迭，统治者都要下诏，不惜重价求书。于是就给求名牟利之徒以可乘之机，纷纷造假以邀赏。譬如汉成帝酷爱《尚书》，可是《尚书》百篇，自经秦始皇焚书以后，十丧其七，只余二十八篇。成帝便悬赏购求足本。东莱张霸便割裂《尚书》篇目，并加《左传》、《书叙》以作首尾，造出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尚书》，称为春秋以前旧物。书上，成帝大喜，立刻赐以博士官职。后经研究发现系伪作，险些将张霸杀掉。隋文帝亦酷嗜古书，尤爱《易经》。当时的大学者刘炫为了邀功请赏，编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献给文帝。并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及至发现作假，盛怒之下，就把刘炫杀了。

政治斗争需要

战国秦汉时代，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创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杜撰了许多史实。如《荀子·宥坐篇》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便系后人杜撰伪造。有时党派之争，各不相下，也采伪造书籍之法，彼此诬蔑诽谤。如唐代牛李之争中，李德裕的门人韦瓘曾用牛僧儒之名伪造了一部《周秦行纪》，以此诬陷牛氏。北宋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炮制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还有人假托司马光之名作《涑水纪闻》，以攻击王安石，亦属此类。

求同伐异

古人于学术之争中徒恃口舌不能胜人时，便造作伪书，或改窜古书，以为武器。为争胜而造假，起于西汉刘歆。在当时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中，他专门与今文家作对，因恐徒恃口舌不足以取胜，就假造《周礼》，并对其余各经，多所改窜。东汉变乱之际郑玄、王肃两人学术主张不同。当时被称为大经师的郑氏经学支配天下，其群经注说盛行于世。王肃为打倒郑玄，便伪造了《孔子家语》一书，并且在《自序》中郑重声明此书出于孔子后人，恰与己说暗合，来证明己说之不谬。

炫名

为炫名而造伪书的亦不罕见。譬如假造《列子》的张湛，因见《庄子》中说及列御寇这个人，《汉书·艺文志》又有《列子》八篇之目，乃搜集前说，附以己见，伪造《列子》一书，为此大出风头。明代藏书家丰坊，世代藏书，购置极富，家有万卷楼，蓄书数万卷。此人嗜古成性，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因所藏秘本不足以填塞其欲望，便仗恃家有储书，谬作《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和朝鲜《尚书》、日本《尚书》，自称乃其祖上丰清敏、丰庆分别得之秘府和译馆。贻笑儒林，欺罔后学。

挟嫌谤人

由于私人怨仇造伪书以诬陷他人，自古便有。譬如唐初欧阳洵，不独书法有盛名于当时，学问文章也为时人所推许。由于他长得很瘦削，类猿猱，所以就有和他怀私怨的人，写了一部《白猿传》，对他大肆污辱。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江总之名，不只诬陷欧阳洵，还兼以诬陷江总。宋代魏泰，是造伪书最有名的人，曾假托梅圣俞的名字，伪造《碧云騞》一书，尽情指骂当时朝廷官吏，想以此引起公愤。被人发觉后，又陆续写成多种伪书行世。

掠人之美

晋人郭象曾把向秀的《庄子释义》稍加改窜，列为己注。东晋人何德盛，剽窃郗绍《晋中兴书》，以为己作。王鸿绪《明史稿》系盗窃万斯同稿，大加改窜后，题曰“横云山人”所著。

嫁名于人

与掠人之美相反，有人费尽心血写成一部书，署己名觉得不便，想抛弃又感可惜，乃造一假名付梓。如《香奁集》本为和凝少作，因书中谈情说爱之处颇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分不符，乃嫁名韩偓所作。

非有意作伪

此类伪书一般由于后人张冠李戴、失考误断所致。一是因书中有某人名而误题。如《素问》一书，又称《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书，原书作者姓名不传。作书的人，本来不想作伪，然因为《素问》起首，有“黄帝问于歧伯曰”的话，乃属作者假设黄帝歧伯问答之题，以发抒其医学见解，后人不察，即以此误会为黄帝所作。又如《周髀算经》，汉代人著，是我国最

早的一部数学书，因无作者姓名，后人则根据书中起首的“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认为周公是该书的作者。殊不知“周”是讲圆，“髀”是讲股，与书的作者风马牛不相及。二是因书中多述某人行事和言论而得名。如《孝经》本是汉代儒家抄写《左传》并加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书中讲曾子的话和事很多，遂派定作者是曾参。三是查不出作者而臆断。如《山海经》是一部古代神话集成，最古的部分，也许是春秋战国时人所作，最晚的部分，当出于两汉之间，绝非一人手笔。只因太史公引过其名，列子曾说过“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便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还有的本可考出作者名，因不察而妄题。如《越绝书》记江浙间事甚详，为汉魏时人所作。作者不愿标出自己的大名，故意在书后作了四句隐语：“以去为姓，得衣而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盖言作者姓袁名康。后人不察，则指为子贡所作。此外，有类书误作专书的，如《管子》。有注解与正文同列而混入正文的，如《庄子》。有后人续作与原作相混的，如《史记》。有编辑者一味贪多，误将他人作品编入的，如《李太白集》。都属后人妄加臆断，虽非有意作伪，却导致了名称与内容的混乱。

伪书的种类

全部伪。如《孔子家语》即是。全部伪以子部为最多，如《鬼谷子》，《关尹子》等。其次是经部、史部。追根溯源，是因为自汉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学术界，经部之书被视为经典，因而经书不致轻易作伪。而不受重视的子书则不然，人们随意编集，所以致伪很多。伪中有伪。本来是伪书，因亡佚，后人又胡编乱造，遂成伪书之伪书。如《乾凿度》，本是战国期间阴阳家及西汉方士所作，却假托孔子所作。而今本《乾凿度》又经后人增添而成。真中有伪。《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司马迁所作，亦有小部分记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至一百年的事，系后人的续记。伪中有真。如《鹖冠子》是一部伪书，但其中的《鹏赋》却是真的。又如东晋梅赜所上的孔安国注58篇《古文尚书》，也是伪中杂真。真伪相杂。如《管子》一书，内篇是管子本人所著，外篇则杂入后人著作，汇集而成。

版本作伪

自宋本日稀，收藏家争相宝贵，于是坊估射利，往往作伪欺人，变幻莫测，总之不出以明清翻宋板剝补改换之一途。明代高濂在《燕闲清赏笺·论读书》中对版本作伪的方法描绘甚详：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秘莫测，将新刻摹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侵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和填。两头角处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鎚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夥围，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替人，莫可窥测。

伪书不可尽弃

近人张舜徽曾说：“伪书不可尽弃。”因为书的真伪和书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伪书里面，很可能保存着有用的资料。譬如《本草》托名神农，《素问》托名黄帝，均属伪书，但是这两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古代医学知识，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再如《周礼》，作为“周公致太平之书”，是伪书，如看作春秋战国学者理想及一些古代传闻的记录，还是有史料价值的。有些伪书，成书于魏晋或唐宋，乃掇拾他书拼凑而成，如果原书已佚，则可看作佚书的部分材料。

说错道讹

篡改

古籍多是个体手工劳动产品，加之传世既久，错误自然难免。如果说在传抄、传刻过程中，出现脱文、讹字、倒字、重文、叠字等都还算“无意插柳”，那么整理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肆意篡改、妄删，则纯属“有心栽花”了。此类例子颇多。譬如明朝张居正七律《闻警》里有“初闻胡骑近神州”句，其中的“胡骑”到清朝刻本《张文忠公全集》里就被改成了“铁骑”。如是作，当然是怕触犯清朝的忌讳。顾亭林的《日知录》删改之处更多。拿现在流行的刻本与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旧抄本进行比较，会发现，“国初”改为“明初”，“夷夏”改作“华夷”，“北虏”改作“北敌”，“夷狄”改作“外寇”……卷六的“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的“胡服”，则整条都被删去。

衍脱讹倒

除了有意的删改之外，古籍错落大致有衍、脱、讹、倒四类情况。衍，指古籍传抄的时候多写了字。脱则指少写了字。讹，则指传写刊刻过程中文字的错讹。倒指的是文字前后顺序颠倒。

衍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惠文王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又维护了赵国的尊严，拜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高兴地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上，吾羞，不忍为之下。”这里“攻城野战之功”和“徒以口舌为劳”相对成文，这个功自然不小，“大”字显得有些多余。唐宋人著作引用这段文字没有“大”字，这个“大”字应该是衍文。

脱

《文选》卷四十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有一段记载了“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的史实，其中有“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一句，颇让人困惑，因为孔安国远没有活到天汉之后，让他此时献书，实属不可能。经查荀悦《汉纪》，有“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的记载，方才释疑：原来献书的人是孔安国家里的人，并不是孔安国。《文选》于“安国”下面脱了一个“家”字，就让人费解了。

讹

有字形的错讹。如刘向校《战国策》写的《叙录》中说：“本书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者多。”有音同或音近造成的错讹。如刘向在《列子叙录》中说：“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有把二字合为一字的。如现在通行的《战国策》里有“左师触誓愿见太后”之句，颇让人费解，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恰好有这段文字，原文是“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原来古书因为直写，把“龙”、“言”二字合成了一个“誓”字。也有本来是一个字而错成了两个字的。如《国语·晋语》里有一句“一人必得晋国”，

其中的“一人”便是“夫”字之误。

倒

《文选》卷五十二载曹丕《典论·论文》：“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作“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从字义看，“以自”二字写颠倒了。

无错不成书

俗有无巧不成书之说，朱大可独否之曰：当作无书不成巧。王云五又有无错不成书之说，盖慨乎言之也。

校书如扫尘

朱弁《曲洧旧闻》称：“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兰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

形夭无千岁

洪迈曾见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乃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原为“刑天舞干戚”，曾纮所书五字皆讹。

严羽变严仪

《沧浪诗话》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可是它的明刻本，经过窜改，错误很多，甚至将作者严羽的名字都弄错了。连许多学者都认为严羽为严仪，以为仪字羽卿，而不是羽字仪卿。

晋师三豕涉河

子夏往晋国去，经过卫，有读史记的人对他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说：“非也，是己亥也！”因为己字古文作己，脱笔成三。亥字小篆似豕，所以误写。等子夏到晋一问，则说：确是“晋师己亥涉河”。

羊肉变芋头

《颜氏家训》记载，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蜀都赋》，而根据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鴟所伏”一句，注文：“蹲鴟，芋也。”“芋”字误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时高兴，舞文弄墨起来，回信道：“损惠蹲鴟，……”收信人查得出处，不觉大吃一惊，奇怪为什么刚刚送去的羊肉竟变成了一个芋头。

金银车

韩愈的儿子韩昶曾为集贤校理，他不知道殷时有一种车子叫乘根，秦加金饰，改称金根，却硬派这个“根”字是错字，把史传里提到的金根车，统统改为金银车，这样，就和南京一位将“饬”误作“锡”的大夫配成一对，那个迷于银，这个迷于锡，一前一后，成为历史上难得的把兄把弟。

西台变西施

明代学者改书之风比之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如郎瑛《七修类稿》说：东坡《跋和靖诗集》：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骨。“西台”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为西施，谬解远矣。

万历刻书多牡丹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八月为壮月”，而改为“牡丹”。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古代藏书家

李泌

李泌，字长源，生于唐开元十年，卒于贞元五年，年 68。魏柱国弼六世孙。徙居京兆，封邺侯。家富藏书，积三万余卷，起书楼度之。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韩愈有诗道：“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后人因称其藏书之处为“邺架”，“邺侯插架”之典亦由此得来。

宋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生于宋天禧三年，卒于元丰二年，年 61。《宋史》记载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他曾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的租金常比他处高一倍。

李公铎

公铎本名常，字公铎，生于宋天圣五年，卒于元祐五年，年 64。建昌人。少读书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庵藏书几万卷。公铎离开此庵时，留下所抄书九百卷，以遗后之读者。其后山中之人思之，把他居住的地方叫作李氏山房。苏东坡曾为之作《李氏山房藏书记》，为藏书史上的重要文献。

叶梦得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因长期居住在吴兴弁山石林谷，故自号石林居士。宋吴县人。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真之霁川弁山，建书楼度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叶梦得平日书不离手，每年五月初天气渐暑，不能看更多的书，就每日专诵《六经》一卷，一直坚持到中秋。叶梦得称此为“夏课”。叶梦得不仅酷嗜收藏图书，而且能利用藏书对图书的内容和图书的生产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他在《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中所记载的藏书与出版的史料，至今仍引人注目。他还在南京建“细书阁”，用以藏公家之书，实为公共图书馆之先声。

尤袤

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宋江苏无锡人。尤袤“藏书至多，法书尤富”。其藏书室名遂初堂，同代另一大藏书家陈振孙有“遂初堂藏书为近世之冠”的评语。尤袤对于图书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他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他曾说：“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段表明嗜书心切的名言，几百年来一直被后世藏书家和学者奉为佳话。清末民初的著名藏书家章钰更以尤袤四当的格言名其书斋为“四当斋”。尤袤曾把自家藏书“汇而目之”，编成《遂初堂书目》一卷。

陈振孙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宋浙江安吉人。陈振孙为官三十多年，无论调往何处，随处搜书、购书、录书。藏书达51,180余卷。陈振孙对藏书事业的贡献，是他编撰《直斋书录解题》。此书写作历时20年。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把历代典籍分为53类。每类之下，著家书名、卷帙、撰人、版本，以及对著作得失的品评。并首创目录学中的解题体裁。《直斋书录解题》原书56卷，早已亡佚。现流传本是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22卷本。

周密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苹洲、泗水潜夫等。宋代人，原籍济南，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吴兴之弁山。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述藏书：“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度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籀金之富。”可惜的是由于“不善保藏”，有不少藏书在他生前即已散去，他曾“为之流涕”。

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太原定襄人。元氏祖上多为读书作官的人。成年之后，元好问自己开始收藏图书。他到处访购和抄录家中未藏之书，尤其注重收集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往来四方，采摭逸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

杨士奇

杨士奇，本名寓，以字行。明泰和人。杨士奇少孤贫，16岁出为村落童子师，欲买《史略》二册，百钱不能得，其母蓄一牝鸡数岁，命以易之。这就是著名的杨母卖鸡市书的故事。稍大以后，杨士奇无钱买书，便常常向人借读。直到作了朝官，才节缩百费，用为收书之资，历十余年，搜藏经史子集甚富。杨士奇曾参与整理政府藏书，主持编订了国家书目《文渊阁书目》。

叶盛

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蜕庵，谥文庄，明昆山人。文庄藏书之富，甲于海内。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钞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生平手自雠录至数万卷，尝欲作堂以藏之。取《卫风·淇澳》学问启修之意，名曰“菴竹”。直到他的玄孙叶恭焕时，菴竹堂才真正建成。叶盛曾根据自家藏书编成《菴竹堂书目》六卷。

丰坊

丰坊，字存礼，后更名道生，字人翁，别号南禺外史，明鄞县人。丰家祖上几代都致力于收藏图书。丰坊亦性喜藏书，曾将家中田产千余亩尽数出卖，以购图书碑帖。家藏书共达数万卷，家有藏书楼，名为“万卷楼”，收藏有宋元两代珍贵的刻本、抄本书和碑帖。据称，他晚年得心疾，整日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读书注目而视，瞳子尝堕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浑然不知。丰坊既耽于书，又有“心疾”，故不善治家，后来家财丧失几尽。其

万卷楼之藏书，凡宋柔与宋本，门生辈窃去者达十之六七。后又遭大火，所存无几。范钦原与丰坊交好，曾从丰坊万卷楼中抄书，丰坊遂将家藏余书尽售与范钦，成为范氏天一阁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

范钦

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明鄞县人。范钦性喜藏书，遇海内异本即购，尤喜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最后他的藏书达七万余卷之多，尤以善本冠两浙。范钦创建了被誉为“江南书城”的天一阁。其藏书主要来源有二：一得之于丰氏万卷楼；后又与著名学者王世贞相约互抄书籍。二是范钦自己搜求。他历官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等地，每到一地，就留意该处所见之书，尽力收购。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食州山人，明太仓人。王世贞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喜收书，曾失一花园而换得一部宋刻版《两汉书》。王世贞的庄园名为弇州园。园中有凉风堂一座，堂后就是他的藏书楼，名小西馆。小西馆藏书达三万多卷。他还另建一座“尔雅楼”，专门储存宋刻书。又有“九友斋”，专门用以收藏最为精善难得的善本书。

赵琦美

赵琦美（1563—1624），字玄度，又字如白，号清常道人，明常熟人。曾官至刑部郎中。赵琦美父赵用贤即喜藏书，赵琦美则“翩翩好古，倬有父风”，在藏书方面的成就和声誉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他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铨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刚食，假借缮与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刊编鬻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雠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赵琦美藏书室名脉望馆，收藏二酉五车，斯架塞屋。赵死后，脉望馆藏书大部归钱谦益，以至于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虽属无稽之谈，但窥其爱书之深。

胡应麟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明兰溪人。胡应麟性嗜古书，少从其父胡傅在京师，父官卑职小，俸禄不厚，胡应麟购书不已，月俸不足，则典卖家中妇人的手饰以购；再不足，解衣典当。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货以治屋而藏焉。书楼名“二酉山房”。胡应麟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性既畏客，客亦见畏，门屏之间，剥啄都尽。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雠之。倦则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胡应麟藏书42,384卷，除日积月累收藏的以外，另一部分是以低价收购了金华藏书家虞守愚的万卷藏书。

陈第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明连江人。古来嗜好藏书者多为文人或文官，而陈第则是部伍半生，曾作过游击将军。他曾说：“吾性无他嗜，唯书是癖。”他“遇书辄买，若惟恐失，故不择善本，亦不争价值。

积三四十余年，遂至万有余卷，纵未敢云汗牛充栋，然以资闻见，备采择，足矣足矣。”陈第藏书非为留传子孙，他说：“吾买书盖以自娱，子孙之读不读，听其自然。至于守与不能守，亦数有必至。吾虽不听之，其可得耶？”

祁承

祁承（1562—1628），字尔光，号夷度，自号旷翁。明绍兴山阴人。万历甲辰进士，历江西右参政，精干汲古，其所抄书，世人多未见，校勘精核，纸墨洁净。其藏书处曰澹生堂，名传遐迩。祁承青年时代即开始藏书，经常将妻子的首饰典卖用以购书。俸禄所得，除供应日常生活之需外，尽数用来购书。经他惨淡经营，加上先世所遗，藏书逾万卷。万历二十五年冬，家中不慎失火，藏书尽毁，不留片纸。但祁承并不因此而灰心，重新开始搜藏。经过多年努力，藏书又日渐丰富，竟至超过旧日，达10万卷之多。曾手撰《澹生堂藏书记》，就保存藏书事，为儿孙们立下了约规。但其藏书终遭散佚。祁承于藏书理论和图书编目颇有建树，后人称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谢肇淛

谢肇淛，字在杭，明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布政使。谢肇淛有耽书之癖，他曾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他一生多就官职，每到一地，都广为搜读当地古籍。叶向高家富藏书，他几乎每天去读，未满一年，便读尽叶氏藏书。谢肇淛喜抄书，“十指如椎冻不信，清霜初下写书频”。所抄之书，多为内府秘本，后世无刻印。不少珍贵图书靠谢氏抄才得以流传。他认为读书是为“明义理”、“资学问”，而不应“以取科第也”。他在《五杂俎·事部》中批评了三种藏书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者，谓之无书可也；二、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三、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寸觚莫展者。

李如一

李如一（1556—1630），本名鸚翀，字如一，后以字行，改字贯之。明江阴人。李如一家世力耕，给公上，其余悉以购书。见图书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老而食贫，指其藏书曰：“富猗郑矣”其读书，阙必补，讹必正，同异必雠勘，病不辍业，衰不息劳。他曾说：“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

徐

徐（1570—1645），字惟起，又字兴公，明闽县人。徐自幼喜读书，他说：“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余友陈履吉云：‘居常无事、饱暖、读古人书，即人间三岛。’皆旨哉言也。”徐终生不仕，虽为布衣，家境并不富裕，却不惜花钱购书。经数十年穷搜苦访，共收集图书53,000多卷，筑“红雨楼”藏度，“堆床充栋，颇有甲乙”。徐主张“传布为藏”，并总结出借书的三大好处。

毛晋

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别署隐湖书隐，晚更名晋，字子晋，常熟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年 62。毛晋性嗜卷轴，为购书不惜倾家荡产。曾在门口张榜，计叶酬钱，一时湖州书舶云集其门，并盛传“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民谚。毛晋极重抄书，甚至于“入门僮仆尽抄书”，并发明了“影抄”法，影抄了许多世所罕见的宋本，使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藏书前后积至 84,000 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度之。毛晋一获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正如《汲古阁歌》所称：“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峨眉老衲、石渠旧史。清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入清授礼部右侍郎。早岁登科，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赴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中年构拂水山房，凿壁为架，度其中。晚岁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榘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未几尽毁于火，中有宋刻孤本，劫后不可再得者甚多，论者谓绛云一炬，实为江左图书之一厄。牧斋每一部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之高阁者远甚。然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且好自矜蓄，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则其弱点。编撰有《绛云楼书目》，于古文献研究颇有价值。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明末清初余姚人。青年时代即开始藏书。他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衢巷而搜买之。常于薄暮，使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建藏书楼名“续钞堂”。尝语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然未及编次为目，却遭大水，卷轴尽坏，其死后 18 年，又遭一次回禄之灾，大火吞噬了他绝大部分藏书，幸存者仅五分之一。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庐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清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举鸿博，授检讨，与修《明史》。富藏书，家有曝书亭、潜采堂。中年好钞书，通籍以后，于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弃者，必借录之。朱彝尊曾因抄书被贬官，但私心亦不悔，时人谓之美贬。及归田，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榘，自谓老矣，不能遍读，而铭之曰：“奇浓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有“购此书，甚不易，愿子孙，勿轻弃”印章。著有《曝书亭全集》等。

钱曾

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清常熟人。

藏书家钱谦益的族曾孙。曾跟随钱谦益学习收集、整理和校勘图书。他广为结交学者和藏书家，经常向他们借校、借抄古籍善本。绛云楼失火后，钱谦益把剩余的书籍全部赠给了钱曾。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他共收集图书四千多种、达数万卷。分别藏于述古堂、也是园和莪匪楼中。撰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

徐乾学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清江苏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官刑部尚书。出身书香世家，自幼爱读书，嗜收藏。正如他自述：“发愤购遗书，搜罗探秘籍。”为官后，他的学生和部属遍及全国各地，他便委托他们在各地搜集图书，以买为主，买不到就借抄。经过几十年的辛劳，他的藏书达数万卷，并在所居之后筑楼七楹以贮书，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细帙，启钥烂然。楼名传是，故有“家有传是楼，藏书甲天下”之说。撰有《传是楼书目》三册。

丁雄飞

丁雄飞，字菡生，清江苏江浦人。自幼喜读书，13岁时随作官的父亲去温陵，经常一起寻访图书。回乡途中，发现苏州书铺很多，典籍丰富，倾囊以购。以后每次外出，必满载而归。终于积至四十橱，三万多卷，藏于乌龙潭心太平庵中。为互通有无，研讨书之异同，他与当时的大藏书家黄虞稷成立了“古欢社”，并订有严格的社约。

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清新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居官二十余载，俸钱之入，悉以购书。其藏书室曰“池北书库”，藏书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自称有“嗜书之癖”，每闻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辄借抄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在京时，士人有数谒王士禛而不获一见者，以告徐健庵，徐亦是藏书家，知王士禛爱逛书肆，便说：“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士人如其言，果然。又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乃悒悒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编有《池北书库藏书目》。

吴騫

吴騫（1733—1813），字槎客，一字葵里，号兔床，清海宁人。一生博综好古，纂述宏富，年轻时即以诗闻名于湖海之间。吴騫“先世颇乏藏书”，之所以成为著名藏书家，全靠一己之努力。所得书皆节衣缩食，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其藏书处名“拜经楼”，藏书不下5万卷。晨夕坐楼中，展诵摩挲，非同志不准登也。吴騫与黄丕烈是同时好友，黄丕烈曾为其藏书处命名“百宋一廬”，吴騫也风雅好事，名其藏善本书处为“千元十驾”。“百宋”、“千元”，一时传为佳话。拜经楼藏书极精，所藏宋元契本及旧抄本很多。《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所收300余种书中，有45种宋元契本；旧抄本、抄本、自抄本、影宋抄本150余种；名人校本、自校本50余种；稿本16、7种。吴騫善于读书，勤于抄、校，陈鱣在《题兔床先生拜经楼》一诗中有“一

楼灯火夜讎书”的称许。吴騫每得一书就写一题跋，记述甚详。卒后由其子吴寿暘汇录成《拜经楼藏书题跋记》5卷。藏书目录则有《拜经楼书目》2卷、《兔床山人藏书目录》1卷及《拜经楼书目》3种。拜经楼共存在一百多年，其子吴寿暘、其孙吴之淳、吴之澄也被誉为善守善藏的贤子孙。

吴翌凤

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晚自号漫叟，署名小匏，清吴县人。诸生。于学无所不窥，年40即绝意干禄之学，惟仰屋著书。家甚贫而酷嗜异书，无力购求，往往从人借得，露抄雪纂，目为之昏。枚庵久客楚中，旧藏书籍寄贮亲友所者，半皆散逸。故王芑孙《题吴枚庵明经借书图》诗云：“吾昔富搜罗，藏家所争讎。偶食武昌鱼，倏然皆羽化。晚归空四壁，往梦付嘑喏。虽无千金市，幸可一瓶藉。久亡忆之频，骤得喜如乍。昏灯摩老眼，积渐仍满架。图成应自哂，兹身亦传舍。”叙其一生经历及藏书经过甚详，堪称吴氏藏书之史诗。吴翌凤藏书目录为《古欢堂经籍略》第一集，后十几集因故均未编出。

黄丕烈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也写作绍圃，号尧圃、茆夫、复翁。其署名另有茆翁、老茆、士礼居主人、佞宋主人、宋廛一翁、陶陶轩主等。清吴县人。黄丕烈是清代乾嘉年间藏书家的代表，王同愈在《藏书纪事诗》序里称黄氏士礼居藏书为“巨擘”，缪荃孙称黄氏为乾嘉以来藏书之“大宗”。近人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称：“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矣。”黄丕烈早年屡次应会试均不售，从此无意于科场，杜门著述、校书，直到终老。他一生无声色狗马之好，只是喜欢收藏图书和读书、校书。尤其喜爱宋版书。顾广圻为他作《百宋一廛赋》，说他家所藏宋本多达百余部，就送他一个外号：佞宋主人，黄氏欣然认可，常自署此号。黄丕烈嗜书至笃，常自称自己为“书魔”、“痴绝”、“惜书不惜钱”。其收藏图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兼收并蓄，广求异本。二是很重视搜罗残本书，日后寻机会合为完书。黄丕烈的藏书总目始终未编成。他所写的藏书题跋甚多，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但在其有生之年亦未及辑成专书。光绪以后，先后由潘祖荫、缪荃孙等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茆圃藏书题识》等多种行世。

张金吾

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别字月霄，清昭文人。自幼丧父，由其叔父、著名藏书家张海鹏抚养成人。由于生活在一个有藏书和刻书传统的家庭里，他得以博览典籍，并长于版本目录之学，从而成为闻名全国的大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名爱日精庐，又有诒经堂。其藏书最初有8万余卷，到散出时多达10万4千卷。收藏宋元秘本甚多，尤注重搜集金人著作。张金吾藏书的特点，一是藏书为读书，他曾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二是不秘藏，“乐与人共，叩必应”。其藏书目录有《爱日精庐藏书志》36卷，为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陈揆

陈揆，字子准，清常熟人。陈揆与张金吾同时，储藏之名并甲于吴中。

其藏书处名稽瑞楼，以藏抄本、名人校本而著称于世。抄本达 573 种，校本达 130 余种。此外还注重收藏吴地乡邦文献和历代地方志，尤其是前者，凡邑人著述及他文集之有关常邑者，自唐及清，搜罗殆遍。稽瑞楼的藏书目录是《稽瑞楼书目》。

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邵亭，晚又称瞿叟，清贵州独山人。莫友芝曾入曾国藩幕府达 10 余年，曾屡欲官之，不可得，后委派他到江南搜访遗书，并督领江南官书局。这使得莫友芝有机会往来于一些著名藏书家之间，搜购了不少秘籍珍本。其藏书处名影山草堂，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最多，其中尤以唐写本《说文解字》（残部）为最著名。莫友芝是清末有名的目录学家，对版本、目录之学穷极其奥颐。其代表作是《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后者被考论版本之学者奉为金科玉律。

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号持静，清广东丰顺人。为洋务派官僚，酷好藏书。他任江苏巡抚时，趁太平天国战乱搜罗荟萃江浙一带藏书家散书，10 余年间共得 10 万卷之多。其藏书处名持静斋，藏书多宋元版本及抄本。其尤精者，景祐本《汉书》、世綵堂《昌黎集》，及宋刊《礼记要义》、《礼记集说》、《两汉会要》、《东都事略》等。丁氏生前藏书就已零星散失，卒后不久便散逸殆尽。有《持静斋藏书目》5 卷，《持静斋藏书纪要》2 卷。

方功惠

方功惠，字庆龄，号柳桥，清岳阳人。方家几代为官，饶于资，故能满足方功惠自小嗜书的要求。官广东 40 年，更是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购致之，不可得则辗转传抄，期于必备。数十年来，收藏 10 余万卷，蔚为大国，雄视东南。方功惠藏书处名碧琳琅馆，藏书多精本。近人傅增湘称其藏书之精可附于丁、陆之间。方功惠的藏书目录有《碧琳琅馆书目》等。

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清湖北宜都人。自幼嗜书，精于目录学、版本学、金石学。光绪六年三月，他应出使日本的大臣何如璋的招请，至日本作使馆随员。其间搜访了大量古籍，并发现了不少中国已经失传的秘籍。其藏书处名观海堂，藏书多有得自日本的唐写本以及中国所未见的宋、元刻本及抄本。他还协助接替何如璋之任的黎庶昌在日本刻印《古逸丛书》，凡 26 种，200 卷，多为国内所没有的唐宋元版古籍，刻印极精。杨守敬著有《日本访书志》16 卷和《藏书绝句》1 卷。另有《邻苏园藏书目》和《观海堂藏书目》。

缪荃孙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也写作小山，晚号艺风，清江阴人。28 岁时到四川，致力于版本、目录和金石学，并开始了藏书活动。

经过长久搜求，到庚子年（1901年）止，他所收得旧刻、旧抄、四库未收之书及名家孤传稿本，共达10多万卷。以后无论东游日本，还是客居上海，“得暇即搜看旧书”，就是到了晚年，也仍搜购不止。缪荃孙是近代的大目录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等。还为张之洞撰《书目答问》，编刻《菴圃藏书题识》等，对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是我国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

近代藏书家

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补楼，别号愚斋，晚年自署止舆。江苏武进人。盛宣怀出身书香门第，但科举道路却甚不如意。27岁时，经人介绍为李鸿章幕僚，从此青云直上，接连主管“轮、电、路、矿”四政以及织造、商务、外交、教育等事业。盛宣怀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他有钱，又有精于版本目录的王存善、陶湘、宗舜年为之协助，故藏书极富。盛宣怀收书不遗余力，但对于藏书的态度却比较开明。他曾刻“贻之于孙不如公诸同好”印章一枚，并打算与两江总督端方一道献出藏书，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滨金石图书院”，公诸天下后世。后因端方失约而未果。盛宣怀便自行其志，在上海寓所旁边拨地十余亩，建造了一所“愚斋图书馆”，并延请缪荃孙编纂多达18卷、16册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一部。

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字颂鲁，号缘袈，又号鞠裳，自题缘袈庐主人、蓬大夫等。其先人本浙江绍兴籍，后入籍长州。叶昌炽一生屡遭不幸：家道中落、科举多舛、门祚衰绝、宦途失意。除了短暂的愉快时光外，经常不是为科第和生活所困，便是为国事或家事而忧。叶昌炽一生的名山事业是《藏书纪事诗》的编纂。此书的编纂始于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六年成书，历时七年。他遍采正史、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野史稗乘等，只要是与藏书家史实有关者，无不采集哀录。以藏书家为单位，每家吟七言绝句一首，诗下采录各条史实原文。实为第一部治中国藏书家历史的专书，在近代学术界颇有影响。以后，《藏书纪事诗》几乎成为一种专门体裁，仿其体例而作、而读、而补的人络绎不绝。有人甚至说：“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叶昌炽自己也是一位藏书家。虽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他的“治庵室”所藏古籍只有向杨守敬购得的北宋本广韵、南宋本竹友集等寥寥数种，叶昌炽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以苏州先哲遗书为收藏重点。治庵室总共大约1000部藏书中，苏州人的著作便有350余部，其中明代文集又占了半数以上。治庵室藏书除购自书肆外，不少是师友所赠或自家抄录的。他死后刊行的日记选《缘袈庐日记抄》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卢靖

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人。卢靖既好学，又主张学以致用，因此他的“知止楼”藏书虽达十余万卷，都只是求其有用而已，并不汲汲于古本秘籍。卢靖鉴于自己早年读书的艰难，为了协助有志向学的寒士，早在清末就捐建多所图书馆，荟萃天下图书于一处，便于学子阅读。民国以后，更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北平木斋图书馆而闻名。同时还刊印图书，使一书能化身千万，普遍流传人间。他和其弟卢粥两人所刻除零星单种外，计有3部丛书：“慎始基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和“沔阳丛书”。

李盛铎

李盛铎（1858—1935），字椒微，号木斋，晚号麀嘉居士，江西德化人。李盛铎出身富户，一生历任要职。其藏书处木犀轩的名称始于其曾祖父李恕，据说积储有十万卷之多，后来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乱后李家重新再辑，到李盛铎时已是四世藏书，却也是到他手里才经营成名重海内的巨藏。光绪时李盛铎的木犀轩已富盛誉，到抗战前夕，平津一带能与相颉颃的藏书家，只有藏园傅增湘一人。李盛铎木犀轩藏书构成主要有五大来源：一是湘潭袁芳瑛卧雪庐藏书。二是所收日本古籍。三是李氏先人的藏书。四是敦煌卷子。五是平常所收名家藏书之精华。李盛铎一生藏书9,000多部，58,000多册，其中宋元古本约300部、明刊本2,000余部、抄本及稿本2,000余部，合计这些所谓善本约占木犀轩全部的半数，对一般藏书家而言，岂仅琳琅满目，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所以同代另一藏书家伦哲如称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1935到1936年间，木犀轩藏书便陆续有些散出，1939年李盛铎卒后四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字伯烈，一字星海，号节庵、藏山，广东番禺人。曾从大儒陈澧读书，188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法越南之役，因疏劾李鸿章六可杀之罪被贬官。后受知于张之洞，由书院院长渐升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但不久又因请罢庆亲王奕劻和奏劾袁世凯而遭贬斥。清亡后，仍效命王室，颇招物议。梁鼎芬的祖父原有“玉山草堂”藏书，散佚后他的父亲重新搜集，到他手中又继续其志。梁鼎芬藏书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收藏丛书、方志及清人文集为多。但清人文集绝不收袁枚和龚自珍，以为一个是素行无耻，一个是心术至坏，都为他深恶痛绝。梁鼎芬对于藏书处的命名，因时因地而异，最后题称“葵霜阁”，表明“为芟恶草护忠葵”的耿耿此心。梁鼎芬还极力提倡书院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不但到处捐书，甚至自家成立图书馆供人借阅。他自己的藏书分成三份：一捐入镇江焦山书藏，一存广州梁祠图书馆，其余留京自用。遗憾的是，他死后，几处藏书均被毁流散，数十年心力所及竟成山河泡影。

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直心，别号郎园，湖南湘潭人。叶德辉28岁时中进士，因不乐仕进，不久便弃官回里，走上了以藏书、著书、刻书为要务的道路。叶德辉的先世已经有些藏书，因耳濡目染，他也养成了嗜书之癖。不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都随时搜罗，先后获得袁芳瑛卧雪楼、宋至纬绩草堂、孔继涵红桐书屋等家藏书不少。到宣统三年时，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4,000余部、20万卷左右。入民国后仍继续增加，估计在他死前已超过30万卷的巨藏。观古堂所藏宋、元精本不少，其中尤以北京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为最，叶德辉称“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此外，还有宋本《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等书。叶德辉虽爱惜宋元槧本，但从不自好于此，注重一书板本内容的好坏，远过于讲求板本的新旧。叶德辉不仅是著名藏书家，也是近代著名学者，他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因此这两类图书很多。他尤其重视清朝人的经义著述，对乾嘉诗文集也搜集比较齐全。1927年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杀死，其藏书也被攘夺部分，不久他的一个儿子突然沉迷赌博，竟将叶

德辉 40 年心血所寄的藏书押注而光。叶德辉著述极多，最著名的是《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此书的撰述是他鉴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来藏书家的遗闻轶事，乃另辟蹊径，撰辑历代版刻源流及校勘故实，以补《藏书纪事诗》的缺略。《书林清话》和《藏书纪事诗》一样，各是近代关于版刻及藏书的巨作，备受后世推崇。

章钰

章钰（1865—1937），字式之，一字孟坚，又字茗理，别署蛰存、充隐、鸥边等等，晚年自号霜根老人，江苏长州人。他 25 岁中举，直到 39 岁才考上进士。作过幕僚和多种小官，参加过《清史稿》的撰述。章钰早年家境困苦，故藏书规模不大。积 50 年之力，共收书 3,368 部，72,000 多卷，所藏以史部与集部为多。宋本寥寥，只有晋书、周书、南齐书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4 部，而且都是残本或是经过元明两朝的修补本；元刊也只是一部仅存卷一的《唐贤三体诗法》。章钰对于古刊本力有不达，却有不少名家校抄本或稿本，他自己也手抄手校了 569 部，近 15,000 卷。正因为深知自己所藏来之不易，所以当积到十二筐的时候，章钰便在筐面标上浙江藏书家陈鱣的藏书印文“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正好每筐一字，可见其爱书如命和用心之良苦。他的藏书处名“四当斋”，来自南宋大藏书家尤袤的“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的名言。章钰虽家境财力不足以多购宋元古本，无法与大藏家相颉颃，但他却“以教书谋食，以校书遣生”，每日丹黄不倦、校勘颇勤，其中用力最深最久的是《胡注资治通鉴》和《读书敏求记》等书。正如他在诗中所吟：“独向穷愁开境界，蠹鱼身世读书堆。”实在难能可贵。四当斋藏书在章钰逝世后由其遗孀王丹芬全部寄赠燕京大学，化私为公，惠及天下学子无数，可谓适得其所。

宗舜年

宗舜年（1865—1933），字子戴，号耿吾，江苏上元人。曾作过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和其它一些小官。宗舜年的父亲宗源翰就喜收书，其颐情馆藏书几万卷，但多是普通版本，明刊已经少见，宋元本则是到宗舜年的“咫园”才开始有的，其中最珍贵的是《通鉴纪事本末》及《湘山野录》两部人间孤本。前者由宗舜年本人出让给傅增湘，后者在宗舜年死后由其子宗惟恭让给蒋祖诒，数十年中不断辗转易主。宗舜年临终前嘱咐其子惟恭，将咫园所藏约千部左右的图书，出售其中的精善本，得款后即以剩下的普通书为基础，成立一所图书馆公诸于世。不料宗惟恭因另有所好于泉币，以致咫园藏书逐渐变换成他“癖泉书室”的古泉。宗舜年过世不过七载，其藏书便已散失殆尽，颇惹一些同辈友人为之唏嘘感叹。

张元济

张元济（1866—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系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藏书家。曾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先后将近 60 年，奠定了中国最大规模出版机构的基础。张元济出身于读书和藏书世家，其藏书处“涉园”一名起自明末他的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命名，九世祖张惟赤开始著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之后，到乾嘉之际六世祖张宗松一辈时，藏书之富达

到巅峰。张氏一门在道光朝后开始中落，藏书相继散亡，太平天国之役，更使数世盛业一旦化为云烟。张元济虽继承了涉园之名，却没能继承涉园之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图书都是自己一手获得。他还努力收回先人旧藏，只要得知书市中出现钤有涉园印记的图书，便不惜高价购回。张元济因爱家而爱乡，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极多，后全部捐入他和叶景葵等人创办于上海的合众图书馆。张元济收古本秘籍甚多，尤其嗜好宋本。因他未曾将涉园所藏宋本编目，故数目不详。不过从已知的几部看，可说部部价值连城！张元济在光绪 30 年为商务印书馆手创涵芬楼，不惜巨资招揽善本秘籍。从而以善本古籍及方志享誉学术界。1925 年，经王云五建议，涵芬楼与商务编译所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改称东方图书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以藏书之多及公开阅览闻名全国，却不幸在 1932 年初毁于日本发动的淞沪事变中。张元济的两大贡献，一是主编学校教科书，供给清末兴办新教育的亟需；一是校印善本古籍，协助民国以来的学术研究。他辑校印行的成套古书，先后有《涵芬楼秘籍》10 集、《四部丛刊》3 编、《续古逸丛书》、《续藏经》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其中尤以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的印行，是张元济的杰出成就。张元济在辑印的同时，除就每一史的版本异同写有要旨跋文外，并逐页逐行地读校和笔记，先后完成多达 100 余册的校勘记。他的“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的精神，颇得学术界的赞许。

董康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历任司法部多职，抗战时沦为汉奸，任华北伪政权“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病死狱中。董康搜书以宋元及明嘉靖以前的古本为主。其诵芬室藏书的另一着眼，是一向被学者君子摒于大雅堂外的民间戏曲小说，被胡适称赞为“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董康的刻书印书比著书著名，1907 年刊刻的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使他一“刻”惊人。他曾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的寓所内，以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长期雇养一批“手民”，30 年中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等 30 余种。当市面毫无古意的铅版活字盛行时，他为讲究宋体字的真面目，不惜将所藏“龙龕手鉴”与《广韵》拆散作铅模，亦属少有之举。他的著作以记录他四次扶桑行的《书舶庸谭》为最著名，与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先后成为目录学上别树一帜的文献。

邓邦述

邓邦述（1868—1939），字孝先，号正闇，江苏江宁人。邓邦述前半生居官顺利，1921 年后家居，景况较为困窘。他的藏书生涯始自 1901 年入端方幕后。因见匋斋中收藏极富的金石书籍，启发了他效法的意愿。1904 年开始大量收藏，1906 年刚从欧美返国，路经上海时获得两部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宋刊本《李群玉集》和《碧云集》，这两部书黄氏曾在《百宋一廛赋》中吟咏题珍，甚至刻有一个“碧云群玉之居”的印章。邓邦述得书后自然大为欣喜，便自号藏书处为“群碧楼”。邓邦述一时成为书林的新豪客，不到 10 年即耗银七八万两，共收书 24,964 卷，包括宋本 816 卷、元本 2,743 卷、抄本 5,338 卷、明本 15,488 卷、批校本 849 卷。其中较多的是史、集

两部。晚年，邓邦述为生活所迫，将大部分精本求售疗贫，领略到“昔者借债以买书，今日将鬻书以偿债”的滋味。伦哲如曾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为之浩叹：“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邓邦述藏书题跋甚多，仅《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所载，便有188部。由于他颇服膺黄丕烈，因此跋记内容与黄丕烈近似，多记版本优劣、得书经过及价格、与书贾的往来等。

徐乃昌

徐乃昌（1868—1936），字积余，号随庵，安徽南陵人。徐乃昌很早便开始藏书，20岁时与缪荃孙相遇于北京琉璃厂，以弱冠而能谈书论艺为缪氏订交。乃昌藏书处曰“积学斋”，其藏书不分古今版本，以清人文集而言，缪荃孙自称艺风堂中虽有千种之多，但比起积学斋则只是小巫而已。可是这些清人文集中的善本因年代较近还不够列入藏书志的资格，可以想见他所藏古案善本的美富。徐乃昌的藏书志虽已编成，似未刊行，以致徐乃昌收书50年，积学斋也曾著称一时，但究竟其数量若干、重点如何都无从了然。徐乃昌死后次年抗战爆发，藏书开始流散，几年中便已片纸无存，徐乃昌开始藏书不久，也进行刻书，一共刻成包括185种书在内的9部丛书，另有单刻《玉台新咏》、《徐公文集》等数种，总数接近二百，是近代以己之力刊刻图书最多的人之一。

丁祖荫

丁祖荫（1871—1930），字芝孙，号初我，江苏常熟人。办过教育，作过地方长官。丁祖荫精于校讎目录学，而且家境富裕，因此不拘宋元旧本，但见好书必尽量搜购，藏之自己的“湘素楼”，已知的湘素楼藏书中，最重要的是包含64册、242种的《古今杂剧》，原是明代赵琦美“脉望馆”所有，后历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等藏书家接续递藏，价值弥足珍贵。但丁祖荫对藏书一向秘不示人，连知己友好都不得窥其堂奥，因此世人并不知他藏有这部杂剧宝库。此书在抗战之初散出，经郑振铎多方居间奔走，始得全璧。

陶湘

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陶湘大半生从事实业，争逐利场，却又雅好藏书，30岁前后开始致力此道，40岁时收藏已富。陶湘藏书有三大癖好，颇为人乐道：第一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末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的大宗；第二是嗜好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套印本、武英殿本、开花纸本等，所藏都是海内一时之冠；第三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尤其重视装潢的美观。陶湘晚年环境不佳，涉园珍藏逐渐散去。40年书福墨缘从此尽，徒留掌故在人间。

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傅增湘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曾任教育界多种要职。傅增湘藏书处名“双鉴楼”，以后又将北京的新宅第命名“藏园”。他从父祖辈继承了一些藏书，不过除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外，都是较普通的版本。傅增湘自辛

亥革命后开始了他 40 年的书堆生涯，大约在 1921 年以后，便已成为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双鉴楼”最突出的收藏，是为数颇多的宋本，1929 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本书多达 180 余部，比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多，平均每年新收 10 部，近代藏书家中没有第二人能与之相颉颃。1934 年，他以 1 万余元买到的宋刊《周易本义》14 卷，算是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1947 年，傅增湘以藏园群书中的 373 部、约 4,300 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估计价值在 3 亿元以上，政府则拨发 4,000 万元作为象征性的奖金。1950 年他逝世以后，长子傅忠谟又先后将藏园遗书中的 480 部，约 3,500 册“无条件”地再捐给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宋元本的美富，固然睥睨一时，而傅增湘校读的精勤，也是一代之冠。他是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平生所校的书在 1,000 部以上。傅增湘对校勘有两点特别的看法：第一是重视而不迷信古本；第二是重视而不迷信前人。傅增湘编撰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他逝世后其门生韩敏修搜辑《藏园老人遗稿》3 卷油印行世。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别署饮冰室主人，一般则称其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生平以言论为国，著述等身，但是他早年的环境不裕，家藏的图书还不及他后来的著作数量之多。直到 15 岁时，算是他购书藏书的开始。以后，梁启超从师于康有为，深受其藏书之益，这对他后来自己也成为一个著名藏书家不无影响。梁启超于学问之道嗜好至广，中西新旧兼备，而且他是因好学而好书，故与一般藏家专一于鉴赏古本者不同。因此饮冰室藏书虽达十余万卷，大部分是清季咸同光绪、甚至民初的通行本，明刊本已不多见，宋元本则未有入藏；饮冰室藏书的另一项特点，是史部和子部佛典的繁多。1929 年梁启超逝世前，口头遗嘱将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翌年 2 月，家属委托律师与图书馆办理移交点书，共 3,478 部、41,819 册。梁启超虽不是首开以藏书捐赠图书馆的第一位藏书家，但是他的赫赫之名及作为，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逐渐在全国形成捐书的风气。梁氏的藏书目录，有《饮冰室藏书目录》4 册，为北京图书馆于 1933 年为之编印。

丁福保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号畴隐，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丁福保在学术上兴趣广泛，他所以号为畴隐，是因为早年有志以算学终身，但后来则文学、医学、佛学、小学、艺术等等，都涉猎有成，这除了他本身的慧根才具以外，也颇得自己的藏书之助。丁福保早年仰慕就读的南菁书院藏书丰富，曾手抄院中目录一册，并发愿照目购藏。但他在清末时的藏书，只是一般的石印本或普通坊刻之类，等到民国以后，他的医业和产业日盛，书癖和泉癖也同时俱增，购书时，不仅普通本必须是板式美观大方的初印本，才能入其眼中，而且也开始搜罗宋元古本。民国 13 年，丁福保在《题五十岁小影》诗中，称自己“藏书十万又三千，笑侯傲王别有天”。再 5 年后，他新筑的“诂林精舍”落成时，藏书又增加到了 15 万卷之多。丁氏藏书不如捐书之闻名，从 1918 年起，他经常捐赠大量的图书给故乡无锡和上海两地的学

校、图书馆，捐书最多的一次，是 1938 年捐给震旦大学的 2 万余册、5 万多卷古今刊本，除了佛典和他亲手批校的书以外，诂林精舍所藏全部尽于此了。民国以来的藏书家，在身后捐书的很多，但生前便能将视如第二生命的藏书捐出来的却不多见，特别是连元刊古本都肯公诸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丁福保捐书的善名，又不如他著书刊书的盛名，30 年间，他所撰述、编辑、译注，并且由他所创办的医学书局出版的图书，先后总在 300 多种，而且内容相当广泛。

叶景葵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近代著名实业家。景葵弱冠前已开始藏书，但他之搜藏善本，却是 1917 年以后的事，这时事业既成，已有余力注意及此。叶景葵卷庵藏书共有 2,800 多部、3 万余册。虽然有些“古”本，如宋刊本《魏志》、元刊本《吕氏春秋》等，但他不像有些藏书家只竞尚宋、元旧槧，而是基于“真”，专意搜罗前辈稿本、手校本及未刊行之本，其中尤以多藏稿本著名，其可贵处在于它们能纠正通行本的伪误，而保存先贤心血结晶的真面目。景葵又注重批校本，其价值仅次于稿本。叶景葵对于藏书并不启秘自珍或希图传之子孙，而是联合同志传之社会。其多年辛勤得来的众多稿本、批校本，连同其他古今刻本、抄本，在 1941 年时全部捐赠他与同志为保存文献而合办的合众图书馆，以公诸于世。并有编印丛书之举，以保文献广为流传而免于湮没亡佚。他的藏书目录是 1953 年合众图书馆编印的《杭州叶氏卷庵藏书目录》一册。《卷庵书跋》则收入题跋之作 349 篇。另有《卷庵剩稿》一部，多为艺苑掌故札记。

伦明

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驻防旗籍人。一生从事教育，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大等校教授。伦明的父亲伦常是东莞县当地有数的藏书人物。伦明幼承家传，十二三岁即开始购藏。他的藏书处名续书楼，其基础奠定于自光绪二十八年入京师大学堂至辛亥为止的 10 年之中。以后伦明的“书癖”有增无减，终于在 1915 年迁居北京，以便在宝山书海中从容搜讨，而且经常趁南来北往之便，在各地留意古籍善本。他比喻自己搜书有如伯乐一过而良马空。后来为求得书之便，干脆效法前辈大藏家黄丕烈开设“滂喜园”书肆之例，也出赁在北京新华街设立一家“通学斋”书肆。伦明搜书的原则有三：以俭、以勤、以恒，其方式则绝不在家等候书贾登门求售，而是亲自前往书肆坐灰寸积之下，或在市摊百货旧书中寻觅，甚至如获知某家书肆派赴各省搜购之人将于某日回京，便先期至其肆坐候，以能先得为快。购买之外，伦明又借抄以补购买之不足。伦明虽极力搜书，却疏于整理典藏，虫蛀、水浸、人窃，颇多散失。《续书楼书目》又未刊行，故其所藏究竟多少、内容如何，都不清楚。据说以集部较多，集部中又以清人撰著为最多。伦明主张续修《四库全书》及其提要最力，甚至自号室名为“续书楼”以见志。他最出名而脍炙人口的著作是继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作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民国以来的藏书故事，凡 142 首，其中不仅私人藏书家而已，又及于公家藏书与市廛中的书估之辈。伦明既精于版本目录学，本身又是藏书家，又是书肆老板，加上数十年南北各地无所不至，耳闻目睹尽是真切的藏书轶闻，因此写来自是与众不同，为人所乐看。

莫伯骥

莫伯骥（1878—1958），字无一，广东东莞人。莫伯骥青年以后由儒入商，在广州自设“仁寿西药房”，并协助堂兄莫伯伊创办《羊城报》，负责编辑工作。莫伯骥最初从父亲承继一些宋明诸子的图书，以后从乡间到广州创业办报，便开始大力搜藏，药房生意的赢余全部投注于搜书。其藏书处原名“福功书堂”，以后积聚多了，便改称“五十万卷楼”，其声势之惊人，直逼近代我国藏书第一的刘承下“嘉业堂”六十万卷。在收藏的33部宋本和80部元本中，他最注重的是两部唐人文集：李翱的《李文公集》和孙樵的《孙可之集》。莫伯骥在抗战中避居香港，随身携带的书仅有4箱，留在广州的1,400箱在散出流落市面不少，部分被人以废纸出售，损失之重可说是图书文献的一大灾厄。莫伯骥好读不倦，所撰题跋颇多，1936年出版《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22卷，收书900部左右。

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字暹先，浙江省海盐县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历史，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多年。朱希祖藏书处为“邨亭”，藏书最主要的特色，是关于南明的史籍。由于他的“好书何必惜兼金”、“勿吝千金名马至”的豪爽作风，他所藏的南明史籍达700余种之多。无论质量数量，均被公认为全国公私第一。南明史籍外，朱希祖也收藏其他古本及抄稿本，而方志的数量则仅次于南明史籍。邨亭藏书和他的主人一样，历经迁徙流离。1943年底，朱希祖拟将来成立一所“邨亭图书馆”，此愿未遂却已溘然长逝。朱希祖是史学家，因此邨亭藏书既非供赏鉴，也不徒供校讎，而是用以读书治学。他历年题跋大多有关南明史籍，撰成《明季史籍题跋》6卷，《邨亭藏书题跋记》4卷。遗憾的是，他的本可期其成的千秋史业“编纂南明史计划”却被战争无情地摧毁。所以有人在他逝世后挽以：“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

吴梅

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号霜厓，江苏长州人。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吴梅早年寒素，无力藏书，只因从18岁起嗜好戏曲一道，曾购买一些传奇本子，但直到宣统中从河南游幕返京以后，才开始着意搜藏。吴梅是一代曲学宗师，奢摩他室藏书也以戏曲为主，1928年时所得已有600种，其中不乏罕见珍本。为嘉惠学界，吴梅曾从藏书中选择152种以《奢摩他室曲丛》为名交商务印书馆分期影印。不幸的是，曲丛第一、二集共35种问世后，遭逢上海一二八事变，不但他交给商务制版的藏本，因抢救不及而焚毁28种，连已印好待发的曲丛三、四集，都随着商务印书馆付之一炬。吴梅伤感之余，甚至说：“曲者不祥之物也！”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戏曲史上的劫难。奢摩他室藏书的第二个重点，是他发愿要搜罗到100部明代嘉靖朝刊本，可惜未及如愿就辞世了。吴梅逝世后，其子将藏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吴梅是清末民初与王国维齐名的两位戏曲宗师之一，一生著述甚多。

陈群

陈群（1890—1945），字人鹤，福建闽侯人。陈群早年追随孙中山，抗战爆发后出任伪政府内务部长，日本宣布投降后，陈群随即服毒自杀。陈群早年并未以藏书闻名，而是在官居伪政府内务部长后才大举搜藏，其中一部分以他丰厚的利禄高价收买，一部分是在沦陷区中强取豪夺而来，一时成为少见的书林豪客。他同时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各建造一所书库，上海的一所规模较小，1942年初落成，以收藏日文书为主，有10万册之多；南京的一所名“泽存书库”，1941年3月动工，翌年2月告竣，工程费达335万元，收藏新旧图书达40万册之多。抗战胜利后，泽存书库交国立中央图书馆。陈群数年中藏书讯来疾去，恍如南柯一梦，成为近代藏书时间最短的藏书家。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别署纫秋、幽芳阁主、玄览居士等，福建长乐人。现代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因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和编辑《小说月报》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要职，1958年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从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郑振铎便开始搜集以戏曲、小说等旧日白话文学力主的作品，经过40年持续不断的收藏，玄览堂全部中外文藏书竟多达17,224部，94,441册，其中线装书占7,740部，41,000余册，由其遗孀高君箴捐给北京图书馆。郑振铎藏书的特色：一是戏曲。郑振铎在1923年的《小说月报》上开始刊登他自己的《读曲杂录》，入迷之后从第二年起，便在上海及苏杭一带不论新旧版本大量购买，到抗战之前已收藏1,000余部戏曲图书，不论杂剧、传奇都有独步一时的成果。二是小说。郑振铎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古典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在《小说月报》革新第一号上曾抨击四库总目不录小说的不平现象，呼吁整理“混乱”的中国文学。因此当他着手搜藏戏曲的同时，也在大量地网罗小说。一般都把郑振铎收藏的小说列在他的戏曲之后，但有趣的是郑对于小说却不曾像戏曲般地割爱出让过。在他死后编印的《西谛书目》中，小说类是682部，比戏曲类的667部还多些。而其中明刊本竟占44部，更属难得。三是版画书。戏曲和小说书大都附有图画，郑振铎爱屋及乌，对此也深所喜好，在《西谛书目》中，除了本来就是美术图录的书外，注明“有图”的共是1,020部左右，换言之，他的藏书中每7部就有1部是附图的。无论质、量，均在国内数一数二。郑振铎抗战期间在沦陷区冒险为国家抢救、保管了大量古籍，被誉为“文献的卫士”。

藏书楼

天一阁

我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藏书楼是位于浙江宁波市月湖之西、宁静的天一街中的天一阁。天一阁是明代藏书家范钦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动工兴建的，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天一阁藏书楼的格局，使范钦煞费苦心。自古以来，火是藏书之大患。因为水可以灭火，故而范钦取《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将天一阁设计为两层。上层不分间，以喻为天；下层一分为六，以比为地，隐含“天一”、“地六”、“以水制火”之意。并在楼前凿一水池，以作防火之用。正当阁成池就之时，得吴道士龙虎山石刻一块，上书“天一池”三字，范钦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于是即以“天一”为阁名。天一阁藏书楼巍然屹立浙东四百余年，成为我国唯一最古的藏书楼，原因之一是范钦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其次是防火措施的严密。另外，在书籍的防潮、防霉，保护图书方面亦有独特之处。天一阁藏书原有7万余卷，自清乾隆以后逐年散失，到解放前仅存13,000余卷，损失五分之四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天一阁藏书总量已达30万卷之多，其中善本精刻即达8万卷之多。

二老阁

清代初中叶，在浙江慈溪离鹤浦4.5里的地方，与紫蟾山相对，有一座崇檐杰峙，巍然而立于天际的高楼，这就是由郑性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始建，存世达二百多年之久的藏书楼二老阁。“二老阁”的“二老”，一是指著名学者黄宗羲，一为郑性的祖父郑溱，两人交契甚深。而郑溱的儿子郑梁又是黄宗羲的高足。所以在家乡建“二老阁”，以纪念黄宗羲及郑溱，便成为郑梁的夙愿，可惜志向未达，便溘然长逝，最终由郑性继承父志，使宏愿化为现实。二老阁为二层楼，坐北朝南。阁的上层贮藏黄宗羲续抄堂所遗之藏书3万卷；下层为家藏之书。黄宗羲的遗著和文献资料，实乃二老阁藏书楼的精华之所在。郑性去世后，二老阁藏书由其长子郑大节管理。此后二百年，历遭劫、厄，加之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调走不少罕见珍籍未还，致使二老阁藏书损失颇巨。到民国初年，仅余万卷左右。抗战前夕终于散佚殆尽，二老阁也于1943年被郑氏后裔拆毁变卖。

拜经楼

拜经楼是清代藏书家吴騫的藏书楼，由于历时较久，所以不仅在浙江，在全国也较有影响。吴騫是浙江海宁人，他笃嗜典籍，遇善本不惜倾囊购之，所得不下5万卷，遂筑“拜经楼”以藏。吴騫以“拜经”名楼，一说例取臧庸“拜经家塾”。吴氏有“不解穷经只拜经”诗名，可以看出如此命名，既表示了他的谦虚，又抒发了崇经以至于“拜”的情愫。拜经楼藏书极精，所藏宋元槧本及旧抄本极多。其中尤以宋版“临安三志”为人所称艳。吴騫之后，拜经楼藏书由其子吴寿旸，其孙吴之淳、吴之澄继续保存了几十年，得使拜经楼存世百余年之久。19世纪中叶以后，再无拜经楼藏书的记载，想必是在兵燹战乱之年不幸而化为云烟。

海源阁

清代私人藏书，初以江浙为中心。辗转流播，终不出江浙境外。而清末山东聊城的大藏书楼杨氏海源阁一起，则冲破了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以“南瞿北杨”并称雄于海内。海源阁从建立到阁毁书散，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历时长达百余年。其创始人杨以增曾官江南河道总督，此时正值江南战乱，一些大小藏书家的藏书纷纷散出，杨以增楼台近水，得月滋多，其中尤以汪士钟艺苔书舍所藏为最精。盖艺苔书舍得南方藏书之一巨擘黄丕烈百宋一廬之旧。另黄锡瓚、袁又恺、顾之逵等“藏书四友”的藏书也一并为杨氏所买。杨以增乃在山东聊城筑海源阁以度藏。海源阁有书室12间，宋元精本藏于楼上。楼名“海源”，是取《学记》中“先河后海”之义。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应观于海而探其源。杨以增死后，其子杨绍和为官北京期间，又颇得传是、述古之旧，这样，海源阁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汲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杨绍和卒后，其子杨保彝又继之。至杨保彝继子杨敬夫，海源阁藏书始散出。先遭匪患劫掠焚毁，又被敬夫换钱出售，三世守藏，一朝书去楼空。1956年，海源阁旧址被列为第一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琴铜剑楼

出江苏常熟县城的宾阳门10里有一南塘，辛峰左峙，清水东潴。有村曰菰里，沃野千畦，桑竹弥望。闻名遐迩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就坐落在这里。铁琴铜剑楼藏书历经瞿氏家族四代人的辛勤努力方才建成。其草创者是清代乾道年间的瞿绍基。他明经不仕，隐归家乡，读书乐道，建藏书楼名恬裕斋。绍基子瞿镛继承藏书楼后，更名铁琴铜剑楼，因他于收书之余，亦旁及金石，家中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故有是名。瞿镛承继先人遗志，更加多方搜讨典籍，使家藏图书达十余万卷，其中不乏宋元精槧与稀世珍本，在清初即著名于海内，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颇善藏书，平日有人管理，故历久不失；每岁必取出一曝，故历久不蠹。即宋元旧槧，视之一如新装，而无一部散佚。瞿镛的两个儿子瞿秉渊、瞿秉浚在守书方面尤其值得称道。当太平天国事起，战乱频仍，不少著名的藏书楼惨遭损毁，而瞿氏兄弟却能不避艰险扶书避难，虽略有散亡，而珍秘之本保护未失。后经几代人的相继守护，铁琴铜剑楼藏书大部于新中国成立后归入北京图书馆，菰里藏书旧楼也得以维修。

皕宋楼

在晚清四大藏书楼中，浙江占去一半，其中之一便是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祖籍浙江临安，世居吴兴。陆心源年轻时便资质过人，偶见异书，倾囊必购。皕宋楼收藏适在咸同兵燹之后，故家藏书，纷纷出售，陆心源“薄富贵而厚于书”，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蟫断总朽。故插架益富，10余年间藏书总数在15万卷以上，素缥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清代藏书家极重宋元旧版，黄丕烈以“百宋一廬”名重天下。陆心源则搜购宋版书200种，取楼名为“皕宋”，大有超越“百宋”之势。另辟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精本；建“守先阁”，以贮一般书籍。对皕宋楼之藏书，有人评价颇高，甚至认为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不及皕宋楼处有五。有人亦称，陆氏虽题皕宋楼以夸其富，却是分

析一书为数种，实不过百十部。但不论怎么说，天一阁宋雄峙浙东浙西，不啻两座书城，总是事实。可惜的是，甬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却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尽数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当甬宋楼藏书捆载入东之时，国内学术界、藏书界无不为之扼腕痛惜，叹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八千卷楼

晚清四大藏书楼，除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甬宋楼之外，就是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了。八千卷楼的主人是丁丙、丁申兄弟。丁氏兄弟以保存和抄补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而著称于世，曾获清政府“嘉惠艺林”的褒奖。其藏书总处便名“嘉惠堂”，占地约二亩左右，原址在杭州头发巷口。藏书楼总共五楹，分作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和善本书室。八千卷楼藏四库著录之书，乃沿袭其先人丁凯的旧名，以为纪念。后八千卷楼所藏皆四库所未收采者。小八千卷楼藏书最为珍贵，中藏宋元刊本约200余种。清代以来藏书家特重宋元刊本，丁氏之书，宋槧只40种，元刊约百种，与百宋千元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被列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其书有以下可贵之处：一为多四库修书底本，可以见当时修书之法制；二为多日本、朝鲜刻本，可以见异国之风光；三则多名儒宿学所藏所校；而其最著者，则在能吸收前代著名藏书家之一二，令人有豹窥一斑之感。所以有人说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远过瞿、杨、陆三家。丁氏藏书的归宿较之甬宋楼藏书，可谓幸甚，就在甬宋楼藏书“舶载而东”的同一年，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以赔偿。两江总督端方恐其亦外流，遂以75,000元之代价，尽辇其书，度之江南图书馆。现仍完好地保存于南京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

中国古来的私家藏书楼多秘不示人，专为一己所私用。由徐树兰创办的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却因为是以私人之力创办公共阅书楼，而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树兰（1837—1902），字仲凡，号检庵，浙江绍兴人。他为了振兴中华之积弱，兴贤育才，决心以私人之力筹办供公众阅览的藏书楼。1900年，徐树兰独家捐白银8,600余两，在绍兴西偏购地一亩六分造起一座四进楼房，将自己所藏的经史书籍全部捐入楼内，又买进大批西学书籍，共7万多卷。至1903年建成后，便捐为绍兴郡公有，供绍兴全郡人士观览。徐氏还每年提供常年经费1,000元。古越藏书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一扫历来藏书楼的一味“存古”，还注重“开新”，不只收藏传统的经、史、子、集，并且另列“时务”一部，收藏有关实事的新书。其管理方法和目录分类体系也是全新的，一切均以有便于读者为出发点。所以，它实际上是一座私人捐办的公共图书馆，只不过用了“古越藏书楼”这一略嫌陈旧的名称而已。古越藏书楼曾于1924年一度停办，1926年后又继续开放，现在归属绍兴鲁迅图书馆。

嘉业堂藏书楼

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以其典籍之宏富，版本之精良，被誉为东南璆琳。不仅建筑规模超过清代四大藏书楼，即与宁波天一阁相比，也大有后来

居上、直追前贤之势。其创办人刘承干，更以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和金钱最多，而被称作近代私人藏书家之巨擘。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南浔镇人。平生爱书如命，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聚书，积10年之久，耗费大量资财，购得60万卷古籍，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鉴于前人的聚而旋散，乃耗资12万，在南浔镇之鹁鸪溪上建起嘉业堂藏书楼。楼与其宅第小莲庄毗连，四周有水，环之如带。西南向池，池中及四围，叠石为小山，有亭台、花木之胜。之所以取名为“嘉业楼”，是因为刘家曾出资为光绪皇帝陵园植树，而得御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故“敬以名其厅事”。关于嘉业堂藏书楼的结构和藏书分布情况，徐中《嘉业堂藏书楼游记》记述颇为详细：“由池而上，有楼七楹。中一楹，为大门。东三楹，为‘四史斋’，以置宋槧四史。西三楹曰‘诗萃斋’，以置翰怡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斋室均北向，斋楼多旧抄精抄名本，室楼皆宋元槧本。再进亦有楼七楹，左右绕以两庑，庞各六楹，楼下为厅事，三楹公列甲乙两部。上为‘希古楼’，度殿本官印，而内府秘藏，亦在其中。楼东西上下，各两楹，杂置书五百七十余箱，左右庑则有各省郡县志。庑楼均为丛书，缥緗满架，美不胜收。”嘉业堂收藏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专重于宋元刊本，而更着眼于明清两代。故明槧有2,000种左右，清槧有5,000种上下，此外有抄本2,000种。二是不惜重金，广收各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一直到镇志，来者不拒，共收1,200余种，33,380卷。此一特色，就连宁波天一阁也要瞠乎其后。刘承干还聘请史学鉴定家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刘承干苦心经营的藏书虽多有散出，但嘉业堂藏书楼终究能几经兵燹而完好保存至今，总算是幸事。

涵芬楼

涵芬楼是近代极为闻名的藏书楼。它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早的图书资料室，原本无名，1909年才取名“涵芬楼”。张元济是涵芬楼的创始人，他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为涵芬楼收藏古籍，耗尽心力，贡献颇巨。他先后四次买进浙江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太仓顾氏謏闻斋、乌程蒋氏密韵楼和扬州何氏等四大藏书家的大批藏书，对丁日昌之持静斋、缪荃孙之艺风堂等的一些珍本也不遗余力、辗转搜求。1926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总厂对面造起一座五层大楼，除善本书仍储涵芬楼外，其余书籍移藏新楼，名之为东方图书馆，全部对外开放。到1932年，东方图书馆藏书达46万余册，涵芬楼善本达5万册。涵芬楼藏书颇精，其中宋本129种、元本175种，数量之多超过有“百宋一廛”之称的黄丕烈，在近代更是无人堪与伦比。其他如抄本、名人批校本、地方志、外文书等也颇多珍品。可惜的是，如此巨大而精良的藏书，除500多种善本书于1927年移存上海金城银行仓库外，其余皆毁于“一二八”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实乃现代藏书史上之一大浩劫。

四库七阁

清乾隆时，诏修编纂《四库全书》，共抄7部，分置7处，即：（1）文渊阁。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在北京紫禁城内。第一部《四库全书》写成后就藏在这里。民国后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现在台湾。（2）文源阁。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在北京西郊圆明园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

联军入侵，书与阁俱被焚毁。（3）文津阁。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在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藏北京图书馆。（4）文溯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在今辽宁省沈阳市故宫之西。书于1966年10月移藏在甘肃省图书馆。以上四阁称内廷四阁，也称北四阁。（5）文宗阁。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建，原在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寺。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火。（6）文汇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原在江苏扬州市大观堂。亦于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火。（7）文澜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就杭州孤山圣因寺藏书堂改建。咸丰十年（1860年）倒毁，书流散。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书由丁丙、丁申等搜集抄补大半，以后又陆续据文津阁本抄补得全。现藏浙江省图书馆。以上三阁称江南三阁。四库七阁都是仿明代范氏天一阁的形式建筑的。

斋名集趣

一兔戴帽两狗对话斋

十年动乱中，一位知识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牛棚”中，有次他在自己的“检查交代”材料末尾，署上“写于一兔戴帽、两狗对话斋”的字样，使办案人员大惑不解。“一兔戴帽”者，“冤”也；“两狗对话”者，“狱”也。这位知识分子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

二酉山房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书斋名二酉山房。传说，秦末有位读书人，为避战乱，将其书迁移至湖南沉陵境内的大酉、小酉山中。两山各有石洞，称大酉洞和小酉洞。读书人将其书分藏二洞之内。后来，历经数代，人们发现了大小酉二洞里的藏书一千多卷，称这批藏书为二酉石室藏书。胡应麟有感于古人的嗜书好学精神，于是给自己建造的书屋命名为“二酉山房”。

二百兰亭斋

清归安人吴云，字少甫，笃学考古，藏度甚富，所藏襍帖，积至二百余种，遂名其居曰：“二百兰亭斋”。又得侯壘二，复名其轩曰“两壘”。入其室左图右史，钟鼎罗列，著有《二百兰亭斋金石记》、《两壘轩彝器图释》等。

七焚斋

明末张溥的书屋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因他自幼爱好学习，所读的书一定要亲手抄录，抄完朗读一遍，随即烧掉，接着又抄，抄了又读，读了又烧，这样有时竟达六七次。

八千卷楼

清末丁丙藏书处曰“八千卷楼”，盖沿先世之称，其实逾四十万卷。

十文选斋

清末方功惠的藏书处名碧琳琅馆，藏书颇精。所收《文选》自宋、元刻本以下，无不齐备，有十种版本之多。其中宋槧《文选》，字大如钱，笔画圆劲，曾经赵孟頫及历代收藏家收藏，十分珍贵。方功惠因又名其斋为“十文选斋”。

十钟山房

清陈介祺书斋名“十钟山房”，因其书斋藏有古钟十口而得名。陈介祺还集有三代及秦汉玺印七千余方，故又名其斋曰“万印楼”。

万卷楼

以“万卷”为书斋名的，古今颇多。宋詹景仁、张用道及清钱培均有“万卷楼”，钱培另有“小万卷楼”，清朱王存有“小万卷斋”，陆心源则有“十万卷楼”，明朱睦㮮有“万卷堂”，近人戈宝权有“万卷藏书室”。

三鱼堂

清代陆陇其书斋名“三鱼堂”，如此命名有一段来历。陆陇其的曾祖陆溥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为官还算清正。有次，陆溥督运钱粮，乘船夜过采石矶，不料船只突然裂缝，顿时水注如涌，眼看有舟覆人亡的危险，情急之中，陆溥双膝跪下，上对苍天，下叩大江说：“船只中如有一粮一钱非法而来，吾自愿葬身鱼腹。”话音刚落，家人报告说船不漏水了。翌晨，陆溥往船舱中察看，原来有三条鱼阻塞在船的裂缝中，阻挡住了汹涌的江水，才使全船人粮幸免于难。其子孙陆陇其发迹后，不忘“三鱼”救命之恩，于是迁居嘉定时，筑室名为“三鱼堂”，其文稿也以《三鱼堂文集》命之。

三研斋

清代袁廷桢书斋名“三研斋”。研，砚台也。三研皆其先世所贻。以后，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研赠廷桢，铁塘奚铁生为作《归研图》。未几，又得谷虚先生廉石研，并前所藏而五。是夏，袁廷桢移归枫桥旧居，名其楼曰“五研”。

之乎也者矣焉哉歟

屠守拙有一斋名，游戏出之，称：之乎也者矣焉哉歟。

士礼居

清代黄丕烈书斋名士礼居。因他藏有宋刊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两种。《仪礼》一名《士礼》，故有此斋名。

书巢

宋代诗人陆游早有文名，性爱书，虽老病不弃，名其室曰“书巢”。客有问曰：今子幸有屋以居，而谓之巢何邪？应之曰：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霆之变有不知也。闲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邪！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双鉴楼

近人傅增湘书斋名“双鉴楼”，因为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是他的祖父傅诚传下的元刊本，另一部是他自己得之于端方旧藏的百衲本，还是用六种宋刊残本才配成全书的。1918年，傅增湘在北平新的宅第落成，取苏东坡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龕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

水石居

百岁书法家苏局仙在当年日寇入侵之际，拒不出任日伪所聘的中学校长一职。隐居乡间，以耕种几亩薄田为生，并将书斋名“蓼莪居”更改为“水石居”，以水样的清白与石样的坚硬自勉。有诗曰：置石案头坚晚节，心清

如水敢盟天。

与石居

近人沈钧儒爱石，故其书斋名“与石居”。

无尽意斋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书斋曰“无尽意斋”，意为“自己报众生恩的心意无有穷尽”。

丹铅精舍

清代劳格藏书处名“丹铅精舍”，在浙江杭州之塘栖镇。前人事校讎多用丹砂、铅粉，遂转称校讎考订为“丹铅”。劳氏以校勘名家，故以丹铅名其室。

文选楼

清代阮元藏书处名“文选楼”，在江苏扬州市。隋代曹宪往昔曾在扬州以《文选》教授生徒，其所居地便叫作“文选巷”。后来阮元居此，建楼五间，题名“隋文选楼”，以此祀曹宪，并作为自己的藏书之所。

五桂楼

浙江余姚黄澄量藏书处名“五桂楼”，世称浙东第二藏书楼。“五桂楼”名称之由来，民间传说是因为书楼前原有五株桂花（五桂楼围墙内至今广植桂花），但亦有人称因黄澄量慕远祖宋时号五桂者昆季五人并著清望，故以五桂名楼。

四经四史之斋

清代杨以增喜收聚古书，所收多至数十万卷，筑构海源阁以度藏，单辟一室，专藏宋元善本以及名校旧抄本，名为“宋存书室”。后来又得宋刻本《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故亦名“四经四史之斋”。

玉海楼

清末孙衣言、孙诒让父子藏书处名玉海楼。因他们仰慕宋代学者王应麟读书之博和著述之富，遂以王氏所著《玉海》名楼，隐含有藏书“如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之意愿。

玉海堂

清末刘世珩家资甚富，性喜藏书刻书，精于校勘，无日不与丹黄梨枣为缘，他藏有元刊初印本《玉海》，因名其藏书室为“玉海堂”。

仪顾堂

清代陆心源书斋名仪顾堂。因他喜读顾炎武《亭林遗书》，故有此名。

礼陶斋

清代周春藏宋刻真本《汤注陶诗》，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斋名“礼陶斋”。其书秘不示人，俗以殉葬。后失去《礼书》，改斋名曰“宝陶斋”，以后又将《汤注陶诗》卖掉，又改斋名曰“梦陶斋”。当卖书时，泣数行下。

平妖堂

浙江鄞县马廉，字隅卿，以藏小说戏曲著名。因取得明万历刻二十四回本《平妖传》，为世所罕见，故名其书斋为平妖堂。因旧时藏书家重视正经正史，以小说戏曲为不登大雅，故又名其室为“不登大雅文库”。

龙虫并雕斋

近人王力书斋名“龙虫并雕斋”。他解释说：“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一般文章、小意思。我龙虫并雕，两样都干。”

老学庵

宋代陆游晚年的书屋叫“老学庵”。据《老学庵诗》自注：“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名庵。”以此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

百宋一廛

清代黄丕烈喜藏宋版书，得宋刻百余种，构专室藏之，颜曰“百宋一廛”。后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悦，因名其居曰“陶陶室”。

百嘉室

近人吴梅在苏州故居的书斋名百嘉室，因为他发愿要搜罗到一百部明代嘉靖朝刊本。遗憾的是，未及如愿，吴梅便辞世了。民国以来，不约而同都立意要收藏百部嘉靖本的藏书家同好中，尚有陶湘和邓邦述等人，以陶湘的成就最大，他的“百嘉斋”后来竟获得两百部以上。邓邦述的“百靖斋”也超过百部的目标。

百梅书屋

近人陈叔通酷爱梅花，取斋名“百梅书屋”，并曾将一生广泛收集的百家画师所绘的梅花编印成《百梅集》行世。齐白石画室亦名“百梅书屋”，38岁那年，他以320两银子租得一处拥有方圆20余里梅花的房屋，每日里大饱眼福。此外，以梅入斋名的尚有朱皑瞻的“梅花草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梅兰芳的“梅花诗屋”等。

红豆书屋

清代惠周惕书斋名红豆书屋，在吴城东冷香溪之北。吴郡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惠周惕移一枝植阶前，因名书斋为红豆书屋，并自号红豆主人。

快雪堂

明代冯文昌书斋名“决雪堂”。因他得右军《快雪时晴》真亦，故建此

堂于西湖之孤山。

何妨一下楼

近人闻一多的书斋名“何妨一下楼”。因闻一多在云南研究《楚辞》、《诗经》时，常常是旬日不下楼。师生们便把闻一多住的楼戏称为“何妨一下楼”。

励耘

近人陈垣书斋名励耘，意在要求自己作学问要像耕田锄草一样，业精于勤，深耕细作。

佣书堂

近人谢国桢，嗜收藏古籍。他曾说：吾节衣省食，得以陆续购一些零星书籍；至于善本书籍、佳槧名钞买的不多，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瓠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书斋之名，以前由工资和稿费所入买书叫“佣书堂”，后来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实。

言言斋

近人周超然熟悉上海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书。所收多词曲小说，因而取“词”、“说”二字的偏旁为“言言斋”。

纸帐铜瓶室

“补白大王”郑逸梅的书斋名“纸帐铜瓶室”，因为古人诗句中多用“纸帐铜瓶”来暗藏一个“梅”字，取暗藏春色之意。

别下斋

清代蒋光煦藏书处名“别下斋”。《论语·季氏》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宋代王应麟取其意以为“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光煦服膺王应麟，“别下”之名取此。

补史亭

清初杭世骏家有道古堂藏书楼，他又建“补史亭”。他在疏证《北齐书》后，继补《金史》。因感书楼无法尽藏其书，所以利用其父造屋时之所积余材，在后园建一小亭，取名为“补史亭”。

劳谦之室

近人王焕镛书斋名“劳谦之室”。“劳谦”二字来源于《周易》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意思是“勤勉有功，又要谦逊，持之终身，就有好的成果”。

宝礼堂

近人潘宗周藏书处名“宝礼堂”。因潘曾从袁克文处得曲阜孔氏旧藏宋

刊《礼记》，深以为爱，故以“宝礼”名其堂。

非有斋

近人黄炎培抗战以后的书斋名，表示“愿与顽敌拼，身非我有”、“早把我身，献给人民，献给国家有”的决心。

邻苏园

清末民初杨守敬在黄州的藏书处名“邻苏园”。黄州城北即苏东坡所写《赤壁赋》的赤壁故地，苏东坡曾游于此，因有此名。杨氏本人也自号“邻苏”。

岱南阁

清孙星衍藏书处名“岱南阁”。因孙星衍曾任官山东督粮道，居于岱宗（泰山）之南，故有此名。

知圣道斋

清彭元瑞藏书处名“知圣道斋”，取自唐杜暹诗：“清俸购来乎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知不足斋

清代鲍廷博藏书处名“知不足斋”，乃取《大戴记》“学然后知不足”之义而取名。鲍廷博刻有《知不足斋丛书》30集。前24集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传入清廷。清仁宗颙琰之书斋亦名“知不足斋”，他谈到了这部书，颇加赞赏，特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及至《知不足斋丛书》第25集至28集成，再次进呈，年逾80的鲍廷博竟被钦赐为举人，一时传为盛事。

抱经

清代乾隆年间，浙江东西两藏书楼皆云“抱经”，一为宁波卢青崖的“抱经楼”，一为杭州卢文弨的“抱经堂”。时人称为浙江东西二“抱经”。卢文弨更被尊称为“抱经先生”。

宝颜堂

明陈继儒藏书处名“宝颜堂”。堂在今上海淞江。因陈继儒曾得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甚宝之，故有此名。

拜经楼

清代吴騫藏书处名拜经楼，藏书五万卷，晨夕展诵。以“拜经”作楼名，既表示了他崇经以至于“拜”，又很谦虚，只能“拜”，而未能达到“穷”，所谓“不解穷经只拜经”。吴騫的同时好友黄丕烈颜其室“百宋一廛”，窃闻之，自题其居曰：“千元十驾”，谓其藏有千部元版书也，可与黄氏媲美。黄丕烈有诗曰：“千元百宋竞相夸，引得吴人道是娃。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崖。”

弇州园

明代王世贞斋名“弇州园”。相传弇州之山是神仙的居住之地，五彩之鸟的栖息之所，王世贞取室名为“弇州园”，这与他当时“才最高，地座最显，声华意气，笼罩海内”的文坛领袖地位是一致的。

研理楼

近人刘明阳，字静远，数十年如一日，搜书弗懈，藏书颇具规模。其藏书楼名“研理楼”，取自诸葛亮研精理性之语意。其楼又曰：“双静楼”，取其字静远之静及夫人静宜之静。

脉望馆

明末赵用贤、赵琦美父子藏书处名“脉望馆”，在今江苏常熟。传说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脉望”，馆名取此。

茗柯堂

清张惠言书斋名“茗柯堂”，取“如茗之柯小实，非外博而中虚”之义。

津逮舫

清陈鳧藏书楼名“向山阁”，藏书堂名“土乡堂”，还有读书堂“六十四砚斋”。他有小舟一艘，因慕明代江苏著名藏书家毛晋刻《津逮秘书》，遂名其舟为“津逮舫”。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借其舟与之同往山塘书肆访书，为美奂之事。

贼者居

清代戏曲家李渔文名远扬，但生活放浪。他寓居北京时，公然大书“贼者居”三字，贴在府第。对门的一个读书人见了，便在自己的门上写下“良人所”三字，以相调侃。

积微居

近人杨树达斋名“积微居”，意思是说知识学问是由一点一滴苦学积累起来的，切勿贪多求快走捷径。

读有用书斋

松江韩氏以藏书著，有“读有用书斋”。大埔温廷敬亦富藏书，有“读无用书斋”。

爱日精庐

清代张金吾藏书处名“爱日精庐”，系其先德取曾子“爱日以学”之语以名之。又有诒经堂，由其父张光基命名，系取“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义。

铁琴铜剑楼

清代著名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最初的名字叫“恬裕斋”，由瞿绍基草创。

楼名系取自古书上“引养引恬”、“重裕后昆”之义，意即要使这种安逸的书斋生活永远留传下去，使子孙后代长守此书，有书读。后因与光绪之名载湉犯讳，又更名为“敦裕斋”。瞿绍基卒后，其子瞿镛继承藏书楼，更名为“铁琴铜剑楼”。因为瞿镛收书之余，亦旁及金石，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以明“玉轴牙签颇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之志。

聊斋

清代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成小说。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斋为“聊斋”。《聊斋志异》就是在“聊斋”里写成的。

绿林书屋

鲁迅的书斋名“绿林书屋”。鲁迅在黑暗年代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奔走鼓吹。一些反动文人就诬蔑他是“学匪”。他便把书屋取名“绿林”，以示嘲讽。

密韵楼

近人蒋汝藻斋名“密韵楼”。1916年，董康发现一部数百年来未见的宋代周密《草窗韵语》6卷，但这部秘籍2000元的高价，只能让书痴望洋兴叹。以后辗转为上海的富人藏书家蒋汝藻所得。蒋氏得到这部沈曾植等人惊叹为“尤物”、“妖书”的宝贝，大喜之余，便把其“传书堂”更名为“密韵楼”。

续钞堂

清初黄宗羲藏书楼名“续钞堂”。因他曾与许元溥、刘城诸人约建“钞书社”，此楼藏书，又多他一生辛勤所钞录者，故名。

续书楼

近人伦明斋名“续书楼”。伦明因为自己藏书颇重清人撰著，所以对于四库所收书范围之偏狭、既收书内容之讹误、未收书种类之繁富都相当了解，因此他主张《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后者为最重要。他从1924年起立志续修库书，并自号室名为“续书楼”，以明其志。

郾亭

近人朱希祖斋名“郾亭”。因他藏有一部明抄本郾道元《水经注》，章太炎代为取是名。这部明抄出自宋本，王国维曾称之为当世所存郾书各种版本中的第一。

惜字庵

清代黄宗羲斋名亦作“借字庵”。其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名。

嘉惠堂

清末丁丙藏书处名“嘉惠堂”，此名系取自清政府的褒奖令——丁丙主持修复文澜阁后，浙江巡抚谭钟麟曾将其经过，具文报告清政府，清政府谕旨中有“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佚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弃，渐复旧观，

洵足嘉惠艺林”之语。

梅屋

宋末许棐书斋名“梅屋”。因其隐居浙江海盐秦溪，书屋四檐遍植梅花，故号曰梅屋。

赐砚堂

清代顾沅收藏古籍及金石文字的斋名赐砚堂。因其先世曾得雍正时世宗（胤禛）所赐古砚，因称。

联珠楼

清末民初缪荃孙辛亥后居住上海时的藏书处名联珠楼。因为他得到了宋刊本窦氏《联吟集》，因而以此名楼。

紫罗兰斋

著名园艺家、作家周瘦鹃，在众多花木之中对紫罗兰情有独钟，友人曾赠以“一生低首紫罗兰”诗句，其书斋名为“紫罗兰斋”，并将苏州园居定名为“紫罗小筑”。

寒柳堂

近人陈寅恪斋名“寒柳堂”，因其酷爱柳树。丰子恺亦爱柳，20年代初在浙江一中学执教时，将书斋取名“小杨柳屋”，并手植小杨柳一株于室外。

寒瘦山房

近人邓邦述书斋名“寒瘦山房”。邓曾获得明初刊本贾岛《贾浪仙长江集》和孟郊《孟东野诗集》，故取“郊寒岛瘦”之典命为此名。

寒在堂

近人周叔弢斋名甚多，多取自所藏善本书籍。如寒在堂指宋本《寒山子诗》；“半雨楼”来自宋蜀本《王摩诘集》中“山中一半雨”之句；“双南华馆”指收藏有两种宋本《庄子》；“东稼草堂”指藏有元本《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孝经一卷人家”，指藏有元相台岳氏本《孝经》；“自庄严堪”则出自《楞严经》。

滂喜斋

清潘祖荫藏书处名滂喜斋。东汉贾鲂以扬雄《训纂篇》终于“滂熹”二字，取以为书名。“熹”、“喜”通用，“滂喜”有盛大之意。

福功书堂

近人莫伯骥的书斋原名“福功书堂”，是根据阮元所撰《虞山张氏诂经堂记》一文，勉人藏书、撰书、刻书，则于己有福、于人有功的说法而来，以后积聚多了，便改称“五十万卷楼”。

影山草堂

清代莫友芝的藏书处名为影山草堂。堂在黔南独山州兔场上街的翁奇河上，因周围有山竹田园泉池之胜，便取元晖的诗句“竹外山犹影”名其庐。独山的影山草堂于咸丰五年被焚，莫友芝居金陵，书屋仍用此名。

晚晴山房

弘一法师（李叔同）书斋名晚晴山房，源自李商隐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大师还自号“晚晴老人”。

鉴止水斋

清代许宗彦藏书处名鉴止水斋。取“读书人第一须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一语之义。

群碧楼

近人邓邦述藏书处名“群碧楼”。邓得到两部黄丕烈旧藏宋刊本《李群玉集》和《碧云集》，因故将群碧二字作为藏书楼名。

栖凤楼

近人梁鼎芬斋名甚多，因时因地而异。最初是中进士前后，居住京师米市胡同时的“栖凤楼”，以隋朝勤于读书解经的何妥（字栖凤）自比；后来由他的一位东塾同门陈树镛，为他撰题“毋暇斋”三字，也是表示他的读书之勤；在武昌的时候则称为“食鱼斋”；等到劾奕劻、袁世凯不成后，称为“精卫庵”，表示“花可傲霜看晚节，鸟思填海有愚忠”的惘惘之意。入民国后，因溥仪曾颁赏一幅岁寒贞松匾，他又改为“寒松馆”；最后是在他完成光绪陵园的种树任务时，表明“为芟恶草护忠葵”的耿耿忠心，便题称“葵霜阁”。

锲斋

近人商承祚斋名“锲斋”，以荀子《劝学篇》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言，勉励自己发愤攻读、钻研学问。

磨剑室

近人柳亚子早年读书的地方在吴江黎里，斋名“磨剑室”，取意于唐朝诗人贾岛的《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8·13”淞沪失守后，柳亚子避居上海“法租界”，眼看国土一片沦丧，痛苦之余，取书斋名为“活埋庵”。以后秘密来到香港，以“羿楼”、“羿庐”为书斋名，取神话故事后羿射日之意，表示他对日寇的无比痛恨。

嗜书美号

十经

晋周续之，12岁诣范宁受业数年，寻通五经、五纬，时人号曰“十经”。

书仓

东汉曹平，积石为仓以藏书，号曰“曹氏书仓”。

书淫

三国皇甫谧，字士安，年20折节勤学，家贫，带经而农，遂通典籍百家之言。一生苦学不辍，尝上表向皇帝借书，皇帝竟赠之以一车书。晚年患风痹疾，犹对黄卷青灯，手不停披。

南北朝刘峻亦称书淫。刘峻，字孝标，好学安贫、耕读不辍。晚尝燎麻炬就读，从夕达旦。时或昏睡，其鬓发，及觉复读。晚年尤刻苦攻读，尝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时人谓之“书淫”。

书簏

晋朝右丞傅迪读书很渊博，但却不能主宰所学的知识。他很瞧不起读书较少的刺史刘柳，而刘柳也常对他反唇相讥：“你读书虽多，只能是个书簏罢了。”“书簏”，装书的竹箱。

唐李善，好读书，淹贯古今，为《文选》注，敷析渊洽，亦号为“书簏”。

书橱

南北朝陆澄，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家藏坟籍，人所罕见。因博闻多识，时人谓之“书橱”。

宋朝李纲，因广览博学，亦被世人誉为“书橱”。

书库

隋朝公孙景茂，自幼刻苦读书，所读书不可胜数，被称为书库。

书城·邺架

唐李泌，7岁能文，及长博学。家富藏书，时人称为“书城”。李泌曾被封为邺侯，因籍丰学博，故又号“邺架”。“架”，指的是书的卷轴插架。

书窟

五代人孟景翌，一生勤奋读书，出门则载书跟随，终日手不释卷。读书所坐之处，四面书籍卷轴盈满，时人谓之“书窟”。

书舟

宋程垓，好学、工诗。家有拟舫堆书，名书舟。敌人称程垓为“书舟”。

书柜

明丘琼山，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素有“书柜”的美称。

书迷

明宋濂，因家贫无力购书，只好到处借阅，读后还把书全抄下来，即便天气寒冷，砚台结冰、手指僵硬，也抄书不止，人称“书迷”。

书痴

清林云铭，少嗜学，每探索精思，数日不食。暑日，家僮具热水请浴，有时和衣入盆，里人以“书痴”目之。

现代诗人闻一多，酷爱读书。读大学时，暑假回乡读书，有时入迷，蜈蚣虫上鞋竟不知。结婚之日，仍稳坐书斋，沉浸于书中，竟被他人从书斋中拉出“拜堂”。家人遂戏称他是“书痴”。

书魔·佞宋主人

清黄丕烈，字尧圃，自称是“惜书而不惜钱”的“书魔”，“遇一善本，不惜破产购之”。他对于宋版书的嗜好是很出名的，当时就有“今天下好宋版书，未见如尧圃者也”的说法。他曾说过：“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好成癖，遇宋本苟力可勉，无不致之以为快。”他积数十年心血，收得宋本百余种，筑室贮之，题额“百宋一廛”，一时翹居群楚，称雄海内。他还每于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洱酬之。自号佞宋主人。

支五经·陈五经

明支立，精于经学，人称“支五经”。

明陈继，亦贯穿经学，人称“陈五经”。

五经笥

东汉边韶，字孝先，以文学知名，教授弟子数百人。一日昼寝，为弟子所嘲笑。边韶闻后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因其学博，世遂以“五经笥”目之。

南北朝任昉，家贫，然好书，无所不窥。聚书至万卷，多异本。昉善谈经籍，时人亦称之为“五经笥”。

左传癖

三国杜 一生耽思经籍，尤酷嗜《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成一家之学。他曾对晋武帝司马炎说：“臣有《左传》癖。”因之，世人以“左传癖”目之。

汉圣

南北朝刘臻，耽悦经史，终日苦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尤精《汉书》，时人呼为汉圣。

刘石经·柳百经

南北朝刘芳，笃志向学，昼为人抄书，夜则勤奋攻读，数十年如一日，遂通经籍。时儒读经有疑，常向他求教，世称“刘石经”。

唐柳全节，习百家之言，世称为“柳百经”。

行书橱

隋朝书法家虞世南，饱览群书，知识渊博。帝尝命写《列女传》于屏风，无本，暗疏之，无一字误，帝甚称之。世人呼之为“行书橱”。

肉谱·行谱·人物志

隋李守素，好学，精谱学，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莫不详究。时号为“肉谱”、“行谱”、“人物志”。

唐韩溥，少俊敏，博学善论，尤详李唐故事，与人谈，娓娓可听，时人颇推重之，号为“近世肉谱”。

朱万卷·小万卷·杜万卷

唐朱遵度，好读书，人称“朱万卷”。

唐朱昂，好学，所得奉赐，以三分之一购奇书，居以讽诵为乐。因时人朱遵度有“朱万卷”之称，故世别以“小万卷”目之。

宋杜镐，博闻强记。凡有检阅，先戒小吏：“某事在某书第几行”，取视无讹。人有著作，咨以古事，无不知者。时人号为“杜万卷”。

吴史

清吴兰庭酷嗜典籍，尤精史学，遂有“吴史”之名。

李书楼

唐李璵，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

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于西南联大执教时，除了去教室授课，总是在一小楼中读书，几乎楼梯亦不下一步。同事名此楼为“何妨一下楼”，称闻一多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织帘先生

南北朝沈麟士，少好学，及长，博通经史。家庭贫寒，尝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常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而归。家尝遇火，藏书尽毁。年八十，犹于灯下抄书二三千卷。

学府

南北朝傅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后居朝嗜书，博极古今，尤善人物，世称“学府”。

经史笥

南北朝许懋，少孤，笃志好学，为当地所称。年十四入太学，尤晓故事。甚受仆射江祐推重，号为“经史笥”。

经痴

清江昱，安贫好学，所居凌寒竹斋，拥书万卷。尤精《尚书》，尝与程

延祚辨证《尚书》古文，至晡忘食，袁枚目为“经痴”。

盲先生

清余萧客，年十五，通九经，闻有异书，必假抄录。同邑朱矣藏书甲吴中，馆之滋兰堂，因得博览，手一编，经夜不寝，遂患目疾，人称“盲先生”。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修几，书册鳞次，潜心研究。

垃圾马车

宁波某公，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版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

柳筐子

唐柳璨，少孤贫，僻居柳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以其博奥，时人目为“柳筐子”。

铁汉

清李绂尝以事入狱，在狱中坚持读书，人叹为“铁汉”。

破伦·书虫

近代藏书家伦明嗜书，除自己亲往书肆尘灰寸积之下淘书外，还借抄以补购书之不足。他固定雇用三四名抄工，准备随时可以抄写。由于他这种嗜书的做法，以致有“书虫”之称。又因他只要有书，即使衣履破旧不堪也不在意，故又被呼为“破伦”。

绣囊

东汉马融才高学博，为世通儒。人们传说他读尽了天下之书，乃奉之以“绣囊”的雅号。

陶开花

近人陶兰泉，最喜收藏初印开花纸书，时人号为“陶开花”。

博物

南北朝王颉，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所责，遂奋激诵习，通五经，好读诸子，遍记异书，当世称为“博物”。

书店揽胜

书店的由来

书店即售书的商店。“书店”之名源于清。在此之前亦称书局；古代则叫“书肆”。“书肆”之名，始于汉代。还有叫“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经籍铺”等名的，既刻书，又卖书。古代亦有直呼字号的，如“富文堂”、“养正斋”、“鸿运楼”、“崇文阁”等。这些名号，除统称为“书肆”外，宋以后也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

书肆的出现

“书肆”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末年。扬雄的《扬子法言》就提到了书肆。东汉初期的都城洛阳已有了买卖图书的“书肆”。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曾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史学家荀悦也是因“家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牋，一见多能记诵”。

世界最大的书店

世界上最大的书店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是由世界上最大的书业集团——科尔斯书业集团开办的。店面共有 8000 平方米，高两层，库存图书 100 万册以上。书店的正面店名牌高 3 米，长度达 80 米。书店的门厅挂有一块很大的电子导向牌，牌上有一楼和二楼两个平面示意图。牌下是 59 个寻向按钮。各个专柜的上方也都悬挂着醒目别致的柜名牌，许多主要通道的尽端还悬挂着很大的电子导向牌。书店的每一层楼又分为上下两层，由楼梯和供残疾人使用的斜坡相互联通。书店自 1980 年 11 月开业以来，每周营业额平均在 10 万加元以上。

独一无二的小书店

日本东京有一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书店”。顾客要用高倍数放大镜和夹子才能看到店内的存书。其中最名贵的要数据称是世界上最小的书的《三只盲老鼠》的复印本，其面积仅 2.1 平方毫米，厚度 0.8 毫米，售价高达 25 万英镑。该店备有各种小书约 3,000 本，其中包括 1536 年出版的罗马大演讲家西塞罗的自传、全套林肯演讲词、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大典时的照片等。

求生书店

在美国洛杉矶的北好莱坞街上，有家奇特的书店。它既不卖畅销书，也不卖裸体杂志，书架上陈列着的全是与求生相关的各种图书。如《生存指南》、《初级求生》、《剃刀血刃战术》、《炸弹制作法》、《刀刃收集》……内容大抵是告诉你如何去应付各种危机。同时，还供应与求生有关的一切装备，从能久藏的干粮、野地营包、滤水器，到防毒面罩、催泪弹、军刀、枪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店主介绍，平时生意极为兴隆，越是经济不景气，这里的顾客就越多。这家书店名叫“求生书店”。

银行式书店

日本东京新桥车站附近有一家奇特的银行式旧书店，店内除出售每册最贵不超过 500 日元的廉价图书外，人们还可以把自己所不需要的图书拿去换取店内存放在出售架上同等价值的图书。如果认为暂时没有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可以像人们通常去银行存款那样，把自己拿去的旧书换取一张“存折”，以便以后换取其他同等价值的图书。

女性书店

日本东京有三家专为女性读者服务或以出售女性图书为主的“女性书店”。第一家叫“女性书店松香堂”，除出售图书外，还出版一种《女性图书》季刊，专为女性读者提供图书信息。第二家位于代代木，设在一幢公寓里，面积仅 250 平方英尺，陈列出售的书多达 1,500 种，顾客中 80% 是女性。第三家是在北青开业不久的“女性彩色书房”。它不仅店名文雅，业务范围亦广，除了卖书，还出售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等。陈列的 2500 种图书以女性的为主。该书店还备有日本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供顾客阅读。

手掌书店

在刚果东北部有个奇特的“手掌书店”，店内见不到一本书。当人们来买书时，店员先询问读者需要哪方面的内容，然后用一种呈紫色的草汁将其所要的知识密密麻麻地写在读者手掌上。这种草汁不易褪色。一旦读者认为已经熟记，再回到书店用另一种特制的褪色草汁将手掌上的“书”抹掉。所以人们称这个书店为“手掌书店”，而该店的职员又被当地人誉为“学识最渊博的人”。

按重量售书

意大利米兰有一家出版社鉴于意大利手不释卷的人越来越少，电视机前度时光的人越来越多，就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书店里实行按重量售书，以吸引更多的人读书。据这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讲，改革以后书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的销售量明显增加。

古书业售货密码

北京古书业售货，有明码、暗码之分。明码就是将书鉴标以明价；密码则用十个暗字以代价格，其字多用铅字钤于首册书背或背面书皮一角。如第一字代表一，第二字代表二，以此类推。假如是一元五角，即用十字中的第一字及第五字；十五元即用第十字及第五；一百五十元，则将第一字下面另加一个“百”字，后边再钤第五字和第十字。如到千元，则另外加一“千”字。明密码之间大约能相差二至三折。旧北京的书肆中，荣华堂的密码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来薰阁用“来南北，薰东西，生财有道”。松筠阁为“经史百家用，子集万人观”。邃雅斋则用“但见花开谢，催人自白头”，“深邃房工大，书雅多异香”。

一折八扣书

1934 年左右，上海有所谓一折八扣书出售，即定价一元的，一折成为一角，再加八扣，八分钱就能购买一书。首创此举的，是上海福州路的新文化书店，主持者范某把《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旧小说加标

点，分段落翻印出版。且一折八扣、登报宣传。不明真相的读者认为他们这样做一定大蚀其本，岂知范某非但不蚀本，而且在一年内赚了 20 万元，成了富翁。原来那时加拿大报纸在我国大量倾销，每一令只卖三元，旧小说既不要付稿费，也不涉及版权问题，初版只算成本，不计赚钱，这种畅销书再版三版，越销越多，就大大地有利可图。各地书店认为这种书很便宜，易于脱手，都现批现卖，于是经济周转得很快，用来再印其它热门书，当然赚钱更多。其他书店看得眼红，纷纷如法炮制，一时间，一折八扣书充溢坊间，甚至由一折八扣而为一折六扣、一折五扣。这样一来，许多书粗制滥造，错字百出、文字节佚不全，结果无人问津，成为废纸。

图书馆种种

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

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已知的是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一座公元前1800年的图书馆。馆内有保存完好的八百多件备忘录一览表。根据专家鉴定，大部分保存下来的图书，如宗教、经文、地理记述和语法读本，还有综合性哲学著作等，都在一览表上有记载。书籍作者均为巴比伦人。专家们认为，这些珍贵文物遗产的毁坏多是人为造成的。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址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山上。创建于1800年4月24日。1982年时入藏品达79,762,191种，其中包括书籍和小册子19,721,066卷。该馆建筑面积为14公顷，书架总长达856公里。

古代最大的图书馆

古代最大的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它的藏书十分丰富，虽然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十万卷或二十万卷，有的说是五十万卷，但它收藏了几乎全部希腊的重要文献和其他各国的学术作品，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当时具有国际性的图书馆，各国图书馆都把经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校订的版本视为标准本。

古罗马最大的图书馆

乌尔皮亚是古罗马时最大的图书馆。它兴建于神庙内，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该馆的希腊文图书部和拉丁文图书部分设在神庙的东西两侧。除此之外，它还保管政府的文件档案。全部藏书按主题分放在书架上或书柜内，并编制有主题目录和著者目录。

希腊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希腊最早的私人图书馆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亚里士多德的私人图书馆。据历史学家记载，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最早建立图书馆的人。

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近代图书馆的雏形是富兰克林创建的费城图书馆。173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在费城用捐款建立起第一个“公助图书馆”。自愿捐助协会的各个成员，每年缴纳会费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图书馆，并享有使用的权利。后来这个图书馆向一般市民开放，深受民众的欢迎。

中国十大图书馆

根据1986年的统计资料，中国十大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藏书1059.8万册，1910年建馆；上海图书馆，藏书700万册，1952年建馆；南京图书馆，藏书482万册，1933年建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书440万册，1951年建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370万册，1899年建馆，重庆图书馆，藏书287万册，1949年建馆；山东省图书馆，藏书286万册，1908年建馆；四川省图

书馆，藏书 285 万册，1940 年建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书 250 万册，1952 年建馆；广东省图书馆，藏书 245 万册，1911 年建馆。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1924 年，商务印书馆出其历年盈余中所提存的款项，计规银十一万余两，在上海宝山路西兴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名为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在 1926 年，但图书的收藏于清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建成新屋于宝山路后，就已开始，时为 1904 年。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之前，藏书 518,000 余册，图表照片 5,000 余种，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1932 年 1 月 28 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狂轰滥炸，使上海遭到空前浩劫。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惨遭炸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图书博物馆

1957 年在捷克的贾尔纳—萨扎瓦市创建了一座图书博物馆。该馆的陈列品介绍了文字、图书编纂、印刷术发展的历史。陈列品均属稀世珍宝，有一部玫瑰花式宝石文的抄本，法国人香保罗昂利用它解识了埃及象形文字。修道院的缮写室以及书籍印刷作坊也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1500 年前印刷的捷克古版书籍要算是最珍贵的陈列品了，1408 年在捷克印刷的第一本书《特洛伊演义》尤为引人注目。

巴黎的露天图书馆

在法国首都巴黎，从著名文化区——拉丁区到圣米歇尔广场，沿塞纳河左岸绵亘数公里，摆满了 230 多个旧书摊。这些旧书摊是一排排绿色的书箱，书箱尺寸都是 2×0.65 米，构成了巴黎的一种特殊风光，被人称为“露天图书馆”。两个世纪来，这种“露天图书馆”一直兴盛不衰。这里的书籍包罗万象，有时还有一些待价而沽的珍本，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名流、失意文人、穷苦好学的学生。甚至英、美、日等国的学者、书商和书籍爱好者也常常涉足这里。

世界杂志图书馆

日本著名的“杂志屋”出版社在东京新宿区建立了一所“世界杂志图书馆”，免费让各界读者阅读来自世界各国的 1,000 多种杂志。这是日本第一所专门陈列外国杂志的图书馆。该馆每月从 56 个国家航空输入 1,300 多种杂志，内容包罗万象。馆内设有咖啡屋，读者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喝咖啡。此外，该馆还聘请了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人员，随时为读者服务，免费提供翻译及咨询服务等。

最大的集邮图书馆

德国慕尼黑市的集邮图书馆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集邮图书馆，该馆现收藏有各种关于集邮的图书六万多册，还收有世界各国出版的集邮刊物和邮票目录。这座集邮图书馆始建于本世纪 20 年代，是由德国一位名叫希里斯托夫·奥托·穆莱尔的集邮爱好者创建的。

收藏科幻作品最多的图书馆

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收藏科幻作品之多，堪称世界第一。这座图书馆大约有二万多册科幻小说和故事集。此外，该图书馆还收藏有世界各国的各种科幻杂志，并计划收藏科幻电影等。

电影图书馆

法国巴黎有一座“电影图书馆”，收藏有影片五万多部，电影书籍三万多册。

音乐图书馆

德国莱比锡市有一座“音乐图书馆”，有录音磁带 6.5 万盘，录制了 4,000 部世界名著和书籍，专为盲人提供服务。

酒类图书馆

日本横滨有一座专门收藏酒类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收藏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名酒，还收藏有上千册有关酒的书，免费供读者阅读。

多功能图书馆

纽约近来出现了多功能的图书馆。这种图书馆不仅可以借书，而且还可以出借钓鱼竿、玩具、幻灯机，有的图书馆还定期举办演讲会和故事会等。

微型图书馆

美国有座微型书籍图书馆，藏书最长的不超过 3 厘米，全部图书只需几只皮箱就可以装走。

唱片图书馆

美国有一种唱片图书馆，一张唱片大小的装置能储存大量资料，20 卷的《美国学术百科全书》中的 900 万个词，只占一直径 15 厘米唱片的五分之四，使用时，将唱片放入与计算机连在一起的唱机上，即可查阅要找的资料。

高技术图书馆

日本藤泽市中央图书馆是一座视听设备齐全的高技术图书馆。该馆收藏有一万多张激光唱片，一千多部录像带和两千多张录像磁片。有十几间视听室，读者可以用一张录像磁片看完图文并茂的《三国志》。数十台计算机使资料检索十分方便，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找藏书齐全的国立图书馆的资料。

地下图书馆

美国阿肯色州亨德里克斯大学为了保证学习十分紧张的学生们在校园里有宽敞的地方娱乐和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想方设法不在那里大兴土木。然而作为必不可少的学校图书馆要方便全校师生员工去阅览或借阅图书，却必须设在校园中间的位置。为了解决矛盾，兼顾上述两方面的需要，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巧妙地把图书馆建在地下。当你置身校园时，不仔细观

察，很难发现它的踪影。

沙龙式图书馆

日本埼玉县朝霞市新建的图书馆宽敞的大厅内，形状各异的沙发、绿色盆栽、悠扬的音乐令人赏心悦目。人们坐在沙发上，翻阅书刊、欣赏音乐和景象。图书馆外有绿色的草坪、喷泉、木椅和雕塑。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读者可以拿着书到草坪上阅读。馆长大泽正雄说：“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都希望身心得到放松。我们设计这种‘沙龙’式图书馆，是为了让人们轻松地学习和娱乐。”

择偶图书馆

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市有一所择偶图书馆。该馆只为未婚青年服务，使他们在馆内学习和其他活动中得以广泛接触和深刻了解异性。该馆对读者要求严格，每一读者均经过认真审查后才发给读者证。馆方不断告诫青年读者，使他们慎重择偶。一旦男女读者结为伉俪，馆方就分别馈赠图书礼品。

站前图书馆

遍布东京的地铁和电车车站是人员分流的场所。人们下班后愿去车站附近的咖啡馆或酒吧消遣。当田町市的车站前建立了第一座图书馆后，下班的职工便涌向这里。图书馆门前写着“稍息一会儿，可使你的知识更新”的字样。这家图书馆开到晚上8时，并设了咖啡室和谈话室，所有图书开架。读者看上的书可以买走。

最严厉的借书法令

美国密苏里州有一项也许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借书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凡借了图书馆的书而未及时归还者，都将被监禁。例如，如果有人借了一本价值150美元的书，超过限期两个月未还，那么他将被判处五年的徒刑，同时还必须缴纳一笔数字可观的罚款。

美国图书馆的大赦

美国的图书馆都有外借书逾期不还要按日罚款的制度，越拖罚得越重。但是，每隔两年左右又总会来一次“免罚日”，不论何时借的书，只要在这天来还，就一笔勾销，一分不罚。此举的目的是把那些怕罚款而久借不还的书收回。图书馆既能收回一批书，又免掉这些读者的精神负担。有些人往往出于疏忽，又舍不得交罚款，于是不来还书，也不好意思再来借书，这就违反了尽量让人多看书的本意。于是定出个日子给这些人搭桥下台。

催书的妙计

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一家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处为了敦促“健忘的”读者尽快还书，特地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催书措施：管理处宣布不仅“特赦”所有的债户（即长期不还书而受到罚款处分的读者），而且宣布，给归还借阅时间最久一书的读者颁发奖品。管理处所采取的特别措施立竿见影，效果特别显著。在很短的时间里，读者就向图书馆归还了将近5,000册图书。其中有一本书是1922年借的，因时间最久而获奖。

读者搬书

英国谢尼克尔克市图书馆，要将几百万册图书迁往新址。为了减少费用，馆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市民都来借几本书，在一个月內陆续到新址归还。这样，图书馆搬家的开支就大大节省了。

还书先抖沙

美国夏威夷市有一个图书馆，大门前放着一个写着“沙”字的空箱子，令许多初来乍到者摸不着头脑。原来，前来借书的读者大都是旅游者，他们在海滩小憩时看书，使书中夹有不少沙子。还书后工作人员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清理这些书籍。后来该馆想出一个办法，还书时得先将沙抖在门前的空箱里，否则将被处以罚款。

书林佳话

叔侄嗜奇

明代范钦归里，于宅中起天一阁，藏书极浙江之盛。其从子范大澈数从借观，范钦不时应。大澈佛然，益遍披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价购之，充其家。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辄具茗酒佳设，迎范钦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范钦取阅之，默然而去。

主与仆

王世贞书室中一老仆，颇善解主人意。王世贞欲取某书某卷某叶某字，一脱声即检出，若有夙因。

叫花子端彩漆花碗

宋代宴叔原聚书甚多，每每迁居，其妻颇讨厌他的书，奚落他是叫花子端彩漆碗。明代谢肇淞亦有藏书癖好，家藏数万卷，每有迁徙，光是搬书的车子就有好多辆。他说：“每次看着搬书的车队，心里生怕人家以为自己搬的是金银财宝，因为我也端彩漆花碗的人哪。”

古欢社约

明末清初藏书家黄虞稷与另一藏书家丁雄飞家相距十余里。两人订立“古欢社约”，约定每月13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谈书、论学，26日黄虞稷去丁雄飞家谈书、抄书。不论到谁家，东道主都要设饭相待。每月两日相交，互通有无，讎对讹谈，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

只向慈仁寺里寻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王士贞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孔尚任为此赋诗一首：“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岁暮祭书

清代黄丕烈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年尝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之图。顾广圻曾为之作《士礼居祭书诗》。

绘图征诗

黄丕烈得一奇书，往往绘图征诗，有得书图，有续得书图，再读得书图，今皆散逸。其名之可考者，曰《襄阳月夜图》，得宋刻孟浩然诗作也；曰《三径就荒图》，得三谢诗作也；曰《蜗庐松竹图》，得《北山小集》也；曰《鱼无机诗思图》，为得咸宜女郎诗而作也。

书友盛会

清代瞿琴山馆主人刘桐以藏书自任，每夏秋之交，设长筵广座，名花异卉，骄列左右。主人命门者延若属，呼侍啸侣，至即十余辈，或有所得，传

观以为赏析。自此刘桐之书，已不啻数万卷矣。

黄丕烈与陈鱣争书

清代陈鱣在书肆遇影宋写本《周易集解》十卷，持以相视，直索十两，正拟购得，黄丕烈已先知之，急遣人来，携首册而去。未几，黄丕烈卧病，然犹持书不释，陈鱣欲其速愈也，因让之，乃竟如其值买之，病果起。遂以香柘制椽而藏。是冬，除夕祭书，此其首列。次年，陈鱣请以二十金易书，黄丕烈面有难色。陈鱣爱书之念，犹然耿耿。越二年，黄丕烈适有所需，乃以三十金购之。较汲古原价，已加五倍。但陈鱣则不以为过。

以书箱奉敬老师

王佩净是金鹤望的高足，师生都是藏书家。有一次，鹤望偶然谈及书多无法容贮，诤意隔了半个月，忽然木器铺送来若干具书箱，鹤望颇为讶异，一经询问，才知是佩净定购奉敬老师的。

三千根竹筒一部书

汉代文学家东方朔曾写过一篇大文章给汉武帝看。这篇文章用了三千根竹筒，由两个人吃力地抬到宫里去。

偶翻破书成状元

清乾隆皇帝东巡泰山，江苏无锡的秦瀛，闻乾隆帝东巡赴召试之。典试题为“东方三大赋”，通场无一人知其详者。秦某起初亦不知，因赴召试时路过清江浦，偶于市中见旧本破烂书一册，购归翻阅，名为《东方三大图》，其中包括：“泰山、东海、孔丘”，皆出自山东者。公榜后竟被钦点第一名，不数年由道员擢仓场总督。

由你取些衣服去

叶昌炽寓沪，一夕，有小窃入室，检取书籍，叶在隔壁听得，即开电灯，并大声说：书籍不值钱，容我开室门，由你取些衣服去。小窃闻声遁走。

载书出征

宋太祖虽武将出身，但喜爱读书，每在军营之中手不释卷。故他出征时，也要载上几车书。一次，有人诬告他窃载“重宝”，周世宗派人来检验，发现全是书籍。问其故，答道：“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后来他当朝，有一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流传至今。

汉书下酒

宋代诗人苏舜钦住丈人家中，每晚读书，总要饮酒一斗。丈人很奇怪，一晚往观，只见他正在读《汉书·张良传》。当读到“良与客狙击秦皇，误中副车”时，拍案叫道：“惜乎击之不中！”即满饮一杯。又读到张良对汉高祖说：“此天下以臣授陛下”时，又击桌叹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于是又一饮而尽。丈人见此景笑着说：“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以全部丛书赠之

清代鲍廷博性宽厚，笃于戚友，有贫乏者，必周恤之。稍有蓄积，为刊书所罄，或遇未见之书，必典衣购之。友朋之贫而好学者，每以全部丛书赠之。

无书可读

夏穗卿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却谓无书可读，盖自夸群书已读遍矣。

物归原主

明代沈周富于藏书，精于诵肄，自坟典丘索以及杂家言，无所不窥。尝以重值购古书一部，陈之斋阁。一日客至，见而谛视之，问书所从得，周曰：“客何问也？”客曰：“公幸无诧，书吾书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见之。”周曰：“有验乎？”曰：“某卷某叶，某尝书记某事，或者犹存乎”周发而视之，果验，乃归之，终不言售者姓名。

晒书

汉代以来，习俗于七月初七日曝晒衣裘。豪富家族常借此炫富斗珍，把一件件名贵的衣饰挂满庭院。魏晋间，阮家是当时的大族，为官作宦的很多。每逢七月七日，诸阮家的门前都晒满了锦绣皮裘。“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却在院子里竖一根长竹竿，竿头挂一条粗布短裤衩，说：“未能免俗，我也来晒晒！”还有个名叫郝隆的士人更风趣，人家晒衣，他却坦着肚子仰卧在阳光里。有人笑着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这肚子里装满了书，别人晒衣我晒书，跟人家比一比究竟谁富有。”

移居为读书

夏承焘幼年，苦家中无书，乃移居温州籀园图书馆附近，博览馆中藏书以成学。

双鉴变三鉴

近代藏书家宗舜年 1928 年收藏《通鉴纪事本末》，成为咫园第一部宋刊秘籍。三年后，双鉴楼主傅增湘闻风而至，再三请求舜年出让，因为他以宋元两部《资治通鉴》名楼，独缺一部《通鉴纪事本末》。眼界极高的他在 20 年中虽看过不少此书的残缺本、抄补本、后印本等等，却只钟情于咫园这部独一无二完整的小字初印本。宗舜年则也慨然同意促成傅氏“三鉴”的心愿。后来傅氏题跋说：“凡历三百六十余日，此七百五十九年前之古刻，二千八百九十余叶之巨编，乃入吾室藏中，屹燃与兴文、盐官鼎列而三，为书林增一佳话。”从他不惮其详地历数数目，可知此书的矜贵和他的兴奋之情。

厕间亦列书架

朱大可藏书甚富，斋中累累皆是，甚至厕间亦列书架，充斥图籍。

百嘉斋与韶嘉斋

近人陶湘的涉园藏书多达 30 万卷，此数已可跻登大藏书家之林，但陶湘别辟溪径地以明本为重点，则与一般倭宋尚元的大藏家有所不同。傅增湘早先与陶湘初识时，曾表示陶湘如能搜得明代嘉靖朝刊本一百部，他愿题“百

嘉斋”匾额相赠，不料后来涉园中的明版书多至一千余部，单是嘉靖本便超出两百部以上，傅氏应为陶湘题“ 韶韶嘉斋 ” 才是。

书缘

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为筹措女儿嫁资，从所藏善本内选择40部定价千元割爱，结果为叶景葵所得，成为卷庵善本的发端。也由于这一次的书缘，当数年后吴昌绶下世，友人拟印行其《松邻遗集》，景葵便独力承担一半费用，再度乐成其事。

两书淫

清代黄丕烈与张燮相得，以彼此藏书故。犹忆癸丑，同上春宫，邸寓各近琉璃厂，每于暇日即遍游书肆，恣览古籍，一时有“两书淫”之目。有《题明秀集》诗曰：“琉璃厂里两书淫，莛友莛翁是素心。我羨小琅嬛福地，子孙世守到于今。”

藏书二友

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江苏常熟城里，同时有两个大藏书家，一为张金吾，一为陈撰，藏书之名并甲于吴中。四方之名士，书林之贾客，挟秘册，访异书，望两家之门而投上者，络绎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滨。张居西关，陈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临水。暇辄过从，各出所获，赏奇辨疑，有无通假，相善也。两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张则钟于经籍而兼爱宋元人集，陈则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其于书也，张则乐与人共有，叩必应；陈则一室静研，慎于乞假。当时人黄廷鉴称之为藏书二友。

藏书四友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与同时代的藏书家如陈鱣、吴騫、周香岩、顾广圻、袁又恺、张绍仁等情同手足，互相交换有无，互相借抄。他与周、顾、袁四人更被称作藏书四友，当时的一位画家曾为他们画了一幅《藏书四友图》。

鲍廷博精于版本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家富藏书，尤喜搜罗散佚。读书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叶某伪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版口，即曰：“此某氏版某卷刊伪若干字。”历历不爽。乾嘉之交，近自嘉禾、吴兴，远而大江南北，客有旧藏抄刻异本来售武林者，必先过其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

龟形人送鹤书来

宋代元丰间有一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程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咏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座，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书苑铁闻

读书灯

明代都穆曾官太仆少卿，归老之日，斋居萧然，日事探讨。吴门有娶妇者，夜风雨大至，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壕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其门，果得火。其老而好学如此。

蠹鱼弟子

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脉望，状如发卷，规四寸许。得此者夜持向天，从规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乞丹度世。刘子威聚仙经，令童子于他书中取蠹鱼置其上，每日检视，冀有仙名被食者，皇甫子循谓之曰：“我当刻一印记赠子，曰‘蠹鱼弟子’。”

天遣风雪下取将

清杭州张氏藏书甚富，造楼水中度置，甲乙悉有次第。以小舟通之，哺后即禁往来。一日忽有烟气出楼窗，大惊，往视之则门肩如故，比登楼，烟亦不见，如是者三。最后细检视，烟自书橱中出，开厨则几天文奇遁之书，悉为烬，惟空函在焉。余书无恙。叶昌炽为之赋诗道：“彼岸还须一苇航，蓬壶宛在水中央。灵文开筐惊乌有，天遣风雷下取将。”

北宋即有窃书者

北宋时，政府藏书允许借阅，馆阁藏书亡佚现象颇为严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一称：“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

聚书之祸

士大夫家藏图籍，固是美事，然亦有因聚书而招致祸患的。宋代藏书家宇文虚中使金被留，被诬谋反，指家藏图书为反具，罪至族。高士谈图书尤多，亦见杀。

藏书家有数等

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藏书家有数等。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为考订家；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唐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南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近人唐弢则分藏书家为三种：第一种是为读书而藏书，叫作读书的藏书家；第二种是藏书的藏书家，他们为藏书而藏书，好比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第三种是既不为读书也不为藏书的藏书家。有些豪于财者之所以收书，表面上附庸风雅，冒充藏书家，实则因为古书可以卖钱，“待善价而估”。归根结底，他们千方百计地藏书，正是千方百计地蓄财。

明刻书家妄改原书

明代有些刻书家喜欢随意改动、删节原书，有的改动题目，如《大唐新语》被改为《唐世说新语》，《岩下放言》被改为《蒙斋笔谈》，《释名》被改作《逸雅》。有的窜改作者姓名，如胡宗宪把《筹海图编》的作者改作

自己的姓名。月窗道人把《诗总》的作者阮阅改为阮一阅。有的改动原书结构，如月窗道人在刊刻《诗总》时，曾据己意重加“汇次”。有的窜入他书文字，如《说文》中窜入《五音韵谱》，《通典》中窜入宋人议论。有的改动若干文字，如苏州所刻《世说》，“右军清真”被妄改为“右军清贵”、“兼有诸人之差”，被妄改作“兼有诸人之美”，与原书迥不相谋，大失古人语意。

废纸堆中淘书

《贩书偶记》作者孙殿起晚年不能去外地收书，便经常到各废纸房和废纸摊检阅称斤的废书。一次，竟发现残本《粤东诗文海》百册，只欠三五册。虽是残本，但因世上绝少流传，弥足珍贵。

炸弹警告书商

30年代初，琉璃厂文友堂以500元得到一部孤本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轰动了文化界，北平图书馆馆长徐森玉闻讯捷足先至，而该店主却将该书隐藏，诡称书主已将原书索回，并谈及此书曾摄影两张，以代书样，实售2,000元，而且要求先付款、后取书。当时北平图书馆购书费不足，文友堂一向又同日本文化界有来往，遇有善本便以高价售归日本。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有人以爱国锄奸的名义书写字条贴在一枚炸弹上，置于该店门前，以示警告。书店主人畏惧闯祸，经过再三磋商，终于以1,800元之高价与北平图书馆成交。

大家都姓马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為了要禁止馬克思的著作譯本，連馬寅初的經濟論文集和古老的研究中國文法的《馬氏文通》也遭了殃，理由就因為“大家都姓馬”。

光赤改无慈

現代作家蔣光赤因為名字上有一個“赤”字，書報檢查老爺便說他不是好人，無論他寫的什麼都要禁止。後來書店老板為了顧全血本起見，征得他的同意，將名字改為“光慈”，可是老爺們一點也不“慈悲”，對他的作品仍一律禁止。

鸟兽不应作人言

1931年，《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中譯本曾在中国湖南省被禁，理由是“鳥獸不應作人言，尤其不應人獸不分”。可見這些書報檢查老爺連寓言和童話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禁用词

國民黨曾秘密印行過一個《抗戰時期宣傳名詞正誤表》，凡是共產黨人文章里用過的名詞，都叫作“謬誤名詞”，分別規定處理辦法。第一類，不准用的22個，例如“邊區政府”、“紅軍”、“抗日的八路軍”、“抗日政權”、“三大政策”、“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時代”、“爭取民主”、“爭取抗戰自由”、“抗日有罪”、“民族失敗

主义”、“两面派”、“亲日派”、“托派汉奸”、“匪徒”、“汉字拉丁化或新文字”等。第二类，“应改正”的 50 个，例如“救亡运动”要改成“抗战工作”、“内战时期”要改成“安内时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要改成“民国十五年北伐”、“各阶层的人民”要改成“全国各界”、“工人阶级”要改成“全国工人”、“国内少数民族”要改成“内地苗民或内地人民”、“拥护抗战到底”要改成“拥护抗战国策”。最奇怪的是，“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拥护领袖”。“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三民主义”。

寻找最早的书

从前有一个怪人，发誓要找到世界上最早的一本书，为此他走遍了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他整天流连于霉臭发黄的旧书堆里，书上的灰尘落满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后来，他从靠着书橱的一条高梯子上摔下来，跌死了。没有在有生之年找到最早的书，使他死不瞑目。他哪里知道，最早的一本书，在他出世以前几千年，就在地底下腐烂了。即使再活上一百年，他的寻找工作也照样是白费劲。

铁链锁书

古代书籍名贵稀少，极不易得。所以在图书馆里，人们用铁链把书锁在桌子上面，以防给人偷走。就在 1770 年，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还有这样上铁链的书。

吃圣经的皇帝

门奈里克二世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和缔造者。他以打败意大利侵略者和致力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而闻名于世。这位皇帝有一个怪癖：无论何时，他感到有病时就要吃几页圣经，坚信如此便会恢复健康。1913 年 12 月的一天，中风刚好的他又感到病重，便把长达 47 章的埃及版圣经列王记全部撕开，吃掉每一页后，便离开了人世。

书有何用

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为教皇米力斯二世造像时，想在手里放一本书，教皇说：“书有何用？放一柄剑！”

白兔与黑兔结婚

美国阿拉巴马公共图书馆拒绝出借加尔斯·威廉的《兔子的婚礼》。这是一本儿童读物，讲到一只白兔与黑兔结婚，触犯了种族条例，被迫在出借目录上取消了这本书。

伊利亚特肚子痛

从前，罗马有一个名叫伊采利的富商。每天都要邀集三百个客人吃饭，用最名贵的山珍海味来款待客人。伊采利虽然样样不缺，但就是没有学问。席间谈话时，他简直没法开口，有时逸强插进一句，也常惹得客人们忍俊不禁。伊采利虽然很尴尬，但又不愿下苦功读书。最后想出一个主意来，让管

家从许多奴隶中间挑选出两百个最聪明的，叫他们每人都读熟一本书。比如，一个读熟《伊利亚特》，另一个读《奥德赛》，等等。以后，每逢宴会临到谈话时，伊利采只消向管家使个眼色，从靠壁肃立的一排奴隶里面，就会走出一个来背一段合宜的警句。这些奴隶就用他们所读熟的书取名字，例如一个叫“伊利亚特”，另一个叫“奥德赛”，第三个叫“伊尼特”，等等。伊采利很为自己的发明得意，谁知好景不长，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富翁便成为全罗马城居民的笑料。那天跟往常一样，饭后要谈论各种学问。大家谈起了古人怎样举行宴会。“我知道在《伊利亚特》里有一段谈到这点”，伊采利一边说，一边向管家使眼色。但是管家没有向奴隶作手势，却跪了下来，吓得直打哆嗦他说：“大人，小的该死，伊利亚特今天肚子痛！”

只有二百人能读懂的书

英国一位名叫麦尔维尔·本内特的退休中学校长，在 82 岁高龄时写完了一部名叫《吉尔塔亚流血的王冠》的小说，通篇内容用科尼希文写成。全世界会讲这种语言的大约只有二百人左右。

纽约市长卖书

美国出版商为了打开书的销路，总是费尽心思。不少作者被安排到书店露面，甚至由作家亲自向读者吹嘘、宣传。纽约市市长就曾为自己的一本名为《市长》的书，露面和周旋于读者中间，不停地高声叫喊：“喂！我的书在这儿出售，你们会喜欢的！”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书销售量竟达到了近百万册。

四岁女孩出书

世界上最年轻的女作家大概要算美国的多萝西·斯特内特。她出生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在 1962 年 4 岁时写出了《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一书。这本书于 1964 年由纽约一个名叫潘西恩·布恩的出版商印刷发行。

读书乐酒吧

形形色色的酒吧在当今美国来说是不计其数的，然而有一家名为“读书乐”的酒吧就显得有些不同凡俗、独树一帜。“读书乐”是这家酒吧的美称，它真正的名字是“书丽雅海滩酒吧”，位于俄亥俄州的乔堡德城。该酒吧共有 20 间吧房，每间吧房除了有必需的生活设备外，其余就全是书了。有趣的是，这 20 间吧房均各自以 20 位古今文坛名作家命名。同时，每间吧房内摆藏的书，亦以各位作家的著作为主，再配备有关参考或考证说明书籍的材料。酒吧开业几年来，生意非常红火，光临的顾客络绎不绝，如今不得不实行预约登记的方法。该酒吧没有任何娱乐健美设施，甚至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

光顾餐馆可获赠书

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一家餐馆，只要顾客光顾一次，便可以免费得到一本书。想出这个主意的餐馆老板马蒂，并不是有意借此来招徕生意，只因自小喜爱藏书，但家中已难容纳日益增多的书籍，又不忍心弃置，故想出这个两

全其美的主意。马蒂自 6 岁起便开始收集书籍，现在他的私人图书馆已有 15,000 本藏书。为了处理大量的旧书，马蒂将书本放在餐馆内，来用餐的客人不但可以随便取阅，临走时还可免费带走一本。自从有此优惠后，马蒂餐馆的生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在一年的时间里，马蒂共赠送 10 万余本书，而他也从拍卖店中购入了 15 万本，以供赠书。不过也有一些藏书者，将自己的旧书悄悄地放在马蒂餐馆门前，免费送给他，为他带来额外的“货源”。

出租书房

近年来日本的书刊发行量急速增加，因为住房狭窄，致使日益增多的书刊无处堆放。出租藏书室是由一些仓库和书店联合经营的，每次只需花 180 日元，便可以把家中无处堆放的书刊寄藏到藏书室。藏书室还把客户寄存的书刊分门别类地制成目录清单，客户如想查阅，只要拨个电话，马上就会“送货上门”。日本的京都则有一幢“出租书房”楼，拥有书房 21 间，每间 15 平米，房内配有书桌、书架、电话、沙发以及电冰箱和煤气灶等设备，书房楼周围的环境也非常幽静，很受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普通公司职员等人的欢迎，甚至还有每个周末都从东京赶来的客户。

书坛公案

徐一夔案

明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上其词云：“光天之下。”又曰：“天生圣人，为典为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此侮朕那？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磨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播天下。

庄氏史案

史书记载：“先是，明相国乌程朱国桢，留心史事，所著有大事记。未刊者，为明历朝臣传；已刊者，谓之《史概》。明亡以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家。庄家固富，乃召集名士，以己意增损，补崇祯一朝事，召匠刻之，号曰《明书》。归安令吴之荣告讦，而狱作矣。”此事之所以成为大案，由于该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且不书清帝年号而仍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的年号，因而“大逆不道”。庄氏史案，案发在辛丑之春（清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决狱则在癸卯（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此时庄廷已死，被开棺戮尸，又诛其弟及诸子。在《明书》上题名诸士，俱罹重辟。另又株连刻书的工匠、售书的商人及列名参与校对者，以及地方官吏等，判处死刑者共达221人之多。案犯之妇女则充军关外与八旗兵为奴。

将明之材案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议政王等遵旨议奏：魏裔介、季振宜奏参刘正宗。有一个名叫张缙彦的，为刘正宗的诗所作的序内有“将明之材”字样。审议结论为“其言诡譎”。结果是张缙彦遭斩，刘正宗被绞。其实，“将明之材”语出《诗经》，在《汉书》和颜真卿碑刻中也都有，并非借用来颂“明”之意。

戴名世案

戴名世案案发于康熙五十一年。据《清稗类钞》记载：“桐城方孝标入滇受吴三桂伪翰林职。吴败，孝标先还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记闻》，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中多录孝标语。尤云谔、方正学为之捐资刊行，……又与其弟子余生一书，论修史之例：谓本朝当以康熙王寅（即南明永历帝亡后之一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十八年，时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云。当时赵申乔为都练，奏其事。九卿会鞫，中戴名世大逆不法，致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弃者发边。时孝标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峰之旅，孙世樵并斩。方世有服者皆坐死，且判孝尸焉。”此案牵连者达数百人之多。方、戴所著之书自亦均被焚毁。

查嗣庭案

雍正四年丙午（1726年），查嗣庭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两句和“小径之蹊间”一句命题。对此，有人举报，说他是“有意讥刺”，三题“茅塞于心”不知何指，“居心不可问”。因而又查抄其笔札诗草，据说是发现“语多悖逆”。查后来已死于狱中，仍判处戮尸，家属也

被杀或充军流放。其实都是莫须有的事。例如查出“维民所止”，就说其中“维止”两字是“雍正”去首云云。

吕留良案

吕留良案发生于雍正八年庚戌（1730年）。吕留良因追念明朝，著书不仕。刑部衙门以“吕留良追思旧国，诋毁朝章，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应行剖尸梟首，财产入官。其子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诸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请限一年内，饰各省、州、县，焚毁其著述”。

坚磨生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1755年），湖南学政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钞》，诗中有云：“一无日月，斯文欲被蛮”、“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所出试题又有“乌鲁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肉”等题，即被人举报为大逆不道。当时的大学士等奏复：“胡中藻背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家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鄂昌，候拿解当日另议。”

吴三桂伪檄文案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有人告发段昌绪藏有吴三桂伪檄，且有赏圈密点，加评赞赏。又疑彭家屏“安能保其必无”？其实，彭家屏并没有过目过吴三桂伪檄文。在再三追逼之下，彭家屏供出，家藏有明末野史《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等书。还供出有《酌中志》、《南迁录》等天启、崇祯年间的政事书，并钞本小字本。可是上述所供各书，在彭家屏家中并未查出。原来，彭家屏在京对簿公堂之时，其子彭传飏闻伪檄文案事发，遂将家中所藏明季野史等毁灭。家屏不知，如实供出。结果段昌绪斩立决，彭家父子俱斩监候，秋后处决。

徐述夔案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8年），《四库全书》开馆后五年，以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之句，科徐述夔以大逆不道之罪，以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然有兴明朝，去本朝之意”。

黄李绝交

澹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黄宗羲讲学于石门，其时吕留良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黄宗羲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吕留良之使者，中途窃黄宗羲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则吕留良所授意也。黄宗羲大怒，黄、吕二人因此而绝交。

景清戏友

明代洪武年间有位御史大夫名叫景清，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他有个朋友藏有一部秘书，他很想借来一读，但朋友不肯，后经再三请求，并保证“明

日即还书”，才借到了手。次日，朋友索书，景清说：“我不知什么书，也没有向你借过。”朋友见他赖帐，颇气愤，便告到了祭酒那里。在堂上，景清举看那本书说：“这是我平时读的书。”说完从头到尾背了一遍。祭酒问景清的朋友，那人却说不出书的一句话来。祭酒就把他叱退出堂。到了外面，景清把书还给了朋友，说：“你平时甚爱秘本，但却不读，所以我跟你开了玩笑。”

曹操烧《孟德新书》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根据自己几十年带兵作战的经验，写成本十余万字的《孟德新书》。后来拿给张松看，张松戏称此书内容古代早有人写，不是什么新鲜见解。曹操不愿步古人后尘，将手稿一烧了之。

王安石毁《兵论》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写过一部《兵论》。一日，其好友刘贡父到他家作客，王安石当时有别的事，请刘在书房等一等。贡父瞥见书桌上压着一叠稿纸，便拿来一看，原来是《兵论》手稿。等王安石再进书房来时，贡父已将《兵论》看完一遍。这时，王安石问他，近来有何新著，他开玩笑他说：“写是写了些，还不成熟，过些时再拿来请教。”王安石要他讲一讲大体内容，他便把刚才看过的王安石的《兵论》的内容，粗略述说一遍。王安石一听，自己所写与刘贡父所写的内容一样，感到雷同之作无多大意思，便连撕带烧将《兵论》毁了。

孤本《本草》

清末藏书家杨守敬住在武昌的时候，藏有宋刻大观年间的《本草》一部，因为这书是孤本，价值昂贵，引得邻居柯逢时眼馋。一天，柯谎称可以高价代售，只希望先借他看一昼夜。杨守敬同意了。柯逢时将书带回家，动员全家人，一昼夜之间把它全部抄了下来。第二天将书还给杨，说：这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以后，书肆上果然有《本草》出售了，杨这时才知道上了柯的当，因此恨之入骨，终身不相见。

秘本《秋月夜》

30年代，上海半斋出版社编印每月古书，其中有一部书叫《秋月夜》，据传是一部世上无双的明版书，可真算秘本了。郑振铎一听说，马上要求半斋出版社老板停止出版，把原书卖给他。这唯利是图的老板，一方面索取高价把珍本卖给郑，一方面暗地里把书摄下影来，照常影印。当郑提出质问时，老板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我们新近又买进的本子影印的。难道《秋月夜》在当时刻成后只印得一部？一定不会有第二部流传下来吗？”郑振铎明知受骗，也只好自认晦气了。

双包案

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出版机构的发行所都在上海河南路，两家相处比邻，彼此竞争激烈。甚至有一次涉及版权问题，诉诸法庭，双方大伤感情。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最突出的是被喻为“双包案”的两部大部头书的出

版。商务于1919年刊行《四部丛刊》，中华于1924年也发行《四部备要》。商务辑印的《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明清较好的版本影印，对稀少古本的复印与流传，是有一定贡献的。所以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四部备要》的主持陆费伯鸿不甘寂寞，也刊登广告，针锋相对，说《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纠正了原本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本，以讹传讹，贻误读者。中华书局还重金征求读者意见，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一字酬以一元。结果真的付出酬金数千元，因而在《四部备要》重印时错字得以纠正，提高了质量，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闲话扬州与扬州闲话

中华书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较稳重的，可是也发生过纠葛。较著名的有《闲话扬州》案。

《闲话扬州》一书，易君左作，1934年春由中华书局刊行。《闲话扬州》凡数万言，记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内中颇有辱及扬州人的地方。如说：“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意思是说扬州人懒得做事生产，上午孵在茶馆中，下午呆在澡堂里，消磨一天。辱及扬州妇女更甚，如硬指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指扬州包办全国妓女，且扬州妇女以不当妓女为耻。所以该书出版仅两个月，江都妇女协会就向镇江法院对发行人陆费逵提起诉讼，并组织了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专门负责追究此事。此时周佛海往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江苏教育厅编审主任，诉讼事起，周佛海就嘱易君左暂时避开。中华书局方面登报道歉，且把所有《闲话扬州》的存书以及纸型，完全付之一炬，才把事情缓和下来。当时有人曾出一联，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一时成为趣谈。

最早的版权之争

传说在公元六世纪时，爱尔兰青年学者柯兰贝在他的老师、修道院院长芬连那里作客。有一个晚上，柯兰贝躲在教堂里私自抄写芬连院长所珍藏的圣诗篇。由于抄写时灯光漏出屋外，被过路人发现他在埋头抄袭，就向院长报告。院长非常生气，要柯兰贝交出擅自抄袭的材料，但遭柯兰贝的拒绝。两人各执一词，最后闹到国王面前。国王了解事情经过后宣判：“每一条小牛应归属于它的母牛，同样，每一篇作品，也应归属于它的作者。”这次最早的版权之争，就以芬连院长的胜利而解决了。

书癖

书癖

钱曾尝分藏书家为读书之藏家与藏书之藏家。近人陈登原则以为历来收藏之徒，殆均偏于后者。除供人记诵之外，兼以神怪非常之态度待其所藏，换言之，则书癖是也。

抱经

杜林于西河得漆书古书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辄握抱此经。

挥泪对宫娥

《宋本汉书》，世间珍籍也。昔王弼州鬻良田一庄而得之。后归钱谦益。钱晚年丧之，三叹于“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之语，并跋云：“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

白昼鬼哭

明代赵琦美身死之后，子孙不保其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

一见公羊泪不禁

清纪晓岚以为赵琦美白昼鬼哭“何所见之不达耶”，故作达观语曰：“大地山河，佛以为泡影。区区者，何足云？我百年唇，倘画书器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导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耶？”语虽旷达，然大抵一时议论。纪晓岚尝见媒姬携玉佩数事，云某公家出售，外裹残纸，乃北宋槧《公羊传》四叶，为惆怅久之。所以叶昌炽曾为之赋诗道：“山河泡影谈何易？一见《公羊》泪不禁。”纪晓岚亦未能免俗。

甚于丧我也

明代边贡癖于求书，搜访金石古文甚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丧我也。”病遂笃，年仅五十七即惋愤成疾而歿。马履泰《历下杂诗》云：“一夕烟横势郁攸，玉啼宝唾浩难收。古今聚散俱如此，何事催心万卷楼。”

佞宋

清初钱曾自述：“余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如蠹之负版，鼠之搬。甲乙部居，粗有条理。……然生平所嗜，宋槧本为最。冯定远尝戏余曰：‘昔入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不能已于佞也。”

以美婢换书

明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评宋槧袁宏所著《后汉记》，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婢临行时，题诗于壁曰：“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后人就此事评论说：夫以爱妾美

婢换书，事似风雅，实则近于杀风景。此则佞宋之癖，入于膏肓。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

《左传》癖

晋代杜预，曾拜镇南将军，伐吴有功。功成后，一意于经籍的研究，著有《春秋左传经传集解》等书。有一次，晋武帝问他：“卿有何癖？”他即以“臣有《左传》癖”作答。

焚香点茶读之

明代黄云卿，嗜古之癖很浓。他每得一古书，就像添了一个良友，几乎达到神化的地步。他在《云卿笔尘》中说：“古梅花放时，以磐石置彝著器，焚香点茶开肉典素书读之，正似共百岁老人，捉尘谈霞外事。”

老蠹鱼

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自叙》中说：“余无他好，而中于书癖，家藏卷帙，不下万数，虽极贫，不忍弃去，数年以来，或持囊以载所见，或携筐以记所闻，念兹在兹，几成为一老蠹鱼矣。”

以田易书

清代马思赞有一次到龙山查氏家，见其案头有宋刻本陆状元《通鉴》，甚爱之，百计购之不可得。后查氏的亲人去世，所卜吉壤，正是马恩赞家的田。马思赞知道后大喜过望，说：“书可得矣！”便去查氏家，表示愿以启己的十亩田换查氏的《通鉴》。把书拿到手后，思赞抱书疾归，惟恐查氏反悔。

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

明代徐富藏书，积至53,000余卷，他在《笔精》中写道：“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

有书千卷

宋杨应之题所居壁曰：“有竹百竿，有香一护。有书千卷，有酒一壶。如是足矣。”

不能一日无此君

清初全祖望每逢外出，必于家书五万卷中，捆载二万卷以为芒油衣之件，因为“蓬窗驿肆，不能一日无此君”！雍正十一年（1733年），全祖望进京赴试，照例带二万卷藏书进京。舟车每过关口，如虎似狼的税吏见其行李甚多，以为必有油水可榨，翻箱倒篋，所见无非是书，税吏们一见索然，相与置之而去。

书之赐

宋代许棐隐居秦溪，筑小庄于溪北，储书数千卷，丹黄不休。尝曰：“予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

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均为一贪，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苦，不若贪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义而富贵者，书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人不鄙夷予之贫，鬼不揶揄予之贫，书之赐也，如彼百年何乐之有哉！”

《得书图》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嗜书至笃，他每得一奇书，往往要请画家为之画一幅《得书图》。其《襄阳月夜图》是为得宋刻本《孟浩然诗集》而作；《三径就荒图》是为收到蒋篁亭所藏的宋刻本《三谢诗》而作；《蜗庐松竹图》，是为得到宋板《北山小集》而作；《鱼元机诗图》，是为得到《咸宜女郎诗集》而作。他把这些画编纂成册，名为《得书图》、《续得书图》、《再续得书图》，可惜后来都散佚殆尽，至今仅能考见上述数种画名。

所传者唯是矣

清代徐乾学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木为櫺，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尝慨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工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唯是矣！”

生儿即以周官字

清人吴騫嗜书甚笃，他每购得一部心爱的古籍之后，或专刻一印章，如“临安志百卷人家”；或借书名来为其藏书处命名，如他得到宋槧本百家注《东坡先生集》，便为其藏书处取名“苏阁”；或以书名作为自己儿子的字号，如他的次子吴寿肠，字周官，号苏阁，周官和苏阁都是以所得书而命名的。就在吴寿肠出生的那天，正好吴騫得到一部宋刻本《周礼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兴奋之余，就为儿子取字为“周官”，因为《周官》系《周礼》的别称。叶昌炽有感于此，写下了“生儿即以周官字，俾守楹书比孝辕”。

不可与君共赏鉴

清代王定安曾得宋刊《孟子》一部，向陈其元炫耀。陈请一观，则先令人背出一椟，把椟打开，里边藏一楠木匣，把木匣打开，才看见书。书的纸墨古色古香，所刻的笔画，却与当时流行的监本没多大区别。陈其元问：“读此可增智慧吗？”答：“不能。”“可较别的版本多记数行吗？”答：“不能。”陈笑道：“这样的话就不如去读监本，何必费百倍的价钱买它呢？”王定安恨恨他说：“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忙把书收藏起来。陈其元大笑而去。

祭苏盛典

近人傅增湘很仰慕他的四川先贤苏东坡，不但取他的诗为藏园命名，而且刻意搜藏宋版的东坡诗集。其中“王状元集注本”，宋刊本传世的虽有四五种，藏书家能有其一，已是珍若拱璧，傅增湘多年搜访，竟独得其三。他

兴奋地在东坡生日那天，特地邀约四川同乡在藏园举行祭苏盛典。他还于每年的岁暮除夕之前，在藏园举行祭书之典，邀请三五同好以书会友，出示一年所得珍本共相赏析题咏。

善观书者之法

赵子昂《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作枕，勿以夹制，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

儒家唯此耳

北宋司马光藏书甚丰，对图书也非常珍爱，每次翻书之前，定把几案拂拭干净，铺上茵褥，把书放得端端正正，然后才坐下看书。他还专门做了一个木制方版，每当他要一边踱步一边看书时，他就将书放在这个方版里，用手捧着方版看，唯恐手上的汗渍会沾到书上。每当他看完一页，就用五个手指把住书页，轻轻地抚平翻过，所以书上没有一点折皱的痕迹。他还郑重地教导儿子也要爱书：“贾豎藏货贝，儒家唯此身，当知宝惜。”因此之故，司马光晨夕所阅读之书，虽经几十年，仍新若手未触。

舒被覆书

南朝人虞和家境贫寒，得书不易，甚知爱惜。一夕下雨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

陶装

近人陶湘讲究赏鉴艺术，每部藏书都要求形式的尽善尽美，凡有缺页断烂，陶湘必购求旧纸，雇用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由于书贾经常割裂挖补、造伪获利，因此陶湘对于已收藏的书，如发现有更好的版本，便不惜一易再易，务求其美观大方、序跋无缺、封面完整而后已。如有必要重新装裱的，更不借重金讲究。傅增湘曾描述所谓“陶装”如下：“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

周叔弢藏书五好

近人周叔弢藏书有“五好”的标准：一、版刻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张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题跋好，等于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装演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借 书借书一痴 还书一痴

南宋藏书家周輝有“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说。周輝所藏之万卷书，多自己手抄，后因借人阅读而散失颇多，内心不无耿耿，故以“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语以表达内心之不满。

四痴

《资暇集》云：“借书籍俗”，谓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

痴本甌也

宋人言“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实是从“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变来。甌，盛酒器也。何蘧《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鲁直诗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诗云：“休言贫病惟三篋，已办借书无一鸱。”以一鸱为一甌。借书一甌，还书一甌，后误甌为痴，殊失忠厚之气象。

不还亦一痴也

刘祈有言：“昔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故世之士大夫，有书多秘之。亦有假而不归者，必援此。余尝鄙之，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己之见闻？果如是，亦狭矣。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亦一痴也。’”

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

明代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所以，他非常乐于借书于人，只要是喜欢读书者，不管是谁向他借书，他都尽力满足。钱谦益记述说，他每次向李如一借书，“未尝不倒度相付也”。“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

传布为藏

明代徐 主张传布为藏，谁到他家来借书，他总是先设茶招待，然后拿出来给人家看。来借书的人，有的看一天，有的一连看几天或十几天，他从来不厌烦。他总结出借书给人的三大好处：一是读者要寻查的内容，自己也可以随时记下，并能经久不忘；二是读者翻阅了久久不动的书，有利于防止虫害；三是能因给读者查找图书，趁机整理藏书，以防养成懒惰习惯。

钱谦益书不借人

昔曹溶游长安，堂上列书六七千册，钱谦益间日必来，来则遍翻架上，遇所乏，恒借抄，如是数四。曹溶私冀异日遂可借钱谦益书，尝请曰：“先生必有路振《九国志》、刘恕《十国纪年》，南归幸告借。”谦益许诺。后曹溶向谦益借此二书，疾应曰：“我家无此书。”曰：“我家无此书，曩言者妄尔！”钱氏绛云楼遭火灾，藏书尽毁，曹溶往吊其灾，坐久，谦益忽自叹曰：“我有惜书癖，畏因借展转失之，子曾欲得《九国志》、《十国纪年》，

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矣！使抄本在，余可还抄也。”曹溶不乐而退。

借书不得逾半月

明末清初黄虞稷与另一藏书家丁雄飞曾订立古欢社约，相约互相借书，“或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他们规定每月十三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二十六日黄虞稷去丁雄飞家。“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

借书之道德

北齐颜之推言：“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江禄借书人不厌

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帙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

九经各有数十部

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每炫本多，是为借人书而不还者。

鬻及借人为不孝

唐杜暹家书末自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则世人谓之为过矣。

罚不与祭

范氏天一阁阁下悬有范尧卿手悬之禁牌曰：“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

正本不得出密园

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谓：“子孙取读者，就室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

誓不以假人

陈宏绪曾嘱王唯士代他假其岳丈焦弱侯书数种，王唯士说：“焦氏书，誓不以假人。言之无益。”

借书不还

吴騫藏《明史稿列传》久矣。邵予桐见而极爱之，借阅累年，后竟携以入都，屡索不还。吴騫嘱武陵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

索书几至面赤

张思孝藏有《绛云楼书目》，吴翌凤尝借阅。张思孝怀疑吴翌凤藏匿不

还，索要甚急，几至面赤。吴翌凤在《跋绛云楼书目》中说：“张子博雅好问，独于书斤斤护惜，古人所谓读书种子，习气未除，即此知张子能谨守弗替者矣。”

少有靳固即焚之

路仲显家世寒微，其母有贤行，教仲显读书。时新出一类书名《节事》，价数十金。大家儿有得之者，辄私藏之，因为仲显买此书。撙节衣食，累年而后致。戒其子曰：“此书当置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我即焚之矣。”

小娜嬛扃钥甚严

小娜嬛，陈恭甫藏书处也。秘册遗文，多闽中藏书家所未有。施可斋曾寓陈恭甫家，扃钥甚严，不能借读。惟旁室中藏其自著《左海诗文集》板，《经解》及《波山志》印板，反覆摹读，手面俱黑，尝为仆从所笑。

未尝为辞

《南史》称崔蔚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来从假借，日数十帙。蔚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陈登原叹曰：“此以琐屑之事，登之正史，盖深许其不同流俗之盛德焉。”

有三等人不可借

钱竹汀云：“借为不孝，过矣。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还，一也；污损，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泽，择其人而借之，则贤子孙之事也。”

看范蔚书者恒有百余人

晋人范蔚有七千卷藏书，而且允许人们到他家看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范蔚待客热情，还为他们办置衣食。

宋敏求与春明坊

北宋宋敏求居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租值常高一倍。欧阳修曾向宋敏求借《九国史》，承不为难，非常感激。著名史学家刘恕为修撰《资治通鉴》，曾专门赴亳州宋敏求任所读书且抄，致患目疾。

愿借于人

明代宋咸熙《借书诗序》云：“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尽能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先君子藏书甚富，生时借抄不吝，熙遵先志，愿借于人，有博雅好古者竟能持赠之，作此以示同志。”

诸藏书家彼此互易

清代汪宪性耽蓄书，有求售者，不惜丰值购之。点勘丹黄，终日不倦。家有振绮堂，为藏书之所。与同郡诸藏书家若小山堂赵氏、飞鸿堂汪氏、知不足斋鲍氏、瓶花斋吴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皆相往来，彼此互

易。借抄借校，因得见宋槧元抄，不下数十百种。龚自珍有诗云：“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东问蠹鱼。”

梁鼎芬借书约

清光绪年间梁鼎芬立《丰湖藏书四约》，其中“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许借一本，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一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阅，不得借出。”还规定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

买 书

千金市骨

元代沈景春平生寡嗜欲，惟酷好收书。有别业在闾门，西去城仅数里。景春昔尝居之。人有挟书求售，必劳来之，饮食之，酬以善价。于是，奇书多归沈氏。昔人有以千金市马，得骏马骨，予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马至者三。景春嗜书，何以异哉？

脱妇簪珥酬之

明人胡元瑞性嗜古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至42，384卷，其余资则构二西山房而藏焉。

书赛良药

明末徐 曾得过一场重病，许久卧床不起。一天，他觉得病稍好了一点，想下床活动活动。这时，听说门外有个书商在卖书，赶紧叫人把他请到家里。那人卖的是一部元刻三卷本《丁鹤年诗》，他一见就爱不释手，不顾家人反对，用买药治病的钱买下这部书。待书商刚离开，他就倚枕读完全书，顿觉心旷神怡而倏然病已。

计叶酬钱

时末清初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当时流传这样一句民谣：“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病卧旬日

清初王士禛官都下二十余载，奉钱之入，尽以购书。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记》，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悒悒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王士禛自道：“古称书淫书癖，未知视予何如？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

风雪载书

清代张若筠好学，于书无所不窥。闻有异书，辄重价购之。或手自迻誉校勘，矻矻不少休。扬州某公，藏书为江淮间第一。其子孙不能守，君闻即冒风雪渡江。购得宋槧书数部以归。兄子崑，为作《风雪载书图》。一时名士，皆为之题咏焉。

得书于卖饬者担上

嘉庆庚子之秋，赵绍祖市得一画于卖饬者担上，展而视之，则赵善政著《宾退录》一书，数十页，散置其中，既零乱霉烂，不可收拾，乃别书于册，其灼然可知者，补之，不可知者，删之。陈登原谓：“此得于不应得之地，非深嗜笃好音，又安以察及之也？”

得珍籍于面铺

初，钱牧斋得《前后汉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因减价也。牧斋宝之，如拱璧。遍嘱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动，窃喜；因以数枚钱买之，而首页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获其首页，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饌，子之二十金，其书遂为完璧。其纸色墨汁，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

名人手稿降为杂纸

郁佩轩家在城东，去厉鹗樊榭山房不一里。传录其秘册尤多。厉鹗歿，其家出所著《辽史拾遗》手稿，郁佩轩以四十金购焉。中间缺五十页，百计求之不得。一日步至青云街，见拾字僧肩废纸，双钜麓。检视之，皆厉氏所弃。厉鹗平日掌录辽史遗事在焉。亟市以归，纷如乱丝，一一为之整理，适符所缺。

丁福保按目购书

丁福保早年读书江阴南菁书院，见院中藏书很富，如入二酉之室，适王都之市，为之目眩神荡。他默默地把院中所藏者，一一抄录下来，私祝它年果能处境较裕，必按此录存之书目尽得购取。所谓有志竟成，后来他居然坐拥书城，不仅书目中所有的他都有，并书目中没有的，他也置备了。

以田换书乃至夫妇勃谿

王佩诤家有良田，他为了购进大批珍本，竟把良田卖掉，以偿书款。他的夫人大不以为然，乃致夫妇勃谿。

买书成癖

谢刚主买书成癖，自谓倘自己知道明天要死，今天的书，还是要买的。

书与债

邓邦述先借债以买书，后卖书以偿债。

一万元买一部书

1934年，傅增湘以一万余元买到宋刊《周易本义》十四卷，算是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

抄 书

抄书家

古代书籍，流传稀少，交通阻隔，无力购致，更有秘本木刻，为世罕见，每多辗转迻录，藉存其书。宋之陈振孙、叶梦得，元之孙叔明、庄慕叔，其抄书掌故，最为世称。明代以后，此风愈盛。藏书家更别其抄本之名，曰吴抄（吴鲍庵），曰叶抄（叶与子），曰文抄（文衡山），曰王抄（王肯堂），曰沈抄（沈辨之）、曰杨抄（杨梦羽），曰姚抄（姚舜咨），曰秦抄（秦西岩），曰祁抄（祁尔光），曰毛抄（毛子晋），曰谢抄（谢肇淛），曰冯抄（冯定远等兄弟），曰钱抄（钱牧斋钱遵王等），更如朱性甫、冯己苍等，平日皆以抄书为课，无间寒暑。

官府抄书

唐文宗爱好典籍，因内府“篇卷散乱，难于检阅”，搜罗了公卿士庶之家的所有异书，设官员主持抄书事宜。抄书的人叫“御书手”。抄完藏于乾元殿，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视之，无不骇其广”。当时各地官府也抄书，抄书的人叫“书手”或“楷书手”，还有所谓“书令史”，也是官府的抄写者。

佣书

古代有代人抄书的书铺。他们雇有大批以抄书为职业的人，名叫“佣书”。佣书以抄书所入维持生计，生活颇为贫苦。

八十抄书

南朝人沈麟士的藏书被烧数千卷，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不灰心，仍然抄书，二三年后，“卷满数十筐”。

左手抄书

陆游自幼得未疾，以左手作字。性喜抄书，尝抄王岐公《华阳集》百卷，笔笔无倦意。

日抄五十纸

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录。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柳氏自备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抄；魏晋南北史，再抄。手书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永不忘

衡阳王筠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以备遗忘。贺玠曰：“殿下家富《坟》、《索》，何复须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抄，则永不忘。”

抄书有三益

明代吴应箕谓手抄有三益：先经抄一遍，于记诵亦易，益一也；可以校书之误，收已之放心，益二也；常抄，则手法易熟，即以当学字，益三也。

贫儿暴富

苏东坡《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

雇二三十人抄书

范钦从子范大澈嗜书，月俸所入，辄以聚书。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

十指如槌

明代谢肇淛见书便爱，无奈薪俸有限，无力全买，乃手自抄写。一次，他客居京城，当时书价昂贵，还要花钱住店，无力买书，就托人从内府借来一部书，在旅店里昼夜不停地抄写。每清霜呵冻，十指如槌，几二十日始竣。

影宋抄

明末毛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毛晋雇用了许多人为他抄书，有“家蓄奴婢二千指”、“入门僮仆尽抄书”之说。钱叶互抄

清代叶林宗笃好奇书古帙，搜访不遗余力。每见案头一帙，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钱遵王与他是好友，两人获得秘册，即互相传录。虽昏夜叩门，两家童子，闻声知之，好事极矣。林宗歿，遵王为之恸哭。

朱彝尊偷抄钱氏书

钱遵王撰《读书敏求记》，凡六百种，皆记宋版元抄，及书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依类载之，秘之枕中。朱彝尊典试江左，与遵王会于白下，求一见之，终不肯出。彝尊乃置酒，召诸名士高宴，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篋得之。雇署廊吏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一卷。词既刻，遵王渐知，彝尊设誓以谢，曰：“不流传于外人！”时人不以彝尊偷抄为过，谓之“雅赚”。

抄书识官印

明初叶盛，做官数十年，未尝一日停止抄书，“虽持节边徼，必携钞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

彩鸾写唐韵

古今女子抄书多者，以吴彩鸾为最。《列仙传》云：“吴猛之女彩鸾，遇书生文箫于道，竟许成婚，箫贫不自给，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复写。如是一载，稍为人知。遂潜往兴新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峰峦而去。”

偏好固莫捐

清代严豹人，“自其少也，即以书为性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秘本假之传抄。故自寻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目录中未载者”。可惜，他身体欠佳，抄书过累即病倒。但他自为诗说：“自知身有病，不作长久计，偏好固莫捐，聊尔从吾意。”以示为书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钞书堂

清初的黄宗羲，家藏图书读尽之后，先后至世学楼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丛桂堂郑氏、传是楼徐氏等著名藏书家抄书，且名其藏书室曰“钞书堂”。

以名刺抄《汉书》

梁朝藏逢世年轻时爱读《汉书》，苦于向别人借书不能长期留阅，就从担任湘东王记室（秘书）的姐夫刘缓那里要来了许多客人来访时留下的名刺，利用名刺的空白，手抄了一部《汉书》，时时攻读，后来竟成为一名以通晓《汉书》见称的学者。

九千与一之比

张冷僧与金雪滕交捻，冷僧尝告雪滕，生平手抄书九千卷。雪滕曰：抄书一卷，必增一分智慧，抄九千卷，智慧增九千分。我懒散并一卷书而未抄，则智慧当逊君远甚，但我虽疏陋，与君相较，以乎非九千与...之比。可见君之慧根，尚不及我也。

守书与散书守书之难

黄宗羲云：“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旧家巢燕飞他家

近人陈登原称：“盖使藏书家能久其所藏，则珍秘所藏，犹有可说。然而不幸其珍秘之结果，无非供不肖子孙之挥霍而已。人情孰不私其子孙？然子孙决不能永保有所私。于是旧家巢燕，纷纷飞入他家。其间移转主者之际，即为艺林一厄；而荒山灵鬼之哭者，更无论也。”

不肖子弟有三变

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尝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货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隶而食也。”

献书以求官

唐代杨浑之因宰相段文昌喜图书古画，便“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段文昌就保荐他为官。

要书不要官

宋代王廉清，其父铨富藏书。铨死，秦嘉恃其父气焰薰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廉清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熏亦不能夺而止。

他年若不和花卖

宋代陈亚藏书一千余卷，名画一千余幅。晚年复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作诗诫其后云：“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我家好子孙。”亚死，悉归他人。

用以为炊

宋代江正聚书数万卷，筑室贮之。正既歿，子孙不能守，悉数落于人间。火燔水溺，鼠虫齧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籍物。有张氏者，所购最多。其买乃用以为爨，凡一筐者，为一炊饮。江氏书，至此穷矣。

剪书裱鞋帮

元代孔克斋家多蓄书卷，平昔爱护尤勤，必告于先人，得所请，乃可置于外馆。晚年，子弟分职，任于他所。惟婢辈几人在侍。一日，孔克斋自外家归省，见一婢持《选诗演》半卷，又《名公柬牍》数幅，皆剪裁之余者。急叩其故，但云某婢已将数卷裱鞋帮，某婢已将几卷覆酱瓿。

屋梁落月照鱼罾

元末虞堪藏书甚富。其后代虞权家益贫，斥卖先世故物，以供衣食。权死，虞堪遗文及所藏词翰无虞数筐，妻子以鱼罾裹置屋梁，久之并其罾亡矣，征文献者为三叹焉。

权其斤两而卖之

阿育王山房多藏本，其后子孙无聊，尽以遗书为故纸，权其斤两而卖之，虽先集亦与焉，遂荡然无一存者。

天一阁藏书最寿

私人藏书之寿者，莫寿于范氏天一阁。至今垂四百余年，其残余犹有存者。天一阁之子孙，虽未曾货卖其书，然清季时缪荃荪登阁阅书，范氏子孙之为招待者，竟不解抽书为何事。

田亡书散

明代王世贞喜收书，尝鬻田一庄而得《汉书》。藏书三万卷，构藏经楼贮之。不五十年，尽归他姓。

为门生辈窃去

明代万卷楼主丰坊晚得心疾，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丧失其家殆尽。万卷楼上之书，凡宋槧与写本，为门生辈窃去者几十之六。其后又遭大火，所存无几。余书为其子孙卖与范钦。

令荡子嬰妇无复着手

明杨循吉既老，知其藏书子孙不能守，乃散书与亲故，云：“令荡子嬰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

以书版作薪煮茗

明代毛晋性嗜卷轴，曾张榜购书，计叶酬钱，因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之谚。又喜刻书，有“毛氏之书满天下”之谓。前后积书至八万四千余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贮之。但其藏书在清初时已告困厄。相传毛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版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更佳也。”遂按日劈烧之。

减价售之

明代金华虞参政，生前藏书数万卷，传到他的后辈手里，竟以数艘大船载到当时藏书颇有名气的胡元瑞家出卖，胡因一时拿不出那么一笔钱来，不肯留下，书主便托人从中斡旋，“减价售之”，以书价不到原值的十分之一成交。

黄虞稷能守先世书

明末黄居中少好读书，老而弥笃，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藏书千顷堂中，约六万余卷。居中次子黄虞稷继之，能守先世之藏书，夏必暴，蠹必简，犹时时借人藏本，稽其同异。并岁增月益，不下数千卷。以千顷堂藏书为基础，黄虞稷编成《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

聚散无常

清人黄庭鉴云：“国初以来，大江南北，藏书者踵起。而吾虞之钱氏毛氏，实为称首。然皆不再传而失之。他如昆山徐氏，泰兴李氏，维扬马氏，

澹生之祔，小山之赵，皆随聚随散。”

曝书亭一朝变桑田

清代朱彝尊之曝书亭，藏书八万卷之多。然至其孙稻孙时，贫不能守，即渐归散佚。据阮元记述：“曝书亭久废为荒田，南北垅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瓷，而荷耜犯此地者，其人辄病。”

化蝶飞去

清代冯班藏书万卷，子孙不能读，且不知爱惜。即宋元精版嘉书，尽化为蝴蝶飞去。

以书抵债

瞿琴山馆主刘疏雨，藏书甚丰，他去世不久，他的儿子挥霍无度，债务缠身，就以十万卷图书押给债主作抵。有人因作诗叹道：“自古图书厄，多经劫火亡，未闻豪贵夺，举作债家偿。”

近代藏书家的散书

叶德辉曾说：“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近代藏书家尤其如此。如王胜之的栩园藏书“论秤而尽”；魏建勋燕营巢的身后萧条；吴痒的“校抄辛苦成底事，换得袁氏头八千”；刘声木的晚境艰窘，“欲以书易米，而冷集居多，亦尚少问津者”等等，藏书都如朝露，瞬间烟消云散。

三友别

近人盛伯希藏宋版《礼记》四十本，苏黄合璧寒食帖一卷，刁光胤牡丹图等，号称三友。逝世后，其养子善宝以一万二千元将三友让归景朴孙。

书 厄书有十厄

隋代牛弘曾说：“书有五厄。”第一厄是秦皇的“焚坑”，第二厄是西汉末年的赤眉入关，第三厄是东汉末年的董卓移都，第四厄是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第五厄是南朝梁时周师入郢。明代胡应麟又提出隋以后的“五厄”，即：炀帝见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为第一厄；安禄山入关，明皇奔蜀，书籍损失殆尽，为第二厄；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僖宗出走，书籍亦遭焚毁，为第三厄；北宋靖康二年，金人入汴，徽、钦二帝被掳，所有图书，散佚无算，为第四厄；南宋德祐二年，伯颜南下，军入临安，图书礼器，掠走一空，为第五厄。

艺林四劫

近人陈登原以为古往今来书厄不可胜计，决不止如牛弘所言五厄，亦不必如胡应麟之足成十厄。他把性质相近的比属而论，推出书有四厄：一、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二、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弃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即政治、兵燹、藏弃、人事，所谓艺林四劫。

商鞅燔《诗》《书》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进程中发生的“燔《诗》《书》”一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禁书事件。商鞅变法大约始于公元前356年。据《韩非子·和氏》篇记载，变法的内容中有一项是“燔《诗》《书》而明法令”。其目的大概是为了防范上层人物的文弱化，保证他一手制定的变法措施能够畅行无阻而不惜焚毁儒家典籍。商鞅“燔《诗》《书》”的规模和范围虽然不一定宏大，但它那种对文化典籍极端仇视的态度，却在西北秦地发展为以焚毁图书为形式的粗暴的禁书传统，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禁毁图书的先河。

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官方禁书事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213年，亦即秦吞并中原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的第九个春秋，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席间博士淳于越主张学古法，行王道，施仁政，分封诸侯，遭到丞相李斯的反对。李斯认为，儒生以古非今，各尊私学，诽谤朝廷，惑乱人心，不利政令贯彻执行。他主张禁私学，焚诗书。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遂下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以吏为师”。一时间，焚书之火燃遍大江南北。次年，又将御史指控犯有“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六百六十余名儒生一次掘坑处死。这两起惨案，史家称之为“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使得官方与民间所存的先秦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殆尽，造成了先秦历史的模糊和后代学术分歧，并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实为中国书史上一次旷世浩劫。

项羽纵火阿房宫

秦所焚毁者只是民间私人的藏书，政府和博士官的藏书都还保存在秦宫

室。公元前 206 年，项羽为争王位，引大军四十万攻入关中，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致使西汉初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故后代有“秦虽焚书，其焚未尽”，“书亡于项羽”之说。

王莽长安大火

汉初，仍禁止民间藏书。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汉武帝鉴于秦焚书的教训，鼓励民间“献书”，由政府第一次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经过广泛征集，民间藏书陆续献出，政府藏书大增。“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后至王莽之乱，中秘所藏，焚烧无遗。

董卓移都荡洛阳

东汉初年，光武帝迁都洛阳，从长安把部分皇家藏书迁往洛阳，藏在兰台、石室，并在全国征集图书。四方儒生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以后几代皇帝亦多爱典籍，使东汉自光武聚书以后，书增三倍，以数计之，当为六千余辆。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恣纵士兵大肆劫掠，致使朝廷在兰台、石室、东观及仁寿阁所藏图书缣帛尽遭洗劫，损失极大。士兵们把图书缣帛或做帷帐、车篷，或做提囊、口袋。劫后所剩图书运往长安者仅七十余车。

永嘉之乱

魏晋藏书事业又有发展。魏继续采集遗亡散失在各地的图书，并派秘书郎郑默进行整理。西晋时再加搜集，晋武帝令秘书监荀勖负责整理秘阁藏书，编出《新簿》，著录图书 29,945 卷。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113 年），匈奴族首领刘聪遣部将刘曜、石勒攻陷洛阳，俘怀帝，纵兵大掠，文物荡然。史称永嘉之乱，又叫刘石乱华。

梁元帝焚书十四万

南朝文化发展，未曾停顿。梁元帝萧绎平侯景之后，收文德殿藏书及公私秘籍七万余卷，又曾特地派人到洛阳书肆购书，据说他在江陵的藏书达十四万余卷。公元 555 年，西魏宇文泰与肖警合兵攻破江陵。梁元帝在投降前夕，命舍人高善宝把所聚图书十四万卷付之一炬。人问何意焚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隋炀帝焚纬书

南北朝以后，堪与秦始皇之焚书相媲美者，为隋炀帝之焚纬。纬书出于汉哀平之世，盖夏贺良之徒为之，以为有经则有纬。王莽好符命，光武帝刘秀以图讖兴起，故东汉以后，讖纬之学盛行于世。宋、梁之际，屡屡禁之。公元 605 年，隋炀帝即位后，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乃在广陵演出了焚书三十七万卷的壮举。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次年，

安禄山入关，两都陷落，六万卷藏书毁灭殆尽。以至后来修史连参考资料也找不到，只得重加赐赏，征集《国史》、《实录》等书，而数月之内仅得一两卷，可见损毁之惨重。

王都自焚

五代后唐定州节度使王都，在后唐灭梁之初，用金帛搜购图书至三万卷。天成四年（929年）王都反叛，被后唐军击灭，他纵火自焚，一夕之间府库化为灰烬，藏书也随之毁灭了。

李后主焚书

南唐后主李煜淫侈无度，却好图书。公元975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李后主吩咐掌管宫中图书的黄氏：“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金陵陷落之日，南唐宫中的图书和书画名迹果然被焚毁了一大批。

秦桧禁野史

宋代秦桧当国时期，自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初起禁野史。秦桧之所以搞文字狱，赵翼以为：“……（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唯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秦桧焚书前后达十一年，虽为时短暂，为祸很厉害。绍兴十五年七月，仅李光一家就被焚书万卷余。另据王明传所记：“……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具圆备。秦桧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率皆更易禁弃。由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结果是：“逮擅以来，十五年间，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辞，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靖康之变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渡黄河向北宋大举进攻。次年，即钦宗靖康元年冬，金兵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又次年四月，金贵族于大肆勒索搜刮后，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北去，东京城中公私蓄积为之一空。据史称：“秘阁图书，狼藉泥中。有史以来，安禄山陷长安以后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甚。二百年来蓄积，自是一旦扫地！”私家藏书也由于兵乱而损失惨重。譬如晁公武家“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叶梦得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以藏书独富著称的江浙，也因“胡骑南骛，州县悉遭焚劫，曩时藏书之家，百不一存，纵有存者，又皆零落不全”。

金元亦禁书

金、元当朝亦未忘禁书。据《元史·刑法志》：“大恶，诸妄撰词曲以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甚至议论禁书也有罪，即所谓“诸妄言禁书

者徒”。

明代焚禁书

明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开国时就有文字狱。传至成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太祖曾有令：“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明成祖更进一步，“命儒臣辑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读书人只能读这套书，不准违犯。饶州儒士朱季友，诣阙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成祖阅后怒曰：“此儒之贼也。”命有司声罪杖遣，焚其所著之书。永乐年间，成祖命解缙等整理封存多年的建文朝的图书以及文书档案，凡有关于农桑礼乐者，可继续保存；然凡是涉及到“靖难”之事的，均付之一炬。

清代文字狱

清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累兴文字狱，禁毁违碍书籍。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就有几十起大小文字狱。成千上万人遭迫害，许多著作被焚毁。他们还往往假借征集、审查、编纂书籍之机，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查禁销毁违碍图书。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把图书分为全毁和抽毁两类，经他认可需要全毁或抽毁的书目就达三千多种，曾经数次颁布全国，下令缴送销毁。据《咫进斋丛书》所载的违碍书目，就分为全毁、抽毁、禁绝、违碍四类，共2,413种。又据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记载，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先后奏销书籍达24次，共收应毁书籍68,339块，共计焚书538种，13,862卷之多。其他未焚而经抽毁及改易字句者不计其数。从间征集的大量图书，仅一半收入《全书》，另一半均被销毁，损失极为严重，许多书籍竟因而亡佚。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外患

我国的图书典籍，不仅因内乱遭致重大损失，外患也给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除明末的倭寇之患外，只清代，就有道光时的鸦片战争、咸丰时的英法联军、光绪时的八国联军。以鸦片战争为例，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军侵入宁波，经过洪杨之役后的天一阁又遭大难。英军入甬，登阁劫夺，掠走《统一志》及其他珍本，使天一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我国典籍造成严重灾难，圆明园的文源阁于1860年为英法联军纵火焚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无片纸留存。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号称中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惨遭散亡，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水灾

历代因水灾而使书籍惨遭厄运者不胜枚举。如隋炀帝聚书号称七十二万卷之多，而唐兴之时，运其书往长安，装船溯黄河西行，途经砥柱，舟队大多翻覆，十不存一二。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亦以舟运洛阳兰台、石室藏书。途遇盗寇，舟队大多沉于黄河，仅数舟存还，损失甚巨。北宋神宗时大臣富弼性好藏书，甲子岁洛阳闹水灾，他家藏书万卷遭淹。清代孙星衍载书过南阳湖，舟覆，书数十麓尽沉湿。明清之际黄宗羲则先遭大水，又逢大火，使藏书损失大半。

火灾

火灾比之水灾，更使图书典籍遭致巨大损失。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 年），荣王宫失火，延烧至崇文院，抢救不及，致使藏书所剩无几。南宋叶梦得有书逾十万卷，建有华丽的藏书楼，后毁于一场大火。同时代另一藏书家李光，人称其“无书不读，蓄书至数万卷”，亦在该年因失火而亡失无存。宋敏求家藏书达三万卷，也因火灾而烧光。明英宗正统己巳（1449 年），南京大内失火，文渊阁焚毁，藏书无存。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北京紫禁城失火。世宗下死命令一定要把《永乐大典》抢救出来，其余图书只能置之不顾，以致损失惨重。明代私人收藏因火受损者亦比比皆是。南京户部尚书边贡藏书不下数万卷，某天家中失火，藏书全部烧光。从此一病不起，卒年仅 57 岁。清仁宗嘉庆二年（1797 年），乾清宫失火，贮藏于“五经萃室”的极其珍贵的宋刻《五经》无片纸存留。嘉庆十年（1805 年），江宁学宫失火，其尊经阁中所藏的《廿一史》、《玉海》、《江南通志》等木刻底版均被烧毁。清代私人藏书遭火的则有钱谦益绛云楼、马思赞道古楼等。

华佗烧书

三国时，华佗为曹操医治头风病，获罪下狱，临死前，出书一卷，与诸狱吏说：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华佗亦不勉强，索火烧之。另据民间传说，狱吏曾将此书带回家中，其妻恐曹操知而问罪，故烧之，经狱吏抢救，仅内容为“五禽戏”的部分得以存传。

西河夫人烧书

清代毛奇龄，人称毛西河，夫人极犷悍。西河藏宋元版书极多，摩挲不忍释手。夫人病之，谓此老不惜米盐生计，而搬弄此花花绿绿者何为也？一日，西河出，竟付之一炬。

书展与读书周

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每届书展参加国要有 90 个以上，出版社 5,000 多家。但它最初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949 年举办时，只有西德自己一个国家的 205 家出版社参加，非常简陋。法兰克福书展交易最繁忙的是美、英和欧洲国家出版商的专柜。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法兰克福书展，要进行正式的国际合作出版和国际交易是不可能的。

伦敦书展

伦敦书展最初举办于 1971 年，每年春季举行，展期三天。以小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为主，是世界专业出版社书商商谈生意的一个场所。

波洛尼亚儿童书展

世界最大的儿童书展是被称作“春季的法兰克福书展”的波洛尼亚儿童书展。该书展每年春天举办，届时世界各国比较大的儿童出版社都会云集意大利，数量常在 900 家以上。

美国出版商协会书展

美国出版商协会书展被称作美国的“书节”。它每年举行一次，地点每年都有变更，几乎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都来参加展销，书商则来此选定购买来年的图书。世界各国的出版商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由于该书展英文图书品种繁多，美国又是出版大国，其规模被认为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

耶路撒冷国际书展

耶路撒冷国际书展是一个具有浓厚地方和宗教色彩的“图书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尽管组织者希望把它办成世界数一数二的书展，但由于以色列远离欧洲，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不少出版社不便或不愿参加。

开罗国际书展

开罗国际书展主要是向埃及读者提供图书的展销会。它的国际性体现在设有特别展厅供外国出版商展览图书。每年举行一次，每次约有 500 余家出版社参加。对于出版阿拉伯文书和英语廉价国际版书的西方出版商，吸引力在不断加强。

莫斯科国际书展

莫斯科国际书展始于 1977 年，每两年举行一次，近期书展参加国均有八十多个，出版社约二千家。一般的国际书展都是采取各国出版界自由结合的形式进行商谈，莫斯科书展则不论任何商谈都以苏联为一方，参加书展的外国出版社为另一方进行谈判。

华沙国际书展

华沙国际书展的特点是主要展出科技、理工、医学等方面的专业学术图书，1983 年的一次书展有九百家出版社参加，包括很多西欧国家的出版社。

华沙书展已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书展。

新德里世界书展

新德里世界书展每两年举行一次。作为世界十大图书出版国之一的印度自称其出版量占世界英文图书出版量第三。本书展仅是一个展销会，不进行通常的版权交易。

布鲁塞尔国际书展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书展每年举行一次，租用国际中心大厦的两个楼面作为陈列场所，是个舒适的小型书展。有人以为，这个书展不如说是在出售各种文字的出版物更为合适。规模虽小，但每次均有上千家出版社参加。

日本的读书周

日本每年的读书周定在 10 月 27 日到 11 月 9 日，每年的读书周均有口号竞赛、象征物、不同的书展、征文比赛等。例如 1983 年的口号为“读书是新发现的旅行”，象征物是猫头鹰。

英国的图书周

英国的图书周是由英国出版商协会赞助筹办的。其活动面向青年学生，通过各种活动，号召青年人多读书，为社会服务。

美国的图书馆周

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在 1958 年 3 月 16 至 22 日举办了全国性的图书馆周活动，并号召人们广泛参加。这年，美国有五千多个城镇的图书馆和当地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第二年，加拿大图书馆界、出版界与美国同时举行了这一活动。美国图书馆周活动还有自己的口号。1963 年的口号是：读五十本书；1973 年的口号是：读书使你进步。1975 年，图书馆周被定为法定的纪念活动。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周

澳大利亚有一年一度的图书馆周，为图书馆周绘制的宣传画颇为吸引人。

读书方法名家读书十法

一、培根的“酿蜜法”。我们不应该像蜘蛛那样在肚里吐丝，而应该像蜜蜂那样，采百花酿甜蜜。

二、华罗庚的“厚薄法”。书由厚变薄是阅读能力提高的标志。

三、陈善的“出入法”。既能钻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

四、鹿善继的“认理法”。读有字书，识没字理。

五、克尼雅日尼的“有无法”。要读懂书上所没有的东西。

六、朱熹的“三到法”。读书要口到、眼到、心到。

七、王充的“古今法”。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

八、子思的“五之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九、韩愈的“提要钩玄法”。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十、孔丘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新式阅读法

通常的读书方法有浏览、泛读、通读、精读、背诵、作提纲、作笔记等，此外，有人总结出几种不太为人注意的读书方法：

标题阅读法。反复琢磨阅读材料的全部标题，分析标题之间的关系，然后牢牢地记住标题；

跳读。在一本书中，尽量跳过一些无关紧要的或自己已经了解的章节；

楔入式阅读。从书中某处单刀直入，向前后逐渐开拓。也可以以书中某一问题为起点开始阅读，随后引出其他一连串的有关问题，全部的阅读活动以解决这一连串问题为目标；

交叉式阅读。不顾全书的章节次序，从多处随意穿插阅读；

逆读。从书的最后章节向前读去。

读书五错

元代文学家袁桷，认为读书不好大凡有五条过错：一、广泛阅读而无所选择。错在读得多而很少掌握要领；二、爱好古人言行，但自甘不如。错在知难而退。三、一件事未做完又换做别的。错在有头无尾，劳而无功。四、想赶上别人，却往往落后。错在好高骛远。五、喜爱作文章却不愿先打好扎实基础。错在不肯下苦功夫。

吃书

朱熹曾是庐山白鹿洞书院之主，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大家见他伏案苦读，书页边都是黑的，有的成了碎片，有人脱口而说：“这书真是‘吃’过一般。”朱熹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当下就向学生们宣讲了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条学规，这就是讲究“吃”书。他说有两种“吃”法：一是如牛，大嚼大咽，然后反刍；一是如人，细细咀嚼，慢慢品尝。必须两者结合起来才行。

读书·看书·味书

杨重子《草堂之灵》“重读书”条载；湘绮（指王闿运）云：“张文襄是看书人，不是读书人；曾文正是读书人。此语至精。所谓读书人者，能通经以致用；看书人者，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谓记问之学，博杂无归者。”其实读书、看书，旧时原就是两样功夫。明宋懋澄则云：“年来

神散，读过便忘，然必欲贮之腹中，犹含美饌于两颊，而不忍下咽，我之于书，味之而已。”此却又是一番隐士情怀，正可与陶令之“好读书，不求甚解”互见。

读书譬如食味

王龙谿说：“读书譬如食味，得其精华，而汰其滓秽，始能养生。若积而不化，谓之食痞。作文譬如传信，书其实而略其游谈，始能稽远。若浮而不切，谓之绮语。所谓无益而反害也。”

少而精熟

明人胡敬斋云：“读书虽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书虽精熟，又要实体会，方有得。”

止熟数篇紧要书

明人蔡虚斋云：“欲为一世经纶手，止熟数篇紧要书。”

读无字之书

清人张潮说：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花月亦书也。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

热则昏矣

清人陈灌说：心要常虚明而不可热，热则昏矣；非特名利之心不可热，著述之心亦不可热；常湛然朗然，超乎万物之上，而后可以读书，可以著书。

郑板桥论读书

郑板桥“少颖悟，读书饶别解”。他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还应“探”、“研”，“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所穷”。“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百卷，只是一条钝汉尔。”“读书好问，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如此，方能“疑窦释然，精理迸露”。

一目十行与十目一行

近人陈友琴谓读书一目十行，这是所谓才子吓唬人的，凡是求读书真正有所得的，还须十目一行才是。

勿贪多

沈瑜庆少好买书，其父葆楨诫之曰：“读旧书自有新得，勿贪多也。”

悟

昔王于一自谓读书三十年，方悟惭愧二字。余天遂自谓读书四十年，方悟一通字。

读书者·思考者·观察者

鲁迅曾比较读书者、思考者、观察者三种读书法的高下。“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较好的是思考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书是一张网

以编辑《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驰名文坛的赵家璧认为，众多的文学作品看起来像一张乱蛛网，其实蛛网再大、再乱，也都只有一头一尾，读书就是将这“头”、这“尾”以及其间的网络琢磨出来，为己所用。

书读四遍

唐弢说：我读一本书，每次读，都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读。如看小说，第一次读，看它怎样将生活变为艺术；第二次，则看主题、看题材；第三遍看表现手法；第四遍看语言。每次感受就不一样。

读书三境界

现代学者孙逊谓读书有三种境界，一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章台折杨柳，春日路旁情”（崔国辅《长乐少年行》），此谓之消遣性读书；二是“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王绩《野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此谓之功利性读书；三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此谓之积累性读书。

论书格言

- 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
——别林斯基
- 书籍是巨大的力量。
——列宁
-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莎士比亚
-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
——乌申斯基
- 书籍——举世之宝。
——梭罗
- 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
——别林斯基
- 书是唯一不死的东西。
——丘特
- 书籍使人们成为宇宙的主人。
——巴甫连柯
- 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
——卡莱尔
- 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
——普希金
- 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
——科洛廖夫
- 书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文化生活的源泉。
——库法耶夫
- 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
——史美尔斯

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雨果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惠普尔

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

——卡莱尔

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

——高尔基

书籍就像一盏神灯，它照亮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

——乌皮特

书籍具有不朽的能力。它是人类活动的最长久的果实。

——史美尔斯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列夫·托尔斯泰

除了野蛮国家，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

——福尔特尔

书籍乃世人积累智慧之长明灯。

——寇第斯

书籍能引导我们进入高尚的社会，并结识各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

——斯迈尔斯

书籍使人变得思想奔放。

——革拉特珂夫

书籍使人们成为宇宙的主人。

——巴甫连柯

唯书籍不朽。

——乔特

书籍使我们成为以往各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继承者。

——钦宁格

书籍是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世代相传，更是给予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的礼物。

——爱迪生

书籍是幼年人的导师，是老年人的护士，在岑寂的时候，书籍使我们欢娱，远离一切的痛苦。

——柯里叶尔

书籍是培育我们的良师，无需鞭笞和棍打，不用言语和训斥，不收学费，也不拘形式；……对图书倾注的爱，就是对才智的爱。

——德伯里

书是随时在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愿，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

——凯勒

一个爱书的人，他必定不致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

——巴罗

书籍是朋友，虽然没有热情，但是非常忠实。

——雨果

书籍是前人的经验。

——拉布雷

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

——高尔基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

书籍是少年的食物，它使老年人快乐，也是繁荣的装饰和危难的避难所，慰人心灵。在家庭成为快乐的种子，在外也不致成为障碍物，但在旅行之际，却是夜间的伴侣。

——西塞罗

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求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

——都德

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

——培根

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雨果

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

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

——赫尔岑

书籍——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
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

——威尔逊

书籍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基础，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的基础。

——茨威格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

——弥尔顿

书籍是培植智慧的工具。

——夸美纽斯

有创见的书籍传布在黑暗的时代里，犹如一些太阳光照耀在荒凉的沙漠上，为的是化黑暗为光明。这些书是人类精神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人们凭借它们的原则，向种种新的发现迈进。

书本是将圣贤豪杰的心照射到我们心里的忠实的镜子。

——吉本

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

——弥尔顿

书籍陶冶情操。

——博维

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

——赫尔岑

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遭遇和寿命。有的书毁于一旦，有的书却能流芳百世。

——马尔夏克

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兽性而上升到人类，更接近美好生活的观念，更热爱这本书。

——高尔基

我需要三件东西：爱情、友谊和图书。然而这三者之间何其相通！炽热的爱情可以充实图书的内容，图书又是人们最忠实的朋友。

——蒙田

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凯勒没有书籍，就不能打赢思想之战，正如没有舰就不能打赢海战一样。

——罗斯福

评价一座城市，要看它拥有多少书店。

——鲁宾斯坦

没有书籍的屋子，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

——西塞罗

图书包含着整个生活……

——巴尔扎克

图书出版业是思想重炮。

——布埃斯特

漫长的岁月，既毁坏了坟墓，又损坏了墓碑，可是光阴对于书却无能为力。

——瓦鲁阿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歌德

好书使人开卷时会有所求，而闭卷时获有益处。

——阿尔考特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

——狄德罗

任何一本书的影响莫过于使读者开始作内心的反省。

——卡莱尔

书是思想的产儿。

——斯威夫特

在我看来，最好的书是那些能够提供最丰富的思考材料的书。

——法朗士

书的真正目的在于诱导头脑自己去思考。

——莫利

书籍的唯一真正用处，是使人能自己去思考，如果有不能引人思考的书，便不值得占书架一席之地。

——拜耶

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

——鲁巴金

一本书最好的并不是它包含的思想，而是它提出的思想；正如音乐的美妙并不寄寓于它的音调，而在于我们心中的回响。

——霍姆斯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考越多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很少。

——伏尔泰

书……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志。

——马克思

要掌握书，莫被书掌握；要为生而读，莫为读而生。

——布尔沃

看书和学习是思想的经常营养，是思想的无穷发展。

——冈察洛夫

有时候读书是一种巧妙地避开思考的方法。

——赫尔普斯

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

——叔本华

书籍对于人类原有很重大的意义……，但，书籍不仅对那些不会读书的人是毫无用处，就是对那些机械地读完了书还不会从死的文字中引申活的思想的人也是无用的。

——乌申斯基

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但必须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开。

——富斯德

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

——歌德

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

——卢梭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读书时，我愿在每一个美好思想的面前停留，就像在每一条真理面前停留一样。

——爱默生

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

——富兰克林

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要比吃得更多的人更健康，同样地，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

——亚里斯提卜

拥有书籍就是教养的证据吗？果然如此，谁在教养上足与拥有满屋子书籍的书店主人抗衡？

——路基亚诺斯

如果使用得好，书是最好的东西；如果滥用了，书就是最坏的东西。

——爱默生

滥用书籍，则学问死矣。

——卢梭

书籍若不常翻阅，则等于木片。

——莎士比亚

世界上有许多好书，但这些书仅仅对那些会读它们的人才是好的。

——皮丁

谁都不会死读一本书，每个人都从书中研究自己，要不是发现自己就是控制自己。

——罗曼·罗兰

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

——彼特拉克

把一页书好好地消化，胜过匆忙地阅读一本书。

——麦考莱

有些书只需品尝，有些需要吞咽，还有少数的应该细嚼。

——培根

就一百个各种问题读一百本书，不如就一个问题读十本书。

——勃兰克斯

不要阅读信手拈来的书，而要严格加以挑选。要培养自己的趣味和思维。

——屠格涅夫

仅次于选择益友，就是选择好书。

——考尔德

生命是短暂的，空余时间很少，因此我们不应把一刻空余时间耗费在阅读价值不大的书籍上。

——洛斯金

在科学著作中，你最好读最新的书，在文学著作中，你最好读最老的书。

——布尔韦尔—利顿

过去读书，只顾贪多求快并不加选择。但令我震惊的是，我很快便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知。

——法朗士

我所读过的每本书都是精华，这使我不必去读几百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

判断一本书，我们是根据书籍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它上面的署名。

——车尔尼雪夫斯基

所谓好书是指其内容和你意见完全相左，但仍旧有所帮助的书。

——罗斯·麦唐纳

选书应和交朋友一样谨慎，因为你的习性受书籍的影响不亚于朋友。

——胡德

读书尤其忌讳毫无目的地狼吞虎咽和一味追求低级趣味。

——马卡连柯

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

——别林斯基

不读书的人就不可能算是一个完人。

——赫尔岑

有能力而不愿读好书的人和文盲没有两样。

——马克·吐温

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曾出现这种情况：我在悲痛时想在书中寻找安慰，而得到的不仅是慰藉，而且是深深的教诲，就像有人为了寻找银子，竟然发现了金子一样。

——但丁

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

——培根读书的方法不仅要根据读书的目的来改变，而且完全由后者来决定。

——波瓦尔宁

读书使人聪明，使人文明，使人上进！

——莫耶

读书越多，越感到腹中空虚。

——雪莱

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

——培根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

——培根

良书即益友，今明永如斯。

——塔帕

人的品格，可从他所读的书判断，犹如可从他交往的朋友判断出来一样。

——史密斯

老友宜信，旧书宜读。

——何拉谷亚诺洛芝

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把你戕害。

——菲尔丁

书的价值应以你在它里面所取得东西的多寡而定。

——斯威夫特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书，书里边描写最动人的地方便是书上的空白处。

——华梅

除非我们将由书本中得来的智慧变成行动，否则书籍只是废纸。

——波尔维

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

——培根

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书等于废纸。

——华盛顿

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

——伏尔泰

读之再读。你准会觉得奇怪，昨天不懂的东西，今天竟完全懂得了。

——于·列那尔

有些书是不该被人们忘却的；但不被人们记住的书是没有的。

——奥登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是用来记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的。

——爱因斯坦

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的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

——列夫·托尔斯泰

读书不作记号，等于不读。

——安东·阿列巴拉

不要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理。

——扬维纲

应该是书本遵循科学，而不是科学遵循书本。

——培根

求知时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

——培根

谁不专心致志地读书，谁就没有坚定的信念，遇事就会摇摆不定，即使他埋进书堆里，也仅仅是在它的表面滑行。

——弥尔顿

读书的艺术贵在于掠读。

——哈默登

要精通某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写一本有该问题的书。

——迪斯雷利

一本书，若只因为它是大出版家印行而去买它，无异于买一套由好裁缝做的但不合穿的衣服。

——波普

如果我有一点钱，我拿来买书；如果还有余剩，才买食物及衣着。

——伊拉斯莫斯

我有了面包和马铃薯便足以充饥，偶尔搞到一支蜡烛，能在夜里读书，便有升天似的快乐。

——左拉

我在书堆中，享受到了世界上任何君王都无与伦比的巨大快乐。

——薄伽丘

没有比读书更廉价的娱乐，没有比读书更持久的满足。

——蒙台居

如果只有书背与封面才是那本书最好的部分，那么，这样的书，世上何其多。

——狄更斯

所谓经典作品，是那些每一个人都希望已经读过，但没有一个人想去读的作品。

——马克·吐温

畅销书是平庸才能的金色墓场。

——史密斯

不好的书告诉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

——菲尔丁

一副毒药只能害人一次，一本坏书却能永远毒害人们的心灵。

——约翰·默里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

——刘向

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

——王符

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王豫

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

——陆世仪

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

——郑板桥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王盛鸣

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

——郑板桥

读书贪多，最是大病。

——朱熹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痛者也。

——王充

三日不读，口生荆棘；三日不弹，手生荆棘。

——朱舜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

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苏轼

为善最乐，读书更佳。

——阮葵生

必尽读天下之书，尽通古今之事，然后可以放笔为文。

——万斯全

但患不读书，不患读书无所用也。

——朱舜水

士大夫三月不读书，则义理失于胸中。

——黄庭坚读书能使人寡过。

——吕坤

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

——王安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刘彝

为学之道，莫先穷于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朱熹

未尝一日去书不观。

——韩愈

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陆游

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朱熹

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

——郑板桥

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

——黄庭坚

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一夫作一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

——阮元

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朱熹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韩愈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颜之推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

——朱熹

大凡读书，不能无疑。读书而无所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

——赵孟頫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孟轲

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

——郑板桥

读书要玩味。

——程颢

读书要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朱熹

读书当作两面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王梓坤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裴松之

读重要之书，不可不背诵。

——司马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

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书，也能害事。

——纪昀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程颐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潜

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

——赵匡义

藏书印

藏书印之由来

每一个爱好书籍的人，总愿将自己苦心搜集起来的书籍，好好保藏起来。在书上加钤藏书印，正是为了辨明书牒归属，以别他人之书。收藏书籍，加钤印记，通常多用私章，如“孙育私印”、“吴元润印”等。讲究一点的就另铸专印，上刻姓、名、字、号、乡里、祖籍、藏书处所等字样，如“王济之图书”、“张氏图籍”、“辛夷馆”、“何慈公娱野园珍藏书籍印”、“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号悔余”等。

藏书印始自唐朝

在书籍上打印记，始自唐朝。因为中国的书画古物收藏，自以皇帝内府为第一，因此最先使用鉴藏图书的，也是官家的内府。贞观时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刻作二小印贞、观，玄宗自书“开元”二字，刻作一开元印，皆曾用在御府图书之上，虽然没有鉴赏珍藏等字眼，但却是鉴赏图章的滥觞，也可视为最早的藏书印。又有集贤院印、秘阁印、翰林院印、弘文馆印。

唐朝始有私人藏书印

从唐代开始，私人藏书家也在自己的藏书上加钤印记，如魏王李泰有藏书印“龟益”，钟绍京有印曰“书印”，张彦远之高祖有“河东张氏”印，韩愈曾写诗称颂的邺侯李泌有“邺侯图书刻章”之印等。到宋代，苏东坡有“赵郡苏轼图籍”印，王晋卿有“晋卿珍秘”印。专为藏书而镌刻的藏书印大约开始于唐宋，经过元朝，到了酷爱风雅的明朝士大夫手中，便特别发展盛行起来了。

藏书印的格式

藏书印不像藏书票那样，在形式和图案方面千变万化。除偶有不规则形制外，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因了这种形式的限定，除了字句的变动之外，几乎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不外乎“某某藏书”或“某某珍藏书籍之印”之类。近代的藏书家，为了顾计流传子孙和保留的问题，才使印章的字句有了一点新的面目，譬如将诗句或铭语镌成印章。

藏书印的钤盖方法

因为一本线装书可以钤印的地方很多，而一个藏书家的藏书印又往往不只一方，于是钤印的地位就值得考虑了。从前皇帝的内府图书藏书印，照例是钤在每一卷的第一面书框上面正中的，这是皇帝的排场，不足取法。正当的钤盖藏书印的方法，最主要的一方，应该盖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面的下方，即著者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的边框为宜。再其次，则每一册的最后一页的下角，也应该钤一方压卷。若再有其他的藏书印，则不妨分别钤在序文前后和里封面版框的空白处，地位总以贴近下角为宜。无论是线装本还是铅印的平装本，都不宜在封面上盖印章。若是这本书已经经过别家收藏，第一页已有若干印章的，则自己的藏书印宜顺序钤在最上的一方之上，以示收藏流传的先后次序。若是下角仍为空白的，则仍以钤在下角为宜。

最长的藏书印

藏书印中所见最长的大概数清代杨继振的长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眇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息，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

以肖像作印

陆心源藏书，钐其肖像印，乃谢庸所刻。

王昶述庵传识长印

王昶的“述庵传识”印亦长，共六十四字，其文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勤；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识。

字数最少的藏书印

字数最少的藏书印仅一字，如清何焯的“髯”字印。

官宦藏印

藏书家中不乏官宦之士，这些人喜欢治书印尽道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情。明季振宜有印“吾道在沧州”，“柱下史”，叶盛有印“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陈察有“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原习之印”。清代孙星衍当过山东督粮道，书印就有“东方廉使”。

女子藏印

明清之际妇女地位有所提高，女子藏书不乏其人，这些女藏书家也往往治印，如归有光妻王氏的“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印、阮元继配孔经楼的“阙里阮经楼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印。

夫妇合印

徐乃昌妻马韵芬，藏书往往钐夫妇合印。俞平伯藏书亦喜用“衡芷馆夫妇藏书画记”印章。张蓉镜字芙川，娶妻姚畹真，号芙初女史，亦精鉴别，故其夫妇藏书印曰“双芙阁”。

以诗为印

明代钱谷的藏书印是一首七言诗：“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

毛普以赵孟頫诗刻印

与钱谷诗意旨相近的尚有元代赵孟頫在藏书卷后所书：“吾家业儒，辛

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毛晋汲古阁将此诗刻为印记，钤于藏书前后。

毛晋藏书印甚多

毛晋于宋元刻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椭圆式印别之，又以“甲”字印钤于首，其余藏印曰“毛晋秘篋审定真迹”，曰“毛氏藏书”，曰“东吴毛氏图书”，曰“汲古阁世宝”，曰“子孙永宝”，曰“子孙世昌”，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曰“开卷一乐”，曰“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曰“菘谿”，曰“弦歌草堂”，曰“仲雍故国人家”，曰“汲古主人”，曰“汲古得修绠”。

平生减产为收书

清张燮有印章云：“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卷余。寄语儿孙勤雒诵，莫令弃掷饱蟬鱼。”

三雅印

王世贞藏书，每以“贞元”二字印钤之，“贞元”本唐德宗年号，而恰符他的名字，故其秘册，往往摹而用之。下必继以三雅印，即伯雅、仲雅、季雅三印，分钤以别宋本甲乙也。

文征明藏书印亦多

明长州文征明藏书印甚多：有江左二字长方印，停云圆印，及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屋、梅溪精舍、烟条馆、悟言室、惟庚寅吾以降诸印。

子孙益之守勿失

明祁承澹生堂藏书印铭云：澹生堂中储经箱，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勿失。

兼以记年

赵之谦为人作印，有“节子辛酉以后所得书”一方，于记名之外，兼以记年，好比书画家用“某人某岁以后所作”的印章一样，于考查上颇为方便。现代作家茅盾亦有一方“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

书不可一日失

吴騫藏书印记云：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贤诒厥之名言，允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率。

临安志百卷人家

吴騫藏书印尚多，有“兔”字白文方印和“床”字朱文方印，“千元十驾人家”白文长方印、“兔床鉴定”朱文方印、“吴氏学医概不受谢”正楷木戳。吴騫家藏三种《临安志》，都是宋人所撰修，十分珍贵。因三部书加起来正好为一百卷，他就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

即非我有亦可喜

许善斋的藏书印绝少患得患失的情调，印云：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暂得于己

有的藏书印不记姓名，只以闲章代替。如近代某人藏书印借用《兰亭序》“暂得于己”四字，用古天衣无缝，而襟怀豁达，殊足称道。

不妨天下有

清孙文川有藏书印，每钤之卷首，其文云：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我闻唐杜暹，撰铭书卷自，鬻借为不孝，惟属后人守，又闻赵吴兴，作诗题卷后，但禁他室买，戒以弃勿取。二公诚爱书，而我意则否，子孙为凤麟，嗜古意必厚，我爱彼更珍，披采成丛蕞，何待我贻留，彼自能寻剖。子孙若豚犬，压架已孤负，摧烧或化薪，弃置更覆瓿。尤物遭轻褻，贻者执其咎。不如付赏音，什袭重瑶玖，品题增光辉，益令传不朽。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

攀取功名履历表

清代李慈铭藏书印颇不少，但其中一方长宽均 3.2 厘米，共刻二十四字的篆文闲章饶有趣味，印文是：

道光庚戌秀才
咸丰庚申明经
同治庚午举人
光绪庚辰进士

不啻一份攀取功名的履历表。如此刻法，大概是感到自己的功名天干之“庚”字的因缘凑巧。按道光庚戌为 1850 年，咸丰庚申为 1860 年，同治庚午为 1870 年，光绪庚辰为 1880 年，这样，李慈铭从中秀才到中进士，走过了整整四十年，每隔十年才能幸运地爬上一层，功名之路也称得上“其修远兮”。

分廛百宋迳架千元

清末江苏潘祖荫因藏有黄丕烈“百宋一廛”和吴騫“千元十驾”之散书，而刻“分廛百宋迳架千元”印以自娱。

夸耀门庭

有些藏书家喜欢在书印上夸耀门庭、追思先人。明江苏吴宽有“延州来季子后”，顾千里有“陈黄门侍郎三十五代孙”，陆芝荣有“忠宣等三十七世孙”印。最有趣的是常熟张陆灿的书印：“明经别驾书经解元临渊三十四世彭祖九十七世”，既有仕途乐趣，又有身世自白，连神话传说中的长寿老人也成了他的祖先。

各出奇招

历代藏书家印文林林总总，各出奇招。有的明志警人，如清洪颐煊的“宁静以致远”、“承先遗后”，清劳格的“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有的做拆字游戏，如项笃寿“马生角笃字离合体也”印。有的记生辰八字，如朱彝尊

“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酉时”印。有的更是大有闲情逸致，如郭协寅“小桥流水即沧州”印，项笃寿“杏花春雨江南”、“桃花邨里人家”印，王鏊则别出一格，于书印上镌御题诗文一首：“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窃书非雅贼

马太龙为叔平后人，擅刻印。曾自刻：宠辱不惊。又：窃书非雅贼。

周叔弢慎用藏书印

近人周叔弢对有些藏书家在书上打坏图章十分讨厌，自己用印十分慎重。他早生用过一方长方阳文的“曾在周叔弢处”的图章，后来在善本书上就只用一枚方形“周暹”两字白文小印。他说选用这方印倒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它小，如果后来的人觉得讨厌，可以挖去，不至损书过甚。他藏书的斋名很多，也请名手刻了很多印，如“寒在堂”、“半雨楼”、“双南华馆”、“东稼草堂”、“孝经一卷人家”、“自庄严堪”，但除三方“自庄严堪”印有时还用外，其余的都不用在善本甲类书上。他常常为印色不好而变黑恼火，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用双氧水在变色的印泥上涂一层，干后能恢复红色。用印泥也十分审慎，唯恐渗油或变色，损坏书籍。

现代作家的藏书印

现代作家中，阿英藏书极富，大都只盖一方小型私章，朱文阔边，篆“阿英”两字。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上签个名，线装的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后来魏建功替他另外镌了两个，一方形，文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一长方形，文曰“长乐郑氏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后一个每字加框，纯然古风。刘半农常钤一大“刘”字。马隅卿则用“鄞马氏廉隅卿珍爱书”。大都废弃篆字，行草杂出，各以其体，倒亦隽永可喜。闻一多、叶圣陶等均精铁笔。拥有藏书印最多的，恐怕是李一氓。“存在第一”是他马克思主义的标帜，“一氓探藏词书种种”是他业余研究的功绩记录。“一氓读书”等十几枚鲜红的藏书印记新清可爱。

大公无私

文革期间，康生侵吞了许多“抄家物资”中的珍贵古籍，遍钤自己的收藏印。譬如他在窃自袁氏家族的祖传宋版《资治通鉴纲目》里就盖有印章十一个。富于嘲弄意味的是，其中竟有一个“大公无私”四字印，一方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霸道之极；另一方面还故作幽默，“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盗窃者得手后的得意之情暴露无遗。

日本的藏书印

日本最古的藏书印，大都发现在古寺院的藏经上，如“法隆寺一切经”六字，高山寺的则仅作长方形的朱文“高山寺”三字，法界寺的则作“法界寺文库”五字，亦系朱文长方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方形“金泽文库”藏书印的前身。日本人称书为“本”，因此古皇室的藏书，在一般印章之外，间有钤上“御本”二字的，表示是官家的藏书。又如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就作“红叶山本”四字。表现在藏书印上的爱书趣味，与中国的藏书家相比，

要更有人情味，也更风趣一些。譬如寺田望南的“天下无双”，森川竹窗的“此书不换妓”都是很有风趣的爱书心理的流露。至于市野迷庵的“子孙换酒亦可”，则浸透着潇洒与达观。

藏书票

何谓藏书票

藏书票是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签。它小如邮票、大如扑克牌，是带有藏书主人姓名的袖珍版画。多采用木刻、铜版、石版等，图案取材广、手法多。藏书票一般贴在书的首页或扉页上，除作藏书者的专用标记外，还可作为书籍装饰品。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1_1.bmp}
```

藏书票的起源

藏书票源于 18 世纪末的德国。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在 1480 年以前，在一位名叫勃兰登堡的德国人的藏书中发现的。这张藏书票的画面是一个天使手持盾牌，在盾牌上画有似牛非牛的图腾。此后，藏书票逐渐在欧美各国及日本流行起来，现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藏书票的收藏家，并且建立了不少藏书票收藏协会。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1_2.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2.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3.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4.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5.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6.bmp}
```

```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457.bmp}
```

藏书票的形制

藏书票设计精巧，色彩鲜艳。有的小巧玲珑，古朴典雅。有手工绘制的，但多数采用木刻版画的形式。可以是彩色，也可以是黑白。一般是自制，也有请人代制的。形状长方不限，内容寓意不等。除图案外，还可注上“××藏书”、“××爱书”等字样。国际通用的体例，要在票面上刻有“EX—LIBRIS”（我的藏书之一）的字样。

藏书票在中国的传入

中国的藏书家很早就有在藏书上加钤藏书印或肖形章的习惯。西方的藏书票则在本世纪 20 年代传入中国。当时的作家郁达夫、叶灵凤等人都有自己的专用藏书票。叶灵凤还爱收藏藏书票，是我国最早的一位藏书票收藏家。

咏书诗

五更三点待漏，
一目十行读书。

——刘克庄《杂记六言五首》

十年学读书，
颜华尚美好。

——江淹《效阮公》

十载寒窗积雪余，
读得人间万卷书。

——石子章《竹坞听琴》

人生识字忧患始，
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
开卷恁怍令人愁

——苏轼《石巷书醉墨堂》

两说穷舌端，
五车摧笔峰。

——鲍照《拟古诗》

犹轻五车富。
未重一囊贫。

——骆宾王

平生萤雪，
男儿无奈五车何。

——辛弃疾《水调歌头》

张弟五车书，
读书仍隐居。

——王维《戏赠张五弟諲三首》

算胸中，
除却五车书，
都无物。

——辛弃疾《满江红》

五车载书不堪煮，
两都觅官自取忙。

——元好问《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放翁白首归剡曲，
寂寞横门书满屋。
藜羹麦饭冷不尝，
要足平生五车读。
——陆游《读书》

饱以五车读，
劳以万里行。
——陆游《感兴》

韦编屡绝铁砚穿，
口诵手抄那计年。
——陆游《寒夜读书》

寻章摘句老雕虫，
晓月当帘挂玉弓。
——李贺《南园》

苍彦白发入衰境，
黄卷青灯空苦心。
——陆游《客愁》

惜日看圭短，
偷光恨壁坚。
——元稹《献荥阳公书五十韵》

掷金换得天边桂，
凿壁偷得榜上名。
——王仁裕《示诸门生》

览卷试穿邻舍壁，
明灯何惜惜余光。
——岑参《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

晓凌飞鹊镜，
宵映聚萤书。
——王维《清如玉壶冰》

一生徒羡鱼，
四十犹聚萤。
——高适《奉酬李太守夏日平阴亭》

囊疏萤易透，

锥钝股多坑。

——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老生读书百绝编，
日晏忘食夜废眠。

——陆游《寓叹》

西邻已富忧不足，
东老虽贫乐有余。
白酒酿来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叶梦得《避暑录话》

此生生计愈萧然，
架竹苫茅只数椽。
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
太平民乐无愁叹，
衰老形枯少睡眠。
唤得南村跛重子，
煎茶扫地亦随缘。

——陆游《题老学庵壁》

古人学问无遗力，
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一生勤苦书千卷，
万事消磨酒十分。

——欧文忠

兀坐书林自切磋，
阅人应自阅书多，
未知买得君书去，
不负君书人几何？

——危稹

辛勤十七载，
书卷四万余。
积之颇不易，
爱惜愈璠琦。
旁观多窃笑，
此翁何太迂？
其臞类山泽，
自称味道腴。
饭熟不遑食，
发乱不暇梳。
非矜插架多，
汲古须修绉。
由博而返约，
寻源得要领。
寡过愧未能，
鉴古稍自省。
虽有豚犬儿，
何由望脱颖。
竭力营田畴，
恐亦成画饼。
不若从我好，
疏水乐清静。

——杨鼎《检藏书有感》

不为安床席，
先遗百本书。
推寻如逋寇，
断烂恨馋鱼。
故物无堪伴，
书巢或可知。
夜寒眠未清，
灯火不须除。

——黄宗羲《移居》

清名即是长生诀，
当世应无未见书。
何处见君常觅句，
小阑干外夕阳疏。

——阮元《赠鲍廷博》

尚剩奚生画，
香厨久弃捐。
伤心余簿录，

过眼付云烟。
压架犹如昨，
充箱孰与迁。
藉君珍此卷，
想象旧瑶编。
自古图书厄，
多经劫火亡。
未闻豪贾夺，
举作债家偿。
编校留希弁，
飘零忆蓼塘。
披寻一牋触，
老泪忽淋浪。

——杨凤苞《题访书图》

君家疏雨吾好友，
积书之癖与吾同。
别来江子亭边树，
终古山阳笛里风。
人有微名都折福，
世间豪举总成空。
只今说着眠琴馆，
卅六年前一梦中。

——严可均《题赠刘桐后人》

近来书贵比珠牙，
善本矜奇借亦难；
不傍灵威仙洞住，
只应写作画图看。

——许宗彦《题吴更生 借书图 》

我怪曹生市廛里，
偃仄喧嚣拥文史。
一厨连屋当屏风，
一匱遮门充阁度。
丛残断缺勤购买，
犹秃千兔写万纸。
吁嗟市隐类古人，
令我长怀颍流泚。
世人有书不肯读，
问之不答我能揣。
温饱嬉闲事游荡，
饥寒齷齪忧妻子。
昏昏索索年复年，

牛马襟裙略无耻。

——孙淇《市肆蓄书歌为曹彬侯作》

名山草堂，
萧然独居。
门无车马，
坐有图书。
沈酣枕籍，
不知其余。
俯仰今昔，
乐且宴如。

——萧蓼亭书铭

远闻佳士辄心许，
老见异书犹眼明。

——陆游

人言冬是岁之余，
自分生涯伴蠹鱼。
比似王筠犹有愧，
摩挲细字欠分明。
西洋镜比传神手，
八廓重开为点睛。
乌鸡已疗疯风手，
秋兔犹存见猎心。
炳烛余光吾若此，
儿曹那不惜分阴。

——查慎行《钞书三首》

藏书自比遗金富，
师道原同祖德隆。
二老额悬光万丈，
南雷鹤浦并高风。

——倪大成《登二老阁诗》

何物满高楼？
宋铸与秘录。
青藜最可人，
黄奶我所欲。
香清凝座隅，
色古悦心目。
焉敢傲百城，
拥书聊自足。

——《柯庭余习·古香楼》

缥帙牙签列四围，
此间渐觉古香肥。
有涯岁月期从事，
无限尘劳赖息机。
开卷蟬鱼如水溜，
下帘芸篆隔窗微。
可怜文苑多名目，
一自兵残世遂稀。

——《古香楼偶作》

阿翁铭识墨犹新，
大担论觔换直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
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笈，
不抵当时装订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
只缘参透达摩禅。

——吕留良《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

嗟嗟顾君好读书，
百万牙签皆玉轴。
宋刊元印与明抄，
插架堆床娱心目。
一握书论一斛珠，
购来手自三薰沐。
黄金散尽为收书，
秘本时时出老屋。

——瞿中溶《挽顾抱冲茂才》

头白话今雨，
汗青藏古书。

——周鼎《题 竹居图 》

有田皆种石，
无屋不藏书。

——吴琨《和周鼎》

吾家本市人，
南濠居百年。
自我始为士，
家无一简编。
辛勤二十载，

购求心颇专。
小者虽未备，
大者亦略全。
经史及子集，
一一义贯穿。
当怒读则喜，
当病读则痊。
恃此用为命，
纵横堆满前。
当时作书者，
非圣亦大贤。
岂待开卷看，
抚弄亦欣然。
奈何家人愚，
心惟财货先。
坠地不肯拾，
断烂无与怜。
朋友有读者，
悉当相奉捐。
胜负不肖子，
持去将鬻钱。

——杨循吉《题书厨诗》

沈疾已在躬，
嗜书犹不废。
每闻有奇籍，
多方必罗致。
手录兼贸人，
恒辍衣食费。
往来绕案行，
点画劳指视。
成编亦艰难，
把玩自珍贵。
家人怪我癖，
既宦安用是。
自知身有病，
不作长久计。
偏好固莫捐，
聊以从我意。

——杨循吉《钞书诗》

连日晒书如晒麦，
人间耕学本来同。

——邵宝《晒书二首》

少爱新书楮墨香，
不辞书价借钱偿。
坐来精舍还怀旧，
海鹤诗中万卷堂。

——邵宝《偶闻书香诗》

两三年写自经手，
七十卷书才到头。

——柳大中《手录白氏长庆集题其后》

百竿竹与身同老，
千卷书曾手自钞。

——柳大中《述怀》

手披欲究百家编，
奴婢年来识郑玄。
顾我幸多千卷蓄，
念君未有一经全。
诗书心醉不容醒，
父子笔耕期有年。
此但古人糟粕尔，
更须从此悟真筌。
书种传来直到今，
读书几似孝标淫。
欲君终就九经库，
与子平分一片心。
更向漆园穷妙旨，
何殊清庙奏遗音。
中郎书籍付王粲，
想得知余此音深。

——楼钥

故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

无事此静坐，
一日是两日。
苦活七十年，
便是百四十。

——苏轼

无事常读书，

一日是四日。
若活七十年，
便二百八十。

——谢肇淛

高阁藏书拥百城，
主人匡坐校雠精。
名传海外鸡林识，
学重都门虎观惊。
卷幔湖光浮几案，
凭栏山色照檐楹。
沧桑世界所须问，
缙岭吹笙月正明。

——陆世仪《赠毛子晋》

千金万金置田屋，
谁见挥金买书读？
世皆贵金不贵书，
书价安知倍不足。

——释苍雪《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闈》

弹铗归来抱膝吟，
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
只向慈仁寺里寻。

——孔尚任《燕台杂兴》

君家在皋桥，
喧阗井市区；
何以掩市声，
充楼古今书。
左陈四五册，
右倾三两壶。

——文征明《饮子畏小楼》

笑论架插邺侯笈，
已愧湖州目录兼；
秀水厨难八万拟，
黄甘字熟两行添。
汉碑草草传洪适，
宋槧寥寥拜子瞻。
化度铭图摹范老，
赐书楼印敢轻钤。

——翁方纲《自题三万卷斋》

归家倏忽岁将除，
折简频邀共祭书；
君作主人真不忝，
我称同志幸非虚。
仪文底用矜能创，
故事还应永率初；
更愿齐斋刊含奠，
每陪酌酒与 蔬。

——顾广圻《士礼居祭书诗》

千元百宋竞相夸，
引得吴人道是娃；
我为嗜奇荒产业，
君因勤学耗年华。
良朋隔世亡双璧，
异地同心有几家。
真个苏杭闻见广，
艺林佳话遍天涯。

——黄丕烈致吴騫

人生百病有已时，
独有书癖不可医。

——陆游《示儿诗》

笠泽老翁病苏醒，
欣然起理西斋书。
十年灯前手自校，
行间颠倒黄与朱。
区区朴学者自信，
要与黄卷归林庐。

——陆游《雨后极凉料简筐中旧书有感》

我生学语即耽书，
万卷纵横眼欲枯。

——陆游《解嘲》

当年甲乙重标题，
万卷遥知费编辑。
芸叶曾防羽陵蠹，
锦罽或用波斯裘。
浮云世事不可久，
却为儿孙觅升斗。
遗业曾无八百桑，

旧家自有千金帚。
倾筐倒篋驱鱣鱼，
载以兼两薄畚车。
易钱难比瑶华乘，
书卷分明博士驴。
富家有书不解读，
贫儿欲读无其福。
饼金攀致玩好同，
插架牙笺手谁触。
白氏杨枝临去吟，
教坊后主新降曲。
明珠脱手各伤心，
同向豪家成一哭。

——彭兆荪《卖书行》

读书数万卷，
胸中适无主；
便如暴富儿，
颇为用钱苦。

——郑板桥

独向穷愁开境界，
蠹鱼身世读书堆。

——章钰

藏书十万又三千，
笑侯傲王别有天。

——丁福保《题五十岁小影》

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颜如玉；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

——宋真宗《劝学文》

吾生本寒儒，
老尚把书卷。
眼力虽已疲，
心意殊不倦。
正经首唐虞，

伪说起秦汉。
篇章异句读，
解诂及笺传。
是非自相攻，
去取在勇断。

——欧阳修

读书习气扫未尽，
灯前简牍纷未黄。
吾儿从旁论治乱，
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须饮酒径自醉，
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示儿》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劝学诗》

生平喜摊书，
垂老如昔狂。
日中就南牖，
日斜就西窗。

——蒲松龄《寂坐》

细雨无尘驾小车，
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
莫典春衣又买书。

——潘际云

家资是何物，
积帙列梁椳。
高斋晓开卷，
独共圣人语。
英贤虽异世，
自古心相许。
案头见蠹鱼，
犹胜几俸侣。

——皮日休

满室图书杂典坟，

华亭仙客岱云根。
他年若不和花卖，
便是吾家好子孙。
——陈亚

哪有余粮愁鼠耗，
只劳架上守残书。
——秦兰征《乞雏狸诗》

心爱奇编雨汗流，
山妻笑我不封侯。
偷闲八日闲中写，
一笔看来直到头。
——俞弁

生平酷好书，
僻性厌城居。
洗杓尝鸱酒，
焚香辟蠹鱼。
荷君函里秘，
益我腹中虚。
好语田园辈，
辛勤廿载余。
——俞弁

玄蝉噪薰风，
嚙嚙庭前木。
晴牕白昼长，
赤日盛炎熇。
不暇傲羲皇，
且抱残编曝。
芸馥当风散，
衣鱼随手扑。
破损感年深，
校阅怜毫秃。
不惜倾囊购，
不辞胝手录。
夸人未全贫，
堆床尚连屋。
世缘已渐忘，
爱此犹骨肉。
身后无可授，
生购不能读。
展看三太息，

将人阿谁目？
有聚应有散，
此理筹之熟。
自笑尚忘疲，
检点仍归椟。

——顾士荣《曝书有感》

吾庐爱，
藏度一楼书。
玉轴牙签颇自检，
铁琴铜剑亦兼储。
大好如仙居。

——瞿绍基

千宋百元为我有，
眼倦灯昏搁笔初。

——伦明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
不如等待到来年。

——佚名

读必谨，锁必牢；
收必审，阁必高；
子孙子，惟学，
借非其人亦不孝。

——叶盛《书厨铭》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
抱残守阙，以安以宁。
唯对于书，爱护备至。
污者净之，折者平之。
阅前沐手，阅后安置。
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
勿拘泥之，勿尽信之。
天道多变，有阴有晴。
登山涉水，遇雨遇风。
物有聚散，时损时增。
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孙犁《书箴》

书斋楹联

五车图集
万轴琳琅

开卷有益
闭户自精

几上千古
花间四时

文章江海
书籍林泉

卧游五岳
坐拥百城

诗情画意
琴韵书声

焚云辟蠹
起草雕龙

干国家事
读圣贤书

——海瑞《自题》

读古人书
友天下士

——包世臣《赠丁晏》

书城巨观
人间罕睹

——天一阁

广祈多福
博览群书

——黄右原集孟郁碑、鲁峻碑句联

助人为乐
读书更佳

无欲最乐
有书更佳

傍百年树
读万卷书

——庐山白鹿洞书院联

邺侯新插架
曹氏旧营仓

藏古今学术
聚天地精华

东壁新画海
西厢美书林

价为三都贵
名因十样新

书中乾坤大
笔下天地宽

立品同白玉
读书到青云

深恩立身道
快读有用书

几净云生砚
窗明月映书

入梦一池草
怡情半局棋

文墨有真趣
园林无俗情

文章千古事
花月一帘春

伴我书千卷
可人花一帘

把酒知今是
观书悟昨非

雨过琴书润
风来翰墨香

诗书惟我共
世事与谁论

泉清堪洗砚
山秀可藏书

洗砚鱼吞墨
烹茶鹤避烟

著书惊日短
看剑引杯长

静闻鱼读月
笑对鸟谈天

蕴借异时辈
卓犖观群书

东壁图书府
西园翰墨林

欲知千古事
须读五车书

图书腾凤彩
文笔若龙翔

奇书手不释
旧友心相知

三绝诗书画
一官归去来

——李啸赠郑板桥联

门对千竿竹
家藏万卷书

——解缙

门前万竿竹
堂上四库书

——杜重划集苏轼句题眉山三苏词联

风云三尺剑
花鸟一床书

为学心难满
观书悟昨非

心知白云妙
书爱众香熏

书镜照千古
笔花开四时

书林含馥郁
艺海汇英华

立德齐今古
藏书教子孙

老我书千卷
惊人笔一支

老拳博古道
儿口嚼新书

——金圣叹

地僻新闻少
屋窄古书多

好书勤诵读
佳句费推敲

把酒时看剑
焚香夜读书

闲临王氏帖
醉读少陵诗

床上书连屋
阶前树拂云

忘食学草木
委怀在琴书

——张仲甫、林则徐集元次山、陶渊明句

纵观廿四史
静对十三经

顷来树佳政
时还读我书

奇书窥鸟迹
赐茗出龙团

松菊开三径
琴书萃一堂

苦读千年史
笑吟万家诗

披云链琼液
坐月观宝书

明灯时作伴
古书常为朋

图书聚所好
竹柏得其真

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相与观所尚
时还读我书

——祝允明集陶诗句联

闻鸡晨舞剑
挑灯夜读书

座对贤人酒
家藏太史书

读书破万卷
落笔超群英

——张仲甫、林则徐集少陵、太白句

读书破万卷
下笔扫千军

读书成底事
报国是何人

读书贵有用
树德莫如滋

读书贵有用
处事在通情

著书惊日短
舞剑伴星稀

得句疑人有
看书不厌志

智勇冠当代
卓荦观群书

勤俭黄金本
读书丹桂根

慷慨谈世事
卓荦观群书

风月畅怀抱
琴书悦性灵

杜门闲客散
摊卷古人来

漱六经芳润
储二酉精华

醉歌田舍酒
笑读古人书

广搜中外名篇
嘉惠四方学子

闲居足以养老
至乐莫如读书

与古人为知己

集斯文之大观

文气曲于流水
天怀和若春风

无丝竹之乱耳
乐琴书以消忧

名教自有乐地
诗书是我良田

竹雨松风梧月
茶烟琴韵书声

养身莫如寡欲
读书尤在虚心

好事流芳千古
良书播惠九州

——郭沫若题天一阁

有打瞌睡豪杰
无不读书神仙

未能一日寡过
恨不十年读书

至要莫过教子
至乐莫过读书

求学将以致用
读书先在虚心

夜月琴声书韵
春风鸟语花香

放开肚皮吃饭
抖起神气读书

临帖常感身健
读书偏爱夜长

竖起脊梁立行
放开眼孔观书

——陈观棣

高，高于人心；
深，深于书籍。

——蔡锷答樊雉联

读书不求甚解
鼓琴足以自娱

——桂未谷集陶潜、庄子句

雅言诗书执礼
益友直谅多闻

古今学术藏满架
中外精华聚一楼

远求海内珍藏本
快读人间未见书

藏书楼上百花放
借阅窗口四时春

文探五典三坟上
友在三秦两汉间

六艺文章华国室
五经才调治安书

左图右史兰台宝
诸子百家石室珍

玉轴牙签唐李泌
琅函金笈晋张华

价高只为三都贵
名重还因五色新

传播四海新文化
推广九州有用书

交游全属斯文辈
生活还寻故纸堆

奇探二西搜罗富

赋就三都声价高

饶有文章堪售世
不嫌麴市作生涯

书有未观皆可读
事经已过不须提

——俞樾集《金刚经》句

书从疑处翻成悟
文到穷时自成神

书到用时方恨少
船行江心补漏迟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书到用时方恨少
事非经过不知难

书味本长宜细索
砚田可种勿抛荒

书声读落三更月
笔阵扫开万里云

书有未曾经我读
事无不可对人言

书似青山常乱迭
灯如红豆最相思

书田菽粟皆真味
心地芝兰有异香

书中岂有黄金屋
海上长存天一楼

——胡乔木题天一阁

书窗正对云洞启
丛菊初傍幽篁栽

——刘孟伉集陆游句题眉山三苏祠

书囊应满三千卷
人品当居第一流

书海大有经济学
市场当存道德心

于古人书无不读
则天下事大可为

三世青毡宜耐冷
五更黄卷莫辞勤

无情岁月增中减
有味诗书苦后甜

鸟欲高飞先振翅
人求上进早读书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灯火夜深书有味
墨花震湛字生光

每逢善事心先喜
得见奇书手自抄

一庭花发来知几
万卷书开见古人

一榻清风书叶舞
半窗明月墨花香

一帘花影云拖地
半夜书声月在天

水环琴室声编细
花护书巢香更多

从来名士皆耽酒
未有佳人不读书

闭户著书忘岁月
挥毫落纸如云烟

好书悟后三更月
良友来时四座春

花香满座客对酒
灯影隔帘人读书

春秋风月供新赏
左右图书结古欢

看书对酒乐无事
洗竹浇花兴有余

客散茶香留舌本
睡余书味在胸中

除却读书无所好
偶题诗句不须编

清谈如晋人尚矣
浊酒以汉书浇之

游山五岳东道主
拥书百城南面王

愧无媚骨难谐俗
赖有痴肠解读书

漫研竹露题唐句
细嚼梅花读汉书

数行褚帖当窗学
一卷陶诗倚枕看

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

——陆游《题书房》

雨醒诗梦来蕉叶
风载书声出藕花

——徐渭《自题书舍》

会须上番看成竹
何处老翁来赋诗

——朱彝尊《题曝书亭》

读书已过五千卷
此墨足支三十年

——袁枚自题

与有肝胆人共事
从无字句处读书

——周恩来自题

人间度阁足千古
天下藏书此一家

——姚元之题天一阁

门前莫约频来客
座上同观未见书

天下奇观书卷好
世间滋味菜根长

书遇会心皆可读
泉能蠲虑剧堪听

有奇书读无他好
与古人游何所期

尽日相亲惟有石
长年可乐莫如书

黄卷催吾朝起早
青灯伴我夜眠迟

韬略终须建新国
奋飞还得读良书

——郭沫若题邹韬奋图书馆

一室图书自清洁
百家文史足风流

人无傲首终必贱
家有奇书未为穷

人原是俗非关吏
仕岂能优且读书

——蒋南庄题颍州厅事联

入世须才更须节
传家积德还积书

——何子贞集《争坐位帖》字联

万卷诗书如好友
一樽谈笑伴高人

万卷诗书寻真理
千秋翰墨寄友情

万卷藏书宜子弟
三田聚宝真生涯

才如湖海文始壮
腹有诗书气自华

山川秀丽澄悬镜
松竹清明静读书

山色满窗书满架
石头为枕苔为毡

山外斜阳湖外雪
窗前流水枕前书

千古文章书卷里
百花消息雨声中

千树琪花三庙药
一庭修竹半床书

千树梨花百壶酒
一庄水竹数房书

久病始知求药误
衰年方悔读书迟

门前车马非为贵
家藏书籍不算贫

开卷群言守其雅
抚琴六气为之清

开卷古今千万事
杜门清浊两三杯
——王伯祥集汪浮溪诗句

开卷神游千载上
垂帘心在万山中

无穷诗思窗前草
不了功夫架上书

五六月间无暑气
百千年后有书声
——常熟萧统读书台联

不因果报方行善
岂为功名始读书

不忘孝友为家政
还冀诗书着祖鞭

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
——章太炎

日月两轮天地眼
读书万卷圣贤心
——朱熹

长留天地无穷趣
最爱书田不老春

风流学士常酣酒
快活神仙亦读书

风月一庭为良友
诗书半榻是严师

六经读罢方拈笔
五岳游归不看山

为学深知书有味
观心澄觉室生光

斗酒纵观廿四史
炉香静对十三经
——史可法

文成蕉叶书犹绿
吟到梅花句亦香

少壮不经勤学苦
老来方悔读书迟

少时读书老犹记
梦里成诗醒半忘
——水竹村人

少年说剑气横斗
长夜读书声满天

未须百事必如意
且喜六时长见书

未必玄关别名教
须知书户孕江山
——徐渭题绍兴青藤书屋联

功深书味常流露
学盛谦光更吉祥

世间惟有读书好
天下无如吃饭难

旧书细读犹多味
佳客能来不费招
——黄钺

旧书不厌百回读
佳客来时一座倾
——蔡福田集东坡、道潜句

四面楼台三面柳
美人颜色古人书
——彭玉麟题杭州西湖开网亭联

尔无文字当安命
我有儿孙要读书

——沈涵

处世当观天下事
读书深见古人心

鸟向枝头催笔韵
梅从花外度书声

立品早防冯如虎
读书不好叶公龙

立志须如三古盛
为书自起一家言

司马文章元亮酒
右军书法少陵诗

对月横安高士榻
论文喜得古人书

发奋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苏东坡

至乐无声唯孝弟
太羹有味是诗书
——梁山舟题三味书屋联

至乐事无如为善
有福人方肯读书

多读书知礼明义
少饮酒多是无非

名美尚欣闻过友
业高不废等身书

名书古画不易得
月阁烟寮相与清

壮士腰间三尺剑
男儿腹内五车书

讲学无非求实体

读书愚智在虚心
——阮元

好书不厌看还读
益友何妨去复来
——毛怀

好友恨难终日对
异书喜是故人藏

驰笔常苦夏日短
展卷不怨冬夜长

两三竿竹见君子
十万卷书思古人

园中鸟语劝沽酒
窗下日长宜读书

吟成好句花皆舞
谈到奇书兴欲狂

但以诗书教子弟
莫将成败论英雄
——无锡项王庙内小学联

奇书贪录如增产
佳卉分培当树人

画阁偏闻雏燕语
乱书常被懒猫眠
——袁杼

雨余窗竹图书润
风过瓶梅笔砚香

直谅喜来三径友
纵横富有百城书

拣茶为款同心友
筑室因藏善本书
——张廷济

明月有情常照我

清风无事乱翻书

明月同行如故客
异书难得比高官

歧黄以外无仁术
汉晋之间有异书
——华佗庙联

贫不卖书留子读
老犹栽竹与人看

诗书千载经纶事
松竹四时潇洒心

贫舍不嫌居陋巷
著书独喜在名山

春情寄语千条柳
世第流芳万卷书

带雨春耕芳草地
焚膏夜读古人书

除却诗书何所癖
独于山水不能廉

除却读书无所好
恍如造物与同游
——蔡福田集放翁、复古句

退笔如山未足珍
读书万卷始通神
——苏东坡

架上有书随我读
壶中无酒任它空

独坐每将书作伴
闭门常与竹为邻

绝交流俗因耽懒
出卖文章为买书
——郁达夫

较量人世无穷乐
罗列世间未有书
——梅庵题北京灵光寺联

获从丰岁偏耕石
穷到奇时不卖书

座满春风书带翠
夜临光月剑铎青

家酝满瓶书满架
山花如绣草如茵

浮沉宦海为鸥鸟
生死丛书似蠹虫
——纪晓岚

读书当观其气象
交游求益于身心

读书方恨知识浅
观海才觉天地宽

读书众壑归沧海
下笔微云起泰山

读有益书精力爽
行无愧事梦魂安

读书要见古人意
作事正须年少时

读书常戒自欺处
谨身不可有闲时

读史有怀经世略
检方常著活人书
——林则徐

雪苑喜栽新著稿
风帘闲校旧抄书

爱书不厌如平壑

戒酒新严似筑堤
——何绍基

移门欲就山当枕
补屋常愁雨湿书
——吴济书房门题

移椅依桐同赏月
点灯登阁各攻书

得好友来如对月
有奇书读胜观光

欲为一代经纶手
须读数遍要紧书

脚下行程千里远
腹中书贮万卷多

深林闲教新添笋
残烛贪看未见书
——郑仁甫集放翁、山谷句

深院钞书桐叶雨
曲栏联句藕花风
——南昌市百花洲联

清坐使人无俗气
读书何计策新功
——修文县阳明书院联

率意不知行径晚
遂心时得异书藏

随时读写古今事
尽日领略天地情

敢为天下大难事
不读人间无用书

雅言不外诗书礼
家教无非孝弟慈

湖面藕花桥上月

窗前流水枕前书

窗临水曲琴书润
人读花间字句香

勤而不足再加俭
耕有余闲且读书

愿乘风破万里浪
甘面壁读十年书
——孙中山手书联

榻横左右三尺书
门向东南月一寮

蕉分新碧侵书架
茶带余香入砚池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原为稻粱谋
——郁达夫

藏书万卷可教子
买地十亩皆种松

藤根揉就充书架
蕉叶斜分作砚田

中外图书，皆有文采
今古名言，俱备精华

东壁图书，西园翰墨
九经芳润，二酉精华

把黄卷手，挽青铜臭
挥蠹儿去，招鸿儒来

典籍石渠，词章艺圃
缣緗锦篆，卷轴金题

珍共图书，争辉东壁
林成翰墨，游艺西园

山水幽深，襟怀妙远

诗书夙好，心气和平

如乐之和，乃称盛德
无书不览，是谓通才

吃墨看茶，听香读画
饮花卧酒，喝月担风

盛德若愚，细行不失
为善最乐，读书惟佳

翰墨图书，皆成凤彩；
往来谈笑，尽是鸿儒。

积文十篋，可谓备矣；
读赋千首，乃能为之。

好花四时，明月千古
远峰一角，奇书半床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读常见书，做本分事
吃有菜饭，着可补衣

好读书时，不好读书
好读书时，不好读书

柔日读经，刚日读史
怒气写竹，喜气写兰

出售古今中西名著
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玉检金泥山通宛委
琼编秘笈地接琅环

锦绣成文原非我有
琳琅满架惟待人求

大块文章百城富有
名山事业千古长流

玉树临风冰壶映月
珊瑚笔架玳瑁装书

观书要能自出见解
处世无过善体人情

孝友初心读书夙好
春秋佳日山水清音

攻千重关心怀天下
读万卷书志在四方

忠厚培心和平养性
诗书启后勤俭持家

家有藏书墨庄香远
门无俗客竹径风清

欲立根基无如为善
能光门第只有读书

博观万卷才识豪迈
纪述百家文翰昌明

博览群书见多识广
兼采百家目明耳聪

几百年人家无非行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学海里遨游你追我赶
书山中钻探我学你帮

攀绝崖志在书山探宝
驾狂涛勇向学海采珠

宝塔七八层，中容大鹤
通书十二页，里记春秋

效祖宗执笔，名垂青史
愿儿孙读书，身显庙堂

喜有两眼明，多交益友
恨无十年暇，尽读奇书

——包世臣题书斋联

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涉猎传记，不能为醇儒

求知识学海探宝累亦喜
追科学书山寻珍苦也甜

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
宽田宽地莫若宽量待人

高论不疲逢敌人而永夜
闭门无事对黄卷以终年

读书治学心怀十亿事业
立说成家志在两个文明

种菽粟于砚田，收成有日
怀奇珍于文席，待聘以时
——潘天寿题书房

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
享百年寿，何如作百世师

不读书而超儒，士心皆冷
未通文而登选，人谓有钱
——讽冷超儒、钱登选联

眼前一簇园林，谁家庄子？
壁上几行文字，哪个汉书？

书山高，勤苦自有通天路
学海深，顽强必启探宝门

书读无厌，念我任重道远
笔耕不倦，任他飞短流长

秉烛观书，毫不拖泥带水
过关斩将，犹如切瓦砍砖
——王兆题关庙联

学校造人材，为改造社会
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
——李大钊题河北乐亭大黑坨学堂联

万轴列牙签待与琅环比富
千秋留玉简任教宛委探奇

文海放舟健儿要敢顶风上
书上探室志士哪能空手回

百尺高梧撑得起一轮月色
数椽矮屋锁不住午夜书声
——郑板桥

富不读书纵有金钱身何贵
贫而好学虽无功名志气高

先代有贻谋肇基端由勤俭
后人宜续绪务本只在读耕

学海无涯飞舟最爱迎激浪
书山有路骏马更需加快鞭

要好儿孙须从尊祖敬宗起
欲光门第还是读书积善来

说南道北吃西瓜面朝东坐
思前想后读左传书往右翻

不吝重金，披罗往昔无传本
籍资攻玉，推广中西有用书

天下奇观看尽，不如书卷好
世间滋味尝来，无过菜根香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题东林书院

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
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方志敏自题

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
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方朔少时，二十万言书尽读

傅隆老去，八千余纸手亲抄
——陶怡云赠袁枚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姚文田

东西汉，南北宋，人物备考
山海经，水浒传，今古奇观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李鹤峰集句题随园

言易招尤，对朋友少说几句
书能益智，劝儿孙多读几行
——石天基

枕耽典籍，与许多贤圣并头
扇写江山，有一统乾坤在手

咬成几句有用书，可以充饥
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

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
欲求学问，须从伏案下功夫

读古人书，须设身处地一想
论天下事，要揆情度理三思

读书入门，爱从疑处求所悟
做事有果，常在难时尽其心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王士桢家训联

眼里有余闲，登山流水觞咏
身外无长物，布衣素食琴书
——杨沂孙

富贵无常，尔小子勿忘贫贱
圣贤可学，我清门但读诗书
——彭文勤

为学如掘井九仞无泉难造就
求知贵有恒一心致志可成功

小坐集衣冠，花径常迎三益友
清言见滋味，芸窗胜读十年书

可怜五十年读书，还是当厨子
做得廿二省味道，也要些功夫
——成都姑姑筵菜馆主人自题

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如教子
寡智乃能习静，寡营乃可养生

好，好，好，阅尽世文方知妙
勤，勤，勤，待闻读书不断声

环壁列奇书，有史有文堪探讨
小楼多佳日，宜风宜雨足安居
——王咨臣

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
蹶方长知，然屡蹶，讵云能知
——徐渭

不戏不怠古今专家皆由学时起
宜勤宜勉中外硕士都从苦中来

综新旧之编莫谓今文无古文有
统中西文学请看近者悦远者来

到门莫问姓名，花草一庭欣有主
入室自分雅俗，图书四壁可留人

学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拥书早起
干世之心已绝，无夕不饮酒高歌

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
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

武侯读书，大意略观，是讲求经济

渊明鼓琴，不求甚解，乃涵养性情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

何必读尽圣贤书，能全孝友便为实学
纵然周知天下事，不知进退总是愚人

觉世瞻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
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真喻圣人
——曲阜孔庙大成殿联

学如烟海，予渐浅陋，岂敢自矜收一粟
书似云山，人尽可师，但期共勉上诸峰

十万卷签题，绡帙斑斑，笑蓂竹蜂云之未博
三百年清秘，祥光炳炳，接东楼碧沚以非遥
——全祖望题天一阁

读律即读书，愿凡事从天理讲求，勿以聪明矜独见
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向往，肯将温饱付初衷

茅屋八九间，钓鱼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邓琰

叹老夫半世辛勤，藏书万卷，读书千卷，著书百卷
看小孙连番侥幸，县试第一，会试第二，殿试第三
——俞曲园

远必自迩，高必自卑，为学在进行，不为中途所阻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读书皆有用，要凭全力以赴

读圣贤书，岂徒摘句寻章，须将践履工夫，尽所人道
处世间事，何必市恩掠美，只要本分做去，求甚天知

过年苦，年苦过，过苦年，年过苦，年去年来今变古
读书好，书好读，读好书，书读好，书田书舍子而孙

人生穷达岂能知，趁早，须立此可为圣贤、可对帝天之志
客告是非且莫管，得闲，要读我有益身心、有关世道之书

庭有佳阴，室有藏书，天下事随处而安，即此是雕梁画栋
人得芳邻，居成美境，田舍翁问心已足，且漫言列鼎鸣钟

读书取正读易取受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书取坚最有味书中岁月
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
——苏州留园五峰仙馆联

何以遣有生涯？或种菊，或艺兰，或蓄水养鱼，避地即仙源，芳序四时
开蒋径

于此间得佳趣：宜敲诗，宜读书，宜临流垂钓，叩关无俗客，小园一角
枕梁溪

——杨楚孙题无锡香草居联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
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
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邓琰自题书屋

昔晚唐建安余氏肇启书林，世界阅千余岁矣，其后三峰万卷，同时梅溪
秀岩，文采风流，我思古人，聊从公等纂坊肆雅闻，缥緗掌故

自北宋布衣毕升始为活板，变迁可一二数耶，近稽兰雪桂坡，上溯石经
漆简，棣通演进，以有今日，何况此间称水陆形胜，东南馆区

出版标记

何谓出版标记

现代图书的封底上，常常印有一个表明出版单位的特殊图案，它或用文字形式表现，或用花纹图样造型，或以文图组合而成。这个图案一般称为出版标记，或叫出版商店徽。出版标记是各家出版社独具而又固定的标记。西方的出版社几乎都有自己的出版标记，在中国，怕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5.bmp}

商务印书馆

中国的出版社采用出版标记，似以商务印书馆为最早。辛亥革命前商务版的出版物上，常在封底正中印有一个颇为不小的青龙图案的出版标记。整个图案雕琢繁琐，据说它曾兼作老“商务”的店徽。辛亥革命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标记亦随之革新，采用 C.P 两个英文字母框成的一个横菱形纹样，中间坐有一个“商”字，CP 即商务印书馆的英译名 Commercial press 的缩写，这个图案一直沿用到解放初。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则至今仍在使用。解放后的标记，线条更趋凝炼：中座坐有一小圆的“商”字，外框是用一个“印”字变形而成的一本书。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6_1.bmp}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创建于民国元年，在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第二家大出版社。它的出版标记，是由两枝对称的稻穗和一本封面上印有“中华”两字的厚重图书组成。这构思不凡的图案，八十年来一直是中华书局的象征。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6_2.bmp}

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创建于 1921 年。它的主持人沈知方原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得力助手，后脱离中华书局，创建广文书局，继而扩展为世界书局。世界书局是 1927 年到 1937 年十年内战时期国统区四大出版社之一（另三家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它的出版标记，是一个云雾缭绕的地球，地球上竖字书写“世界”二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6_3.bmp}

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是由商务印书馆派生出来的一家出版社。主要以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它虽然资金不多，规模远不能与商务、中华和世界相比，但由于它方针明确，店风正派，出版物以质取胜，所以深受读者欢迎，被人们看作中国有数的几家大出版社之一。它的出版标记，上半部分是杲杲之日，下半部分是一本打开的书，上书“开明”二字。似乎在暗寓：开卷可以摆脱愚昧，得见光明。这个图案设计与“开明”二字，与开明书店的出版特色巧妙、和谐地统一起来，称得上天衣无缝。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7.bmp}

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商务、中华一样，也是蜚声国际书林的著名出版社。它是 1948 年 10 月，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合并而成。三联书店的出版标记是一圆形图案，上画三位劳工在一小星下扬镐挥锹，象征着三店联合，努力协同工作。既突出题旨，又令人回味。此前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出版标记也各具特色。特别是新知书店的标记，于一册书上画一只手点燃火柴的图案，下书“新知”二字，寓意十分贴切。{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8_1.bmp}

良友图书公司

良友图书公司是由华侨投资，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出版机构。30 年代因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书，声望大大提高。它的图书标记是两只天鹅相对而游，造型很美。暗喻书店及其出版物乃是读者的“良友”，就像嬉水的天鹅那样亲密无间。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8_2.bmp}

晨光出版公司

晨光出版公司创业于抗战胜利之后，它以啼叫的公鸡作标记。报晓的鸡是光明、希望的象征物，与“晨光”之名，颇为切题。雄鸡的图案取自唐朝砖刻，古雅优美。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8_3.bmp}

新月书店

新月书店成立于 1927 年春，创办者大多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多崇尚唯美主义，其出版标记倒也精美：一弯新月如镰，月儿两边嵌入一“新”字，字体曲折变形，宛若轻舒漫卷的托月之云。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9_1.bmp}

现代书局

现代书局是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较有影响的小型出版机构，由洪雪帆、张静庐和卢芳合作创办。它的出版标记是由书叠起的摩天大厦，颇有几分“现代”色彩。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49_2.bmp}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 30 年代在出版界享有盛誉。它的出版标记是一个坐着的智慧老人的塑像。图案逼真地表现了智慧老人凝思着的栩栩如生的神态，象征着人类是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创建者，出版物则能为我们打开知识的窗户，而得睹文明古国的奥秘。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0_1.bmp}

光华书局

光华、平明等书局的出版标记只是光华、平明字样的变形，图案简洁，富有装饰性。此外，天马书店、光明书局、北新书局、上海出版公司等出

版标记也都各具特色。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0_2.bmp}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解放后成立的出版机构，大多没有自己的出版标记。仅有的几家，似乎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最早。它的图案是一个驾驶着骏马驰骋沙场的战士雕像。含义简明，使人一望而知它的出版物是以反映军事题材及描写战士生活为主的文艺作品。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1_1.bmp}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标记，是用寥寥数笔组成的开放着的鲜花造型，花蕊中央饰有“百花”两字的拼音缩写“BH”，象征它的出版物就像竞相开放、异彩纷呈的朵朵鲜花。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1_2.bmp}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是大陆第一家专门出版港台书籍，为海外华人提供出版服务的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标记是两个相交的圆环组成的心型图案，象征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心相印、以文会友。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1_3.bmp}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出版标记采用“人民”二字的汉语拼音缩写“RM”，M像一本摊开的书，又似知识的大门。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1_4.bmp}

人民法院出版社

人民法院出版社是全国唯一出版审判专业书刊的出版社。它的出版标志采用法官的肩牌徽章，图案中的华表和天平象征着法律的尊严和公平。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2.bmp}

华夏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是以编辑出版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所需要的各类读物为特色的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标记，上半是“华夏”的拼音缩写“h”的变形，颇像跑步的人体，象征着残疾人的身残志坚。下半部图案既像翻开的书页，又似新叶萌芽，让人联想起生命的茁壮成长，与其出版宗旨极为贴切。

国外出版标记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3.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4.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5.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6.bmp}

图书馆标志馆内标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59.bmp}

设施标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60.bmp}

分类标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61.bmp}

使用标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62_1.bmp}

规则标志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62_2.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70_0563.bmp}

附录·书迷话书

厂甸

·周作人·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葫芦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

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树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以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树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庠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邵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鸛臬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著枝，故字从木上鸟，而臬首之象取之。”猫头鹰之被诬千余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臬不食母与鸟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

（廿三年三月）

选自《苦茶随笔》

书和回忆

· 黄永玉 ·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它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甚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稿素，北走蜿蜒”；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楣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了罢！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罢！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么？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蟋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动乱，“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了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本身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一九八一年三月

选自《太阳下的风景》

好读书

· 贾平凹 ·

好读书就得受穷。心用在书上，便不投机将广东的服装贩到本市来赚个大价，也不取巧在市东买下肉鸡针注了盐水卖到市西；车架后不会带单位几根铁条几块木板回来做沙发，饭盒里也不捎工地上的水泥来家修个浴池。钱就是那几张没奖金的工资，还得抠着买涨了价的新书，那就只好穿不悦人目的衣衫，吸让别人发呛的劣烟，吃大路菜，骑没铃的车。但小屋里有四架五架书，色彩之斑斓远胜过所有电器，读书读得了一点新知，几日不吃肉满口中仍是余香。手上何必戴那么重的金银，金银是矿，手铐也是矿嘛！老婆的脸上何必让涂那么厚的脂粉，狐狸正是太爱惜它的皮毛，世间才有了打猎的职业！都说当今贼多，贼却不偷书，贼便是好贼。他若要来，钥匙在门框上放着，要喝水喝水，要看书看书，抽屉的作家证中是夹有两张国库券。但贼不拿，说不定能送一条字条：“你比我还穷？！”三百年后这字条还真成了高价文物。其实，说穷也不是穷到要饭，出门还是要带十元钱的，大丈夫嘛，视钱如粪土，它就只能装在鞋壳里头。

好读书就别当官。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的，哪里还有时间串上级领导的家去联络感情，也没有钱，拿什么去走通关关卡卡？即使当官，有没有整日开会的坐功？签发的文件上能像在新书上写读后感一样随便？或许知道在顶头上司面前要如谦谦后生，但懒散惯了，能在拜会时屁股只搭个沙发沿儿？也懂得猪没架子都不长，却怎么戏耍成性突然就严肃了脸面？谁个要整，要防谁整，能做到喜怒不露于色？何事得方，何事得圆，能控制感情用事？读书人不反对官，但读书人当不了好官，让猫拉车，车就会拉到床下。那么，住楼就住顶层吧，居高却能望远，看戏就坐后排吧，坐后排看不清戏却看得清看戏的人。不要指望有人来送东西，也不烦有人寻麻烦，出门没人见面笑，也免了有朝一日墙倒众人推。

好读书必然没个好身体。一是没钱买蜂王浆，用脑过度头发稀落，吃咸菜牙齿好肠胃虚寒；二是没权住大房间，和孩子争一张书桌，心绪浮躁易患肝炎；三是没时间，白日上班，晚上熬夜，免不了神经衰弱。但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干肠，是在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的嘟囔，也不是脾性好，是读书入了迷两耳如塞。吃饭读书，筷子常会把烟灰缸的烟头送到口里，但不易得脚气病，因为读书时最习惯抠脚丫子。可怜都是蜘蛛般的体形，都是金鱼似的肿眼，没个倾国倾城貌，只有多愁多病身。读书人的病有读书病的药，药不在《本草》而直接是书，一是得本性酷好之书，二是得急需之书，三是得未见之书。但这药医生常不用，有了病就让住院，住院也好，总算有了囫囵时间读书了。所以，约伙打架，不必寻读书人，那鸡爪似的手没四两力，要欺负也不必对读书人，老虎吃鸡不是山中王。读书人性缓，要急急不了他，心又大，要气气不着，要让读书人死，其实很简单，给他些樟脑丸，因为他们是书虫。

说了许多好读书的坏处，当然坏处还多，譬如好读书不是好丈夫，好读书没有好人缘，好读书性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器

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说到这儿，有人在骂：瞧，这就是读书人的酸劲了，为什么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呢？真是阿Q精神喽！这骂得好，能骂出个阿Q来，便证明你在读书了，不读书怎么会知道鲁迅先生曾写过个阿Q呢？！因此还是好读书着好。

1990年

选自《抱散集》

琉璃厂

· 陈平原 ·

到北京来的读书人，罕有不逛琉璃厂的。读《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清人记载北京风物的著作，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负曝闲谈》等晚清小说，读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的散文笔记，你自然会对琉璃厂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有机会读到李文藻、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一、二、三、四记，了解这两百年来琉璃厂作为京都文化中心的兴衰起伏，对琉璃厂的兴趣定然倍增。仿佛到这儿来不只是逛书店，还有参观博物馆或者凭吊先贤的味道。在这条小街上走过多少文化名人，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过我知道鲁迅曾经三个月内来了二十六次，这有1916年5月至7月的鲁迅日记为证。

琉璃厂辽时不过是京城东郊一乡村，元时因建琉璃窑而得名。清中叶后渐成闹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开馆，文人学士颇有至此游赏访书的，书市乃大发展。此后二百年，琉璃厂书肆虽有盛衰，可作为京城的文化中心，一直驰名海内外，读书人罕有不闻之心动者。

1958年公私合营后，各私营书店合为中国书店。1980年重修文化街，好多老字号逐渐恢复，如邃雅斋、来薰阁、文奎堂、松筠阁、汲古阁等，还有那以酸梅汤和杏脯蜜枣著称的致远斋。不过企业国营的性质似乎没变，起码那几个书店是如此。

今天的琉璃厂，虽说不能跟全盛时代比，可也大有可游之处。先说西街，路北有萃珍斋、荣宝斋、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中华书局门市部，路南有珍古阁、朝花书画社、来薰阁、复云堂、观复斋、古籍书店、文奎堂、华彩文化服务公司、文物出版社门市部、清秘阁、通古斋、濯锦斋。而琉璃厂东街则有邃雅斋、北京市中国书店第一、第二门市部和机关服务部、汲古阁、瞻云阁、安徽四宝堂、一得阁、松筠阁、墨缘阁等。大大小小各种斋、阁、堂、店，加起来不下六、六十家，也算洋洋大观了。可对我辈读书人有吸引力的，实际上就那么十几家。余者经营珍宝古玩、名人字画，真的买不起，假的又可能看不上，还是眼不见心不烦好。偶尔进去买点笔墨纸砚，或者印石、拓片也还可以，可我没有一逛再逛流连忘返的习惯。不过初来乍到者，也应该进去走走，开开眼界，也听听清闲的营业员在练英语、日语口语。

“朝花”、“华彩”、“文物”都专营音乐美术书籍，“商务”、“中华”又基本上只卖自家的书。剩下那六、七家“兼收并蓄”的书店，都隶属于北京市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原来专售旧书，如今基本上都改售新书。

这里曾经是木版线装书的天下。清末民初，开始流行铅印平装书和石印线装书。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七十三回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新、旧书店之争的有趣描述。随着价廉物美的平装书的逐步盛行，再加上海内外学术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的大力搜求秘籍珍本，琉璃厂所能提供给一般读书人的有价值的线装书必然是越来越少。

其实，琉璃厂书肆的魅力不在于“线装书”，而在于“旧书”。如今谈旧书，当然不只是指明清刻本，还有清末民初乃至五、六十年代铅印的各种书刊。买新书挑选的余地不大，想读什么就买什么，只要书店里有就行了，连讨价还价都用不着。买旧书可就不一样了。不只是个价钱高低的问题，还

要考眼力、凭机遇、看胆识，这才谈得上其乐无穷。买新书尽可托人去办，买旧书却必须自己去翻检查询，因为这种访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郑振铎的小说《书之幸运》中，主人公仲清买到一种好书，自觉“占了敌国大片土地似的喜悦”。我未曾如仲清访到稀世珍本，可很能体会他的心情。几乎所有写买书记的，都不记其买新书的经历。固然因新书印数以千以万计，根本成不了珍本，除非遭查禁销毁；更因买旧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绝非买新书可比。前几年我还能在这里买到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李霖编的《郭沫若评传》、冯至著的《伍子胥》、丁西林著的《妙峰山》，以及“文革”前出版的《判断力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等，如今旧书基本绝迹。

文奎堂和古籍书店二楼有一点线装书和解放前的书刊，可价钱又贵得吓人，大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味道。一本1932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神话辞典》，六百页，标价四百元；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考古学社社刊》，六册，标价六百元。我想除了外国学者或哪个图书馆愿意收藏，国内读书人大概没有愿出这笔冤枉钱的。

手头保留着一张1976年4月4日琉璃厂古旧书刊门市部的发货票：共购买《昭明太子集》、《禅月集》、《石柱记笺释》、《文山题跋、石门题跋、遗山题跋》、《于湖居士文集》五种六册（前两种三册为线装），书款合计二元五角。那时候“文革”还没真正结束，书籍便宜理所当然：如令科学文化受重视，旧书涨价也可以理解。甚至再新办几十所大学，琉璃厂的旧书一扫而空也说不定。也许正是为了保留几部像样一点的旧书以壮门面，书店才故意漫天要价。跟书店里一位老师傅谈起旧书业的不景气，他却告诉我当年全北京城送到造纸厂的旧书可“海”着呢。当三个月后他们奉命赶去挑选旧书时，已不知有多少秘籍珍本早就成了纸浆。言下之意，经过那场浩劫，旧书的来源近于枯竭，旧书业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琉璃厂能有那么一个真正出售旧书的市场。没有解放前的旧书可卖，就卖解放后的，乃至这几年出版的处理书刊。倘若利润太低，有些书不降价乃至稍微提价也可以。有好些书在新华书店里一闪而过，再也找不着。比如前些年出版的《知堂回想录》，我漏过了，此后虽也寻寻觅觅，却再也无缘得见。把售书的重点放在几年前、几十年前乃至几百年前的旧书，而不是当年出版的新书，这才能保持琉璃厂书肆特有的魅力。要不再过几年，琉璃厂中国书店和王府井新华书店没什么区别，我怀疑这里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旅游胜地，而对真正的读书人失去吸引力。

选自《书里书外》

美国的珍本书

· 董鼎山 ·

去年秋间，刘宾雁在我纽约寓所作客，谈到“非虚构小说”，我向他提到了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地。我的书架上正好有卡波地的名著《冷血》，这是一本印数有限的初版本，上面有作者的签名，并有版本的编号。我因只有一本，不能割爱。但我送了他一本卡波地的《圣诞故事》，也是有作者签名及编号，印数有限的初版本。

赠书给文友是一件快事。我当时向刘兄说，这是一本珍藏本，很有价值，望他好好保存。

我不是藏书家，所藏这类珍本也不多。美国藏书家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们藏书不是为了爱书，而是为了爱书的价值。很多藏书家购买了珍本，不是为了阅读与把玩的乐趣，而是把藏书当作投资。在美国，什么都是以金钱价值为前提，集邮与收集古玩名画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将来价值的上涨。因此，有的珍本价值的上涨是人为的。

古书好似古董，在今日必须以高价收购乃是必然之事。现代文学的初版本成为收藏家的对象却是近来一种奇特的现象。例如，一本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畅销书，当时的书价不过三元九角五分，如果保存得好，有的名著今日可值七十五元；如果外封面纸仍保存无缺，甚至可多值二三倍。现代的藏书家愿出价一百至五百元收购一些二十年前才出版的初版本。越有人要，辗转越多，书越是值钱。一些特别富有脾气古怪的藏书家，常常愿出高价搜购杰出作家的初版作品，十余年来，这些初版本价值的高涨程度令人吃惊。

藏书家的重视初版本，理由很多：有的是因书的装帧特佳；有的是因后来的版本文字有了改变；有的是因为作者特地印了有限的初版精装本编号，专门送朋友当礼物。一个版本的值钱，主要当然是在藏书家市场的需求。英文新书每年出版达七万五千种之多，当然不是本本都是值钱的，试想，七万五千种的新书，如果每版只印最低限度的一千五百本，每年总数要达一亿本以上！奇怪的是，除了文学书之外，有的藏书家也在开始收藏关于经济，化学，太空旅行，电视，电脑各方面的初版本。

以文学书而言，许多小说家只不过昙花一现，十年之后不一定仍在出版小说。因此藏书家也应该有一点文学修养，有敏锐的眼光，看中了一个有前途的天才作家，把他的第一部著作初版本收藏起来，保存如新，数十年后很可以赚一点钱。

由于藏书家的兴趣，有生意眼的出版商应时而起，故意印刷一些有限的版本，希望从中取利。比如说，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拥有广大读者，初版新书往往一印五六万本，出版商就故意发行一种印数有限的精装本来吸引藏书家。这类印数有限的版本有时只印一二百本，每本编号，售价六七十元。正如股票市场一样，如果时机合适，收购者众多，这类“珍本”就会立即涨价。

有时，小型出版商会恳求名作家给他们一些不重要的著作出版，印数不多，物以稀为贵，也会变为“珍本”。

上面说过，藏书家所重视的不仅是初版本的文学质量与标准，还有书的外表，纸质及美术设计。纸质非常重要，如果纸张不佳，任何初版本不能经

受时间的沧桑。书的外封面纸也很重要，受珍视的初版本如果保存如新，二三十年后，其价格可达原价十倍，如果外封面纸完好，又可多加十倍。

在过去十余年里，收藏家所最注意的是两种书籍的初版本，一是现代文学中的“巨人”如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倍克，F.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等的作品；一是所谓“逃避文学”，如科幻小说，惊险侦探小说之类。

近六七年中，名作家的珍本市价并不十分高。以福克纳作品的版本而言，每年所可拍卖者约五十件，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特殊突出的高价珍本，其余平庸得很，有的价格甚至在降低。在同一时期，海明威的珍本价目却涨了百分之二十。史坦培克也不错。诗人劳勃·弗劳斯特(Robert Frost)的珍本价值在降低，因为收藏家的兴趣移向先锋派和落拓派的诗人如亚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等人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却身价百倍。他的小说《伟人盖茨倍》(The Great Gatsby)被摄为电影上映时，初版本的价目立时上涨，藏书投资者都知道这项门坎。

真正对藏书投资有兴趣者，往往避免价值一百元以下的初版本，因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不会看涨，其余百分之五则有光明前途。这就要看收藏家有没有敏锐的眼光。投资的收藏家情愿出高价收集稀有版本。一九七五年时价值五百元的珍本，今日可高达一千五百至二千元。

“逃避文学”的珍本，包括《人猿泰山》作者埃德茄·赖斯·波罗斯(Edgar Rice Burroughs)的作品，及雷门·张德勒(Raymond Chandler)，达歇尔·哈默特(Dashrell Hammett)的侦探小说等。收藏这类书籍的藏书家文学兴趣标准较低，他们所重视者是书的外封的设计。这些封面往往画了口含雪茄的私家侦探与妖艳的女人，在艺术上并无价值，不过代表了美国某个时期(二三十年代)的气氛，很受留恋过去的人士的欢迎。

“逃避文学”的初版本受藏书家重视，相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却不一定吃香，这又是另一个奇特现象。近几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如艾萨克·辛格及伊莱亚斯·卡内蒂的初版本，却在逐渐引起收藏家的注意，可是它们是不是会在下一代吃香，仍是一个疑问。

文学书籍的被当作古董，又有另一个特点：文学批评家与学术研究者好似验尸官，往往将死者的作品不断批判与剖析；已故作家在文学界的名誉与身份时升时降，这也影响了版本市场价格的升降。有识者说，名作家的身价最高时期是他刚死不久之时，因为那时不少报章杂志会发表死者讣闻简传，把他捧得很高。这当然也是藏书家应该出售死者作品之时。不久以后，死者即被慢慢遗忘，藏书家对他的兴趣至少须过了十数年才会复活，到那时，大学文学系开始注意死者的作品，研究生需要一个作家作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很多作家在文学史的声望就是这样复活的。最极端的例子是，英国十八世纪几个次要的小说家，就是因为近年大学研究生的研究论文又再度的名见经传。

初版本如有作者的签名，价值特高。如有著名受件者之名，价值尤高。有的作家任意的替读者签名，有的则对签名极为憎恶。在这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仍通行。

五十年代时，诗人T.S.艾略特某次在纽约一书局替购书的读者签名。有一个聪明的藏书家购了一本艾略特新书请他动笔。艾略特问：“题赠给何人？”藏书家答，“哦，请你写‘给亚伦·金斯堡’吧。”

艾略特不加思索，在书页上写了“给亚伦·金斯堡；T.S.艾略特。”五十年代金斯堡不过刚刚露出头角，那位聪明的收藏家却颇有远见。这本书于今日成为极有价值的稀有品，金斯堡自己则尚在闷葫芦中。

珍本的售与购，多半都经过拍卖商。但纽约也有几家特殊的旧书店或古董店，能够鉴赏与收购有价值的初版本。对以投资为目的的藏书家而言，收藏珍本是件正经的商业。

* * *

我并不是一个收藏家，偶有的几本珍本，是朋友送的，把它们保存是为自己的兴趣，不是为了“投资”。卡波地的《冷血》是豪华精装本初版，装在盒内，总共只印了五百本，每本都有作者的签名与编号。我的一本编号是“116”。另一本我所收藏的卡波地著作《感恩节访客》，只薄薄的一本，其实是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一共不过六十二页，也装在盒中。书中首页有言：

“《感恩节访客》此版纸张特佳，装订特美，共印三百本。每本编号，并有作者签名。27，杜鲁门·卡波地（签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

选自《天下真小》

主要参考书目

-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顾志兴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陈登原 上海书店 1983 年版
《古典目录学浅说》 来新夏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中国古典文献学》 吴 枫 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古书通例》 余嘉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 郑伟章、李万健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
《版本学概论》 戴南海 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古代文献知识》 赵振铎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校勘学概论》 戴南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古书读校法》 吴孟复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 罗孟禎 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古籍知识手册》 高振铎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简明古籍辞典》 胡道静主编 齐鲁书社 1989 年版
《简明古籍整理辞典》 诸伟奇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黑白》 伊林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印刷
《书林琐记》 雷梦水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书的历史》 庄 葳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书报话旧》 郑逸梅 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
《艺林散叶》 郑逸梅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读书随笔》 叶灵凤 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晦庵书话》 唐 弢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书林清话》 叶德辉 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书史简编》 刘国钧著 郑如斯补订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年版
《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版本知识浅谈》 陈国庆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藏书纪事诗》 叶昌炽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文言津逮》 张中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书籍知识》 高 峰

书文化大观

李广宇 编著
张安平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1.625 印张 400(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 - 5043 - 2353 - 5/G · 859
(京)新登字 097 号
印数: 5001 - 10000 册
定价: 19.50 元

我之于书

· 夏丏尊 ·

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我向无对于任何一向题作高深研究的野心，因之所买的书范围较广，宗教，艺术，文学，社会，哲学，历史，生物，各方面差不多都有一点。最多的是各国文学名著的译本，与本国古来的诗文集，别的门类只是些概论等类的入门书而已。

我不喜欢向别人或图书馆借书，借来的书，在我好像过不来瘾似的，必要是自己买的才满足。这也可谓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买到了几册新书，一册一册地加盖藏书印记，我最感到快悦的是这时候。

书籍到了我的手里以后，我的习惯是先看序文，次看目录。页数不多的往往立刻通读，篇幅大的，只把正文任择一二章节略加翻阅，就插在书架上。除小说外，我少有全体读完的，大部的书，只凭了购入当时的记忆，知道某册书是何种性质，其中大概有些甚么可取的材料而已。甚么书在甚么时候再去读再去翻，连我自己也无把握，完全要看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兴趣。关于这事，我常自比为古时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书，譬诸列屋而居的宫女。

我虽爱买书，而对于书却不甚爱惜。读书的时候，常在书上把我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竟用红铅笔划粗粗的线。经我看过的书，统体干净的很少。

据说，任何爱吃糖果的人，只要叫他到糖果铺中去做事，见了糖果就会生厌。自我入书店以后，对于书的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可是仍不免要故态复萌，想买这种，想买那种。这大概因为糖果要用嘴去吃，往往摆存毫无意义，而书则可以买了不看，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缘故吧。

——《中学生》第三十九号

选自《平屋杂文》

卖 书

· 郭沫若 ·

我平生受了文学的纠缠，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了，我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民国二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民国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了。走的时候本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终究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两年，它在我的笥里是没有取出过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的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民国七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起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交给了友人们，明天便是我永远离开冈山的时候了。

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实在是不能丢去。但我又不能不把它丢去。这两部书和科学书，我的精神尤为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时候我因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也比较珍奇，在书店里或者可以多卖些价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伞向冈山市上走去，我到了一家书店，我进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青年的日本人怀着两只手粗暴的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一掉各自去做他的事情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失悔得什么似的，心里又是恼恨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人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对我！我抱着书仍旧回我的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无限的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塞，太戈尔，凯波，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我的年青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起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没有一个人。我向着—位馆员交涉了说我愿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谄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生平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恬静，非常的轻灵，雨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的脚上受着MagdaIen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是这样罢？——这样的感觉，我到现在也还能记忆，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自从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是没有往

图书馆里去过，六年以来，我坐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经过了冈山五六次，但是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的三年间的生活的回忆是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罢？

呵，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栖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弄过舟的旭川，那儿有我每朝清晨上学，每晚放学回家，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没有？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录没有？看那样的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终竟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我想来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蚀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没要怨我抛撇了你们，也没要怨知音的寥落罢！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存，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还要幸福些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住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一样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我现在也还要希望什么呢？

啊，我现在的身体比从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个儿子已渐渐长大了起来，生活的严威紧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们长到几时？但我要把他们养大，送到社会上去做个好人，也是我生了他们的一番责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没有重到冈山来看望你们的时候，我死后的遗言，定要叫我的儿子们便道来看望。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藉着你们永在。

选自《现代十六家小品》

